鱸鄉萍踪

朱自華隨筆

前　言

由于命运的安排和工作的性质，几十年来写了不少文章。现在收进这本集子里的，只是其中的极少一部分。这并非出于谦虚的考虑，而是不得已之举。因为平生写过的文章，相当一部分篇幅很长，比如调查研究报告就是这一类。我滥竽于某个研究岗位十余年之久，占去了我青春和生命的很大一块，当然写了不少调查研究报告，可惜因为篇幅的原因不适宜收进本集。还有一部分文章不能或不便收进这本属于我自己的小书，原因也不必细说，这也算吾辈文人的一个小小悲剧吧。

那末，收进这本小书里的，就显得很寒碜了。寒碜归寒碜，还得编排一下，便于读者浏览。

“繁星篇”收了 58 篇文章，放在前面的是近两年发表在《扬子晚报》副刊《繁星》版上的。发表以后，据反映，读者还愿意看；篇幅也不长，几分钟就可以看一篇。我是提倡写短文章的，重印这些文章，就有“短文章也可以说清一点道理”的意思在内。本来，写这些文章还有一个暗暗的心愿，象一个企业生产某种特别产品一样，想走出一条“哲理散文”的路子，把文章写得轻松些、短些，可是讲出一点勉励自己、也劝劝别人的带有哲理性的话，如《性格》、《也说西康路上》、《善于》等就有这个意图。不过，说说容易做起来难，“哲理散文”的形成，还有待长期的努力。“繁星篇”里的文章，有一批是发表在《新华日报》或其它报刊上的，类型相近，就归在一起了。还收了几篇早期作品，反映了时代的烙印，这也算不忘历史吧。

“前后篇”，是指为几本著作写的“序言”或“后记”，前言后语之谓也。这里值得提到的是有一篇“《沿海六行》序”，这是我荣幸地曾经为费孝通先生的著作《沿海六行》写的一篇序言。当然，这是费孝通先生给我的荣誉。序言写得不好。至于当时的心情和来龙去脉，读者看看文章就可以明白了。费先生与我，都是吴江市松陵镇人士。从1983年以后，我曾配合费先生做过十余年的乡镇企业和小城镇的调查研究工作。从年龄上说，费先生长我一辈；从学识上说，我充其量是个不太够格的学生；从为人方面说，我对费先生充满敬佩之情。因此，他让我写一篇序言，我居然就写了。也因此，我冒昧地把费先生1984年为我的一本小书《乡镇工业与小城镇》所写的序言，也收进这本集子。看看费先生所写的，这才叫序言。

“乡镇企业篇”，收进了40篇文章，虽然已属本书各篇中文字较多的一篇，但应该说，只是我所写过的这方面文章的很少一部分。因为1980年我从上海回到江苏工作以来，对乡镇企业一直很关心，调查它，研究它，宣传它，支持它，迄未停息。这方面，出了几本专著，也宣传到了海外，所以收到本书里的只是一些短文章。据我所知，1983年到1988年间发表在《经济参考》报、《江苏乡镇企业》杂志等报刊上的那些短文章，曾经对乡镇企业和基层的同志，对有些专业研究人员，起了一定的作用。

“小城镇篇”，与“乡镇企业篇”是姐妹篇，可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密不可分。为便于阅读，分割为二。其中有一篇《一介书生的六十个春秋》，写的是费孝通先生。把这篇文章放在这一篇里，未必很合适，但可以认为与“小城镇篇”的关系最密切，并且认为是本人的一篇认真之作，这要请读者注意。

“经济篇”内的文章，长长短短，说东道西，大抵反映了我在经济问题上的一些观点，有几篇略有新意而已。

“交流篇”，收进了我七次去日本访问时同日本学者进行学术交流的一部分讲演，旨在提供一个信息：日本学者很注意中国乡镇

企业和小城镇建设，她们——如日本著名学者鹤见和子教授称之为“内发型”的发展模式。十余年来，这些日本朋友一直密切关注着江苏经济的发展趋势和许多乡镇企业家的事业和命运。日本大分县知事平松守彦先生象关心他所倡导的“一村一品运动”的兄弟那样，关心着江苏的乡镇企业。江苏的乡镇企业和小城镇研究，已经形象鲜明地走上了国际学术交流的舞台。

“莫名篇”，收进了一些不忍割爱可又无处可去的文章，因此，“莫名”大概是“莫名其妙”或“没法取名”之意吧。《追念顾惕》一文收进此篇，以永远纪念我的一位好朋友。先我而去者，我今纪念，他日纪念我的，又将是谁呢？

在吴江市松陵镇——我的出生地——原来有一座鲈乡亭，座落在太湖之滨、孝母坟旁，是吴江水乡一景。这大概因为“莼鲈之思”的典故就出在吴江这一带，而有鲈乡亭之命名吧。很可惜，此亭1936年毁于日本军国主义的炸弹之下。我是从鲈乡飘出来的一叶浮萍，浪迹天涯，萍踪无定，故有此集名。

尽管不过薄薄的一本，对我本人来说，几十年过去了，逝者如斯夫！对读者来说，有一两篇让您喜欢，于愿已足矣！

朱通华

1994年7月于南京

目录

前言…… (1)

繁星篇

扬州记诗…… (2)
镇江记趣…… (4)
山西记水…… (5)
吐鲁蕃记热…… (7)
滕王阁的魅力…… (9)
夏天，上海比南京热…… (12)
我看日本人的待客之道 …… (14)
守松守信 …… (17)
也说西康路上 …… (19)
性　　格 …… (21)
善　　于 …… (23)
溺　　爱 …… (25)
巴金先生(上) …… (27)
巴金先生(下) …… (29)
新春访巴金 …… (32)
梅园联句
——中国小城镇研究的根和叶之一 … (34)
庙港蚕村
——中国小城镇研究的根和叶之二 … (37)
松陵话棋眼
——中国小城镇研究的根和叶之三 … (40)
苏北探异同
——中国小城镇研究的根和叶之四 … (43)
卡拉罕到淮阴

——中国小城镇研究的根和叶之五 …… (46)
合肥岳战
——中国小城镇研究的根和叶之六 …… (48)
温州看市场
——中国小城镇研究的根和叶之七 …… (51)
桥头富市穷镇
——中国小城镇研究的根和叶之八 …… (54)
退思园答客问
——中国小城镇研究的根和叶之九 …… (56)
吴仁宝又出新意 …… (59)
“广告”的广告 …… (61)
要革革“历来如此” …… (62)
略评“随便讲讲” …… (63)
年终防“三热” …… (64)
喜看西瓜又满街 …… (65)
这样的“气派”不宜提倡 …… (66)
下笔之前须三思 …… (67)
少而精 …… (68)
新苗勤浇长如风 …… (70)
谈“出色” …… (72)
立合乎时代要求的大志 …… (74)
穷办法办法无穷 …… (76)
用在刀口上 …… (78)
“把关”从哪里把起 …… (80)
大家都来做青年工作 …… (81)
民主首先在领导班子内部 …… (83)
卧轨拦车是学谁的样 …… (86)
何必在请柬上摆阔气 …… (88)

不要“头多肩胛少” …… (90)
凌云之业，须实地去干 …… (92)
为一场演出的好风气喝彩 …… (95)
谈谈“从恶如崩” …… (97)
提倡一点“君子之风” …… (99)
“邑有流亡愧俸钱” …… (101)
由此及彼的感想 …… (103)
有以为继 …… (105)
爱之厚薄观 …… (107)
年年有余 …… (108)
半点不薄白衣人 …… (109)
敬老养老不是“封建孝道” …… (111)
正确处理职业差别和兴趣距离 …… (113)
家庭观念 …… (115)
贵在埋头苦干 …… (117)

前后篇

故乡吟 …… (120)
《乡镇工业与小城镇》序言(费孝通) …… (124)
《沿海六行》序 …… (128)
《小城镇经济管理》序 …… (131)
《中小企业管理思考百题》序言 …… (133)
《农村振兴与小城镇问题》序言(朱通华、宇野重昭) …… (135)
《江苏百家名镇录》后记 …… (144)
《沿海经济开发与发展》序 …… (149)
《渡村创业纪实》序 …… (151)
故乡明月千重光 …… (153)

乡镇企业篇

中国农村工业化和现代化的道路
——江苏乡镇企业的兴起之一 …… (158)
“节制闸”和“蓄水池”
——江苏乡镇企业的兴起之二 …… (160)
小城镇建设关系到“四化”全局
——江苏乡镇企业的兴起之三 …… (162)
起用能人、重用创业者
——江苏乡镇企业的兴起之四 …… (164)
要有一支好的供销队伍
——江苏乡镇企业的兴起之五 …… (166)
从实际出发扬长补短
——江苏乡镇企业的兴起之六 …… (168)
小而专小而精
——江苏乡镇企业的兴起之七 …… (170)
面临新竞争，更上一层楼
——江苏乡镇企业的兴起之八 …… (172)
乡镇企业的改革还大有文章可做 …… (174)
乡村工业中的实践、政策、理论 …… (176)
欧桥村的一九八四年 …… (178)
城乡协作产生新的生产力 …… (182)
江苏农村的四十颗“明星” …… (184)

多层次、多领域的城乡联合
——江苏乡镇企业新势头之一 …… (188)
以最快的手段获得市场信息

——江苏乡镇企业新势头之二 …… (190)
精益求精，狠抓质量
——江苏乡镇企业新势头之三 …… (192)
大力兴办第三产业
——江苏乡镇企业新势头之四 …… (194)
领导部门跟着基层转
——江苏乡镇企业新势头之五 …… (196)
军民协作多，经济效益高
——江苏乡镇企业新势头之六 …… (198)
论“离土不离乡” …… (199)
苏北如何发展乡镇工业 …… (208)

农村繁荣和农民致富的道路
——介绍“苏南模式”之一 …… (215)
评价“苏南模式”的三条标准
——介绍“苏南模式”之二 …… (218)
在农村经济发展战略中的独特位置
——介绍“苏南模式”之三 …… (221)
有独到之处，亦有待完善
——介绍“苏南模式”之四 …… (223)
小农具，大问题 …… (225)
“建房热”的两面观 …… (228)
乡镇企业的“三上一高”与三支力量 …… (230)
乡镇企业的观念要更新 …… (232)
农民增收与文化程度息息相关 …… (234)

欧桥的经营对策 …… (236)
八仙过海，各显其能 …… (238)
农民投资意识为何薄弱 …… (242)

真诚地为乡镇企业服务…… (244)
改革乡镇企业管理体制的新思路…… (245)
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方式…… (248)
同乡镇企业同志谈政治体制改革…… (252)
六年办厂无失误的奥秘…… (254)
《明星》有黑点　原因堪深思…… (256)
“草根工业”的现代化之路…… (258)

小城镇篇

乡镇工业的兴起与小城镇的繁荣…… (267)
从乡村工业看到小城镇
——随同费孝通教授苏南调查见闻 …… (270)
三千里路镇和乡
——随同费孝通教授苏北调查见闻 …… (276)
古镇名镇建设中的一个重要问题…… (280)
实行镇管村体制势在必行…… (282)
日本小城镇见闻…… (285)
务实·致用·多学科攻关…… (288)
小城镇建设与中国城市化道路…… (295)
一介书生的六十个春秋…… (305)
小城镇的纽带作用…… (311)
喜看《江苏名镇》播出…… (316)
用直人的精神…… (317)
对乡镇开发小区应有全新的观点…… (319)

经济篇

比较·内因·思考…… (322)
致省长的一封信…… (326)
赞县办大学——沙洲工学院…… (327)
学习三得…… (330)
稳定的农业,兴旺的副业,发达的工业…… (334)
“方寸地”上做出大文章…… (337)
当前苏南农业的经营形式和规模…… (340)
城乡联合的基础和原则…… (348)
“七五”计划与乡镇企业…… (356)
对农业基础地位的再认识…… (359)
重视企业和群众的要求…… (365)
对长江三角洲开发的经济思考…… (367)
面向 21 世纪的构想 …… (370)
“万无一失”与“一失万无”…… (37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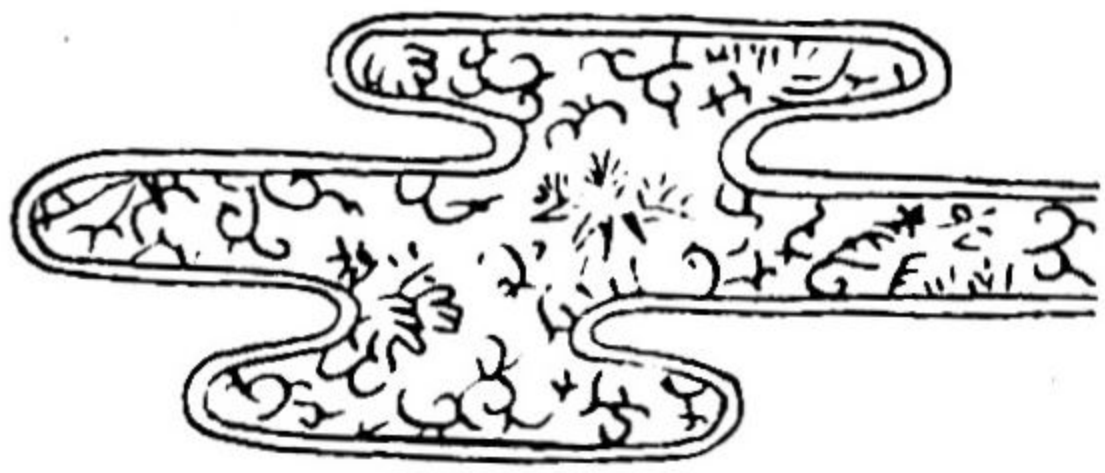
交流篇

初访日本追记…… (375)
江苏小城镇及其研究…… (381)
振兴农村乃建国之本…… (396)
中日农村发展的共同思考…… (401)
中国苏南地区的新发展及其新影响…… (410)
江苏乡镇企业与大分“一村一品”运动…… (419)

莫名篇

追念顾愉……（427）
理·利·情·义·法……（429）
一句未必适宜的开场白……（431）
调查研究的立脚点……（433）
对改革告别仪式的一项建议……（435）
论大字报……（436）

繁星篇



扬 州 记 诗

又是烟花三月，又一次来到扬州。这个每来一次都使人感受到青春气息的文化古城，如今洋溢着发展经济、对外开放的时代气氛。原来，这里正在举办“琼花节”。琼花，多么吸引人的奇花，北宋名臣韩琦在《望江南》中写道：“维扬好，灵宇有琼花。千点真珠擎素蕊，一环明玉破香葩，芳艳信难加。”扬州琼花以其冰清玉洁的形象和“天下无双”的独特性，使她誉满天下。由于平民百姓的钟爱和文人墨客的渲染，引发了种种传说，有说琼花来自天上，为仙女手植；有说琼花不阿权贵，因人而开；流传最广的则是隋炀帝因慕名来扬州看琼花而亡国的故事。凡此种种，都给琼花增添了浓郁的浪漫色彩。

如今，琼花已被定为扬州市的市花，每年四、五月间（农历三月上旬），她以（女）主人的身份出现在“琼花节”上，笑迎八方来客和四海商贾。这样，琼花虽然被人格化和用来为经济服务，仍然不乏诗意、不失季节性和富有地方特色，这正如苏州之举办“丝绸节”，丹阳之举办“黄酒节”，镇江之举办“金山之光”，高邮之举办的“双黄鸭蛋节”，……具有推陈出新、雅俗共赏的含意。

我这一次之碰上“琼花节”，既非红贴所邀，亦无“万贯”缠腰，是陪两位已退休的老知识分子作一日之游而已。我们在西园“御码头”下船，在美丽的瘦西湖畔徜徉而过，但见两岸柳荫浓密，柳枝直垂水面，摇　生姿，使人神往。岸边几株修竹，几丛杜鹃，翠红掩映着粉墙黑瓦的民居，使人如在画图之中。扬州市近几年精心设计和拓建了从“御码头——瘦西湖——二十四桥——平山堂”的游船路

线，确是匠心独运、继往开来，为古城扬州添了一景，增了光彩。

应该说，这次扬州一日游的最大收获还不是赏心悦目的春光，而是在街头买得一本小册子里面的一首诗："上堂已了各西东，惭愧阇黎饭后钟。三十年来尘扑面，如今始得碧纱笼。"（唐·王播：《题惠照寺木兰院》）如果不了解作者王播的生平，就难以了解此诗的含意。王播（公元759—830年），太原人，其父王恕曾任扬州仓曹参军，遂随父定居于瓜洲。少孤贫，曾寄食于扬州惠照寺木兰院。长期寄食，毕竟使有的和尚势利起来，有一次故意吃过饭后才打钟，待王播赶到，饭已开过，和尚们纷纷抹嘴离去。长庆二年（公元822年），王播出任淮南节度使，开府扬州，重访旧地，发现他当年落魄扬州时写在墙上的诗，竟已罩上碧纱。世态之炎凉，使王播感慨不已，遂有此诗。王播于历史上应如何评价，此处且不评论。就此讨而言，读了许多书的王播，毕竟没有被饭后之钟打得消沉下去，否则不会开府扬州；想来也不该被墙上碧纱罩得云天雾地，忘记了锦上添花之多余或无聊。

（载《扬子晚报》1993年6月11日）

镇 江 记 趣

近日陪两位来江苏讲学的日本朋友作镇江一日游。他们是初访镇江，自然非到金山、焦山观光不可。镇江市容建设之飞速进步，金山寺之端庄，京口古迹种种神话之迷人，使本来对《三国志》很熟悉的日本朋友赞叹之声不绝。

有趣的是到焦山定慧寺观光时，竟会遇到这么一件趣事。我们走进了大雄宝殿，一张横桌上铺开着一本缘簿，缘簿后面板凳上坐着一中年出家人，正在同一起坐在板凳上的一位俗家人聊天。我真后悔，我过去常常喜欢浏览一下缘簿的习惯在这次也没有改掉，走上前去望了一眼（并非动手翻阅）。这时，这位出家人清清楚楚地冒出了这么一句：

“胖子，来不来写一点?!”

我是从范文澜先生的《中国通史》中而对佛学发生浓厚兴趣的，是从通读了凡能找到的一切有关李叔同先生（弘一法师）的资料中而对广大僧众怀有敬意的。因而，对定慧寺这位出家人的这句不逊之言，应该如何应对，太没有思想准备了。

我只好说：“你叫我胖子，我还能写吗?”

这位出家人又说：“难道你不胖?”

我于是默然而退，为我自己的不争气的胖态而惭愧！

走出大雄宝殿，我仍然不敢有任何不敬之意。就在这座定慧寺里，有一位茗山法师，我读过他的诗集，我们都是省政协的成员，我很敬重他。

佛门有十戒，其中一戒为“戒诳语”。我这篇小文严守这一戒。

载（《扬子晚报》1993 年 6 月 27 日）

山 西 记 水

水？打开龙头哗哗地流出来的不就是水么？长江、太湖、洪泽湖、高邮湖里扬波翻腾的不都是水吗？水在江苏，可谓随处可见，随手可得；可是在山西，她的价值，她的可贵，就不是江苏人所能体会到的了。

山西最值得骄傲的地方之一是晋祠，在太原西南 25 公里的悬瓮山麓，为纪念周初分封晋国的开国诸侯叔虞的祠堂，始建于北魏。晋祠有三“国宝”（献殿、圣母殿、李世民书法碑），三“绝”（鱼沼飞梁、四十一尊宋代彩塑、龙凤古柏），曾经使已故建筑大师梁思成先生为之流连忘返、废寝忘食。而与之相衬托的是绕晋祠而流了几千年的潺潺山泉，为浑朴端庄的唐宋古建筑凭添无限情趣。所以这里长得极好的水稻，有“山西小江南”之称。可是在今年四月的一天，潺潺山泉戛然断流了，使晋祠本来像一座生机盎然的大水阁，如今却如搁浅的古船。山西有关方面邀请了国内研究水资源的专家，数次会诊而未见治理效应。山西的朋友惊呼：这可是不祥的先兆呵！人类虐待了自然，自然将要给人以惩罚呵！

雁门关内的浑源县，矿产资源丰富，又有如北岳恒山、建在峭壁上的悬空寺等海内外著名的旅游资源，是山西经济发展中等偏上的县，与江苏江阴市结为姐妹县，对外联系颇为广泛。可是，住到招待所的客人所感到的第一件不方便之事，就是每天要在晚上十点以后才有自来水供应。非服务不周也，水资源不够也。据说，山区有的老百姓有整年不洗澡的。山西的朋友还讲了这么一个不是笑话的故事：有两个老汉相约一起赶集，其中一位忽然毁约不去，

使另一老汉大为失望，生气地说：我都洗过脸了，你怎么好不去呢！

山西是块宝地，燕赵男儿多豪侠之士，为中华民族留下了多少荡气回肠的悲壮故事。乌金遍地，煤炭供全国，江苏能源的三分之一来自山西。在一定意义上说，没有山西的支持就没有江苏生产的规模和效益。

山西已觉水之贵重如油，分量如金，爱之惜之则多，鄙之滥之则竭，护之宜早，迟则生悔。这对现今水资源尚为丰富的江苏，无疑是宝贵的经验。

（载《扬子晚报》1993 年 8 月 22 日）

吐鲁蕃记热

我国新疆东部的吐鲁蕃市，以“热”闻名于世，素有“火洲”之称。那里一年有5个月的气温持续在35℃以上，其中有40天左右的温度高达40 ℃以上，1975年7月30日测得气温为49℃，为我国最高气温记录。吐鲁蕃夏季的中午地表温度平均为75℃，最高达到82.3℃。“沙里烤熟鸡蛋，墙上烙熟大饼”的说法一点不假。

热到这个样子，反而热出了名堂了，“热”就成为当地一大特色了。国外和国内的许多人纷纷慕“热”而去，把领略“热”景作为一个旅游项目。加上《西游记》中对火焰山的生动描写，再加上电视剧《西游记》有景有神的成功再创造，夏季的吐鲁蕃的“热”就有点神奇兮兮，火焰山就成了必到之地，那怕热昏了头，出尽了汗，也非去不可。有一位72岁的法国老人，已被查出身患癌症，医生和朋友劝他以在世无多的时间，参团去法国、瑞士旅游散心，但他出人意料地选择了吐鲁蕃。朋友们问他何以作出这样的选择？他说：他看过法文版《西游记》，被神奇的火焰山和孙悟空迷住了，非要实地去看一下不可。参观火焰山那天，他婉谢搀扶他的朋友，用三个多小时的时间，登上了拔海800多米的火焰山山顶，手舞足蹈，大喊大叫。下山时一身汗水，兴奋异常，连连说：“如愿以偿，如愿以偿”。这可以说，他是花大本钱品尝火焰山的“热”的。这次我们亲临其境，觉得火焰山确实大有看头，它赤峰秃岭，显赭红色，层峦叠嶂，形状怪异，夏天的阳光照在山岩上，红光闪闪，云烟燎绕，蓝天之下，白云朵朵，衬以一望无际的戈壁沙滩，火焰山真如一只硕大无比的火鸟，自有英姿万千。

我的新疆朋友还告诉我：前年他从自治区的工作单位下放到吐鲁蕃市挂职锻炼一年，整理行装时带了一把雨伞，他想：毕竟此去要一年时间，带了总有用处。那里知道，直到挂职期满，雨伞始终没有用上。他说：只有一次下了一点小雨，待他回屋去取了雨伞出门，雨已停止，尘封一年的雨伞还是没有派上用场。吐鲁蕃干燥少雨，由此可见一斑。

那末，在这样干燥和奇热的地方，日子过得下去吗？这种担心实在多余。凡是到过吐鲁蕃，才知道造物主（自然规律）是多么的别具匠心（奇妙）。在吐鲁蕃，包括在火焰山，既有酷热无比的茫茫沙滩，也有林荫蔽日、田园如画的葡萄沟、桃儿沟、木头沟、吐峪沟、连木沁沟、树柏沟和胜金口峡谷。七条沟里泉水咚咚，林木葱葱，葡萄架绵延数公里，一串串鲜葡萄，碧如翡翠，艳如玛瑙，圆如珍珠，大如橄榄，这种清凉世界同炎炎夏日真是大异其趣。旅游者来到葡萄沟的长棚之下，可以随意在一张圆桌旁坐下，每人花 2 元钱，就有两盘不同品种的鲜葡萄端上桌来，粒粒皆鲜甜，吃完还可再添，吃够为止。此时，神清气爽，暑意全消，对吐鲁蕃的印象就铭记在心、此生常新了。

（载《扬子晚报》1993 年 9 月 20 日）

滕王阁的魅力

夏日偕一二书友，登滕王阁一览赣江之水，重读王勃之序，确是人生一大快事。南昌滕王阁始建于唐永徽 4 年(公元 653 年)，在以后 1300 多年的代有兴废、世有战火中，毁毁建建达 29 次之多，真是多灾多难、历尽百劫！然而如今又如大鹏之展双翅，昂首屹立，脚踩白练，英姿焕发，回眸笑视人间。现在我们所登临的这座滕王阁，是江西以及南昌市政府集巨资大师名匠于一体，从 1985 年动工、于 1989 年建成的。重建的滕王阁，以建筑大师梁思成早年的《重建滕王阁计划草图》为根据，参照天籁阁旧藏宋人彩画《滕王阁》以及宋代《营造法式》一书而设计建筑的。阁高 575 米，上下九层，面积 13 万平方米。历史上的滕王阁最高不过 30 米，楼不过三层。新旧相比，诚如今人一副对联所述：江上才人作序，惊服历代文人墨客；滕王古阁重建，且看当今鲁班之巧。

腾王阁被誉为江南三大名楼(黄鹤楼、岳阳楼)之首，既是闻名遐迩的游览胜地，也是中华民族灿烂文化的象征。一座以滕王(唐太宗李世民之弟李元婴)的封号命名的古阁，既名声大噪于当时，屡毁屡建，又流传千古至今世，愈益辉煌，这是为什么？万人之口，百代之心，可不简单呵。

历史是一面公正的镜子。

滕王阁从唐代到现在，都有效地把人文景观与自然景观巧妙地结合起来，浑然一体，她赢得了“江南多临观之美，而滕王阁为第一”的口碑。请看文学家韦悫(唐大中二年，公元 848 年)的《重建滕王阁记》里的描绘：“冠八郡风俗 之最，包旧时物候之异。春之日则

花景斗新，香气袭人，凭高送归，极目荡神。夏之日则鹦舌变弄，叶荫如栋，纨扇摆摇，绮窗堪梦。秋之日则露白山青，当轩展屏，凉风远来，沉醉易醒。冬之日则檐外雪满，幄中秀暖，耐举樽罍，好听歌管。”如此美阁，谁人不爱？损毁之后，焉不重修？

天下江山之好，亦赖文章相助。滕王阁之名噪天下，不在滕王始建此阁之时，而在22年之后王勃写了《秋日登洪府滕王阁饯别序》之后。“天下好山水，必有楼台收。山水与楼台，又须文学留。……自到江湖来，外人咨不休。倘非子安（王勃之字）序，此阁成荒陬。”（清·尚镕）王勃是我国初唐时期的杰出文学家，与扬炯、卢照邻、骆宾王并称为“初唐四杰”。据史载，他10岁通六经，14岁应举及第授朝散郎，为沛王府修撰。因戏写《檄英王斗鸡文》得罪了另一位皇弟，被赶出沛王府流落蜀中。王勃15岁写出滕王阁序，意境深远，结构严谨，笔调豪壮，佳句迭出，文传天下，名满天下。如果遍翻此前史籍，在王勃作序之前，滕王阁没留下一篇诗文，只有在王勃的《滕王阁序》问世之后，又有王绪作《滕王阁赋》，王仲舒作《滕王阁记》，史称“三王”。到百余年后的中唐时期，韩愈又写了《新修滕王阁记》，称“窃喜载名其上，词列三王之次，有荣耀焉。”后来的历代著名文人，如白居易、杜牧、欧阳修、曾巩、王安石、苏东坡、朱熹、文天祥、辛弃疾、解缙、韩雍、汤显祖、王士祯、朱彝尊等学士名流，皆以登滕王阁一睹江山景色，留一二诗文为爽心快事。初唐以后的1300多年间可以查到的诗文，有1400余篇之多。

王勃的《滕王阁饯别序》全文凡717字，其中写景296字，抒发感情301字，虚文62字，应酬宴会的只有58字，提到滕王的只有“帝子”二字而已。当唐高宗李治读到《序》中的“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等隽句时，掩卷良久，叹曰：“真奇才也！”后悔不该将王勃赶出沛王府，欲重新起用王勃，方知王勃已落水而死。清康熙皇帝对王《序》百读不厌，以董其昌笔意亲笔临摹《序》的全文驰赏江西，这便是后来滕王阁中“御书亭”的由来。毛泽东主席

1964年写给儿媳邵华的即是“落霞”、“秋水”这两句，据说，这是人们迄今看到的唯一毛书楹联。

王勃之《序》，不愧是华夏文字的精血，骈词丽句，琅琅上口，意境高雅，发人深思。《序》中的“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已成为华夏子孙众口一词的骄傲；“老当益壮”、“穷且益坚”、“逸兴遄飞”、“桑榆非晚”，至今犹是人们常用的不朽佳句；“觉宇宙之无穷”，“识盈虚之有数”，“胜地不常，盛筵难再”，多么使人们开卷有益，掩卷思量！

文以阁名，阁以文传，滕王阁之不朽，实有赖于《滕王阁序》的不朽。

（载于《扬子晚报》1994年9月14日）

夏天，上海比南京热

南京在夏天比上海要热一两度，夏天的上海比南京要凉快一些，这是无论南京人还是上海人多少年来都这么承认的。这一点，也可能是有些南京人，比如我，常觉得南京不如上海的一项内容。我的在上海工作的宝贝女儿，是从来不在夏天到南京来探亲的，“啥人会在大热天跑到火炉里来休假呀！”夏天多东南风，那么高的紫金山横卧于南京之东南侧，自然使南京的地面温度要高；上海濒临东海之滨，得海洋性气候之利，自然应该比南京凉快。

然而，现在情况起变化了。

最近在昆山举行的江南经济社会发展研讨会上，中国科学院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的一位专家宣布：今年夏天上海的地面气温比南京要高一度，这是“城市热岛效应”的结果，因此，不是暂时现象。所谓“城市热岛效应”，主要有二：一是近几年上海的高楼大厦纷纷拔地而起，起得很快，“水泥森林”越来越多，绿色面积越来越少。二是“水泥森林”中还装起了空调机，而且是大功率的，抽出来的热气都排放到人行道和马路上，行人趋避无门，使本来不多的空间更加充满了热量。有此两条，上海能不热吗？反过来说，南京的“水泥森林”和空调机还没有那么多，多年努力的绿化工作使偌大的南京城可称绿树成荫，于是取得了今年夏天气温比上海要低的可喜结果。

当然，这一可喜消息想来不会使南京当局喜得从此不热心于改造旧城，想来也不会挫伤有关人士致力于南京城市现代化的积极性。但是，“水泥森林”引起的城市热岛效应，确是使人可怕的，几

十吨、成百吨水泥堆上工地，意味着它要吃掉几亩、十几亩树木草地或本来可以绿化的空间。即使利用拆迁旧房，毕竟也要占领空间。以此易彼，有利也有弊，这就叫效应；如无良策，如无远虑，这就会欠债，就会惩罚人类自己。

现代城市不能没有“水泥森林”。现代城市更不能没有绿色森林。人类的要求并不过分：劳作一天，夏天不要太热，冬天不要太冷。

（载《扬子晚报》1993 年 11 月 9 日）

我看日本人的待客之道

秋高气爽、满山红叶的醉人时光，我应日本大分县知事平松守彦先生的邀请，去参加该县举办的“丰之国书塾”十周年纪念活动，主要任务是作一次《江苏乡镇企业与大分一村一品运动》的讲演。日程上写明，讲演会是下午2时开始。可是在我按时到达会场的休息室后被告知：请于2时40分进场。正当我有所不解时，日方派给我的翻译郭先生告诉我，他刚才到会场上去张望了一下，知事先生正在讲话，正在向大家介绍您呐。啊，原来如此，日方安排我晚点进场，是为了知事先生要先讲话，讲过之后可以先退场。这一来，我觉得我全明白了，我先上了一堂日本式的待客之道的课。知事在百忙中赶来讲话，并介绍了我，是表示对客人的尊重；讲过之后就退场，这是实行礼节上的对等。知事在中国，是正省级官员啦，这样做是何等的得体。而且，应该说，这并非完全是“日本式”的，因为与咱们中国之礼是何等的相通和相似。

但是，日本式的待客之礼，也有使中国客人不太习惯的。

11月4日我从上海飞到福冈，下机后即被接上汽车送到住处——别府杉乃井宾馆，这已是下午7时了。被邀参加同一活动的日本成蹊大学宇野重昭教授已先我10分钟抵达宾馆。于是我和宇野教授两人，很快被前往机场迎接我们的上野和夫、石松久典先生和翻译郭先生带进餐厅进晚餐。到餐厅一看，一张方桌上只放着两副餐具。日本主人把我和宇野教授安置就坐后，就连连鞠躬而退。当我边吃法国大菜边和宇野教授聊天时，曾扫视了一下餐厅的其他角落，但没有看到我们的日本陪同和翻译郭先生的坐处。我想，他

们一定在另外一个餐厅进晚餐。当我们用过晚餐步出餐厅时，日方两位陪同和翻译已赫然站在餐厅门口，直到把我们送到房间门口，才互道晚安而别。

第二天，翻译郭先生在闲谈时告诉我，他们三个人昨晚是在送我们进房间后才去进餐的，是一餐简单的工作餐。郭先生还说："昨天晚上真饿坏了！"

日方陪同和翻译郭先生昨晚的这一经历，真使我有点吃惊，并使我于心不安。然而日方这样的待客之道，不能不使人表示理解。因为日方对待客人和对待主人自已，在费用开支上是完全不同的标准和原则(注：中国外事接待费用的原则也是如此)，而且严格地实行。因此对同样来自中国的翻译郭先生(西安与大分交流人员)，日方是把他放在主人一方的。我和郭先生尽管都有些不习惯，但对此都表示可以理解。

可是，日本式的待客之礼，也有使中国客人既不习惯，也不能理解的。

就是在我和宇野重昭教授作讲演的那一天下午，日方主人是这样安排的：在主席台上，我与宇野教授各据一桌、各占一方，话筒旁边各放着一只冷水瓶，瓶子上的盖子就是杯子。翻译郭先生侧坐在我的桌旁，可是没有冷水瓶。面对台下的近 500 只眼睛，我只能集中思想作我的讲演，回答宇野教授对我的提问，调动我的脑细胞来遣字造句，尽量讲得好些。可是不知怎么搞的，眼睛老是看到那只冷水瓶和独无仅有的那只杯子，脑子里老是浮起"郭先生必定口干了"的意念。

现在我一点也不说假话，当时我真想帮助郭先生解决"口干问题"，可是我实在不能把杯子让给郭先生，因为我是个从来离不开水的人，特别是午后。直到 2 小时以后，我才抱着对不住人的心情而结束讲演。同样在讲着话的翻译不能得到一杯水，这是讲演会的日方组织者的疏忽？还是日本严格等级观念的表现？

据郭先生后来告诉我，他事后曾婉转地向日方主办单位讲了他的看法：翻译也需要一杯水。可是得到的答复是：你说的也有道理。

（载《扬子晚报》1993年12月6日）

守 松 守 信

寒冬腊月，在太仓做点调查。一个偶然的机会，与杨守松先生在同席吃饭。这是久闻大名的作家啦，他的名作《昆山之路》、《苏州老乡》等都读过。可是从未见过面，也未打听过，想象之中，可能是一位鹤发童颜的长者，也可能是一位西装革履的现代派，因为在一张报纸上好像见过有关他的使用着“大哥大”的报道。

见了面，寒喧了一阵，同想象中的作家完全不一样，是一位普通的中年人，弄不懂自己原来的想象是怎么来的。大概人们的想象都有一个误区，认为什么阶层、什么职业的人，就该是什么样的模样和个性，由此产生一种戒备心理或某些成见。由此想到，咳，自己在别人的想象里，还不知道是一个什么样的怪物呢。

分手的时侯，当然是一阵热烈的握手。我出于常规，基于礼貌，对杨守松先生说：你的大作或新作，希望便中赐读。守松很爽快地答允了。对于这种礼节上的过门，本人是老江湖啦，是“瞎子吃馄饨——肚里有数”得很呐。向文人要书，向书画家求墨宝，是从来不会碰钉子的，文人嘛，从来讲礼貌，也不忍把仰慕者的天真热情当场拒之千里之外。至于是否会兑现，则从来不抱很大的希望。我们充分理解其中的苦衷和难言之隐。

真想不到，回南京后的第三天，杨守松的几本书赫然寄到了我的手中。老杨啊老杨，真有你的，居然如此守信用，把随口答允的事真当一回事。你是为了始终不渝地坚持在《苏州老乡》里反思的“真诚”二字吗？是无事不在地体现“个性是生命的一个基本事实”吗？

轻诺必寡信，诚哉此言，我是信守这一条的，但该做而未做、可

诺而未诺的毕竟也有不少。这是至今引以为憾的。见贤思齐焉，从守松守信这件事得到启发：体现一个人的个性，大可做得更完美一些，无论是哪一界的凡人还是名人。

（载《扬子晚报》1994 年 1 月 25 日）

也说西康路上

吴镇同志不愧是大手笔，一篇千把来字的《西康路上》（见扬子晚报1994年1月19日八版），把南京的一个中心的角落的几十年变化，举重若轻，小中见大，写得那么生动有趣。还有些更可咀嚼的深意，大概尽在不言中了。当然，这对于一位建国初期的《新华日报》总编辑来说，是牛刀小试，小意思啦。

我多年住在珞珈路上，紧挨着西康路，与吴镇曾是紧邻，“文革”中被勒令搬家，硬着头皮想顶也顶不住，被撵出了这个住宅区，受了不少气。在那个无法无天的年代里，西康路上被迫“乔迁”的人家很多，于是有的“造反司令”就荣升成为“西康族”，住进了小洋楼，进的进，出的出，笑的笑，哭的哭。这是七十年代西康路上历史风云不应忽略的一幕。

西康路成为令人羡幕的住宅区，并非人民政权在建国以后所辟，而是国民党政府在抗战胜利以后，从重庆“还都”南京，那些“劫收”大员用人民的血汗——盖一幢小洋楼要花几十根金条——营建起来的。青砖红瓦，花树庭院，千姿百态，成百幢地在这一带拔地而起，为南京城西凭添了一处胜地。当时，这些房主人着实享受了一阵，也使营造厂的老板着实发了一笔大财。可是曾几何时，“百代兴亡朝复暮，江风吹倒前朝树”，腐败的政权经不起人民解放军的铁拳，不过三年，这些人就携妻挈妾，不得不仓皇南逃了。发生在这一历史时期的庭院易主，对这些“劫收大员”来说，“最是仓皇辞庙日”，真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对人民政权来说，也是不容忘却的一页，正如中央领导同志所一再告诫的，人心向背，生死存亡。

随着人口越增越多，机关、宿舍又纷纷向西康路一带靠拢，这一带本来具有的闹中取静之胜，就逐渐消失了。这里的空地成了宝地，谁都想在上面盖起洋楼别墅。七十年代初期，在西康路附近的颐和路上清理出了两块空地，当然成了抢手货，有些部门都以很充分的理由提出主权要求，要盖房子。争地的来头都不小，事情很不好办，争到了当时主持江苏工作的一位负责人那里去定夺。他对城市建设很内行，对城市绿化情有独钟，考虑良久，说：算了，这两块地谁都不给，留在那里，种上树，让附近的琅琊路小学的孩子们有块草地玩玩。一言定局，结束争论。如今，一块空地成了小学生的体育场地，一块空地种上了玉兰丹桂，花开花落已十余个春秋，俨然一座小花园了。有些人极善于把一块块空地都盖上房子，有的人极其艰难地为后人留下些天空和草地，在当今是贡献各有千秋，且让历史去从容评说吧。

西康路上，人来人往皆匆匆而过，车水马龙也不过留下缕缕青烟，春风秋雨，白昼黄昏，如此日复一日，年复一年，难道真的什么也没有留下么？不会的，西康路是永存的，他是历史的见证。他始终保持沉默，他只是听其自然，其实，他永远在静静地观察和思索，这是别人替代不了的。

（载《扬子晚报》1994年2月4日）

性　格

人人都有自已的性格，各人的性格又各不相同。即使相近相似如父子，相近相亲如夫妻，性格也有差异，甚至有大的差异。

人与人之间不同的性格，是一种正常的自然社会现象，一般情况下不产生相互排斥的作用，而且，人们自已会从相互需要中学会调节以相互适应。因此，一对未婚男女往往以不同的性格——“我就喜欢他(她)这一点”——而相爱而结婚；相反，一对恋人往往因不同的性格——“他(她)的这一点让我恨透了”——而分手。这么说，性格是可爱的，又是可恨的，这真是千岩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蒙笼其上，各有千秋。

性格纯属自已。喜怒不形于色，是深沉型的性格。嬉笑怒骂，晴雨阴雪，别人一目了然，是外露型的性格。有人刚烈如虎如玉，有人柔顺如羊如绵。有人豁达如山，一蓑烟雨；有人谨慎如溪，点滴入流。这都不足为奇，无需有所褒贬。宝钗和黛玉的不同性格就鲜明得很，但不能以此贬薛小姐为面善内奸，褒林小姐为口快心慈。当然，这是对平常日子的一般情况来说的。

在关键时刻的不平常情况下又当别论。彭大将军德怀同志在1959 年的庐山会议上，明知此时此刻讲真话必将使“最高”震怒，但他不会讲假话的性格还是让他讲了真话。彭大将军就此倒了大霉，可是“一世英名”就此定论了。近代著名作家洪深先生(1894—1955)，常州人氏，1929 年时在上海一家电影院看名为《不怕死》的电影，全片尽是帝国主义侮辱中国人的镜头，他忍无可忍，站起来振臂抗议，真如一声惊雷，使原来全场沉闷而不知所措的观众们为

之一振，使全上海的群众爱国热情得到升华。洪先生千日均随和，一刻如霹雳。洪深的性格，成为一代佳话。原来，在接受大风大浪考验时，一个人的性格会脱颖而出，可以为忠，可以为奸，可以进史，可以上榜，一念之差，其实是性格之差。可见性格事小又事大。

性格属于自己，因而说它事小；性格关系到别人，于是也可以说它事大。举例来说，性格对于自己的上级，对于自己的下属，对于自己的同事和朋友，都可能留下深刻的印象或一时之影响。这点不应忽略，确实不应忽略。但不必因此背上包袱，否则，你就违背了自己的性格——性格如石，环境如水，水落石出，真相毕露，做不得假。

其实，性格鲜明的人，即使有杀身之祸，叫他做假也做不来的。远的如杨修。杨修绝顶聪明，而且锋芒毕露；曹操聪明绝顶，可是不喜欢别人比他高明。这么天天见面的一对，杨修又不肯改，他能不倒大霉吗？倒了大霉也好，为后人留下一出好戏和一道思考题。近的如 1966 年间的江苏主要领导人，挨斗时两个造反派揪住他的脑袋胁迫他“低头认罪”，他还是昂昂地抬起头来表示不服，最后晕倒在南京大学的广场上。他当时不知道“低头”或“昂头”的不同待遇和不同结果么？指挥过千军万马的人，视死如归罢了。

性格是多元形成的，因此，性格是学识，性格是精神，性格之中有家教，性格之中有人生的风霜雨露，否则，怎么能说性格是内心世界的表现呢！

这篇浅薄小文，或许什么也没有说明白。性格是怎么形成的？没有说。为什么不说这一条？也没有说。但说了这一条：一个人的性格，就是一个人的命运。

（载《扬子晚报》1994 年 3 月 29 日）

善　于

读书，写文章，做工作，锻炼身体，支配时间，持家理财，为人处世……无一不有个“善于”还是“不善于”的问题。

写文章要善于做标题，以得画龙点睛之妙。好产品要会做广告，这叫善于经销。“敢于斗争，善于斗争”，过去常连在一起强调。“戏法人人会变，各有巧妙不同”，这个“巧妙”就是“善于”。大观园里的袭人，贵不如薛（宝钗），娇不如林（黛玉），亲不如晴雯，“后台”不如鸳鸯，可是我敢说，她受宝玉之宠之爱之敬，是不逊于上述任何一位的，这就是袭人很“善于”也。

“善于”的核心是“善”。在中国，与“善”连在一起的，大多是好字眼：善意，善良，亲善，人性善，真善美，善解人意，善始善终，善有善报……

善于，是本分的延长，是把应该做到的做得更多一些、更完美一些。“善于”比“合格”进了一步，但不是要求去做不可能做到的事。善于与不善于，只相差一点点，可是效果完全不一样。进一步说，善于还是不善于，您本人存在的意义就不一样。当家人的善于持家与不善于持家，对全家的巨大影响是不消多说的。“善为国者，仓廪虽满，不偷于农。”（商君书《农战》）这更是把“善于”的问题扩大到了一个国家的范围，说得很深刻。

基于对“善于”的理解是“本分的延长”，所以，“善于”有润滑剂的作用，事半功倍。“善于”有味精的功能，无所不在。然而“善于”之对于为人处世，比润滑剂和味精要高明得多、深刻的多。在公共汽车上被踩上了一脚，被踩的人如果这样想：“对方大概有急事，所

以这样慌里慌张”，笑笑了事，于是就避免了一场争吵，而与人为善的风格自见。给顾客递了东西，微笑地等待顾客的挑选，在递了又递之后还是微笑着，那末，您被戴上“模范营业员”的桂冠大概为期不远了。“谁不喜欢得到良好的服务”，善解人意，将心比心，如此而已。

“善于”是一种谅解，一种默契，一种对他人的尊重或体贴。医生与病人之间，师生之间，上下级之间……无不如此。因此，善解人意，无需请求而主动帮助，是智慧的表现，是一种教养和品质。这是“上档次”的服务，有时是出自真诚的牺牲。

“善于”不是心计。在我的眼里，“工于心计”是一个贬义词，有点讨厌它。“善于”不是“理亏”，同“吃瘪”更是两回事，虽然有时确是让步。

善解人意果成为一种风气，这个社会必定大有希望。

但愿大家都来“善于”，但愿“善于”普照人间。

（载《扬子晚报》1994 年 5 月 12 日）

溺　爱

有位长我十余岁的同事于十余年前对我说过："我现在天天玩孙子，有意思得很，你现在还体会不到。"就这么几句话，听了就算，不当一回事，还认为这位同事有点"娘娘腔"。可是这些话一直没有忘记。近年又想起了这些话，遂有如下故事。

有位先生两年半前得一孙，喜极。孙子呱呱坠地之前即想为之取一动听的名字，以体现爷爷的学识。久思而不得，日甚一日，紧迫性如为人起草讲话稿尚未完篇而讲话人已登台索稿那样，有点"江郎才尽"之感。忽一抬头见书橱中有一无锡泥人，于是，孙子就叫"阿福"。定名之初，儿子（即阿福之父）不太满意，连呼"太土太土"；女儿（即阿福之姑）也撇着嘴说："阿要乡气，屋里多了个阿乡哉。"可是没有多久，阿福成了家中的明星，凡下班回来，人人都先喊阿福。

孙子渐大，家里永不衰落的话题之一是孙子的长相。客人来访，有人说阿福象爷爷，这位先生必大开笑口；有人说阿福象奶奶，这位先生也表示赞成，并补充一两句以示"赞助"，内心如何想的，难说。

阿福爱动，动必有失。比如玩具，人家送的，自家买的，数量不少，可是没有一件是完好无损的，一般在一两天内就被跌得断肢缺胳臂。比如墙壁，原来洁白如纸，随着阿福的长大，越来越多的墙角被画上黑线和圈圈。阿福不爱吃，可是精力充沛，每到吃饭时间就东躲西藏，或钻入床肚，或匿身沙发底下，他妈妈就手执碗匙追来追去。这些，爷爷都不以为非，而认为阿福调皮得可爱。每逢阿福

打破了物件或犯了其它小“错误”，爷爷常动员奶奶：“你来骂他几句！”自己则从不愿对孙子唱红脸角色。

这位先生口内有两颗假牙，一大一小，小的一颗状如白色螃蟹，做工很讲究，因而也很珍惜。阿福常爬上爷爷膝头，伸手便到口内掏牙，连连呼“螃蟹”。这位先生从来视自己的假牙为秘密，白天放入口内，睡前置于漱口杯，从不以示外人。可是阿福伸手要掏，立时立刻取出，不过连连叮嘱：当心当心，别掉在地上。

有一天，这位先生在外面陪了一整日客人，回家觉得累了，就在椅子上坐了下来，而不象往常那样一回家先抱孙子下楼溜达。阿福扶着爷爷的膝头问：爷爷，你怎么了？这位先生回答：“爷爷吃力了。”阿福一听“吃力”，连连追问：“吃力呢？吃力呢？”这位先生没有领会，“唔、唔”以应。阿福又急了，又问：“吃力为什么不带家，为什么？”爷爷仍未领会，仍“唔、唔”连连，强调“爷爷在外面吃力了”。正在厨房烧饭的奶奶已经有点听懂了，不禁哈哈大笑，说：“阿福把吃力当成吃的东西了！”于是爷爷也跟着哈哈大笑。阿福本来为没有见到“吃力”而不高兴，又见爷爷奶奶如此大笑，似有嘲笑之意，说时迟那时快，爷爷头上已挨了一小拳，于是又大笑，于是又是一拳，……三小拳一挨，这位先生也不觉得“吃力”了。

这位先生，就是写这篇小文的敝人。

认识和体会某些事情，需要时间。所以，当你对朋友很起劲地向你鼓吹的事情并不理会的时侯，先不要急于下定论。

（载《扬子晚报》1994 年 6 月 11 日）

巴 金 先 生(上)

还是在念初中的时侯，得到一部《家、春、秋》合订本，足足有两块砖那么厚的一大本。四十年代，读了不少历史小说和武侠小说的我，第一次读到巴金先生的书，清新之风扑面而来，真是如获至宝，上课时偷偷地读，回家后躲在被窝里读，读得废寝忘食，读得如痴如醉。为此挨了父亲的骂，呵责我“把眼睛搞近视了”；也被老师批评过，说我“影响了功课”。读完这部书，很崇拜巴金，但苦于不了解巴金是何许人，把他看成远在天边的奇人，心想大概是个一把大胡子的老头吧——那时不像现在，有那么多传媒介绍作家以及他们的花花絮絮。

一晃三四十年过去，想不到竟会因为工作的需要而结识巴金，有数年的频繁交往。认识从 1977 年发还巴金稿费的事情开始。那是粉碎“四人帮”不久，对“马、徐、王”等上海余党的揭发批判正在进行，尽管事情千头万绪(比如，当时全上海存煤不到一万吨，副食品供应极其紧张，这是何等的燃眉之急)，上海已在开始对文艺界人士落实政策。上海是第一家在那年春节就召开大规模的文艺界人士座谈会，通过这一形式，让许多被打倒多年、消声匿迹的知名人士出来亮相。巴金先生就是这个座谈会名单上的第一号人士。后来全国各省，包括江苏，纷纷效法，推动了文艺政策在全国的落实。这类事现在说说容易，一切理所当然，可是那时可不简单，要受到许多框框的束缚。

“文化大革命”中，不知出于什么心态，张春桥、姚文元之流对于巴金可谓恨之入骨，把巴金夫人肖珊迫害致死以后，每年还要把

绳索收紧再收紧，对巴金敲打又敲打，真正做到了“打倒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包据巴金的稿费，也作没收处理。巴金是一位专业作家，尽管担任好几个职务，多少年来从不领取工资，全凭稿费收入维持生活。没收了稿费，等于切断了他的生活来源。对于这笔稿费，粉碎“四人帮”以后的上海市委作过一次认真的讨论。当时也有思想束缚，因为数额较大（一笔六位数的稿费比现在值钱得多，可买几幢房子），有关部门也提出过分批发还的方案。在讨论时，主持会议的负责同志从善如流，采纳幕僚的建议，说：“稿费嘛，作家的劳动所得，数额虽大，一生心血啦，一次、全部发还！”为了落实这件事，我奉命跑了几次腿，同住在武康路的巴金先生慢慢熟悉起来。

更熟悉是在1977年、1978年两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之后。巴金先生从五届一次全国人大会议以后，重新被上海选为全国人大代表，我作为上海代表团的首席工作人员，会议之前和会议期间总要同他接触多次和相处多日。

被可恶的“文革”扼杀和封闭了十余年，犹如掩没于尘土之下的宝藏被发掘，废弃不用多年的黄钟大吕被敲响，那时的上海代表团，真是群星璀璨，光芒四射。特邀界代表中有荣毅仁、刘念智、溥杰、杜聿明等，文艺界代表中有巴金、张瑞芳、袁雪芬、李炳淑、石沛琴等；科技教育界代表中有苏步青、周谷城、严东生、谈家桢、吴若安、陈植、谭其骧、王应睐、刘佛年、汪猷、杨槱等，体育界代表中有林慧卿、陈镜开、李富荣、钱澄海、迟尚斌等。（上）

（载《扬子晚报》1994年6月21日）

巴 金 先 生(下)

七十年代在北京举行大型会议，即使是档次很高的会议，条件也比现在差得多多。对全国人大上海代表团的安排历来还是最蒙优惠的，那时也不过住住西苑大旅社和铁道部招待所，还按总人数计算，每两人分给一个房间，交给代表团统一安排。百废待兴之际，人们要求也不高，那时分配房间、使用汽车之类的事情很好办。我记得，每次都把荣毅仁、刘念智二位分配住一个房间，一则知道他们二位之间很熟，谈得来；二则估计荣先生北京有家，晚上不会住饭店，这样就让刘念智先生实际上住一个单间。门上照贴荣、刘二位的大名。这其实是不得已之举。可是，刘念智先生(抗战初期全上海万人抗日歌曲大合唱的指挥、著名爱国人士)有一次笑吟吟地对我说："您的安排太周到了，也太抬举我了。"刘先生没有细说此话的意思，可是满意之情溢于言表，使我也高兴了好几天。

有一次上海代表团被安排住在西苑大旅社，房间大的大、小的小，不成标准，而且分配给上海团的房子实在太紧张，只好把巴金、溥杰、杜聿明三位代表安排在一个大套间里。他们自己协商的结果，巴老住在里间的一个小间里，溥、杜二位住在外面一个大间里，里外相通，相安无事。巴金先生说："他们二位照顾我，我住得自成一统。"杜先生则说："很好，很好，我与溥杰是老搭档了。现在与巴老又成了邻居。"溥杰先生一身中山装，浆洗得极为挺括，胡子剃得很干净，对谁都彬彬有礼，但从来默默地很少说话。我对他们三位的宽容和幽默，只有频频表示歉意。

尽管那时的所有代表可称都是大名鼎鼎，都很严己宽人(比如著名运动员陈镜开、迟尚斌代表，每次上车总是坐在最后一排："压

车”），可是我的感觉，巴金先生总是最突出的一位，突出在：朴素，平凡，像一杯清澈的白水。

当时上面有个规定：凡是年事已高的代表，可以带一名亲属作为随员，以照顾代表的生活起居。巴金先生当然够这个条件。当我征求巴金先生意见时（他的女儿、女婿均在身边），他总是说“不需要”。每次到北京开会，自己提着一只小皮箱，还谢绝别人的帮忙。两次会议开下来，我觉得从任何一个角度来说，巴金先生都够格带一名随员，于是再三动员他。他则再三推辞。平素说话不多的他，在这类问题上更没有几句话，可是让人感觉到他真的不需要，不愿意给公家添任何麻烦。

我在上海曾写过一部《上海滩十年沧桑耳闻目睹记》，反映“四人帮”上海余党在“文革”中的丑恶表演，意图是为曾经在中国土地上发生过的一场大灾难留下一点真实记录。其中有一章写《六位知名人士之死》，因为有些材料有必要请巴金先生过目，就送一份给他。没有料到，巴金先生很快就写了回信：

通华同志：

文章拜读，写得很好，材料丰富，使我知道不少事情，希望早日出版。这样的著作，现在很需要，今天人人都谈论“四人帮”，可是对“四人帮”的毒害和影响却没有一个明确的概念和深入的理解，久而久之恐怕有人连“四人帮”是怎么一回事，也搞不清楚了。这本书可以帮助我们记牢许多不应该忘记的事情，并且从中吸取教训。

我没有什么可以补充，我只能作为读者。打印稿两节如需要寄还，请来信告知，当即寄上。

此致

敬礼

巴金

1978年1月30日

巴金先生在这封信中所表达的观点，后来也写进了他的《随想

录》。随着时间的推移，智睿之见于今重读，更有振聋发聩的作用。因此，将鼓励我继续做完这件事。

（载《扬子晚报》1994 年 6 月 22 日）

新春访巴金

最近利用假期拜访了巴金先生。巴老还是那样，在很少的几句寒暄话以后，说："送你几本书。"边说边上楼拿书。去年见他时是这样，前年见他时也是这样。这个行动，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为这鲜明地显示出一位长者的热情和平易近人。然而，当我每次拿到他的著作以后，印象更为深刻的则是这位老作家的工作精神，那会使我们这些比他年轻很多的人感到汗颜。

巴金先生的工作是很有计划的。

他经常说："我是作家，就该用作品同读者见面。我年过七十，工作的时间不会多了。我被林彪、"四人帮"剥夺了整整十年的大好时光。现在要订个五年计划，抓紧时间，一篇一篇地发表，多留下一点东西。"

去年此时，他告诉我 1981 年他要出三本书，一本《随想录》，一本《创作回忆录》，还有一本翻译著作。我当时还天真地问他：这三种内容完全不同的书同时开手，有没有问题？巴老回答说：几本书同时写，已经习惯了，可以的。今天他在这三本著作上签上名字，交到了我的手里。他说到做到，全部完成了自己的计划。当然，这一年，他何止做了这些工作呢！他出席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参加了文联和作协的会议，出国作了友好访问，还有许多必要的社会活动，说不定还有不少无可奈何的应酬。

告辞时，我照例问了问 1982 年的计划。他告诉我，一部长篇小说，已经写了一部分；一年一本《随想录》，总要写的；原订五年完成的十三本书，仍要一本一本地写出来……。一句话，"我只是一个作

家，一个到死也不愿放下笔的作家”；“我也要向前看。不然我为什么还要制订计划，想方设法，求东西告，争取时间来写作品呢？其实不写也照样过日子，只要自己名字常见报，大会小会不缺席，东讲几句话，西题几个字，这样似乎对社会就有了贡献，对后人就有了交代，这又有何不可呢？但是我的书房里偏偏留着那面大镜子，每次走过它前面，我就看到自己那副‘尊容’，既不神气，又无派头，连衣服也穿不整齐，真是生成劳碌命！还规规矩矩地待在家里写吧，写吧。”

在回来的路上，我手里拿着那三本书，默默地走着，只觉得一股热流在胸中涌起。走着走着，我终于从纷乱的思绪中把我最主要的感想捉摸住了，这就是：

一位七十六岁高龄的作家，他是怎样地度过他的每一天呢？写作，勤奋地写作，有指标地勤奋写作。

我们每一个年富力强的人，是不是应该这样度过自己的每一天呢？工作，勤奋地工作，有指标地勤奋工作。

他一年写出了三本以上的书，我们能否一年做好三件以上的事情呢？

（1982年1月12日于上海，载《民主与法制》杂志1982年第二期）

梅 园 联 句

——中国小城镇研究的根和叶之一

《扬子晚报》6 月 29 日二版上登了一条消息：为纪念梅兰芳诞辰 100 周年，梅先生的故乡泰州市将举办一系列的纪念活动。人们过去一般把泰州同“春兰”空调机连在一起，今后大概将更多地同梅兰芳大师的名字连在一起了。我也因此联想起了一段往事。

那是 1984 年的秋天，我陪同费孝通先生作苏中调查，从镇江过江到扬中县住了五天，然后从扬中县摆渡到泰州，住在乔园饭店。吃晚餐时听到广播，印度总理英迪拉·甘地夫人遇刺身亡。费老搁下筷子，沉吟一会后说：对英迪拉·甘地夫人，他 1936 年在英国伦敦经济学留学时熟识一位曾经招待过她膳宿的夫人，经常讲起她早年在伦敦的生活，因而有深刻的印象。当英迪拉·甘地夫人陪同她父亲尼赫鲁总理来华访问时，我与她在民族学院初次见面，因是前后同学，相叙如旧识。费老接着说，今年还曾在印度见过她一面，两度相逢，她见得已老了不少，但风韵依然，令人欣慕，尤其是她英语讲得极纯正。很可惜，竟死在卫兵的枪口之下。这一不幸事情，可能成为我们这次泰州调查过程中，费先生容易谈起一些往事的触媒剂。

1983 年和 1984 年是费先生最为忙碌的两年，也是到江苏作小城镇调查次数最多、时间最长的两年。1983 年春天他亲自坐镇并组织力量对吴江县七大镇作了调查，称为“解剖麻雀”，接着主编出版了《小城镇、大问题》一书。1984 年春天又作苏北和苏中调查，走遍了徐州、连云港、盐城、淮阴各县，还到了南京市所属各县和镇江市的句容、丹阳两县，秋天又从扬中到了泰州，真可谓马不停蹄，

人不歇脚。虽然那时已是70多岁的老人，一路行来仍是口问手记，事必躬亲，直至调查完毕写文章还是自己动手，一字一句地从自己的笔下流泻出来。很感人的镜头是：费老的一副眼镜，提问时戴上以看着对方，问完了要取下以作笔记，这样戴上取下、取下戴上地忙个不停，一头白发的老人完全沉浸在掌握实际情况的乐趣之中。这使我本人很受感动，我觉得：对这样的大学者研究这样的大问题，如不支持，天理不容。

到了泰州以后的第二天下午，来到梅兰芳公园散步。1984年时的梅园还没有现在的规模和景致，不过几丛修竹，几树梅花，倒也楚楚动人，赏心悦目。那一天秋风初起，略有一丝凉意，但并不寒人心骨，只吹得数枝修竹微微摇晃，使披在竿上的长叶发出轻轻的沙沙之声。偶而也有几声蝉鸣，使极静的梅园又添几分情趣。费先生和我们几个人坐在竹亭里闲谈，话题自然离不开梅兰芳。这时，泰州的民盟主席（恕我忘了他的大名）拿出手抄的一篇民间词作，是写都是泰州人的柳敬亭和梅兰芳的：

吴陵好
绝技梅柳双
檀板难消南渡恨
歌衫未卸北平装
一例管兴亡

在议论这则手抄词作时，“早春”二字带出了我的联想，就在梅园的竹亭内，我斗胆向费先生出了一个上联：

早春前后，大江南北，一例前生事

费先生对这一上联频频颔首，略有沉吟，然后说：“明天，要明天。”果然，第二天早起才启门，费先生送来一纸：

一九八四年十月二日余公历生日也，偕同乡朱通华同志作泰

州郊游。是日新华日报刊出《苏北篇》，因出联作对，翌晨梦回得句：

千秋功罪，文章高下，尽付后人说

泰州梅园的联句，大概反映了我们两个吴江人当时的心情，后来费先生在民盟中央的某个会议上还引用了一次，博得满堂掌声。

一晃眼十余年过去了，我们的小城镇研究没有间断地做了十余年。昔日是“小城镇、大问题”，如今是“小城镇、大繁荣”，“小城镇、大市场。”研究小城镇的队伍，也从少数专业成员扩大到了各界，包括成千上万的乡镇领导成员。十余年来，凡是费先生发表的有关小城镇和乡镇企业的文章，可以说，广大乡镇干部是无人不读的。这真是学者与农民之间，成功地架起了心心相通之桥。

海内外有的学者说过，如今中国，有个小城镇学派。这些学者，志在富民，根在实践。

（载于《扬子晚报》1994年7月31日）

庙港蚕村

——中国小城镇研究的续篇之二

庙港是吴江市的一个乡名，地处太湖之滨，站在庙港乡政府招待所小楼的二楼，碧波浩　的太湖尽收眼底，晴天可以看到远处影影绰绰的吴县东山，夜来可以清清楚楚地听到湖水撞击的劈拍之声。费孝通先生为这座小楼起名为"万顷阁"。近十年来，他每年要来一两次或住上一晚。

费先生是庙港乡的常客，不是没有原因的。因为他的调查基地之一——开弦弓村，就属于庙港乡管辖。费先生从1936年第一次驻村调查，写出著名的论文《江村经济——中国农民的生活》以后，毕生跟踪观察，历50余年不辍，这在世界学术史上是罕见的。

费孝通之到开弦弓村作调查，有着相当的偶然性，也可说带有很强的传奇色彩。那是1935年他刚从清华大学研究院毕业，遵从导师的嘱咐，要带一篇论文去英国留学，就到广西大瑶山调查。为了调查工作上的方便，与同学王同惠女士提前结婚后结伴同行。在大瑶山调查的有一天，费孝通夫妇在当地一位山民的向导下，从住地翻过几个山头去另一个村子访问。归来途中，向导脚步匆匆，转过一个山头，跟在后面的费孝通夫妇竟看不到向导的身影了。其实是转错了方向。于是越想紧紧跟上，越是找不到向导。就这样赶到傍晚，精疲力尽的费孝通坠入了当地土著猎取野兽的深坑，石头粗树齐下，把他埋了个结实，自己爬不出来，他的妻子也无能为力拉他上来。心慌意乱的王同惠，急急忙忙去找人救援，可是在荒山野岭找人谈何容易！这位救夫心切的王同惠，当晚竟溺死在一座山谷之中。费孝通是第二天清晨由路过深坑的山民救助脱险的。受了

伤的费孝通，扶着新婚妻子王同惠的棺木，离开了大瑶山。

对于这件事，50多年后的1989年，费先生在给我的一封信中这样写道：这次一走二十五天，未免劳累。……诗是有几首，大多是应酬性题笔，不值得保留。只有一首是真情之作，那是我在前妻石碑前献花后回来写的：

心伤难复愈，人天隔几许。
圣堂山下盟，多经暴风雨。
坎坷羊肠道，虎豹何所沮。
九洲将历遍，肝胆赤心驱。
逍遥自绰约，尘世惟欤聚。
石碑埋又立，荣辱任来去。
白鹤留翼影，落日偎远墟。

（费注：圣堂山是广西大瑶山的顶峰，白鹤山在梧州，前妻初葬于此，后墓被毁，有好事者代焚化，（骨灰）寄回北京，因而受累。石碑埋地下，又被下放劳动者设法掩盖保存。反正后梧州市文物局重建立在白鹤山腰。瑶族同胞更热情造一碑亭于早年调查所住的村子的对面小山上作为纪念。）

受了伤并失去了妻子的费孝通，为了身心两复，来到家乡吴江庙港乡的开弦弓村，投奔他的二姐费达生。当时费达生正在这个蚕村兴办缫丝厂，把从日本学到的新式缫丝工艺推广到中国农村，并培养一代新缫工。她的这批弟子，后来许多人成为苏州大丝厂的骨干。美国曾经出版过一本《费孝通传》，里面写到了费达生，并且认为她同她的大哥和两位兄弟都有资格列入世界名人大辞典。

费孝通在开弦弓村的最大收获是运用他在清华研究院学到的知识和方法，调查研究了这个蚕村的每一户人家，同农民交了朋友。并且从开弦弓村研究到了附近的震泽镇，从“乡下人”研究到了

“街上人”，从研究农民进入了研究商品、交换、集镇 和“乡脚”的关系的领域。无意插柳柳成荫，竟至成为参天大树，成为几十年后大规模研究小城镇的契机。《江村经济》一书，1939 年在英国出版，后来在西方重印了三次，在许多大学的人类学课程中被列为必读参考书。1981 年，费孝通先生因此被英国皇家人类学会授予人类学学科中的最高奖——赫胥黎奖章。

半个世纪，在人类的历史长河中不过一瞬间而已，而在一个人的学术生涯中则是锲而不舍才能有所建树的艰难历程，个中甘辛，几人能解？

（载于《扬子晚报》1994 年 8 月 1 日）

松陵话棋眼

——中国小城镇研究的根和叶之三

吴江市松陵镇是费孝通先生的出生地。他在松陵镇度过了人生最初的十个年头，后来就离开吴江到苏州上中学和东吴大学预科，然后到北京上大学。人的感情真是奇妙的东西，费先生十岁就离开松陵镇、离开吴江了，后来几十年的风云之时都不在吴江，然而他对家乡的感情之深，我实在无法形容。费先生讲话的口音，饮食的爱好和偏食，生活起居的习惯，至今都是地道的"吴江模式"。他对吴江人和吴江事的热心，更是众所周知，本人也从不讳言，他为苏州饭店的留言是"故乡梦萦绕苏州"，还说：爱国必爱乡，爱国必先爱乡。

当然，费先生的爱乡之情，有理智上的原因和研究上的结合。

我记得我同费先生第一次见面是在1983年的南京饭店。费先生同江苏省的主要负责人就乡镇企业和小城镇建设问题交换意见，我因工作需要"忝陪末座"。谈了整整半天，双方观点完全一致，后来一直被称为"不谋而合"。达成的协议总得有人来具体落实呀，于是我被指定为江苏省与费老之间的联系人。时过十年，一切已成历史，但是我可以这样认为，费先生对江苏省对他研究工作的全力支持是满意的，江苏省当局关于"要人出人，要钱出钱"的承诺是兑现了的，前任如此，后任也如此。当然，费先生多年来在几个重大问题上对江苏省的支持和谋画是起了重要作用的。

南京饭店谈话以后，1983年和1984年这两年，费先生差不多每年要到吴江调查，下榻松陵饭店。这一期间，我们两辈吴江人吃饭时谈，开会时谈，晚上洗澡后也谈。尽管费先生在年龄上足足长

我一辈，学识上我更是无法以道理计，可是星斗之下，藤椅一张，蒲扇一把，我们谈起来可谓无拘无束，海阔天空。费先生谈得最多的有两点：一点是“七块钱怎么花”的问题，一点是“两个棋眼”的问题。所谓“七块钱”，费先生说，我已73岁了，1957年以后浪费了整整20年，现在是我学术生涯的第二个春天，到80岁还有“七块钱”可用。这七块钱我不零花了，要整块地花，派点大用场了。怎么花法？费先生说，下围棋要有两个棋眼，我的两个棋眼，一个是研究小城镇，一个是研究民族地区、边远地区的发展。这两个“棋眼”，其实就是费先生研究工作的重点和落脚点。

费先生曾经说过：我对民族地区有点“偏心”。所谓“偏心”，就是有特殊的感情。费先生是毕生研究民族地区的先行者，他的前妻王同惠女士是殉难于民族地区而永远长眠于民族地区的。相知也深，其情也深，费先生以研究和帮助民族地区为己任，提出了“以东支西，以西资东”（东部地区支援西部地区，西部地区以其丰富的资源吸引东部地区去开发）的设想，并以高龄之身每年于东西部之间穿梭调研几个月。

这些，都是在松陵饭店小院子里、庙港乡“万顷阁”上反复谈过并随风吹散了的片断。十余年过去了，费先生的这些设想，有的已经实现，有的有了眉目。1984年春天在庙港小住，我不揣冒昧，送了一首七言给费老：

细雨蒙蒙惊晚春，
松陵二子结伴行。
岂敢偷闲寻旧梦，
推浆拂柳下江村。

第二天，我向费先生告辞要回南京了，承费老和了一首回赠：

束发离乡六十春，
此番重访感伴行。
新晴喜看桑田绿，
夜来星火照渔村。

如果我没有弄错的话，1984 年的这次旧诗对唱，在我是强步风雅，勉为其难；在费先生是家学渊源(注)，驾轻就熟，从此打开了写写古诗的闸门，后来差不多每年到江苏和各省调查，兴之所至，都要吟哦一番。记得 1987 年苏北调查那一次，在淮阴的早餐桌上，费先生又拿出了一首新作来给大家传阅，使结伴同行的宦乡先生感到意外，说：原来你们也玩旧诗？

(注：费孝通先生的父亲费朴庵先生，是前清的秀才，曾是南通状元张謇府上的西席，当然有着深厚的中国古文的功底，这对他的子女不能没有影响。顺便说一句，费先生名字中的"通"字，就是南通之"通"也。)

苏北探异同

——中国小城镇研究的根和叶之四

1983年由费孝通先生率领的全国政协调查组，对苏州、无锡、常州、南通四市作了25天的小城镇调查，跑了11个县、18个镇、29个乡镇企业(那时还叫社队工厂)，行程1700公里，费时25天。我们把这次调查称为“苏南调查”。在这些老先生的说话和思考中，都把南通放在苏南之列，认为南通的经济、社会、生活各方面，与苏锡常更为相近和相通。

“苏南调查”看得最多、议得最深的是社队工业问题。这些从北京下来的专家学者们其实都是社队工业的“铁杆老保”，与县委书记、乡党委书记、村支书们可谓一见如故，共同语言很多。他们的调查，就是为了眼见为真，拿到一批实际材料，以说服那些当时不赞成办社队工业的人们。正因为这样，每到一个地方，听汇报、提问题都特别的认真，格外的仔细，唯恐看到的、听到的材料不实在。

最有趣的一场是在沙洲县(现称张家港市)，发生了一场六位教授考县委书记的热烈场面。沙洲县当时社队工业发展很快，差不多每年增长四、五个亿，所以特别引起全国政协调查组的兴趣，可是又有些不放心，担心情况不实。到了沙洲县以后的第二天上午，在一个大会议里，一边坐着费孝通、钱伟长、罗涵先、齐康、李梦白等著名教授，一边坐着县委书记陈璧显，摆开的阵势俨如论文答辩。在陈璧显汇报以后，教授们轮番地提出问题，向县委书记考问社队工业的作用、对农业的支援、与国家税收和地方财政的关系、社队工厂的原材料和技术人员从何而来、到社队工厂做工凭什么条件……等等。教授们提问题时字斟句酌，彬彬有礼，风度翩翩。可

是问题提得很尖锐，或从正面，或从反面，一副“打破砂锅问到底”的架势，实际上揭示了那些不赞成办社队工业的官员们的忧虑和疑问。问题提了一天，县委书记回答了一天。教授们问得仔细，县委书记回答得具体。教授们问得尖锐，县委书记答得干脆。县委书记答得舌焦唇干，十二月的天气还频频拭汗；教授们听得喜笑颜开，频频点头。会议结束，走出会场，我笑问钱伟长先生：如何？对县委书记的答辨有何评价？钱先生满面笑容，连连说：“可以可以，答辨成功”。这次沙洲之行，使钱先生与沙洲县结了不解之缘，身为上海工业大学校长的钱伟长先生，应邀担任沙洲县办大学——沙洲工学院的名誉院长直至现在。而且不是挂挂名而已，十余年来每年到校视事，并从多方面给以实际支持。如今，沙洲工学院已经花树满园，人才辈出，成为一所初具规模的职业大学了。

费孝通先生对小城镇的研究，虽从“解剖麻雀”开始，从吴江七大镇开始，但并不满足于对典型的了解，也不满足于对苏南的调查，在写了《小城镇、大问题》、《小城镇、再探索》两篇大文章以后，很快就过了江，于 1984 年春天开始了苏北调查。在苏北，看了徐州、连云港、盐城、淮阴、扬州的 20 个县，行程又是 1500 公里。

这次苏北调查，使费孝通先生亲眼看到了苏北几年来的大变化，同苏北每市的市委书记、市长谈得很投机，许多问题都想到一起去了。用费先生自己的话来说，是“开眼界”和’洗脑筋”。费先生说：我回想我自己，长久以来对苏南和苏北的区别存在着许多不符合实际的错误看法。在我的头脑里还保留着一种早期流行的对苏北的偏见，那就是把苏北看成一个贫穷落后没有前途的苦地方。这种偏见其实只反映了解放前一百来年的历史，既与更早的历史不符，又和当前的情况不合。他认为苏北的潜力很大，后劲很大，现在已经从农业优势上表现出来，今后还应从资源和工业方面开发出来。这一心情和看法，在费老送给当时的盐城市委书记杨明（解放

后吴江县第一任县长，与费先生可谓乡谊归识）的一首诗中，有一定透露：

天晴海无边，潮落涂连天。
驱车绕堤行，舍路涉滩前。
港口鱼船集，牧场野花妍。
芦荡接桑园，虾池依棉田。
水杉初成林，丹鹤方北迁。
荒滩成宝地，万民庆丰年。
老来见此景，暇思似水涟。
范公堤上草，岁岁忆先贤。

当然，对于苏北存在的困难和问题，费先生和调查组其他专家们当时也提出了恳切的建议。这次苏北调查的过程，实际上是一次毫无保留地宣传社队工业巨大作用的过程；也是宣传小城镇在促进城乡共同繁荣中将发挥巨大作用的过程。

1983 年的苏南调查，1984 年的苏北调查，小城镇研究贯在因地制宜，见其相同以学得有效经验，更见其区别以求得分类指导。即使在一个省内，不同的地区，也不以一个经济发展模式去硬套。

（载于《扬子晚报》1994 年 8 月 21 日）

卡拉罕到淮阴

——中国小城镇研究的根和叶之五

小城镇研究"苏北篇"的高潮，是费孝通1986年把英国工党领袖(前首相)卡拉罕搬到了淮阴。

1986年上半年，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访问欧洲。费孝通先生以全国政协副主席、民盟中央常务副主席的身份，陪同胡耀邦总书记出访。费先生在一封信里说："我身在外，心仍在乡。上月淮阴之行，深感没有一个工业较发达的中等城市，周围腹地的乡镇工业是难于发展的。要发展苏北地区，我看要着重把淮阴的电站和盐矿发展起来。这方面技术上并无多大困难，关键在钱。我在英首相'铁夫人'(即撒切尔夫人)的宴会上，刚好坐在工党前首相卡拉罕的旁边，他也是伦敦经济学院出身，而且现在和我同是该校荣誉院士，所以，'铁夫人'笑着指指我们两人说：'这是一伙'。她的'这一伙'却使我灵机一动，想到了淮阴。我向卡拉罕把乡镇企业的道理一讲，他立刻反应积极，我说缺资金，他接口'我可以打电话'，意思是向英国银行界作小项借款。我把此事向总书记汇报，他说可以联系。回旅馆后，我请使馆送卡拉罕一本英文版《中国小城镇》。下面的文章就得我们来做了。"

"这是我的白日梦，但也许有实现的可能。……时间很迫切，请你把计划搞出来。我记得那位女市长(指当时的淮阴市市长徐燕)曾经给我一个资料的，一时已找不到，你手边有没有?如果没有，请你向女市长要一份，且不说有什么用，总是我在想法帮她实现这个计划就是了。"

费先生"身虽在外，心仍在乡"的精神，念念不忘为了乡镇企业

办实事的精神，使江苏的同志很感动，当时江苏省的几位主要负责人都参与了对这一计划的支持。而且，当时中央统战部的秘书长胡德平专程赶到淮阴察看路况和现场，为卡拉罕访问淮阴作具体安排。在几方面的共同努力下，几个月以后，卡拉罕带着一批外国金融家，果真来到了淮阴。

当时淮阴的交通状况比现在要差得多，从南京到淮阴，轿车要走一整天。为了让英国客人在有限的四天时间内多看一些，中央有关部门从北京调了两架直升飞机把卡拉罕一行从南京直送淮安，不到一小时就送到了。所以访问结束时，卡拉罕对费孝通说："我在江苏访问，象天鹅一样飞行。你，做了让世界了解苏北的贡献。"淮阴市长也赶到南京为卡拉罕送行，分手时，74 岁的卡拉罕把市长拉过去吻了一下面颊，这一英国式的礼节，使年轻的市长感到很不好意思，脸也红了。

这是七年以前，即 1986 年的冬天，一位学人在尝试着把苏北介绍给世界，尝试为苏北架起一座对外经济合作的桥梁。

（载于《扬子晚报》1994 年 8 月 30 日）

合 肥 舌 战

——中国小城镇研究的根和叶之六

《新华日报》在宣传、支持乡镇企业和发展小城镇方面，曾经起过很大的作用。这种作用，在八十年代是行政力量所替代不了的。其最集中也是最有成效之举，是1984年开辟了《小城镇建设探讨》的专栏，共出45期，刊登文章140多篇。在长达10个月的时间里，几乎用了理论副刊《八十年代》篇幅的一半。这一专栏的特点很鲜明：作者广泛，立论实在，读者爱看，对实际工作大有推动。具体组织这一专栏的编辑富有钻劲，拉住了费孝通先生，凡写有关小城镇的文章，必先送此专栏发表；也拉到了中纪委王首道书记的文章，阐述了江苏发展乡镇企业的重大意义，并提到了“中国特色”的高度。江苏省委韩培信书记撰文评价这个专栏“围绕实际，不乏新意”，“博采各家之言，必起积极作用”。这个专栏居然还吸引来安徽省王郁昭省长的文章，认为“发展小城镇的意义，不亚于在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必将推动农村经济的第二次突破”。著名建筑设计学家齐康教授的文章，很生动地把小城镇发展经济与建筑设计之间的关系，比喻为核桃的“桃仁与壳子”的关系，强调了同步进行的观点。许多乡镇干部来文提出实际问题，参加了讨论。

这个专栏富有群众性和创造性，正如当时的总编辑所回顾的：过去报纸搞讨论，常有一个弊病，就是先订好一套计划，怎样提出问题，先讨论什么，后讨论什么，结论怎么做，都事先设计好了，以后按部就班地做，生怕越雷池一步。这一次完全改变了这种做法，讨论由大家提出问题，各抒已见，逐步深入，展开多方面、多学科、多层次的理论与实际实切联系的讨论。他说，他作为一个老报人，

几十年来还是第一次。可以说，乡镇企业和小城镇发展的生动实践，各界人士对小城镇的浓厚兴趣，在《新华日报》上生出了繁枝茂叶，生机盎然。

江苏发展乡镇企业和小城镇的实践和经验，首先辐射到最邻近的安徽、浙江等地。1983 年以后这几年，安徽在发展乡镇企业方面花了大力气；在小城镇研究方面，也下了大功夫；在实践和理论研究两方面都搞得有声有色。1985 年的夏天，安徽省社会科学院还发起了一次规模较大、层次较高的学术讨论会，请到了费孝通先生，还邀请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权威于光远、薛宝鼎诸先生以及几个省市的学术界朋友。会议开幕以后的中午，在稻香楼宾馆的餐厅里，主人请来宾吃便饭，饭开两桌，济济一堂。席开不久，北京来的一位专家对着费老说："我看江苏的乡镇企业不行，不正之风都从那里刮出来，是基层干部搞特殊化的根据地。产品也不行，……。"在这样的场合开了这样的腔，举桌均感突然。费先生当然不便说什么，放下了饭碗，低头用筷子拨弄碟子里的几根豇豆。我毕竟年轻气盛，话又是对着江苏来的，忍不住了，也放下了饭碗，眼睛直盯盯地对着这位老先生，说："某某先生，我很尊重您，可是不同意您刚才的看法。江苏的乡镇企业，并不象您刚才所说的那么糟。您是江苏人，希望您回家乡看看，听听农民是怎么说的。"这一下把这位先生弄得有点被动，他并不明白同席是些何许人，就问我："你是谁呀？"我说："我是江苏政策研究部门的负责人，我在这方面有一点发言权。欢迎您回江苏看看。"我强调这一点，因为有点估计到，这位老先生一定受到某些偏见的影响。

餐后走回各自房间的走廊上，于光远先生笑着对我说："年轻人，你多大啦？讲话好厉害啊。"他大概以为我还是毛头小伙，所以敢于对老先生当场开销。我向他伸出一手，笑着说："于先生，我芳龄五十啦！""'芳龄？五十？哈哈哈哈。"费先生和于先生都哈哈大笑地走回房间。

十年后的今天重提此事，绝无对一位已经作古的老先生的一句失言有何不敬之意。这位先生敢于说话，以清正闻名，在了解了乡镇企业的真实情况后，也对乡镇企业持公正的态度。我只是想说，乡镇企业已经成为参天大树的今天，是曾经有过作为"路边小草"而不被认识和受过歧视的昨天的。昨今之别，迥异也，不敢忘也。

（载于《扬子晚报》1994年10月6日）

温州看市场

——中国小城镇研究的根和叶之七

最早提出“苏南模式”这个概念的，据我所知，是费孝通先生。时间大概在 1985 年—1986 年之间，也就是在费先生对苏南、苏中、苏北都作了调查，对江苏不同经济区域有所了解、有所对比以后，对由江苏群众创造的一种经济社会发展路子的理论概括。

对于一位学者来说，可贵的不仅在于提出了一个理论概念，而且在于不拘泥于这一概念。他认为，“苏南模式”还要丰富，各地条件不同，农民致富的路子也不同，不要以“苏南模式”去套任何地区。

于是就有了 1986 年春天的温州之行。

在这之前，对温州可谓议论纷纷，说法迥异。议论中比较强烈的一种，是认为温州在发展资本主义，后果不堪设想。但是，在我们一行用九天时间看了温州市的四个县，主要是看一些集镇、小商品市场和家庭工业，同省地市县镇的各级干部座谈以后，费先生很明确地提出，这里有个“温州模式”。并且认为“温州模式”的重要意义倒不在于它发展了家庭工业，而在于它提出了一个民间自发的遍及全国的小商品大市场，直接在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建立起一个无孔不入的流通网络。从这一特点看去，“温州模式”就超出了区域范围，对全国的流通体制改革创造了新鲜经验，为从根本上解决买难卖难问题树立了一个标本。

费先生还向我们讲了他近 50 年前在柏林的一次经历。那是 1937 年的夏天，费先生从伦敦到柏林去同他哥哥一起度假。一天，有人敲他的房门，开门一看，是一个拎着手提箱的中国人。异国遇

乡人，自然是互感亲近，可是方言不同，话语不通。只见此人有礼貌地鞠了一躬，然后打开手提箱，一看里面都是一些日用小百货，原来是上门售货的。他走后，费先生的哥哥说："在柏林、巴黎等欧洲大陆的许多城市，这样的生意人数以万计，大多来自浙江温州、青田一带。起初他们背着青田石飘洋过海，在意大利、法国、德国做石刻手艺，待到石头用完了，就转而做小买卖。他们靠挨家挨户送货上门和彬彬有礼的优良服务态度，经商赚钱，养家活口，置田起屋。

50年前费先生在柏林的经历，50年后我们这次在温州所见的情景，其间实有相通之脉，这就是历史传统和商品意识。费先生说，他从中领悟到"温州模式"与"苏南模式"之间不同特点的关键。苏南地区的历史传统是农工相辅、男耕女织，可以说是"牛郎织女"式的农民谋生之路；温州地区的历史传统是"八仙过海"，是石刻、竹编、弹花、箍桶、裁缝、配眼镜、挑担卖糖、拎箱卖小百货的手艺人和生意郎周游各地直至飘洋过海，家里也是有着种田的妻子和孩子，这是"货郎村姑"式的农民谋生之路。牛郎织女也好，货郎村姑也好，共同点都是"人多地少"，剩余的劳动力必须寻找出路。在苏南长出来的是社队工业和后来渐渐兴起的乡镇工业，在浙南冒出来的是家庭工业和加工专业市场。苏南是农副业里出工业，以工补农、以工建农；浙南是以商促工，以市场带动各业。历史特点总要顽强地表现自己，群众实践创造出更高一筹的历史，"苏南模式"和"温州模式"都给予我们这些书生以生动的教育。

在温州仔细看了桥头镇及其钮扣市场以后，走浙东返回的路线，3月6日到了天台县，住在天台宾馆。时已下午5时，我信步走出宾馆，原来隋代名刹国清寺就在附近。暮色中的国清寺，五峰环峙，双涧绕流，清幽而肃穆。一抹夕阳，斜照在山门和东面照墙上，淡淡的色彩，似黄非黄，似橙非橙，柔和极了，我仿佛觉得，在坐车几天略有疲劳之感的现在，沐浴在这种色彩之下，顿有放松安神之感。寺前和四周都是参天大树，郁郁葱葱，错落有致，此时此地，没

有一点尘世的喧嚣，富有生机而没有杀气，偶而有几声鸟鸣，也是清音一声，远远逝去。我看过许多庙，还没有一处留下的印象如国清寺那么深刻。静，真是静；干净，竟是那样地没有俗气。社会真是多棱镜，人生何其巧相逢，一日之间，身处两极：早晨还在闹市，所见所闻，但求竞争取胜直至蝇头小利之必得；现在已在名刹之侧，暮鼓晨钟，清风霁月，不能不使人生发一切莫非身外之物的意念。

费先生夜宿天台，也有一首诗："夜幕轻笼灵石巅，双峰紧偎正相恋，女童窃窥心情异，一任众口说万千。"当时，对此诗的最后一句不太懂得，现在似乎略有一丝体会。

桥头富市穷镇

——中国小城镇研究的根和叶之八

小商品、大市场，是我们1986年初访温州以后总的印象。我们还认为，如同苏南的实践那样，那里已把温州地区的推进到了“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现实，同样是宝贵的经验。这其中，在诸多的浙南小商品市场和小城镇之中，给我们印象最深的莫过于永嘉县桥头镇——以纽扣市场闻名于世的山乡小镇。

桥头镇坐落在瓯江北侧的山峦之中，偏离杭温公路3.5公里，居永嘉县桥头区管辖。这个区有2.5万人口，人均耕田仅0.28亩。如此人多地少，如果只务种田一业，将有近7000个剩余劳动力，这是何等严重的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

奇迹出现了。1979年据说有个姓王的弹花郎到苏州地区的农村弹棉絮挣钱，从社队企业带回几麻袋纽扣(处理品)回家，在桥头镇摆起了纽扣摊。想不到这一摊竟摆成了气候，一年以后，桥头镇上的纽扣摊连街成串。纽扣摊子的出现，推动了家庭工业；家庭工厂生产出晶莹耀眼的各色纽扣，又带动了纽扣市场的繁荣。到1984年，桥头镇销售的纽扣已达50亿颗，年成交额近6000万元。山乡小镇，纽扣薄利，吸引了成千上万的客商，把大包小包的纽扣带向全国各地。规模之大，客商之多，超过了上海城隍庙的纽扣一条街。这一年，桥头区已经有430家纽扣厂，其中300家是家庭工厂，消化了劳动力近万人。小小纽扣，繁荣了一片，富裕了一方，拖动了千家万户，闯出了一种机制。

这些情况和数字，是在桥头镇政府的一间狭长的接待室里，由镇长向费孝通先生一行汇报的。汇报的人精神抖擞，眉飞色舞。听的人兴趣盎然，满堂笑声。可是，二月下旬这个早春天气，毕竟乍暖

还寒，一阵阵刺骨的凉风从玻璃破碎的接待室窗户里吹得人缩脖袖手。费先生毕竟是走遍全国、尝尽冷暖的社会学家，经验丰富得很，穿了一件皮领子的短大衣，把皮领子翻了上来，双手袖成一个笼管，以“内循环”的保暖法认真地听着汇报。我可苦了，那天穿了一件薄呢大衣，但是暖和不了穿着夹裤的双腿，不时踮起脚尖企图脱离冷风带来的寒气，而不听使唤的两丝清水鼻涕还是挂了下来。我仔细端详了这间镇政府接待室，抱怨它的简陋，想不通为何冬天也不把玻璃窗配整齐，推想其不安装暖气设施的原因，并联想到苏南的有些镇政府接待室是多么的豪华。

我到底抗不住了，悄悄地走出接待室，到桥头镇上去看看，也暖和暖和身子。镇区并不大，道路修得并不好，店面不少，公用设施不多。新盖的楼房一般是三层，一层摆柜台卖商品，二层摆生产设备，三层是住房。中国通行前店后坊，这里是下店上坊。经商致富盖了新楼，盖了新楼不忘经商。我留下的印象是：温州地区此时所盖的民房，远比苏南的民房要洋气和阔气，足见群众手里的钱比较富裕。参观了几家住房出来，信步走到镇梢去“方便”，镇上的那个公厕那就极不雅观了，几乎脚无可踩之处，粪便已经溢到四周的路上，这是公用设施无人过问和无人管理的结果。

桥头匆匆一日，印象深刻而鲜明：市是富的，群众手里是有钱的；相对而言，镇是穷的，改善公用设施还没有摆上位置。这也是“温州模式”与“苏南模式”的差异之处吧。当然，最近传来的消息，这些年来已大有改观，民间资金已经开始投向社会事业的建设。从大范围来说，苏南、浙南、闽南、广东、山东之间的相互参观、相互学习从未断过，可谓取经之人不绝于途，而且见之于实践，各自以他人的经验完善自己，在经济社会发展套路方面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我称之为“模式”的相互渗透和趋同。这是好事。当然，不可能达到完全一样，因为基础和条件完全不一样。中国之大，情况之差异，多多益善，多多好于少少。

退思园答客问

——中国小城镇研究的根和叶之九

退思园是吴江同里镇上的一座私人花园，占地仅9.8亩。由于设计的巧妙，园内亭台楼阁、廊坊桥榭、厅堂房轩，居然各有安排，一应俱全，这真是匠心独运了。此园以一个不算小的水池为中心，各类建筑和假山皆紧贴水面，如浮水上，故又有“贴水园”之称。退思园始建于清光绪11年(公元1885年)，历时三年建成，主人为凤颍六泗兵备道任兰生，耗银数万两。园成之日，这位”军分区司令”被解职归里，于是园名“退思”，以示“退则思过”。现在成为与苏州网师园齐名的江南名园，加之同里镇保存完好的小桥流水、明清建筑、自然风光，这里已成为太湖旅游区的重要景点。

1986年9月的一天，费孝通先生在退思园会见了日本小城镇研究会的代表团。率领这个代表团的，是日本著名的上智大学教授鹤见和子。这位女士出身名门，毕业于东京大学并留学美国，受过地道的西方教育，能说一口地道的英语，但从来穿着和服出现在一切正式场合。她学识渊博，为人热情，对华友好，同冰心女士有很深的友情。冰心的先生吴文藻博士是费孝通先生的老师，又曾住在一幢楼里。经过冰心的介绍，鹤见和子与费先生也逐渐熟悉起来。而且，鹤见和子教授是为日本“内发型发展论”赋予特定含义并确立为学术概念的权威，因而她对依靠地区力量和农民力量发展起来的乡镇企业和小城镇，有着知音之感的浓厚兴趣。

费孝通先生假退思园会见日本朋友，不仅因为此园最贴近农村，见园即见小城镇，也是一种情感的表现。费先生的母亲杨纫兰女士是同里人，一位受过良好教育的女性。费先生的舅父杨天骥

(千里),是本世纪初活跃于上海的知名记者。有这么一层关系,费先生对同里镇无疑倍感亲切。

座谈会在退思园的桂花厅里举行。费孝通告诉鹤见和子:中国这几年最大的变化是从计划经济转变到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具体的道路则各个地方有所不同。我愿意用这样八个字:因地制宜,多种模式。在这次座谈会上,日本代表团的七位教授,被允许每人向费老提出一个问题。费老侃侃而谈。可惜,担任翻译的先生对乡镇企业和小城镇不太熟悉,费先生就不时插以大段的英语,再由鹤见和子教授翻译成日语传播。这样以中、日、英三国语言穿插的座谈会,倒也生动活泼,使小巧玲珑的退思园更加充满了生趣。

鹤见和子对于费孝通的调查研究,很有趣地比喻为"孙悟空式",她说:"费孝通的比较法,也许就是他自己喜欢使用的孙悟空式的手法。他在中国境内东西南北任意飞翔,不仅是为了全国一盘棋,而且还想把国界以外的地区与地区之间的交流和协作也纳入射程之内。但有一点,不管走到哪里,他经常把苏南作为比较的基点。"鹤见和子教授的观察是细致而正确的。

鹤见和子代表团的几次访问江苏,意味着日本学术界对中国小城镇学说的高度注意。那几年,日本的东京大学、上智大学、成蹊大学、法政大学、东京女子大学等十几所大学,打起研究中国乡镇企业和小城镇旗号的团体有三个之多。他们对"农村办工业,农民办工厂"、"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无农不稳,无工不富,无商不活,无智不进"等问题,对沈奎生(常熟阳桥村支书、瓜子大王)、袁勤生(常熟江南仪表厂厂长)、肖水根(吴江达胜友鞋厂厂长)等农民企业家的未来,特别感兴趣。我每次到日本访问,鹤见[illegible]都要问:"沈奎生现在好吗?"日本最有实力的研究团体NIRA(国院综合开发研究机构)也参加了研究。所以费先生说,中国的小城镇研究在国际学术讲坛上,是拿得出去的。

十年过去,可以认为,常年求教于实践的学者,是最有可能有

着超前的思考并提出智睿的建议的。

十年过去，中国小城镇研究的根始终深深地扎在中国农村，并逐步发展到对城乡关系和城市化道路的探索；其花其叶，从东部复盖到西部，也飘洋过海，到了更远的地方，比如日本的大分县（“一村一品运动”发源地）……。可以相信，这项研究还将继续展示其生命力，实践之树毕竟是长青的。但，新课题层出不穷，行行重行行，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吴仁宝又出新意

“苏南模式”作为一种以共同富裕为目标的经济社会发展模式，正愈来愈受到海内外学术界的称道和注意。这一模式的出现和成功，不是来自计划经济，不是靠上面的赐与，是苏南人民的实践，是苏南群众的创造。这其中，首先是许多奋斗在第一线的基层干部，他们千方百计，，艰苦努力，办起了乡镇企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不合法到成为主角，真正是“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郑板桥语）。江阴市华西村党委书记吴仁宝就是突出的一位。说他突出，是因为需要他吃苦的时侯，他真能吃大苦；需要他拿出主意的时侯，他还真有点儿心计。“苏南模式”就是靠这么一些能人、高人、实干家构筑起来的。

吴仁宝最近又出新意，提出华西村1994年要做到“三爱三关心”：爱国依法纳税，爱厂多创积累，爱邻（附近后进村）共谋发展。关心领导抓中心，今后华西村各种庆祝活动不邀请上级领导和主管部门；关心农民利益，切实减轻农民负担；关心左邻右舍，帮助周边五个村求得共同发展。

吴仁宝所想的，可谓是平凡中出新意，纷繁中拿要害，千头万绪中注意理顺关系，见怪不怪中针砭时弊。

现在以经济为中心，每年都是在既定的任务下拿出切实可行的办法。在一个范围不大的村或乡，是不可能每年都有很多新套套，也没有必要每年拿出新口号，来要求群众去办这办那。而吴仁宝今年提出的“三爱三关心”，却是在紧贴中心的前提下，把全国、全省的大局与华西村的实际完全结合起来了，也与华西村群众的

切身利益结合起来了，而且显示了华西人的爱国心和骨气，显示了华西人的思想新高度。那个“三爱”是如此，那个“三关心”也是如此。

曾有一部写华西村的电影在全国播放，里面的主角是以吴仁宝为模特儿的。其实吴仁宝没有象电影里的角色长得那么俊，可是，吴仁宝的为人和思想，确有可敬可爱之处。

（载于《新华日报》1994年2月5日）

“广告”的广告

用三十九个字，占大约两个五分钱硬币那么大的一块地方，做了一则新书广告。这是从新近一期《读书》杂志上看到的。广告是醒目的，内容是吸引人的，决不因其字少、篇幅小而受任何影响。我是完全相信这一点的。

我不知道这一广告的作者或设计者是那一位。但这位同志之别具匠心是令人感佩的：他节约了宝贵的篇幅，节省了读者宝贵的时间——一句话，节约了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而不象有些广告制造者那样：广告做得老大，内容空空洞洞，而且基本上是吹牛。

一本令人发笑，
又发人深思的书
官场病
〔英〕帕金森著　　陈休征译
三联书店出版　0.28元

（载《新华日报》1982年12月26日）

要革革“历来如此”

已经在不止一次的场合，发现“历来如此”这四个字的魔力是如此之大，足以成为维持现状、无需改革的“盾”。比如说，某一部门在汇报机构问题，有人对他们两个科室之间的扯皮不休感到不理解，提出“为什么机构设置要这样重复，并起来不好吗？”汇报人响亮地回答说：“历来如此的呀！”于是，全场哑然数秒钟以后，汇报继续，万事大吉。

这个“历来如此”之居然能使许多人表示相信和服气，其魔力在于：有人理解为这是上级文件的明确规定，有人理解为上下左右都是这样做的，有人理解为这是本单位头头们的集体决定，……反正一句话，“这样做没有错”。谁都没有想去查一查这个“历来如此”的根据何在，合理不合理。

对“历来如此”相信一次两次，倒也罢了，但盲目性之状可掬；如果每次照信不疑，养成了对什么事都不想寻根究源的惰性，任人牵着鼻子走，那就接近了蒙昧主义的泥潭，实在是一种很危险的精神状态。而且，即使真的有因有据，是个货真价实的“历来如此”，难道就不能随着新情况而改一改吗？

1983 年将是一个不平凡的年头。在这一年里，从政治到经济在进行一系列的改革。实行这种改革，没有一个好的精神状态是不行的。其中，“历来如此”这面“盾”，就应该革一革！

（载《新华日报》1983 年 1 月 16 日）

略评“随便讲讲”

已经多次遇到这样的情况。开起会来，某些领导干部讲话，总是这样开头：“今天没有什么准备，只是随便讲讲。”有的是表示谦虚，以示不是作什么“大报告”，这当然无可非议；有的其实讲来并不“随便”，是由秘书写好了讲稿照念的；有的则确无多少准备，既然被请来坐在台上，似乎非讲一番不可，因而“言不及义”者有之，离题千里者亦有之。

显然，后两种情况实际上反映了有些领导干部的作风不实在，满足于“赶场子”讲话，象华威先生那样，以为讲话就是工作，就能解决多少问题。中央一再强调“多办实事，少说空话”，现在各方面工作又都比较繁忙，下面殷切希望领导干部多深入基层，帮助下面解决实际问题，“随便讲讲”倒不如不讲。

（载《新华日报》1986年5月9日）

年终防“三热”

徐州市委一位负责同志在邳县作调查时，提醒大家说：年终总结要实事求是，防止“三热”，即：开表彰会、茶话会之热，滥发奖金、奖品之热，形式主义大检查之热。这个提醒及时、中肯，可以使某些惯于搞老一套的同志清醒头脑，从俗套中解放出来，并且省出精力和财力去办几件该办的实事。

一年之计在于春，是讲一年当中开头的重要。但，一年之终，也是很重要的。尤其今年，要总结“六五”规划执行情况，作好明年和“七五”规划，年终时刻更显得格外重要。一定要在年终抓紧多办几件实事，工作见实效，人民得实惠。毫无疑问，工作总结当然要做，先进工作者也该表扬，但茶话会、滥发奖金和大检查之类费钱而又俗套的事，大可不必去搞。

（载《新华日报》1985年12月3日）

喜看西瓜又满街

盛夏高温，满街西瓜。刚上市卖过六角500克，这是“抢鲜”；不过几天功夫，500克售价就跌到二角五分；现在已稳定在一角五分左右了。这就使家家户户的“财政部长”都高兴了起来。

前几年，西瓜是那么地抢手。农村干部为了落实种西瓜面积，动员瓜农讲得舌敝唇焦。商业部门为了搞好供应，采购西瓜总是每年的难题之一。消费者为了吃上几个西瓜，在烈日下排队等候……。从去年开始，买瓜真正不难了。在西瓜问题上，如今人们真正看到了什么叫“买方市场”。

过惯了“凭票供应”、排队买平价东西的日子，对于价值规律的作用，难免有陌生之感。其实，东西少了，价格就要高起来；东西多了，价格就要降下去，这正是商品经济中很自然的事情。一年西瓜又满街，人们尝到了市场放开的甜头，西瓜如此，其他有些东西也可能如此，这个甜头，发展生产力的甜头，人们还要尝下去。

（载《新华日报》1986年7月2日）

这样的“气派”不宜提倡

在四月二十九日的《扬子晚报》上，有一篇《亿元乡的气派》的报道引人注目。请看：有的报名参加“致富杯”篮球赛，“把一叠叠现钞扔到桌上”，有的在一个镇上“修建了三片灯光球场”，有的以“投标”八万元争办篮球赛，真是“气派”十足。

关心体育事业无疑是正确的，不过，应当能俭则俭，不宜太铺张。象有的乡那样，花“五百元报名费”不算啥，掏几万元办球赛不眨眼，难道这样的“气派”也值得提倡吗？

“气派”是一种精神状态。有的“气派”，如民族自豪感、集体荣誉感、自立自主精神等等，是值得提倡的。有的“气派”，如摆阔气、讲排场、乱花钱等等，损勤俭之风，显纨绔之气，依笔者之见，实不宜提倡。

（载《新华日报》1986年5月4日）

下笔之前须三思

一月十日，我看到了上海《解放日报》登载的中国民航局负责人答新华社记者问的消息。文中强调：民航“服务质量提高”、“几百万空运旅客是服务质量的最好裁判”、“近几年民航作出了积极的努力”……看后，觉得同实际情况不符，无助于提高中国民航的声誉。

一月十四日，读到了一月十日《人民日报》海外版上刊登的同一报道，我又产生了另一种想法。此文专有一段写民航的不足：“还有很大差距”，“特别是在服务质量和服务态度方面还存在许多问题”，“上航班不正常大多是天气条件等客观原因造成的，但地面服务有时跟不上，向旅客详细认真解释不够，给旅客带来了很多不方便”。这样评价过去，就觉得比较实事求是，符合许多旅客的实际感受，读后对中国民航的工作可以寄以厚望。

两稿所以不同，主要是删节造成的。一条新闻如何用法，标题如何做，重点突出什么，这是由报纸编辑决定的。但编辑动手删稿之前，一定要考虑：第一，你要突出的地方是否符合党的方针政策；第二，删了之后，全文有没有片面性、是否脱离实际？古人说：“文官提笔安天下”，编辑虽不是官，但对其笔头的份量，也不能小看！

（1986 年 1 月 12 日，载于人民日报社《编采业务》）

少 而 精

一九五八年是工农业生产大跃进的一年，也是大写文章、大学理论的一年。全省各地县（市）委都加强了或创办了机关报，很多县（市）还创办了理论刊物，出版了许多推广生产技术和工作经验的书籍。县（市）委大办报刊、大出书籍，而且出得快、出得多，这是一件可喜的事情。它充分反映了各地党委对政治思想工作的重视，反映了人民群众对文化生活的迫切要求和需要，显示出全省理论队伍的成长和活跃，标志着文化事业的繁荣和发展。一年多来，全省各地的报刊出版工作，在当地党委领导下，基本上贯彻了为政治服务、为生产服务的方针，因而在人民群众宣传党的任务、方针、政策，推动干部和群众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交流工作经验和生产技术等等方面，都起了很大的作用。但是，也有一些报刊出版物，质量是不高的，其中某些文章内容比较空洞，文字粗糙，甚至在理论上不大准确；有些出版物互相转载，内容重复，过多地编辑翻印各地报刊书籍上的文章；有的出版物片面追求数量，超过实际需要，增加了读者的负担，造成了很大的浪费，等等。

报刊出版物，每天要联系和影响几万、几十万人，所以它不仅需要有一定的数量，更要有一定的质量。只有数量，质量不高，对人们的思想和工作的指导作用就不大，而且浪费人力和纸张。质量高，即使数量不多，宣传很有力，作用还是很大。少而精的实际效果，比多而滥要大得多。而且，为了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大家的工作、生产、学习都很紧张，阅读报刊的时间也要相对地减少了。愈忙愈需要学理论，愈需要丰富的精神食粮。这是问题的一个方

面。另一方面由于时间有限，因此，大家都希望报刊出版物的质量高些，以便用有限的时间，看精采的东西，得到更多的营养。打一个比方：十颗维他命 B1 丸与 31 斤清糠的营养是一样的，但是人们总是愿意吃十粒维他命 B1 丸，不愿吃 31 斤清糠。

所以，当前的形势也好，读者的要求也好，都要求报纸、刊物非提高质量不可。

目前各地县(市)委都十分重视报刊的质量问题，许多地方根据少而精的原则，决定把报纸由日刊改为双日刊或三日刊。同时，暂时停办一些条件不够的理论刊物，以便集中力量办好有条件办得好的刊物。这无疑是一个好主意，是一个适合目前情况的积极性措施。因为，在一个县(市)的范围内，目前无论在人力或物力方面，都有一定的限制。又办报纸，又办刊物，刊期短，编辑人员少，要为发排足够字数的稿件而紧张，就很难解决提高质量的问题。这样一来，人力和物力的紧张情况解决了，编辑人员可以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把报刊办得更好一点，发挥更大的宣传和鼓动作用；各地的理论工作者，也可以有给省的和地方的报刊写些出色的文章的余地了。既然这个措施可以提高县(市)报的质量，可以使省报、省理论刊物稿源丰富，办得更好，那末，这就是加强了宣传阵地，而不是削弱了宣传阵地；它就是积极性的措施，而不消极性的措施。而且，在一定时期以后，在人力物力条件具备的时侯，在数量上仍然可以继续发展。因此，各县(市)办理论刊物的同志们，要认真总结一下工作经验。这些经验不仅时目前提高报刊质量有用，而且将来再办理论刊物时，也是很有用的。

(载《群众》杂志 1959 年第 12 期)

新苗勤浇长如风

江苏省二千多所农业中学基本上巩固下来了，办得较好的差不多占一半，而且已经有八十四所学校实现了自给或半自给。江苏省农业中学在生产自给、提高教学质量、劳动和教学时间的安排等方向性问题上，取得了一些很好的经验。一句话，江苏省的农业中学，办得相当有成绩。

农业中学是半耕半读的半日制学校，是大跃进的产物。江苏省创办这种新型的学校，不过一年多的时间，为什么它发展得如此迅速，而且很快地得到巩固和提高呢？

江苏省委书记陈光同志说得好："广大群众需要它，社会主义建设也需要它，这是农业中学赖以生存的土壤。各级党组织重视它，农业中学师生有办好它的决心，这是农业中学发展的阳光和水分。一株新苗，有肥沃的土壤，有温暖的阳光，有适宜的水分，再加上精心的培养，怎么会不结出丰硕的果实来呢？"（见本报八月八日第二版）在这篇短文里，我想专门谈谈精心的培养这一点。

一株新苗要茁壮地成长，除了土壤、阳光等基本条件外，精心的培养是很重要的一条。同样的自然条件，如果养分充足，培养方法正确，新苗就成长得很快。如果培养方法不正确，或者根本上不去管它，生命力再强的新苗，也不能很快地成长，甚至有与野草同生共灭的可能性。

我们从报纸上的报道可以看到，对于农业中学这株教育事业上的新苗，江苏省一直是领导非常重视，群众大力支持。一年多来，江苏省各级党委在农业中学发展的不同阶段，抓住了不同的关键

问题：从刚创办时的明确农中性质、方针、任务，到后来的抓师资、抓整顿，一直到现在的抓生产自给、抓提高教学质量，以及不断地提高办学思想、办学领导、办学方法。在这个党委加强领导的过程中，可以说是一环不漏，一步不松；而且是一环套一环，一步紧一步。所以，江苏省的农业中学办得有成绩，可以有十条、一百条原因，最根本的原因是党委加强领导。

再说群众的支持这一条，我看，同党的加强领导也有必然的联系。党相信群众、依靠群众，群众也听党的话，照党的意见办事。既然党委那样地重视农业中学，不断地宣传农业中学在文化技术革命中的作用，群众当然给农业中学以大力支持了。事实可以证明，农业中学办得最好的地方，总是党委最重视的地方，也是群众支持最好的地方。

归根结蒂，既要善于发现新事物，又要帮助新事物的成长，这才是对待新事物的正确态度。在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 中，我们永远需要积极分子、积极的态度、积极的方法。

（载《文汇报》1959 年 8 月 21 日）

谈“出色”

两位同志在对话。一人问：一杯茶怎么才能泡得“出色”？一人答：要用开水来泡，不能用凉水。这个比喻很好。同样的道理：一件工作怎么才能做得“出色”？也应该回答：要满腔热情地去做，不能“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

“出色”是同“热”联系在一起的。茶要泡得“出色”，水的热度要高。工作要做得“出色”，干劲必须要大。在我们的国家里，“六亿神州尽舜尧”，社会主义事业进行得轰轰烈烈，一日千里。前些日子，全国和各省市召开的群英会，说明了这样的一个真理，每一项看来是平凡的工作，到了伟大的中国人民手里，加了“热”，事情就变得有声有色，万紫千红。

这里，随手拈几个例子。江苏省徐州专区畜牧局的生猪饲养保管组长王金才，他和小组的同志们集体创造和推广了一百二十多条先进经验，为国家增产和节约了大量的财富，并创造了一九五七年五月以来连续二十七个人保管生猪十三万多头无一死亡的新纪录。请想一想，如果王金才同志他们不是二十七个月如一日，干劲十足而又踏踏实实地对待自己的工作，怎能使十三万多头又叫又跳的生猪，度过昼去夜来、炎夏寒冬而无一死亡？这就是“热”！这就是“出色”！

再举一个例子。掏粪，这可以算是平凡的工作了吧？到了先进人物手里，就也做得成绩显著。北京市的清洁工人时传祥，他每天背着大木桶，把一家家的厕所掏得干干净净，并且主动地关心居民家里其它的卫生问题；不断地改变劳动组织，提高背粪桶的数量；

不但自已工作好，还关心班里其它清洁工人的进步，使班里没有落后的人。这种一片丹心为人民，尽量把自已的工作做得更多些、更好些，并且积极去做自已本份以外而对人民有利的事，这就是“热”！这就是“出色”！

“热”来自共产党的教育。“出色”来自社会主义的制度。不然，为什么整整当了三十年粪 便清除工人的时传祥，独独到了第三个十年才干得这样出色？只有在社会主义社会里，才真正做到了“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全国群英会就是一个明证。请看，今天的时传祥，被选入全国群英会的主席团，同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全国最杰出的先进生产者坐在一起，主持这一有历史意义的大会。当我们在全国各大报纸上看到刘少奇主席同时传祥握手的照片时，谁不心情激动、浮想联翩?!

但是，即使是同样的茶叶，有的茶泡得清 可口，有的茶却泡得淡而无味。同样是为人民服务的工作，有的人干得有声有色，有的人干起来却“吊而郎当”。为什么呢？在我们看来，是热度不同，是干劲不同。有些人却怪杯子不行，工作太平凡，等等。同志，请你认真地想一想，你泡自已这杯茶，用的是开水？温水？还是凉水？

（载《文汇报》1959 年 12 月 6 日）

立合乎时代要求的大志

怎样才能得到幸福？第一要立大志，第二要老实。

大志和老实，本来都是我们这个时代的青年应该具有的品格，但有些人认为这两者是对抗性的东西：立大志，就有点不大老实，是“想入非非”；老实人不应该立大志。所以有提出来议一议的必要。

“志”这个东西，不是人凭空想出来的，它是社会存在的反映，是时代要求的反映。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阶级，人们往往立不同的“志”。在旧社会里，一片乱哄哄，真理被踩在地下，闹革命要掉脑袋，“升官发财”就被认为是“大志”。有些青年虽然立下了革命的志向，但为旧制度、反动统治阶级所窒息和压抑，根本没有实现的可能。现在我们这个时代，情况就完全不同了。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需要大量的科学家、文学家、艺术家、理论家……，要有今天的张衡、祖冲之、李时珍、鲁迅、齐白石……；因此，时代要求我们青年立大志、鼓大劲，在自已的岗位上勤学苦练，使自已成为有杰出成就的人，对国家、人民作出杰出的贡献，而不是一般的贡献。同时，我们有社会主义制度，有共产党的领导，有同志般的师友，……这些客观条件非常有利于我们立大志和发挥自已的积极性。我们要无愧于这个伟大的时代，敢于攀登科学、文艺、理论……的顶峰。

什么叫老实？无非是从实际出发的意思。立合乎时代要求之大志，创推动前进之奇迹，完全是从实际出发的合情合理的事情，正是老实人的正确态度，怎么是不老实呢？时代如此伟大，制度如

此优越，不立大志，不创奇迹，才是奇怪的事情。

当然，我们希望青年立大志，是要求青年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敢于对自己提出更高的要求，对人民作出杰出的贡献；而不是要青年去做野心家，人人象刘邦见了秦始皇以后那样，人人立下也要做皇帝的志愿。所以，“立大志”同“想入非非”是完全不同的。这主要是前提和可能获得的结果不同。“立大志”有着更好地为人民服务这个总前提，是为了促进社会向前发展，是为了造福于人类，因此合乎社会的发展规律，有实现的可能。“想入非非”或者是从个人名利出发的幻想或者是莫名其妙的空想，或者是想拉住历史车轮的恶念头。这就象一个人钻进了黑弄堂，不是跌交就是碰壁，别无结果。

立大志一定要鼓大劲，要从事艰苦的劳动。青年人本来阅历浅、锻炼少，如果只立大志而不鼓大劲，就等于没有立大志；如果因此而飘飘然起来，那就比不立还要不好。因此，立志以后要老实，志越大，越要老实。容国团立志夺取乒乓球男子单打世界冠军，这无疑是大志，现在也成功了。他怎么会成功的呢？从报纸上的介绍可以知道：他立下大志以后，不是飘飘然，不是吃安眠药片，而是鼓大劲，老老实实地向王傅耀、姜永宁、杨瑞华……等优秀乒乓球手学习。集了各人的特长，自己又作了各方面的锻炼，一句话：他提前两年实现大志是勤学苦练的结果。所以，大志和老实是密切联系而相互起作用的，是辩证的统一。我看，事情是不是可以这样提：还是立个大志好，还是老实一点好。——这样，大志才能实现，才能得到最大的幸福。

（载《文汇报》1959 年 7 月 3 日）

穷办法办法无穷

“穷办法办法无穷”，是一句响亮的口号，是一条经过实践反复证明的经验。中国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用穷办法革命：一把菜刀闹革命，“小米加步枪”抗击日本帝国主义和消灭国民党反动派，取得了革命的伟大胜利；用穷办法建设：“蚂蚁啃骨头”，土洋结合、从土到洋，大办“穷棒子社”，穷养猪，勤俭办学……，正在取得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胜利。穷办法有着无穷的威力，穷办法永远用得着，这是因为：穷办法是一种革命的办法，它打破常规，战胜困难，主要靠自力更生来改变旧中国“一穷二白”的落后面貌。穷办法是一种积极的办法，它因陋就简，白手起家，不是消极地等待条件，想“福自天上来”，而是积极地改变条件、创造条件，“福从干中得”。穷办法是一种智慧的办法，它不是做客观条件的奴隶，而是做客观条件的主人，千方百计，精打细算，“两条腿走路”，使事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把社会主义建设多快好省地推向前进。

所以，穷办法并不是狭义地指哪一种个别的技术措施或哪一个具体办法，而是我国六亿多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从实际出发，为迅速改变“一穷二白”的落后面貌，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的一种精神。当然，这种精神不是抽象的，在具体工作、具体情况下，就表现为一种革命的、积极的、智慧的具体措施。有些人不理解这一点，认为穷办法在革命时期有用，建设时期行不通了，这是不对的。试想一想，革命时期需要积极的、智慧的革命精神，建设时期就不需要这种革命精神了吗？现在发展工业能不用“蚂蚁啃骨头”、土洋结合、从土到洋，发展农业能离开大积自然肥料、穷养猪，发展教

育事业能离开群众办学、勤俭办学……等等原则和办法吗？离开了这一些穷办法，我们的工业、农业、文化教育事业就不能多快好省地发展。

我们认为穷办法威力无穷，并不是说我们就因循守旧，永远用一个固定不变的办法来搞建设。恰恰相反，现在用这些办法，正是为取得更好的武器来搞建设。只有现在大搞“蚂蚁啃骨头”，才能走上机械化自动化的道路；只有先大积自然肥料，发展农业生产，促进工业发展，才能大量发展化学肥料工业；只有先穷养猪，才能逐步富养猪……。这就是既从我们现在的实际情况出发，又充分发挥主观能动作用的做法。但是，那种革命的、积极的、智慧的“穷办法”，则永远是我们的武器。

（载《文汇报》1959 年 12 月 29 日）

用在刀口上

“把……用在刀口上”，是一句大家常说的话。

“把钱用在刀口上”。这是搞经济工作的同志经常说的。这句话意味着社会主义的经济工作者，要把人民的每一分钱，都用在社会主义建设最迫切的需要上去。少花钱，多办事，一块钱办五块钱的事业，贯彻了这种精神。现在我们大多数的经济工作者，都是本着这种精神在管理人民的财富。如果每一个经济工作者都这样做了，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一定能够发展得更加快。

“把劳动力用在刀口上”。这是搞工农业生产的同志经常说的。这说明在我们社会主义社会 里，既注意节约物力，又注意节约人力，而且特别重视对人才的使用。大搞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体现了这种精神。既抓生产，又抓生活，劳逸结合，也体现了这种精神。地主阶级把农民当做奴隶，资产阶级把工人当做工具。只有在社会主义社会里，人才是最宝贵的财富，得到最大的重视和爱护。“把劳动力用在刀口上”，不仅仅是干部的一种领导方法问题，而且是我们社会主义社会制度的本质体现。

“把时间用在刀口上”。这是更多的人经常说的。在我们的社会里，无论工人、农民、干部、教师、学生、青年、妇女，人人大跃进，大家都很忙。一天二十四个钟头，觉得有点不够用。很多同志善于安排，把时间用在刀口上，收到了工作好、学习好、身体好的效果。有的同志不善于安排，事不分大小缓急，时间平均分配，没有用在刀口上，甚至用到刀背上、甚至刀柄上去了，虽然忙忙碌碌，但是工作搞得不全、不深、不细，学习时间没有，休息时间很少。对己、对工

作都不利。

总而言之，“把……用在刀口上”这句话，说法虽然不一，各人体会虽然不同，但是都包含了“巧”和“好”的精神。把钱用得巧、用得好，把劳动力安排得巧、安排得好，把时间用得巧、用得好，是一种革命精神，“穷棒子”精神，符合总路线的精神。所以，我们要大大提倡，把……用在刀口上！

（载《文汇报》1960年4月8日）

“把关”从哪里把起？

“质量第一”的思想正在越来越深入人心。在上海的工业生产战线上，“生产优质品光荣，生产劣质品可耻”，正在成为广大工人的自觉行动。这真是一种可喜而可贵的风气！

为了保证质量，每个工厂和企业都在加强质量检验工作，做到只有挂了“合格证”的产品才能出厂。如果检验出来的是次品，就要返修；如果是废品，就把它剔出来，让它靠边站。虽说是一张小小的“合格证”，大不过一寸见方，却是无数人劳动的综合表现。因此，人们称之为“把关”。这个“把关”，无疑是极为重要和完全必要的。

这里，我却想提出一个问题：“把关”究竟应该从哪里把起？如果说，某一个产品的生产过程是五道工序，前面四道都没有把住，只在最后一道才把住了一个次品或废品，固然不失为负责矣，然而国家则蒙受了损失，社会则减少了财富，对人民终究是不利的。一台惹人喜爱的“蝴蝶牌”缝纫机，不仅在挂“合格证”时要把住“关”，更重要的是在生产机头和机架时，就要把“关”把住；推而远之，在生产机头和机架所需的钢材、生铁时，就要把住质量关。一台高质量的缝纫机，从根本上说，不是从挂上“合格证”那一天才诞生的，而是从它所需要的那些优质原材料生产出来时就呱呱堕地了。因此，质量“把关”并不仅仅是质量检验员一个人的事。质量“把关”要从头“把”起，人人把关，关关“把”住；参加生产的人个个都来做质量检验员。而让那位最后检验产品质量的同志能够给每个产品都挂上“合格证”，让商业部门收购到更多的高质量产品。这样，我们的市场将更加丰富多采，人民将更加高兴！

（载《文汇报》1978 年 11 月 1 日）

大家都来做青年工作

当前，对青年的思想教育工作，回沪知识青年的安置工作等等，都需要加强。这许多工作靠谁来做？那些青年所在的街道里弄，当然责无旁贷，要放手大胆地去做。工作做到一定程度，总能收到效果。但是，光靠街道里弄做不够，还要靠大家来做。这个“大家”，就是家长要做，邻居要做，现在和过去的老师要做，青年集中较多的有关工厂、企业、学校、机关都要动手做。从一定上意义上说，只有“大家”都来做青年工作，才能把工作做好，做出成效。

做什么思想工作？照我看，首先是要从政治上关心和爱护青年，引导青年认清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和自己肩负的责任，认清巩固和发展安定团结大好局面的重要意义，坚定不移地听党的话。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是经过实践完全证明了的一条真理。

有同志要问：这还成问题吗？是的，这应该说是不成问题的。问题是现在有各种各样的话，青年也会听到各种各样的话，这是一个客观存在。青年的思想是最活跃 的，这是好事；但是，又需要帮助、引导。有些话听来好象很动听，实际却极片面，甚至是政治上不负责任的话，听了不作分析，就要上当。所以，分析好，大有益，听到了各种各样的话，要仔细想一想，是否真有道理，是否符合广大群众的根本利益，是否符合党的十一大路线和抓纲治国的要求。

在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的问题上，对青年多做工作，也是对他们政治上的关心和爱护。青年最富于进取心，他们每天象海绵吸水一样在吸取各种观点。青年好动，每天总想有点事做。什么该做，

什么不该做，我们大家都有责任予以正确引导。现在和将来，有利于安定团结的事是该做的，不利于安定团结的事就是不该做的；有利于生产、交通、人民生活的事是该做的，不利于生产、交通、人民生活的事就是不该做的。因此，这是关系到一心一意搞好四个现代化的大事。有些青年有这样那样的实际问题要解决，我们应该倾听他们的要求和意见，需要和可能解决的问题应该切实解决，但是，难道做点不利于安定团结的事，就可以解决问题了吗？我们应该让这些青年懂得，做亲者痛、仇者快的事，是最蠢不过的。

大家都来做青年工作，也包括对个别人干坏事进行批评和斗争。这对绝大多数人来说，是提高识别能力，打“免疫针”。对那个别人来说，也是一种爱护，使他不致走得太远。唯恐上海安定团结，唯恐我国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人肯定是有的，这不奇怪。否则，我们怎么理解“四人帮”及其余党对上海的严重干扰破坏呢？问题是这种人很狡猾，往往躲在人们的背后捣鬼，因此我们不能掉以轻心。尽管如此，广大群众是有觉悟的，也不可怕。

（载《文汇报》1978 年 12 月 15 日）

民主首先在领导班子内部

领导班子内的民主问题，是民主生活的极其重要的一个方面。道理很明显，领导班子内，民主集中制搞得好，生气勃勃，将会极大地推动它所管辖的地区或部门的工作和生产。反之，就会使那里要么暮气沉沉，工作毫无起色；要么“十个和尚念十本经”，使下面无所适从，对工作造成危害。

重大事情要由集体来讨论和决定。凡属原则问题、政策性问题、关系到广大群众切身利益的重大事情，均应由领导班子集体作出决定。在这些问题上，要搞“群言堂”，绝不能搞“一言堂”。诚然，对革命工作敢于负责、有魄力、有胆量，这是必须大大发扬的。但是，个人所知有限，集体智慧无穷。正确的集中，从来是以充分的民主为基础的。而充分的民主和正确的集中，又必须首先在各级领导班子内得到充分的体现。

领导班子内有没有民主，主要并不表现在是否天天开会，更不是要求事无巨细都拿来集体讨论，而应该表现在是否运用了集体的智慧和力量来抓住和解决主要矛盾。只有善于把主要时间和精力用来研究重大问题，从而作出符合实际情况的正确决定的领导班子，才是一个强有力的战斗集体。讨论研究重大问题，还必须有一定的准备，有分工负责的基础。倘若不加区别，不作准备，那些明明可以由分管同志决定的事，偏偏要拿给大家来“民主”一番；应该是集体决定的大事，却不酝酿，不讨论，这就未免本末倒置，糟 了民主。

充分反映群众和下级的意见。有这样一些单位的领导者，他们

对于跟自己权位相当的人们的不同意见还可以接受，但要他倾听一下来自下级和群众的批评，就很难办到了。殊不知，领导班子内的民主，一般是人民群众民主的缩影，应该生动地反映人民的要求，人民的愿望，人民的呼声。群众在想什么？要求什么？希望什么？对领导班子来说，犹如人需要空气和水一样地重要。强调领导班子的民主，不是为了别的，最根本的是为了更好地服务于人民这一崇高目的。不了解民情，不了解下情，领导班子讨论问题就是无源之水、无根之木，也就不可能作出正确的决定。

领导班子的成员怎样才能了解群众的脉搏，听到群众的心声？关键在于放下架子深入到群众中去。如果整天泡在会议里，同自己的服务对象严重脱离，那么，领导班子讨论问题的民主空气再浓、发言再热烈，也不可能同群众想到一块去，至多是个徒有其表的“民主俱乐部”而已！

对不同意见或反对意见给予充分的考虑。“强调民主，不同意见多起来怎么办？”这种担心，说明某些同志还不懂得什么是真正的民主。只准按规定的口径唱一个调子，生怕有不同意见，那不能叫民主，只能叫“真主意，假商量”。其实，党内党外，不同意见都是客观存在。特别在全党工作的着重点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作战略性转移的情况下，新事物、新情况、新问题泉涌而至，没有熟路可循，没有成法可依，出现不同意见更是理所当然。

存在不同意见是好事，不是坏事。兼听则明，偏信则暗。客观事物是错综复杂的。我们革命工作的规律也是通过变化纷繁的现象表现出来的。多一点不同意见，就是从多一些侧面来分析客观事物，从而将使我们多一些认识工作规律的有利条件。在不同意见面前，各自要有正确的态度：要取长补短，互相补台。既然大家都是革命者，既然大家的不同意见都有着为人民服务这个共同目标，那还有什么错误意见不可以抛弃？还有什么必要心存芥蒂？我们可以在会议上争个面红耳赤，但又必须按照决议办事，在开展工作时

互相协调、亲密无间。在领导班子内树立起这样一种风气，才能齐心协力，步调一致地为人民服务。

关键在于“班长”。一个领导班子的民主风气，要由领导班子的成员共同来培养，而关键在于“班长”。

称党委书记为“班长”，是一种习惯性称呼。其实两者之间是有颇大区别的。毛泽东同志说过：“书记和委员之间的关系是少数服从多数，这同班长和战士之间的关系是不一样的。”书记要当好“班长”，就应该充分发扬民主，对各种意见虚心倾听和研究。气魄要大一点，胸怀要宽阔一点，以便苦口良药怡然而服，逆耳忠言欣然而听。一、二把手如果不注意用民主的作风、平等的态度来处理自已和其他领导成员之间的关系，就难以把“一班人”的积极性调动起来。民主的“班长”主持会议，必然是发言踊跃，讨论深入；“霸王”式的“班长”居于首座，十之八九是鸦雀无声，面面相觑——这种情况不是屡见不鲜吗？而如果连“一班人”的动作都不整齐，又如何带领千百万人去建设？应该说，民主精神是“班长”的一种基本品格。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指出：“由于在过去一个时期内，民主集中制没有真正实行，离开民主讲集中，民主太少，当前这个时期特别需要强调民主，强调民主和集中的辩证统一关系”。这是一段切中时弊的话。各级领导班子、特别是“班长”们，不妨都来看一下：自已这里民主作风发扬了没有？民主集中制完善了没有？如果有欠缺，这种欠缺又到什么程度了？如果准备改，那又怎么来真正地、切实地改？

（载《解放日报》1979 年 1 月 22 日）

卧轨拦车是学谁的样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五十七条规定："公民必须爱护和保卫公共财产，遵守劳动纪律，遵守公共秩序，尊重社会公德，保守国家机密。"

对于发生在二月五日的拦阻列车事件，必须分清是非，严肃对待，否则，广大群众真正需要民主就得不到保障，社会主义法制就得不到伸张，"四人帮"横行时的那种无政府主义苦头又要重吃一遍。这样，全党全国的工作重点也就没有办法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

人们都还记得，一九六六年十一月，王洪文之流在上海卧轨拦车，制造了一个"安亭事件"。由于得到江青、张春桥、陈伯达的支持和教唆，一度被吹捧为"革命行动"、"英雄业绩"。王洪文、陈阿大之流也从此起家，登上政治舞台，篡党夺权，在全国和上海横行了十年之久，给国家和人民带来了莫大的危害。

在粉碎"四人帮"已经两年多的今天，难道还能干卧轨拦车这类事情吗？难道还能把它称为"革命行动"吗？这样干和这样认为，是学谁的样，把自己划到哪一边去了呢？！当前，举国上下同心同德搞"四化"，这是全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也是每个公民的共同纲领。我们每个人都要把"四化"当作自己的切身事业，凡是符合"四化"要求的，我们要大干特干；王洪文、陈阿大之流干的破坏活动，我们万万干不得。这是一点也不能含糊的。

有人说："我是为了解决自己的问题才这样干的。"且不谈阻拦列车的这些人所要解决的问题并不合理这一点，就讲"为了解决自己的问题"这个"道理"吧：这道理，那道理，阻拦列车就是没道理；

不仅是没道理，而且是一种违法的行为。请看一看、算一算这笔账：就这么一拦，上海站有二十九趟列车开不出去，三十一趟列车不能进站，八万多旅客不能上下，并打乱了几条铁路干线的运行秩序。这给国家经济大动脉造成了多么严重的问题，给几万群众的生产和生活又造成了多么严重的问题！而且，恶劣影响之所及，也给我们的国家信誉抹了黑，这又是一个多么大的问题！人们向政府反映意见和要求，不能妨碍和破坏正常的工作秩序、生产秩序和社会秩序，这是一个原则。违背这个原则，就要走上邪路。社会是大家的，一个人的社会行动应该受到社会的制约，不能以妨碍别人的生产和工作来驰骋自己的"自由"。俗话说，有理走遍天下，无理寸步难行。汽车、自行车走路尚且要分左右、听红绿灯指挥。一群人的活动怎么能够不遵守社会秩序和国家法律呢！否则，社会将成个什么社会，国家将成个什么国家呢！

有人可能要说：你这样发议论，把这些人同王洪文、陈阿大联系起来，"纲"上得未免太高，界线分得不清吧？我说：这个"纲"上得一点也不高，界线也是分清了的。我没有说这些人就是王洪文、陈阿大。王洪文在全国只有一个，陈阿大在上海也只有一个，他们已经绳之以法。卧轨拦车，王洪文之流确实干过，并引以为荣，这是明明白白的。那几个二月五日拦阻列车的指挥者和幕后策划者，是身上还有王洪文、陈阿大的流毒没有肃清，因而干出这种违法行为，我看也是明明白白的。我们如果不是这样认识问题，那才是是非不明、界限线不清哩！

最后，我倒有个想法：这一事件的后果和影响实在太坏了，铁路部门有权起诉，控告那几个拦阻列车的指挥者，并查出幕后策划人，由司法部门给以必要的法律制裁和经济制裁！惩办极少数，才能教育大多数。确保正常的社会秩序、生产秩序和工作秩序，才能维护和发展安定团结的大局，更好地发扬社会主义民主，顺利地把重点转移到"四化"上来。

（载《解放日报》1979年2月14日）

何必在请柬上摆阔气

陆陆续续收到一些请柬、入场券，有的是开会通知，有的是邀请看球赛或展览会。积以时日，逐渐形成一个印象：这些请柬、入场券之类，有点越来越阔气了——虽然简简单单几个字，纸却用得老大，而且是重磅道林纸；虽然是一个普通的展览会，入场券却烫金、敲花。说实在话，开始拿到少数几张的时侯，还颇感新鲜，放在抽屉里舍不得丢掉，慢慢积成一大叠，就不免有些感慨了。

一定的形式是反映一定的内容的。有些重要的会议或展览会，为了表示郑重，或者还为了兼有留作纪念的意思，把请柬或入场券设计得美观一些，印制得精致一些，是无可非议的。如果花同样的材料和成本，我们为什么不在设计和印制方面下点功夫，搞得好看一些，搞得讨人喜欢一些呢！

问题是形式要服从内容。请柬毕竟只是请柬，入场券毕竟只是入场券，在通常情况下，无非是让你知道应该于何时到何地入何座。它还不是会议或展览会本身，它不能说明这个会议或展览会的内容是丰富还是单调，值得参加还是不值得参加。特别在我们国家还不富，许多物资例如纸张还很紧张的情况下，不能把人力、物力、财力用在不必要的形式上面，不应该在这些方面摆任何阔气，因为这不符合节约的原则。

这里，节约的原则同实事求是的原则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准备一个会议，筹备一个展览会，要紧的是它的内容，它的效果。如果内容不精彩，不吸引人，或者开的会不大解决问题，那么，任你把请柬、入场券印得再大，再漂亮，也只能给人留下既铺张浪费，又哗

众取宠的感觉，不会留下别的好印象。为此，奉劝有关同志，多一些节约观念，讲一点实事求是，如果不是出于什么特殊的原因，不要再在请柬、入场券之类印刷品上摆阔气！

（载《解放日报》1979 年 5 月 14 日）

不要“头多肩胛少”

一副肩胛上长着两三个脑袋甚至四五个脑袋，这是《封神演义》里的人物，现实生活里是没有的。可是，现在许多基层单位遇到上面多头领导的状况，则是确实存在的。拿一个工厂来说，主管局有权管它，主管公司有权管它，所在的区或县有权管它，还有上级部门各个职能部门也有权在某一方面管它。因此有的工厂，一个月内往往要接待上级来人一、二十批，而且几乎每天要派出一个领导干部去参加会议，接受各种各样的任务。真是“上面有线千条，下面针眼一个”，“上面多头多脑，下面昏头昏脑”。

多头多脑，使基层单位穷于应付，这还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问题的另一个方面，还在于“龙多不治水，头多肩胛少”。有些领导部门，往往只顾向下面布置任务，动不动从基层单位抽人出来搞临时任务，几只手一齐伸向基层单位要这要那。当基层单位在生产和工作中遇到具体困难，需要上面帮助解决的时候，却有“头”无“肩胛”，不负责任。一张报告送上去，图章盖了十来个，半年不见一声回音。基层单位遇到这种情况，只有叫苦不迭。

“头多肩胛少”的状况，显然是不符合工作重点转移的要求的。厂矿企业等基层单位，处在向四个现代化进军的第一线，它们是多么需要领导部门的关心和帮助啊！比如说，一个轻工业工厂，为了加快产品的质量升级和品种换代，发展优质、名牌产品，增强国际竞争能力，就不仅需要得到轻工业领导部门的帮助，还需要得到有关协作单位及其领导部门的关心和支持。各行各业的领导部门，都必须全心全意为基层服务，千方百计给基层以方便，而不是给基层

以麻烦，这才是在现代化建设中对待基层单位的正确态度。对基层单位的领导，“头”不能太多。更重要的是：有一个“头”，就要有一副“肩胛”，同基层一起挑担子，帮助基层解决问题。这样，基层单位就能肩挑重担，甩开大步，在现代化建设的道路上走得更快一些。

（载《解放日报》1979年6月14日）

凌云之业，须实地去干

调整的方针完全是一个积极的方针。有人比喻说：调整国民经济好比是棉花整枝，把那些消耗营养、不能结铃的雄枝整掉，就可以保证多结棉铃，多产棉花。可见调整是前进，不是倒退。对上海来说，任务不是轻了，而是更重了。上海人民有责任也有志气在打好四个现代化的第一个战役中继续前进，为国家多作贡献。

上海要办的事很多，举其大者有：要大力加快轻工、纺织、手工业的发展，努力发展全国和出口需要的短线稀缺产品、高精尖产品，搞好产品的质量升级和品种换代；要充分利用上海口岸的有利条件，努力发展出口贸易和旅游事业；要把郊区的农业进一步搞上去，把国营农场办好；要积极发展和提高科学研究事业，在重视基础理论研究的同时，用更大的精力研究解决四化建设中的重要而迫切的课题；要采取坚决措施，有计划地治理“三废”污染；等等。这样一些重要事情，是关系到能不能把上海建设成为我国先进的工业、外贸和科学技术基地的大问题，都需要各行各业的广大工人、技术人员和干部，团结一致，目标明确，脚踏实地去干。我们要一心一意搞四化，聚精会神搞四化，重要的一点，就是要脚踏实地，拿出行动。实干才能见效，空喊不值分文。

脚踏实地干，首先来自强烈的社会主义责任感。“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搞不搞四个现代化，就是一件关系到国家兴亡、子孙祸福的大事。无数革命先烈、志士仁人抛头颅、洒热血，就是为了有今天这么一天。我们每一个中国人，都应该把四化的重任，心甘情愿地放到自己的肩膀上，竭尽全力，备斗不懈！

为四化献身的思想，要见诸于行动，立足于本职，埋头苦干，少说多干，这才叫脚 踏实地。四个现代化是把各行各业都“化”在里面的，在任何工作岗位上都有为四化贡献的机会。如果认为四化只是某些领域、若干岗位、一部分人的事，“我这个小单位，我这个小八腊子，关系不大”，那就大错特错了——人人都这样想的话，四化就将落空。所以“为四化钻研业务，为四化多作贡献”，应该成为每个公民的共同口号和自觉行动。

在向四化的伟大进军中，肩负各种领导责任的干部和共产党员，应该义不容辞地成为火车头和发动机。不仅自已要跑在前头，发光发热，成为实干的模范，而且要带动一大片，把自已所在的单位、部门，乃至行业都带动起来，为四化作出出色的成绩。干部和共产党员同样会遇到一些个人恩怨、利害得失、家庭子女等各种问题，这是不奇怪的。要紧的是在历史的转变关头，必须懂得大局和全局是什么，带头识大体、顾大局，为国分忧，抢挑重担。

现在值得注意的是：在不少单位的负责干部中，往往存在一种“宁慢不快，宁等不闯，宁逸不劳”的思想，一句话，就是只求无过，不求有功。产生这种思想的原因，主要有二：一是心余有悸，怕闯不好或出点什么问题，什么时侯又要挨整；二是怕艰苦，图安逸，无所作为的庸人世界观在起作用。用不着多说，这种精神状态同搞四化是何等的格格不入。斯大林说过：“我们共产党人是具有特种性格的人，我们是由特殊材料制成的”。张志新同志是无愧于共产党员这个光荣称号的。我们每一个人闯过了林彪、“四人帮”这座鬼门关、正在为四化奋斗的共产党人和干部，应该把张志新烈士的光辉形象作为一面镜子，严肃地想一想：自已是否够得上是“特殊材料”制成的共产党员？自已在新长征中有没有解放思想、开动机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如果自已至今还只是在奉命办事，不动脑筋，成为庸庸碌碌、敷衍了事的“一般材料”甚至“不合格材料”，应该怎么办？

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特别是在伟大的历史性转变的重要时刻，如同打仗需要有士气、同“四人帮”斗争需要有骨气一样，搞四个现代化非要有一股脚踏实地苦干的风气不可。有没有这种精神。是强烈还是淡薄，对四化的进程是大不一样的。我相信，随着四化大业的发展，脚踏实地苦干的精神必将蔚然成风！

（载《解放日报》1979 年 8 月 20 日）

为一场演出的好风气喝彩

十月二十一日晚上，应著名评弹表演艺术家陈希安先生的邀请，去静园书场听了一回书。这是上海评弹团从香港演出归来的汇报演出。我不禁为这场演出的好风气所折服了，实在应该为这种剧场好风气大喝其彩！因为这是一种真正的文化生活和艺术享受！

从七点到十点的演出时间内，台上台下，互相尊重，感情交流，打成一片。演员们个个认真地演唱，有的演员似乎感冒了，还是一丝不苟，说唱得汗流浃背，每一档书都博得了观众十几次鼓掌和全场会心的欢笑。观众们极其尊重演员们的劳动，聚精会神地听，热情地鼓励演出中的每一个精彩“片子”和“关子”。书场有一千多只位子，不可谓不大矣；说书达三个多小时，时间不可谓不长矣，然而，自始至终，台下极少谈话声和窃窃私语，更没有喝倒彩、怪叫声或乱起哄现象，也没有“拔签子”和提前退场。寂静时，场内只有演员一人的声音；高潮时，全场欢声雷动。笑声不断，然而是有礼貌的；掌声迭起，都是观众发自内心的赞赏。我深深感到，象这样的风气，演员高兴，观众也高兴。与我一起去听书的一位同志是宿迁人，应该说是北方人了，对评弹这门艺术是比较生疏的，也赞叹地说：演员演得好，观众听得好，剧场风气好！

这场演出的好风气，当然首先来自演员们的精湛艺术和辛勤劳动。他们以动人的情节和精彩的表演，吸引、感染了全场观众。我这里要强调的是观众的配合。这一天，观众来自各个方面，年龄大小也不等，他们是真正的评弹爱好者，真正是为欣赏艺术而来的，因此无论男女老少，都显得很有素养，象一个过文化生活的样子。

整场演出都是在鼓掌、点首等热烈而文雅的气氛中进行的，没有喊叫，没有怪声，没有喧闹。绝不象有一次我去听音乐会所见到的那样，喝倒彩有之，站起来喊"勿来三"有之。有些人已经粗鲁到了野蛮且有失人格的程度，看了使人感到痛心！

在公共场所，特别在剧场、影院，把自己的行为放得文明一些，是一个小问题吗？不能这么说。这是一个社会风气问题，是一个关系到民族精神面貌的问题，因此绝不是一个小问题。是不是难以做到呢？也不见得。象静园书场不就做到了吗？非礼勿动，这难道不正是我们中国人的固有美德吗？在行为端庄、讲究礼貌方面，中国比其他任何国家应该是一点也不逊色的。

有的人有一种论调：我买票看戏，爱怎么样就怎么样，别人管得着吗！不对，这是一种个人利己主义的思想。为什么这样说？第一，买票看戏，理所当然，没有什么了不起。难道在现在的社会里，还想不买票看白戏吗？第二，你买票看戏，其他观众哪个不是买票看戏？因此，你有什么权力以自己的怪声怪调或丑态，来影响、干扰全场几百上千人？难道你是京剧舞台上那种鼻梁里画着个小白乌龟的恶少或恶仆吗？第三，最根本的，买票看戏，观众同演员的关系，是社会主义社会里的同志关系，不是雇佣关系、买卖关系和主从关系。因此，你不能花了几角钱，就想在剧场里为欲所为，胡作非为。谁不懂得这一点，他的思想就大成问题，就应该好好改正。在没有弄懂这些或不想弄懂这些道理时，最好先别进剧场去出洋相。如果有人还不以在剧场里表演这种丑态而害羞，反以为"扎台型"，谁都有权利嗤之以鼻！不能让他们爱怎么样就怎么样，别人就是管得着！而且我想，再过几年，当他懂一点事的时候，会觉得自己当年的所作所为实在太无聊了！

（载《文汇报》1979 年 10 月 27 日）

谈谈“从恶如崩”

我国古人有一句话：“从善如登，从恶如崩。”意思是说，一个人学好样、做好事，象登山一样，不那么容易，要花力气；一个交了坏朋友，跟着做坏事，象石头滚下山一样地方便，而且有粉身碎骨的危险。

这句话启发我们交朋友要慎重。许多人都有这样一个深刻的体会：交了一两个品德好的朋友，往往可以帮助自己在正路上走得稳稳的，对自己一辈子起着好影响；如果交了一个坏朋友，硬是把自己往邪路上带，那就倒了一辈子的霉。所以，古人的话不是凭空而来的，而是通过实践得出来的经验之谈。即使拿现在的社会来讲也是这样，许多品学兼优的学生，钻劲干劲都挺大而有所成就的青年工人，他们的知心朋友大体上总是比较正派的；而不少邪气满身、甚至走上犯罪道路的青年，往往是从交了坏朋友开始失足的。于是，古人又有一句话，叫做“观人先观其友”，就是这个意思。

有的青年同志可能要问：现在，剥削阶级不是已经消灭了吗？社会上不都是好人了吗？你怎么还在讲交朋友要当心呀？这种看法实在是种误解。剥削阶级没有了，少数坏人还有，特别是人民内部，剥削阶级意识形态和种种损人利己的影响还将长期存在。在上海，“四人帮”及其余党被打倒了，但他们的余毒和影响，决不是两三年时间就能全部肃清的。这些，都需要引起我们青年同志的极大注意。坏人不是写在额头上的，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则到处都有，一不小心，就将“从恶如崩”，难以自拔。在最近各级人民法院宣判的一些案件中，只要我们加以注意和思考，都可以找到这样的例

子。

有的青年同志可能又要提出一个问题：如此说来，我们还能不能交朋友呀？当然，事情没有那么严重，不需要紧张到那样的程度。因为：第一，坏人毕竟是极少数，而且社会各方面都在帮助和督促这些人改恶从善，新社会是有力量改造他们的；第二，我们要把有某些坏思想、坏习气的人同坏人严格区别开来。如果在自己的朋友中间有那种坏思想、坏习气的人，就应该尽到同志和朋友的责任，帮助他们改正缺点和错误，绝不能听之任之，也不能就此回避。特别要注意一点：打铁先得本身硬，自己要拿定主意，站稳脚跟，不能给他牵着鼻子走，跟着他向歧路上跑，做坏事千万不能讲“义气”，而要把他向正路上带，帮助他共同进步。一个人的力量不够，就要发动其他同志一起来做，依靠所在组织（街道、学校、车间的党团组织）一起来做。这才是正确的、积极的态度。

（载《文汇报》1979 年 12 月 8 日）

提倡一点“君子之风”

“君子”这个词，作为“小人”这个词的对立面而存在着，在我国的文字和口头语中是源远流长的。孔子说过：“圣人吾不得而见之矣，得见君子者，斯可矣。”人们平时也常常说道：“咱们订个君子协定，好不好？”“君子一言，驷马难追。”“不要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等等。所以，“君子”在我国历来是一个褒词，是指那种讲究气节、才德出众、注意修养的人。《镜花缘》里把一个理想的国家称为“君子国”，有的古人把“出淤泥而不染”的莲花称为“君子花”，无非就是这个道理。

然而，在十年浩劫中，一切被颠倒了过来，“君子”也蒙受了不白之冤：凡是谁倒了霉（事实上绝大多数纯粹是冤、假、错案），尽管他过去学习认真，工作刻苦，生活俭朴，待人谦逊，一概要斥之为“伪君子”。如此一上“纲”，他也就比那种不学习、不工作、不俭朴、不谦逊的人的问题似乎还严重。这类所谓的“一错百错”的谬论，把“君子”同“小人”混淆成了差不多的贬词，使人们不敢谈什么君子之风、君子之言、君子之行了，有人把“气节”、“人格”、“修养”等等的为人之道都丢到了太平洋里去了。

在阶级社会里，什么是“君子”？什么样的言行是“君子”应该具备的？不同的阶级无疑有着不同的解释和标准。而且，不同的社会形态，自然会给它注入不同的道德内容和规范。这是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男女授受不亲”，自然只能是封建社会“君子”的道德标准，而不能成为资本主义社会的“圭臬”。“将本求利，一本万利”，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可以自由地驰骋，不受任何约束，但不能成

为社会主义社会里的“美德”。历史的发展，总是要求社会风尚、道德标准等等，尽可能地符合统治阶级的要求，以不断巩固它自己的统治地位，推动社会的继续前进。

那么，在我们现在的社会里，应该不应该有自己的“君子”呢？要不要提倡一点“君子之风”、“君子之言”、“君子之行”呢？我想是应该的。理由无需十条八条，只需一条：你总不能提倡做“小人”吧。我们中国的国格、邦本、民气和为人之道，许多传统是极其光辉烂灿的。比如，“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爱国思想，“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为人民服务观念，“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革命情操，“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工作精神，“君子慎其独”的自我修养精神，敬老尊贤、言而有信、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不取非义之财等等的为人之道，难道不应该作为“君子之风”予以发扬吗？

这里所举的种种“君子之风”，许多是为人的根本之道，在今天的社会里仍然是十分重要的。不仅关系到个人，更重要的是关系到国家和社会的风貌。试想，如果有那么一个青年，在旅游饭店门口伸出手去向人讨香烟抽，这种行为除了给人留下“此人厚颜无耻”的印象以外，恐怕还要留下比他个人出丑要严重得多的恶劣影响吧。这种行为所失掉的，已经远远不止是他个人的尊严了。可见，人格和国格是联系在一起的。要有爱国心和民族自尊心，就很需要有中国人民传统的“君子之风”的骨气和精神。

（载《文汇报》1980年5月18日）

“邑有流亡愧俸钱”

最近，制冷专家陈廷骧被迫出走一事，由于报章的披露，而引起了各方的重视，对某些组织、人事部门的严重官僚主义和“踢皮球”作风进行了谴责。如果从此得出积极的教训，使有用的人才不再“流亡”，人尽其才，才得其用，将是一件好事。

问题是谁该接受教训？仅仅是商业二局的人事部门吗？这个部门当然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他们对中央和市有关领导部门的意见置若罔闻，把陈廷骧的工作安排问题推来踢去达七个月之久。我们敢于妄测：有些同志对自己亲属的工作或升学问题，是决不会如此冷若冰霜的。

问题是仅仅商业二局人事部门接受教训，实在远远不够。陈廷骧是具有一定影响的学者，又愤而办了出境手续，这才引起了重视。还有更多虽然身有专长，但无出境手续可办的人，会不会引起如此重视呢？还不是给官僚主义“闷”在那里叫天不应，叫地不灵吗？所以，只有各级党委和所有人事部门都来重视，特别领导干部要将心比心，把关心各种有用之才象关心自己“插队”子女那样地时刻不忘，象当年自己被一锅端到“五七”干校那样地痛感不当，那么，“出走”之类的事才可能成为历史陈迹。

唐朝诗人韦应物在做苏州刺史的任上，曾做过一首诗，内有一句云：“邑有流亡愧俸钱！”后来范仲淹读到这一句时，叹为“仁人之言”。对地方官来说，管辖下的老百姓没有饭吃，跑出去要饭，就是“邑有流亡”。专家、学者由于工作安排过于不当甚至几十年没有事做，被迫出走，这更是“邑有流亡”了吧？这对于“地方官”来说，实在

不是光彩的事！一个比较体恤民情的封建官吏，尚且要发出“邑有流亡愧俸钱”的感叹，作为人民公仆的“政府官员”，面对“邑有流亡”应该下个什么样的决心呢？“铁饭碗”和“愧俸钱”之间总该来点矛盾和斗争了吧！

（载《民主与法制》1980年第10期）

由此及彼的感想

最近到省委党校学习，使我有机会回到二十多年前工作过的地方重新生活。旧地熟人，都有了不小的变化，自然也有不少的感触。然而，说来奇怪，最突出的感触却是这么一件小事：一日三餐吃“包伙”，八个人先后坐到一张桌子边，然后争着分饭端菜；吃饭时是客客气气的，也互相交谈几句，问问某某熟人现在怎么样了，你小孩有多大了，……如此等等。有时侯，还要完成一点厨房布置的轻活：吃过了早粥，一起剥完一盆毛豆之类，“喔，今天中午有毛豆吃啦！”过惯了小家庭生活和吃惯了食堂制的，来过几个月这样的“包伙”生活，是颇有一点新鲜情趣的。

在一日三餐、“八仙”共桌的人们中间，有省委党校分管行政工作的副校长。另一位主持日常工作的副校长，虽然不在食堂吃饭，也每周几次到饭厅来转转、看看和问问。我当然明白，党校食堂能够使学员比较满意，主要是由于行政部门和食堂工人们的努力。他们有一种“要让学员尽量吃得好一点”的服务观，以及由此而来的良好态度。但是，不能不说，领导干部、特别是分管这项工作的领导干部的身在现场和切肤之感，是有其别人代替不了的特定作用的。前天，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邮电部党组决定，每个部党组成员每个月都要写几封平信、打几个普通长途电话……，并切实了解其效率和效果。这种从小事抓起、为群众着想的务实精神，今天实在是太需要了。

我当然不敢说，分管后勤的校长、局长、部长到了食堂吃饭就一定能够办好一个食堂。旋风式的视察而无切实的工作，是只能使

他自己务虚名而可能使吃食堂的人们受实祸的。但是我敢说，那种“敲锣卖糖，管好本行”，管山登山、管水下水的务实精神，确实是治病之良药，为群众所欢迎的。这同那种只敲锣，不卖糖，大话说说，隔靴搔痒的领导比起来，真正是不可以道里计了。

（载《新华日报》1981 年 10 月 4 日）

有 以 为 继

办事必须考虑有以为继。办好事尤其要注意有以为继。

一位善于用兵的指挥员，无论兵力如何拮据，手里总要掌握一定的预备队，在关键时刻用上去突破最重要的一点，从而夺取战役的胜利，如果兵力无以为继，孤注一掷，尽在于此，就意味着迟早要打败仗。

一位能干的主妇，从上街买菜到炒菜分菜，总是把全家的早餐、中餐和晚餐一起张罗的，决不会只顾上顿而不顾下顿。一位主妇是否数得上能干，其主要标志，大概就是看她理家是否掌握了有以为继的原则。

同样，搞生产，搞建设，办福利，也都要考虑有以为继。

有以为继，就是办事充分考虑人力、物力、财力的允许程度，办其可办者，分别轻重缓急，不超载，也不满载，做到源源活水，徐徐而来，源源不断。这样就把事业置于客观现实性上，不靠偶然性吃饭，也就立于不败之地。

有以为继，就是办事考虑左邻右舍，瞻前顾后，走第一步棋想到第二步、第三步棋，使调动起来的积极性是一大片，而不是一小块；是持久不衰的，而不是下气不接上气的。

有以为继，就是办事既振作精神，又留有余地。竭泽而渔，杀鸡取蛋，谁都知道是办了蠢事。这就是因为戽干了池塘，宰掉了母鸡，就无以为继，再也打不到鱼、取不到蛋了。

特别是办好事，许多人容易忘掉或忽视有以为继的原则，认为“办好事谁不拥护？还要考虑什么？”然而，办好事如果无以为继，顾

了这一头却丢掉了另一头，过了初一就过不了十五，积极性只能调动一小片和一阵子，那么，这样的办好事是办不长的，甚至会得到相反的效果。在现实生活中，不是常有这类教训吗？

（载《新华日报》1981 年 12 月 25 日）

爱之厚薄观

爱之有厚薄，有其客观的标准，而不单纯是主观的。

对孩子的任性、爱吃零食，好心而缺乏科学知识的奶奶往往以为“宝宝会胖起来的”，在已经吃了两块蛋糕以后还怂恿“宝宝再吃一块”；具有一定科学卫生知识的妈妈却不大以为然，劈手把那块蛋糕夺了下来，而给了宝宝一个“白果眼”。当时的宝宝，一定会嘟哝着说：“奶奶好，妈妈坏。”奶奶和妈妈之爱，虽然难分谁厚谁薄，但客观效果好坏，在成年人和懂事的孩子眼里，是一清二楚的。当然，妈妈的态度如不那么“生硬”，效果会要更好些。

在人们的世界观、事业观、是非观等还很不一样的社会里，爱之厚薄观也很不相同。这比奶奶喂宝宝要复杂得多，因而不能不更加注意考虑其客观效果。

君子爱人以德。这个德，就是人民利益至高无上的道德标准，而绝不是看他对我说了多少好话和戴了多高的帽子，对我有利还是无利，利多还是利少。

过早去世的田家英同志，1962 年写过一首诗，其中有这么两句：“一饭膏粱颇不薄，惭愧万家百姓心。”他的厚薄观是正确的。他把万家百姓的生产生活、前途幸福放在最高位置，而置自己的得失祸福于度外，厚群众之厚，薄群众之薄，把自己的感情完全放在党和人民一边。所以，他的这种人民知识分子的风骨，是值得人们尊敬和怀念的。

（载《民主与法制》1981 年第 11 期）

年 年 有 余

以前，我国民间有个风俗，过年时节见到熟人喜欢讲几句“恭喜发财”之类的话。直到现在，除夕晚餐，不少人家都要烧盘鱼，并要整的，不摆几天不肯吃它，鱼的谐音是余，以此祝愿“年年有余”。

但是，祝愿归祝愿，要把它变成现实，一要路线正确，劳动人民当家做主；二要统筹兼顾，事事考虑有以为继、留有余地。

一般说来，农民是很注重年年有余的。他们尝过年关被逼债的苦头，他们懂得盘中之餐粒粒皆辛苦的道理。最近报载，江阴华西大队许多农民年终分红得现金成千上万，他们除了抱回一台梦寐以求的电视机，留百十元过新年外，大部分钱都存入银行，支援国家建设。我市郊县农民也是这样，储蓄大增。

城里的劳动群众一般也懂得“年年有余”，但毋庸讳言，一些青年工人工资不高，花起钱来却大手大脚；少数单位的领导明知故犯，老是在年关突击花钱。平时办福利、搞建设也不考虑左邻右舍，不考虑人力、财力、物力的允许程度。这种办法不是“算了吃”，而是“吃了算”，甚至吃了还不算，它只能是“吃光用光”，年年亏空。

年年有余，是我们民族的好传统，而竭泽而渔，无以为继，却是败家子的作风。一位善于用兵的指挥员，手里总是掌握着一定的后备队，在关键的时刻拿出来突破最重要的一点；一位能干的主妇总是把全家的生活安排得停停当当，决不会吃了上顿没下顿，不论小家、大家（集体），还是国家，都要合理地生财、聚财、用财，量入为出，月有盘算，年有节余。当此新年时节，录以贡献大 家。

（载《南京日报》1982 年 1 月 24 日）

半点不薄白衣人

彭德怀同志是永远值得人们怀念的。因为他横刀立马，征战一生，为建军、建国立下赫赫功勋。因为他高风亮节，刚正不阿，长留那浩然正气于人间。

其实，彭老总的品质，还有着极其珍贵的一面，就是他对战友的诚挚友情，对平凡的人的尊重。对于十年动乱造成“人情薄如纸”、“人整人、人防人”的被污染环境来说，这种品质真是其洁如玉，其质如金，贵重无比。

请读一读《红旗飘飘》第 21 期上一位烈属李志强感人肺腑的回忆：

“那是 1956 年农历三月二十日晚八时许，我正在灯光下书写我丈夫陈毅安烈士的生平事迹。听到铃声，我便起身去开门。我又惊又喜，真想不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部长彭德怀亲临我家，我感到莫大的荣幸，连忙招呼请坐。彭部长和我握手，他那双炯炯的眼睛一下就看见了壁上挂的一张放大的相片……他在毅安遗像之前肃穆看了约五分钟之久。接着，他说道：‘你不是要问清楚陈毅安同志阵亡的情形吗？’我说，是的。他就开始叙述前面我写的那段经历。……他临走前，再三嘱咐，只要我不哭，关于陈毅安同志的情况，他再来谈十次、百次都是可以的。”

作为身经百战的大将军，彭老总充分理解战友的未亡人的心情，愿意十次、百次地向她叙述她的亲人的情况。这是一种多么富有人情味的革命情义！

李志强同志的回忆接着说：

“1965年秋天，我又带着小孙子去探望彭德怀同志。因为路上耽搁了，到吴家花园（当时彭总住处）中午已过。他正在午休，听说我们来了，连忙穿好衣服，走出卧室相迎。我问他：‘您的院子怎么这样清静？’他用南方口音说：‘真是鬼打死人！’他知道我们还没吃午饭，他不愿打扰厨师休息，便亲自到厨房为我们做饭。”

尽管这个时候彭老总已经靠边，警卫员、厨师还是有的。作为一介平民的一个烈属的到来，使他高兴得马上从午休中起来，而又不愿意打扰厨师的休息，就亲自下厨房为客人做饭。在这里，作为主人、客人、厨师三者的关系来说，已经完全没有元帅、平民、工人的区别，地位是平等的，心是相通的。感情是打成一片的。这真是：将军座上多贵客，半点不薄白衣人。

在我们的社会里，人与人的关系应该是平等的、同志式的。职务和职责上的差别，只是社会的需要和分工的不同。彭老总这种半点不薄白衣人的作风，不只是富有人情味而已，而是共产党人高尚品质的一种表现。共产党人的这种品质，是一种高级“粘合剂”，把不同分工的人们都团结、联系在一起；是一种用之不竭的“特殊能源”，能够给各种岗位上的人们以信心、力量，共同向“四化”的伟大目标前进！

（载《新华日报》1982年6月13日）

敬老养老不是“封建孝道”

有的青年认为，提倡尊敬老人、赡养父母，就是提倡“封建孝道”。我觉得，这种认识是错误的，有必要加以澄清。

敬老尊贤，孝顺父母，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是前人为我们留下的精神文明。中国封建社会的杰出思想家孟子，主张“父子有亲”、“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并提出了“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口号。应该说，这个道德规范是得人心的，因而一直为后人奉为信条。但他所宣扬的这种“孝道”，毕竟有着严重的阶级局限性。其核心就是要求子女，在任何情况下，都要绝对服从父母，而不管父母正确与否。所谓“天下无不是的父母”，“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就是这个意思。这样的“孝道”，与我们现在所提倡的敬老尊老、赡养父母，在性质上当然有所不同。

我们现在所提倡的，是一种新型的社会主义的伦理关系和道德观念。父母和子女之间，应该在建设“四化”的共同目标下，互相尊重，互相体贴，做到幼有所养、老有所尊。我们尊重老人、赡养父母，就是尊重他们过去的辛勤劳动，报答他们过去对家庭和社会所作的贡献。他们过去含辛茹苦，操劳一生，如今年老体弱，应当让他们在家庭内多多得到温暖，在社会上多多得到尊重。这些，正是无产阶级的道德，社会主义的风尚，同“封建孝道”是有本质区别的。

无产阶级的革命家朱德同志，在《母亲的回忆》一文中，深情地记述了他对母亲的怀念。他写道：“我应该感谢母亲，她教给我与困难作斗争的经验。我在家庭中已经饱尝艰苦，这使我在三十多年的军事生活和革命生活中再没有感到过困难，没有被困难吓倒。”“我

应该感谢母亲，她教给我生产的知识和革命的意志，鼓励我以后走上革命的道路。”朱德同志的文章，生动地表达了他对母亲的敬爱之心，深刻地反映了无产阶级的骨肉之情。正如革命导师列宁所说：“没有‘人的感情”，就从来没有、也不可能有‘人’对于真理的追求。”

人孰无老？谁不希望自己有一个安适、幸福的晚年？谁不愿意在衰老之际获得亲人和社会的关怀、体恤？所以，大力提倡和发扬以敬老养老为荣、不敬不养为耻的风气，是顺乎民心，合乎民意的。而且，有了这种好的风气，就能使千千万万个家庭亲爱和睦，团结幸福，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促进社会的安定和团结。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是不是自觉地做到尊老养老，并不纯是个人私事，它对社会风气的好转，对安定团结政治局面的巩固和发展，都将发生深刻的影响。

中国有这样一句古训：“重货财，薄父母，不成人子。”今天，在我们社会主义社会里，应该“重父母”而“薄货财”，这才是真正的“人子之道”。可是在这一点上，少数青年同志是很有问题的。如某大学有位老教授，一向把自己的两个女儿视为“掌上明珠”，为培养她们费尽了心血。然而“十年内乱”期间，两只“百灵鸟”竟跟老头子“彻底划清了界限线”。老人叫天不应，叫地不灵，真是苦不堪言。粉碎“四人帮”以后，党对老教授落实了政策，发还了存款，恢复了工资，两只“百灵鸟”扑扑翅膀又飞回他的身边，而且还带来了“毛脚女婿”。她们今天伸手要这，明天伸手要那，眼看老头的钱掏光了，又扑扑翅膀飞走了。当这位老教授病倒在床时，学校常常派人探望，可见这两位“千金小姐”竟三个月没有去看老父一眼。象这样的宝贝女儿，难道不觉得心中有愧吗？

（载《江苏青年》1983 年第 2 期）

正确处理职业差别和兴趣距离

夫妻一般不可能从事同一职业，这是一个客观存在。夫妻职业不同，对有些家庭来说，带来的常常是乐趣和愉快，因为这种差别使彼此的思想天地和兴趣领域更加广阔了；而对有些家庭来说，如果夫妻之间不理解、不合拍，带来的则是一些具体的矛盾和小小的苦恼。

本来，从职业差别而带来的兴趣和爱好上的不一致性，在结婚以前就是可以感觉到的。但是当双方陶醉于爱情之河的时候，这一情况是没有被当作一回事的。结婚以后，家庭建立起来了，具体矛盾就出现了。比方说，晚上打开电视机，南方人想看越剧，北方人想看京剧；星期天休息，当教师的丈夫想去文化宫听个讲座，而做演员的妻子则想到公园去欣赏梅花，等等。再说，每一个有革命责任感的公民，对自己所从事的工作（职业），都有着自豪感和自尊心。因而，在自己的丈夫（或妻子）面前，是容易较多地强调自己这一行或这一岗位的重要性的。这样，就难免使另一方的职业自尊心受到小小的刺激。

从职业上的差别而带来的兴趣爱好和作息起居等等的不一致，就会导致夫妻矛盾，影响家庭和睦。因此，年轻的夫妻特别要注意正确处理这个问题。夫妻双方，都应当做到互相尊重对方的行业和工作，绝不能有“高人一等”的思想。在兴趣爱好，作息起居等具体问题上，则要互相体贴，甚至互相迁就，不要各执己见。兴趣是可以培养的，爱好是可以转移的。原来爱听京剧的，现在陪同妻子一起听听越剧；原来较多地跑商场，现在陪同丈夫多走走书店，有何

不可呢？只要是正当的兴趣和爱好，可以是多方面的，这样可以使自己的业余生活更加丰富多采。不是原则问题，不是政治问题，夫妻之间的互相迁就就是尊重；这在夫妻生活中间，是不可缺少的一种要素。

（载《新华日报》1983年3月4日）

家 庭 观 念

这是一个不宜简单地、笼而统之地说应该浓化或应该淡化的问题。

过去，“家庭观念”是作为一个缺点或一个贬词留在人们印象中的，它往往是“小资产阶级情调”或“农民意识”的同义词。但是，有家庭就有家庭观念。谁无家庭？农民有家庭，工人也有家庭；小资产阶级分子有家庭，无产阶级也有家庭。从反映论的角度解释，家庭观念也是人人都有的。问题在于具有什么样的家庭观念？

一种是把革命大家庭的利益置于次要地位，把血缘小家庭看得比革命大家庭还要重要。还有一种对革命大家庭和血缘小家庭的关系有正确的认识，在两者利益相一致时能够正确处理，在两者利益发生矛盾时也能够正确处理，即“小家”服从“大家”，直至必要时甘愿为“大家”牺牲“小家”。1950 年，当美帝国主义燃起战火，逼近鸭绿江时，“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成为激动人心、鼓舞斗志的口号。这说明，“家”的观念并非总是消极的。

那么，我们是不是在提倡浓化家庭观念呢？不，不是这个意思。我们认为，现在应该浓化的，是家庭伦理道德观念，而不是一般的家庭观念。许多年来，特别是由于十年内乱的影响，家庭伦理学的研究很不够，人们的家庭伦理道德观念比较薄弱。这种情况，同现在我们的国情是不相适应的。因为，我们国家在经济上有全民所有制、集体所有制和一部分个体所有制；家庭一般是消费单位，在农村和城镇的一部分也是生产单位。农村已经普遍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这是合作经济中的一个层次，也是一种新型的家庭经济。这

样，家庭的职能就没有削弱，相反，在某些重要领域和重要方面还有了加强。这样的经济基础，不能不对上层建筑的观念形态部分发生深刻而强烈的影响。根据这一情况，加强家庭伦理学的研究和宣传，普及对家庭伦理道德的指导，无疑是一项重要而迫切的任务。

那么，家庭观念在现在是不是没有可以淡化的内容了呢？当然不是。有些家庭观念，确有淡化的必要。

当前，在一部分家长和青年中，“好男儿志在四方”的观念比较差，满脑子“实惠”思想。有的说什么“宁愿在上海扫马路，不愿到边疆开金矿”，身有技术，学有专长，但不肯离开城市，不肯离开家庭，到更需要的地方去发挥更大的作用。有些青年从中学毕业以后，宁愿马虎应试，进本地的中等技校，不愿发奋努力，考全国的重点学校，也是为了不想离开本地和家庭。有的高中毕业生进了工厂当了一两年学徒以后，就不想深造了，把业余时间全用在“钓鱼摸虾打家具”上面，说什么“埋头不问国家事，一心经营小家庭”。以上种种的家庭观念，是胸无大志的表现，是封建家庭观念的残余，对集体、对国家、对四化大业有很大害处。这样的家庭观念，同我们的时代精神是背道而驰的，应该淡化和克服。

（载《民主与法制》1983年第6期）

贵在埋头苦干

在全省认真学习和贯彻党中央一号文件，争取1984年经济工作更上一层楼的时候，中央几位领导同志对江苏工作的指示，对全省人民以及各级干部是很大鼓舞，也是极大鞭策。我们一定要在整党的全过程中，把思想进一步统一到中央要求的实现经济翻番的任务上来，同心同德，埋头苦干，为实现和力争提前实现十二大提出的总任务、总目标而努力奋斗！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江苏的经济形势是好的，1983年的国民经济计划执行情况也是好的。尤其令人高兴的，是农村涌现了一大批“五年翻一番”的先进单位。不仅苏南有，而且苏北也有；不仅有城市郊区，而且有过去的穷乡僻壤；不仅许多原来基数低的翻了一番，而且不少基数高的单位也翻了；不仅有单项翻的，还有几项同时翻的。五年来实现经济翻番的县，已经不是星星点点，而是有那么一批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它使我们再一次看到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威力，看到了改革农村经济和发展农村商品生产的潜力，也看到了建国以来所积累的物质技术基础的力量。这就使我们有充分的根据相信，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只在我们继续解放思想，扎扎实实地工作，到1990年实现经济翻番是可以做得到的，在本世纪末实现十二大提出的总任务、总目标也是完全能够办得到的。

正如省委负责同志最近指出的，江苏经济的发展很不平衡，经济发展中的矛盾和短处还很多，经济技术方面的不少重要指标同兄弟省市相比还有很大差距。现在更需要各级干部懂得“谦受益，

满招损”的道理，想一想存在问题，找一找经验教训，议一议怎样继续前进，戒骄戒躁，好学敏求，锐意进取，努力夺取新的“七战七捷”。

今年是夺取新的“七战七捷”的首战之年，我们一定要在整党的推动下，不辜负党中央的期望，上下同心同德，全省共同努力，勇于创新，开拓前进，为一九八四年取得新的成绩，贡献出全部力量！

（载《新华日报》1984年3月17日）

前后篇



故　乡　吟

——《乡镇工业与小城镇》后记

故乡，是每个人记忆中最难忘怀的。那里，有自己的童年，有自己的父老乡亲，有自己的甜酸苦辣的生活经历，有……。对故乡的思念，是人们最纯朴、最美好的感情之一。

何况我的故乡——吴江县城松陵镇，是那么的美，那么宁静，那么多的水，还有垂虹桥、三里桥、共和园、三角井那些古老而美丽的石桥板路和玲珑庭院。那时的吴江城真别致，一水穿城而过，把小小的一座城一分为二（清代末年，一城分属两县，河之南为吴江县，河之北为震泽县）。这些，都时时牵动我的思绪。人说“月是故乡明”，我想再添上一句：“人是故乡亲”。当我于1983年同费孝通先生五访江村时，虽然闻名于前而识荆于兹，两辈的松陵游子，却一见而成忘年之交。

“江村”是费先生早年为做博士论文而取的学术地名，实际上是开弦弓村。它在震泽镇西南，太湖之滨。当那年我们调查夜宿庙港乡时，春雨蒙蒙如丝，湖水茫茫似海。我们吃着乡里的土产红烧鳗鱼和麦芽甜饼，喜看桑田新绿，渔村星火点点，高兴地谈论着震泽的古老作坊和新兴的乡镇工业。吴江七大镇，在江苏颇为有名。在研究小城镇问题上，七大镇具有相当的代表性。解放三十多年来，它们既保持着古镇的特色，又以崭新的面貌出现人们面前。如果没有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的确立，没有农村经济的全面繁荣，也就不了解这种鱼米之乡的生活情趣和话题中心。难怪费先生那天晚上要吟出“故园梦寐绕苏州”的诗句了。

震泽的工业萌芽于三坊：经坊（缫丝织绸）、作坊、糟坊。近代工

业则出现于二十年代震丰丝厂的筹建，抗战期间毁于战火。至解放前夕，农村经济　蔽，全镇产值仅5万元之微。现在的震泽，已拥有酿造、丝织、服装、制革、化工、机械等多种工业，产值近6,000万元。那里的震泽中学，以教学质量高而闻名于全省。昔日的农副产品集散地，今日已当之无愧地成为“乡脚”远及几十平方公里的经济中心和文化中心。

七大镇中变化最大的，要数盛泽镇和平望镇。盛泽之名，是南宋绍兴元年(公元1131年)盛章被封为“吴江开国伯”而出现的。明清时盛泽是我国四大绸都之一，镇上有织机万台，机杼之声，彻夜不息。此后逐渐衰落。直到本世纪七十年代中期，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以丝绸为骨干的工业生产才又有新发展，产值竟高达3亿多元，丝绸织品4,000多万米，占江苏省产量五分之一，向50多个国家和地区出口。它，又以绸都的崭新面貌享誉海内外了。

平望镇是以水陆交通便利见著的。它地处江浙之间的大门，北通苏州、常熟，南联嘉兴、杭州，东达青浦、上海，西抵皖南山区。它是苏(州)嘉(兴)公路和沪宣公路的交接点，又是京杭大运河与太(湖)浦(江)河的汇合处，如果你站在著名的莺脰湖高处远眺，可以见到各种车辆奔驰于绿荫道上，长长的船队在大运河上南来北往。震耳的笛声、喇叭声此起彼伏。有同志作了统计，每天有2,000辆次汽车、300个船队以及1,800艘民船从平望通过。此时此刻，你真能领略到交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正因为这一点，从古代的吴越战争，近代的江浙军阀混战，直到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虽屡遭兵燹，平望仍能衰而复兴。这些年来，首先是县的化肥厂和农机厂办在这里，后来又办了玻璃钢厂、合成化工厂、汽车配件厂、皮革厂。1981年起又与上海的缝纫机厂、织袜厂、儿童用品商店等挂上了钩，或联营，或订货包销，生产出群从欢迎的“蜜蜂牌”缝纫机、羊皮夹克衫等产品。群众富了，从这里到上海又方便，买高

档消费品或结婚用品，都爱跑一趟上海，早上揣着鼓鼓的钱包出门，晚上带着满意的笑容归来。

同里镇和黎里镇，还有那民间长诗《五姑娘》的诞生地芦墟镇，都是各具特色的水乡集镇。凡对中国现代史略有所知的人，都知道"南社"的创始人陈去病、柳亚子。凡读过名小说《孽海花》的人，一般只知道作者是曾朴，而不知道前几回是金松岑写的，是金松岑同曾朴共同商定了全书六十回的题目。柳亚子就是黎里镇的大胜村人。柳先生那句"汾湖便是子陵滩"里的汾湖，就怀抱着黎里镇和芦墟镇。现今的黎里镇上，保存着柳亚子故居，吸引了许多海内外人士前去瞻仰。

特别是同里镇，堪称国内少见的文化古镇。从北宋淳化三年到清嘉庆十五年间，同里曾出状元 1 人，进士 38 人，举人 80 人，真是"儒绅大夫彬彬辈出"。元末有倪云林、顾阿英，明代有姚广孝、董其昌、计成，清代有沈德潜、陈祖范，近代有杨（千里）、柳（亚子）、松（金松岑）、柏（陈柏如，即陈去病）等文人学者，在同里镇寓居或授徒。同里镇有着别具一格的镇区布局。一切建筑围绕着水，依傍着水，真正是环水设市，依水成街，沿水建屋，傍水成园。"一线晴光通越水，半帆寒影带吴歌"，在这里可以饱览典型的"小桥流水人家"那一派江南水乡景色。现在，同里镇被列为江苏省文物保护单位，黎里镇被列为省建委集镇规划重点单位，明清重要建筑和园林得到保护和修复。我在同里工作过、劳动过，去年又在那里小住了十多天。早晨，在浏览一遍农贸市场以后，就在镇上吃早点。每天选吃一二种，如汤包、粽子、烧麦、馄饨、麦芽饼、梅花糕等等。吃着吃着，对故乡的依恋，对正确政策所赋予经济的活力的思考，一齐涌上心头。

对故乡的感情，不是自然主义的，是一种深厚的社会感情。这种感情，有的高于幼辈对于长辈、下级对于上级的感情。松陵镇有个小城镇研究会。去年，它向外地工作的吴江人，发出几十封回乡

参加讨论小城镇建设的邀请信。短柬一则，好似令出，无论远在何处，离乡多久，无不立时复信或赴会。有个专家在信中说："接信心中万分喜悦，全家老小都为此而高兴，愿将自已点滴光热贡献给故乡"。思念故乡之情，本来就浓；如今故乡新花灿灿，此情怎能不更重呢！

（1985年1月于南京）

《乡镇工业与小城镇》序言

费孝通

本书作者朱通华同志和我都是江苏省吴江县松陵镇人士。先后在同一城镇里长大，但前后相隔逾三十年，直到两年前为了要调查研究家乡的小城镇才有相识。相识以后，我每次去江苏进行调查工作，总是和他结伴同行。朝夕相处，成为忘年交，有“松陵二子”之称。1984年同住吴江之庙港乡工余之暇，杯茶相叙，面临太湖，浩荡万顷。我们强步风雅，学诗对唱。我曾有句：“束发离乡六十春，今番重访感伴行。新晴喜看桑田绿，夜来星火数渔村”。亦所以记当时之情境也。

回忆这两年，大江南北，千里奔波，正是我们研究小城镇的共同记录。我在1981年冬，三访江村时开始提出从农村调查更上一层楼，以小城镇作为科研课题的倡议。我们是从农村的角度去接触小城镇这个问题的。我对家乡的农村研究已有多年的因缘。最初是1936年，其次是1957年，至1982年已是三次，所以称“三访江村”。江村者，庙港乡开弦弓村之学名也。这三次在同一个农村里调查，正好反映了三个不同时期的情况：解放前、合作化高潮中和拨乱反正后。农村面貌在此不同时期的变化实在动人。真可以说是从穷困、翻身到繁荣的过程。以农民收入来说，在八十年代正在以大约每年近百元的增长速率向繁荣的路上猛进。在正确的政策下，农村经济开始从自给、半自给的经济向商品生产的经济转变，越变越富。

农村经济走上商品生产的道路表现在千家万户农副业的多种多样化，更表现在为供应市场商品而生产的小型乡村工业，当时还

称"社队工业"的发展。当时我们在农村里就注意到商品流通渠道过于狭窄，已不能适应农村商品经济发展的新形势。比如说，这年吴江县的兔毛，生产用于全省，但是后来因为外国市场刹价，农民看到无利可图，就把兔子杀来吃了。没有地方出售农副产品，多种经营是一句空话。由于人口不断增长，到七十年代，农村里劳动力过剩的现象越来越明显，家民需要找新的活路，但是城乡户口严格划分，不准逾越。即便通过隙缝，进入了镇上干活的农民，还是随时有被"清理"回乡的威胁。种种事实已说明，如果作为农村经济流通中心的小城镇不改变当时的状况，农村经济也就难于进一步发展了。就是这种客观形势把我们带进了小城镇研究的领域。

1982 年年底我们向江苏省委汇报了我们小城镇研究的意图。汇报时我们才了解到江苏省委已经开过会，决定要发展小城镇，所以是"不谋而合"，因而决定科研队伍和政策研究队伍结合起来，一起攻关。我和朱通华同志就是这样在工作上结合起来的。从 1983 年春吴江县的小城镇调查起到 1984 年冬苏中小城镇调查，前后两年我们在这项工作上一直结伴同行。由于我们一路看，一路谈，在这项工作上的见解基本上实在难分彼此，也许只有一点不同，那就是我因为工作频道多而且杂，事实上难于集中力量在这个重点上用功夫，所出的力远少于江苏省方面参加这项工作的同志们。我在江苏的调查即使不能说蜻蜓点水，也只是走马看花。每次调查必须事先由当地同志为我们开路，征集有关资料，到了现场又要依靠他们选择观察对象，在讨论时更需要考虑他们的意见。

实际上，我们所做的主要是在提出问题，核对和总结当地工作同志对这些问题所提出的资料和意见。主要的调查工作是当地同志所做的。组织和指导他们工作的是省委政策研究室和江苏省社科院的同志，朱通华就是其中的负责人之一。由于他长住在江苏，又多次单独到各市县进行调查，他对江苏小城镇问题，掌握的第一手资料较多，接触面较广，对这个问题的见解也因之较为深入。

我们在组织这个小城镇调查研究队伍时有所约定，就是既要发挥集体协作的长处，还要注意发扬各人独立的思考和见解，鼓励各人就专题写专论。1984年江苏人民出版社发行的江苏省小城镇研究论文选第一集《小城镇、大问题》就体现了这个精神。论文选集篇幅有限，还有许多应该发表的文章，除了在各刊物上登载外，正可以出版专集，朱通华同志这本有关江苏小城镇的论文集就是其中之一。

小城镇的研究可以说还是刚刚开始，正在继续进行。已经发表的这些论文只是初步的探索。我这两年几乎每隔几个月就去实地观察一次，每次都看到许多新事物、新苗头、新问题，而感觉到我们这些研究工作者实在赶不上形势的发展。同时也感觉到我们已有的研究过于局限和肤浅。

从局限这方面说，不仅在研究的范围还只限于江苏一省，即以这一省而论，也还存在着许多没有接触到的空白点，江苏西南部和丘陵地带就是一例。其他各省中虽则已有对这个问题进行了调查研究，但是还没有能汇合比较，作出理论上的分析和阐发。从研究角度上说，局限性还表现在对小城镇本身的建置和规划研究得不够，更少触及小城镇和中小城市的有机关系。至于小城镇发展依托于大中小城市的必要性，固然在过去的研究中已经指出，但是还没有从这些研究中形成社会经济区域的这个具体概念而进一步深入摆事实，讲理论，为今后城乡同步发展的规划提供必要的资料。形势的迅速发展确成了我们这些研究工作人员的严重压力，我想也正是这种压力会推动我们科研工作的发展前进。

从肤浅这方面来说，我总觉得我们过去这些研究工作还不免“见数不见事”，“见事不见人”，“见人不见其思想活动”。研究社会现象，也就是研究人的生活，我认为不应当满足于一些选样统计的数字。这种数字是有价值的，也是十分可贵的，而且要得到这些可靠数据还是很不容易。不过这些数据实际上只能间接地提示我们

对社会的一些概括的认识。这些数字背后还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内容。我们讲到小城镇，只讲了它有多少人，一年能生产多少价值等等，还没有看到在小城镇上居住着、生活着的各色各样的人物，他们都有行动、有感情，而正是他们的思想感情决定着他们的一举一动。无数人的一举一动综合起来，才汇合成现在在论文中看到的一些数据和概括的描述。我们如果想进一步了解为什么发生这些概括性的现象，那就是深入到这些人的思想感情领域里去发现他们行为的指向和动力。关于这些，我们过去的研究还没有做到家，所以至多能说我们对小城镇问题刚刚破题，真正的好文章还得后人来写。在后人中，我想应当包括比我年轻三十多岁的朱通华同志在内。朱通华同志的论文集将要出版，要我写序，我就把这个希望写为序言。

1984 年 11 月 14 日于福州

《沿海六行》序

为学者之著作序，难也，岂非“班门弄斧”？为长者之著作序，尤难也，不无狂妄之虑。然而我不能不从命于惶恐之中，勉为其难，亦甘为其难。

众所周知，费孝通先生是一位学者，一位放洋留学、执教京都的学者。然而，他常年跋涉于乡间，致力于中国农村问题的研究，在学者与农民之间成功地架起了心心相通之桥。1985 年 8 月在新华日报上发表了他的《九访江村》（即收入本集的《故里行》），其时我正因调查任务在太仓乡下，问了好几位乡干部和村办企业干部，竟无一不读这篇文章，无一不对此文的主要观点表示赞赏。学者与农民之间，心曲如此相通，心电感应如此之快，不能不使我惊奇之余，认真地想一想为什么？

记得 1983 年 8 月我陪全国政协调查组作苏锡常通农村调查那一次，费先生登南通狼山归来写了一首诗，其中有两句：“一介书生逢盛世，著书耻为稻粱谋”。学者欣逢盛世，一心为国献策，与当年龚自珍笔下的时代和文人，当然不可同日而语。这就是原因吧？

但还有更为具体的原因。这里，不妨再引一段费先生自己的话：

“回顾我国解放后的 30 多年，近 7 年才是变化最大的 7 年。以前我们曾停顿了一下子，以至走了一段回头路。这 7 年农村有了史无前例的发展。我每年回乡去看，每年都有所不同，都有新的发展，出现新的问题。所以，我说在这个时代，正是学习研究的大好时机。尽管我年纪不小了，离 80 岁也只有 4 年多，趁我还能动脑筋、还能

跑的这段时间，多看看我们国家的这个大变化。同时还想把这个大变化记录下来，给我们后代人也看一看。”

历史的责任感使学者与农民真正达到了共命运、同呼吸的境界，督促着费先生不断地跑，多多地问，不停地写。看得多了，问清楚了，想到一起去了，农民喜欢看的文章就一篇篇写出来了。费先生对农村中的任何新鲜事情都感兴趣，都想去实地看一看，如愿则兴高彩烈，力不从心、颓然作罢时则无可奈何地爽然若失。我每见此种神态，不免稍有此老何其不自量力之感，继而顿起可敬之心，其为学之诚岂常人之能及。

常年在农村跑，记录历史的变化，学者并非是置身事外的旁观者，而是真正地进入角色，把基层干部当作老师，把农民当作知心朋友，全身心地投入了对中国式的社会主义的探索。探索必须从生动的实际出发，既看到新的发展，也看到新的问题，既报喜，也报忧。探索要吃得起苦，走出高楼深院，耐得高寒酷暑，特别要进行艰苦的脑力劳动。探索需要勇气，有时要说一些逆耳之言，有时要针砭一些时弊。做到这些，岂止是“迟桂余香”，实属难能可贵。

同样地众所周知，费孝通先生是江苏人，他生于吴江县松陵镇，十岁那年迁居苏州，并在那里渡过至今还梦寐其间的中学时代。但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即六十个年头是在北京、伦敦、昆明等地工作和生活的。长期地远离故乡，基本上是在城市居住，已经离土又离乡了，然而，据我的观察，费先生脑子里最不能忘怀的还是家乡和民族地区这两块地方。

那句“故乡梦寐绕苏州”，无疑是他的心声。无论在福建还是在甘肃，无论是讲话还是写文章，哪一次不提江苏？可谓思乡之情，溢于言表。

费先生从不隐讳自己对故乡的眷眷之情。他说：爱国必爱乡。这一观点，无疑很容易为大家所接受。人非草木，岂能无情？诸情之中，乡情是最值得珍贵的一种。“月是故乡明”的感情，照我看，

就是爱国之情的表现。所以，为自己家乡的繁荣而高兴，为家乡的进步多出力，这种感情和行动，无疑是爱国心和责任感的表现。

费先生曾经说过：我对民族地区有点“偏心”。所谓“偏心”，就是有特殊的感情。这种感情说得远一点，可以追溯到五十多年前，他的新婚妻子就是在民族地区落水殉难的。为了中国的民族学研究，他失去了亲人。说得近一点，就是上个月，我们已经完成了在吴江的调查任务去吴县两天了，因为甘肃临夏回族自治州的一个访问团到了吴江，尽管费老在客人来前已向吴江的东道主作过再三的交代，费先生还是从吴县折回吴江，同临夏州的同志亲切叙谈了两个半天，对于临夏州同吴江县的经济协作问题，发表了具体的见解。虽然我是亲临其境、参与谈话的一员，然而，我今天这支拙笔仍难以全部表达他们之间的亲切愉快之情。有一个印象是留下来了：那个时候，在费先生的心目中，吴江人已退居第二位，临夏州的客人是第一位了。当然，这只是我的印象。

在《海南行》这篇文章里，费先生这样说过：“我对少数民族很有感情，少数民族的朋友也这样说。为什么呢？我分析一下自己，主要是感到历史对少数民族很不公平，以致他们在经济和文化上落后了。我有一点‘抱不平’的心情想去帮助少数民族。”这段话的总的精神，我很同意；但对最后一句话（抱不平心情），我觉得还可斟酌，还可以表达得更准确一些。但费先生的中心思想是明确的：“一个民族首先要自己站起来，自己走路，自己发展，绝不能依靠别人过活，一切伸手。”基于这一点，“以东支西，以西资东”的想法提出来了，并自己牵线搭桥，付诸实践，以检验自己的想法的可行程度。

《沿海六行》的问世，可以让读者看到作者两年间的大致足迹。我们不难看到，一位学者，一位七十多岁的老人，一直没有丢下他手中的笔，仍然不停地在祖国沿海和边区的土地上走着。

（1987 年 7 月 12 日于南京）

《小城镇经济管理》序

已经有越来越多的朋友在关心着、研究着小城镇问题了。

到本世纪末，我国农村劳动力总数将由3亿多人增加到5亿，而农业本身充其量只能容纳2亿多人。这就是说，将有2亿多农村劳动力连同他们的家属近4亿人之众，主要要进入小城镇找出路，而不能都涌进大中城市。小城镇的作用，会越来越充分地显示出来，意义非同小可。

不打破城乡分离的局面，不解决现代工业与落后农业并存的结构性矛盾，这根"绳索"就会绊住农村发展的腿，就不可能实现真正意义的中国农村现代化。农村的现代化实现不了，中国的现代化就难以实现。小城镇一头伸向城市，一头联系农村，起到沟通城乡关系、促进城乡共荣的桥梁和纽带作用。因此，发展小城镇，对于逐步缩小工农差别、城乡差别，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农村工业化、城市化的道路，意义也非同小可。

农村商品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是小城镇兴起和繁荣的根本动因。无论是以工兴镇、以商兴镇还是以交通兴镇，归根结底都要靠开放、靠发展经济来兴镇。苏南的小城镇如此，江苏的小城镇如此，发达地区和相对落后地区的小城镇莫不如此。

所以，我们有理由认为，研究中国的农村问题，不能不研究小城镇；研究小城镇，不能不研究它的经济现象及其经济管理问题。从总结经济发达地区小城镇经济建设和管理经验入手，进而探讨中国式的以城市为中心的乡村城镇化道路，以指导今后小城镇建设的实践，无疑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本书的作者，既有从事教学和科研的理论工作者，也有长期从事实际工作的领导同志和基层干部。这些同志中的大部份，是在苏州工作过的。山明水秀、人文荟萃的苏州，是我国经济发达地区之一，也是小城镇形成很早、发育较成熟的地区之一，到这里走一走，你会感到一股扑面而来的勃勃生气，它凝聚着农民群众的生动创造，也包含着基层干部们不倦的实践和思考。这正是我们理论工作者大有用武之地的底蕴所在，也是我们的理论工作"源头活水"所在。

对于从实践 中得来、又对实践起着一定指导作用的理论专著，我想，读者朋友是只嫌其少不嫌其多的。

（1988 年春于南京）

《中小企业管理思考百题》序

管理的产生可以追溯到很远的古代。全人类都为之骄傲的埃及金字塔和中国万里长城的出现，证明当时的人们已经具备了相当的管理和组织能力。随着现代工业的发展以及企业之间竞争的日趋激烈，管理愈来愈成为左右企业命运的决定性因素。管理就是效益，管理能够促进企业升级。这一点，大型企业如此，中小企业同样如此。如果说，有些人对于强化企业管理的作用在前几年市场短缺、卖方市场占据主导地位时还看得不够清楚，那么在贯彻落 实“治理整顿”方针将近两年的今天，应该不会再有疑问了。

企业管理是一项系统工程，但归纳起来无非是计划、组织、领导、协调四个方面。最重要的可谓是组织和协调。这就是共性。管理企业的办法或者称之为管理艺术，大凡成功的企业都有自己独特的一套，这就是个性。一旦确定了目标，在实施计划时，每个企业必须建立一种适合本企业特点的组织形式。一个为市场提供电器配件的企业，同生产、经营旅游鞋的公司，其组织工作是迥然不同的。当然，管好一个企业，关键还在于善于调动职工的积极性。人是企业的主体，是提高生产率和产品质量的根本。一个企业目标得以实现是靠全体成员的共同努力。这就必须十分注意做好职工的思想工作，使企业形成自己独特的“企业文化”和价值观。而这种“合力”的出现、形成和产生尽可能多的能量，需要有深谙领导艺术的“带头人”或企业家来做“马达”，以发挥职工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尤其是中小企业，企业的领导行为相当程度上代表一个企业的组织行为，领导是否有方实际上反映了企业管理水平的高低。

如果到书店浏览，能看到不少有关企业管理的书，但仔细翻翻，就会发现大多是外国人写的，象《日本企业的用人之道》、《美国最佳公司的最佳管理法》等等，介绍的大多是些誉满全球的跨国公司。这些经验自然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但中国毕竟不是美国、日本，占全国企业总数90%以上的中小企业同托拉斯、辛迪加也有很大的区别。社会制度、经济体制、文化传统和企业规模等方面存在的差异性，决定了我们管理企业必须有自己的一套办法。特别是中小企业，更应因厂制宜，有灵活而独特的招数。

现在摆在大家面前的这本书，是由一位接待过五万多人次参观者、当了十年厂长的实际工作者袁勤生同志写的。无论他写得细致还是粗糙，讲的是道理还是实例，叙述得生动还是平常，都是他和这个企业众多人们的切身体合，凝结了作者多年来管理企业的甘甘苦苦。一口气读完这本书，感受最深的便是：书要让实践的人来写，就好看了。

（1990年3月12日）

《农村振兴与小城镇问题》序言

——中日学者共同研究，中文日文同时出版

朱通华·宇野重昭

由费孝通教授和鹤见和子教授“搭桥”（我们称他们为“红娘”）的中日共同研究成果——《农村振兴与小城镇问题》一书，终于同广大读者见面了。这项共同研究，历时三年有余，行踪黄海两岸，从城市到农村，从最先进的企业到小小的渔村、山村，这多少次学者与农民以不同语言进行的灯下长谈，至今犹使我们兴奋不已。

根据协议，本书应由双方的主编写一篇序言，并商定由宇野重昭起草第一稿，朱通华予以补充。还应宇野重昭的要求，为了适应日本出版社的习惯，序言以扼要介绍本书各篇论文的内容为重点，中方尊重这一意愿。

至于这一研究成果的具体的来龙去脉，读者们只要读完这篇序言，就可以了然于胸了。

对人类来说，最舒适的居住环境是指什么呢？是指现代化的社会吗？

毫无疑问，现代化给人类带来了积极的因素。科学的发展，交通工具的改进，城市文化的繁荣等等，无疑是好事。摒弃闭关自守，克服封建意识，推动现代民主等等，都值得欢迎。那种落后愚昧、无法可循、备受压制的环境，谁都无法忍受。

可是人类从现代化获益的同时又失去了许多。首先人们被合理化、效益至上的口号所压抑，失去了根据自己的步调设计人生道路，按自己的意愿建设社会的自由。跟不上所谓的合理化、效益至上的人或民族往往被扣上后进落后的帽子。尊重人、尊重个人的本意被曲解为个人主义竞争。同时，高速工业化往往导致浪费资

源、破坏环境而产生形形色色的社会公害。“生产过剩”给社会带来不稳定的因素，效率至上论导致了划一性及权力过度集中的现象，又导致了悬殊的贫富之差，不少农村被抛在繁荣的背后。

当然，关于现代化问题，中日两国存在着较大差异。日本已处于资本主义成熟期，尊重人的个性，保护生态平衡，调节经济发展，成为迫需研究解决的课题。而中国的课题是谋求社会发展，推动工业化，调整市场调节机制达到促进计划经济的发展。尽管有如此的差异，然而吸取现代化的积极因素，同时要维护人们理想的生活环境，大力发展工业又注意农副业按比例发展，建设一个自主、自立、人人感到充实的社会，这一点应该说是两国的共性。

为了避免不必要的误解，必须强调，我们并非反对现代化，我们只是对那些盲目地引进欧美根据自己的历史条件发展起来的现代化模式，生搬硬套地加以绝对化，持批判态度。把欧美的现代化模式看作普遍的准则，视为唯一标准来强行推广的态度，是不可取的。

那么，本书究竟想说明什么问题呢？

满足地球上所有人都得到衣、食、住、行、医的基本要求及分享现代化的成果，同时为让所有的人能充分发挥其才能而创造条件是人类的共同愿望，也是共同的目标。然而实现此目标的方式方法以及走什么样的道路，不同地区的人们根据各自的历史文化传统，适应其不同的自然生态基础，必须独立自主地开辟自己的道路，创造自己的条件。所处的地域尽管千差万别，但不同的地域的所有的人或民族都有各自的能力。人们相互尊重，致力于提高知识技术水平和生活水平，致力于为子孙万代造福，致力于建设安定、和平的家园等等，是人类普遍拥有的想法。不谈过去，就现代而言，上述想法可称之为社会普遍的课题。正因为有此普遍的思想基础，才促使相互开放，吸收外来的思想、知识、技术和教育方法。这种相互学习，当然是以自己可能范围为基础，坚持独立自主的方针。类似这

种相互引进的方法，从广义上说，我们认为仍然属于“内发型发展”。

“内发型发展论”出自于本书作者之一鹤见和子教授。鹤见和子把中国的费孝通同日本的柳田国男作了比较研究，并认为他们的思想是“内发型发展论”的原型。同样，费孝通也认为新事物与传统模式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且往往产生于传统的模式。费孝通历来从中国出发，从事为民造福的研究，是一位与中国农民心心相通的、博学多才的人类学者。当然他的研究对象及研究方法必然与中国历史一道不断发展。他的思想方法如同中国社会，雄伟宏大。与此相呼应，鹤见和子不愧是费孝通优秀的解释者。鹤见和子曾就读于美国布里斯顿大学社会系，从所周知，她掌握了欧美思维方式的方法伦。她把这种方法结合自身的思想，变成独具一格的逻辑，这种逻辑又通过反映费孝通的思想再次表现出来。而费孝通对鹤见和子的对自己思维的解释并没有提出异议。从中可以认为，费孝通和鹤见和子的共同理论便是“内发型发展论”。

下面我们要说一说本书的编排问题。首篇是费孝通的论文《对中国城乡关系的新认识——四年思路回顾》，以此展示接触中国社会的方法。紧接着，是鹤见和子的文章：《费孝通与柳田国男的比较——内发型发展的原型》。费孝通的论文总结了自身投入这项工作最富于精力的 1984 年至 1989 年期间所经历的认识过程。相信读者通过阅读此文，可以认识到费孝通的从实事求是出发，坚持不懈地追求着中国农村的发展模式的极为引人入胜的过程。中文的模式译成英文的 model 也许不够确切。因为 model 含有榜样、典型的意思，而费孝通的研究从来注意着各自不同的社会条件，强调走出适合于自己的路，因此，费孝通思想与带有榜样的、典型的“model”相提并论，显然有着不妥之处。可是出于广义来理解词意，求大同存小异，在书面表达时仍以模式＝model 来表达。

鹤见和子论文对费孝通的人生、社会背景、与西欧的接触进行

了细致的分析。费孝通与柳田国男所处的社会时代不同，社会地位不同，而且国情差异很大，可是通过二者的比较，费孝通的特点就愈为明显。对地区、类型、模式的词意更显示其积极的含意。

对于“内发型发展论”的具体对象，中日双方的研究团体选择了中国的江苏省和日本的大分县。重点放在研究两国农村及地方城市独立自主发展道路的模式。关于中日两国研究者团体通力合作的动机，鹤见和子论文及成蹊大学亚洲太平洋研究中心的《所报》第7期宇野重昭论文中有过详细的叙述。中方也发表了许许多多的有关报导和论文。

这项中日共同研究起始于1985年。正式开展研究交流活动是1986年至1988年期间。这个时期正是中国农村的乡村企业以最快的步伐发展的时期，同时农村中的非农部分转向“城市化”（所谓小城镇化）的时代。而在日本，正值“振兴乡村”运动高涨的时期。乡村企业在中国发展最有成效的代表省份就是江苏省。而在日本“振兴乡村”运动的典型便是“一村一品运动”的发源地大分县。两者成功地从各自的实际情况出发走向现代化，这一开花结果的成功例子，引起了中日双方研究者的热切关注。

因此，本书对江苏省和大分县的对比研究占了较多的篇幅。原因正是我们共同研究的实质性内容的中心议题。朱通华的论文及宇野重昭的论文是互为补充的。宇野论文介绍了朱通华阐述的“离土不离乡”的思想以及中日学者研究论文中提到的一些新涌现的领导人物。

宇野重昭先后曾访问江苏四次。对同一地区重复访问也许给当地增添了麻烦，然而对其本人收获甚大。朱通华除两访大分县外，还访问了山形县、群马县、枥木县、神奈川县、长野县及著名的广岛。他考察了许多乡、村、企业，与当地的农民及当地领导人进行了亲密的接触和交谈，获益不浅，尤对大分县留下的印象极深，这在他的文章里生动地表述了他的心情。他与费孝通都出生于“苏南

模式”发源地之一的吴江县松陵镇，他的大半生是在农村渡过的，虽然他是一个典型的知识分子，然而他对农村、特别对苏州地区的各县有很深的了解。这次他特地选择大分与苏南作一比较的原因也在于此。从此文可以发现，一个外国学者对“大分模式”的观察如此之细微，是值得注意的。

那么，日中双方的研究团体在这次的论坛上是否就站在同一“内发型发展论”的立场呢？并不尽然。日本和中国的实际情况都反映了以中央和大城市为主导的现实。尤其在中国，从大城市引进人才、技术、设备及资金，把乡镇企业发展成外向型企业的倾向较为强烈。这是因为国家的方针是要求增加外汇收入。为此，提出农村实现现代化，鼓励小城镇城市化的道路受到好评。江苏省小城镇研究会的特点就是研究实际生活中的重大问题。江苏省小城镇建设的动力，其规划的实施及指导，主要不是从上而下，而是由下而上，重视“内在发展”。

齐康的《中国城市化与小城镇建设的特色》，概括了城市化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身为城市规划专家的齐康，主张建设一个适应生产和生活的现代化乡镇，主张从自然到人为，从乡工型到城镇型，由农业型到农工结合的“城市型”，是必然发展的趋势，并指出城市化发展由东部逐渐向西部发展。

邬大千的《乡镇企业与城乡联结》指出，乡镇企业是从城市和农村的联结中获益，同时促进其进一步的结合。此文论述了乡镇企业的由内向型转为内外结合型的可能性趋势，又巧妙地叙述了当前乡镇企业与城市大工业的关系处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状况正在继续发展。邬大千非常熟悉苏州市的乡镇企业，他说，乡镇企业的发展决定于其自身的规律，农民企业家必须不断接受专业训练以扩大视野，小城镇转向小城市必须采取“产业意识”的方法。

吴大声的《中国农村城市化研究》，是通过在江苏农村的实践，叙述了以建设小城镇为主的农村城市化方向及其设想。论文指出，

在发展中国家，大城市化的形式并非理想的途径。他认为，实践证明，“大城市化符合高效率”这种说法有问题。最理想的方法便是多元化的形式。当然在不同的地区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会出现不同的结果。吴大声的论文试图为中国指明尽可能少走弯路的现代化道路，然而同时又预料到以建设小城镇为重点的农村城市化的实践之路是“缓慢的、曲折的、相当长期的过程”。

如何看待中国的经验，尤其如何评价江苏省的小城镇建设及其意义，在我们研究者中的见解是不同的。同时日本对大分县的“一村一品运动”的历史性意识的评价也有争议。但在中日共同研究团体中对亚洲的现代化与欧美的情况有着相当大的差异这一看法，是基本一致的。同时都认为，亚洲的经验对欧美的现代化有一定的反思作用。于是山本英治的文章提出了“从亚洲的反射”的问题。

山本英治的《地区社会现代化问题的提出和比较》是以“亚洲反射”的内容及其意义作理论上的叙述。山本论文对欧美现代化的模式作了细微周密的整理后，对现代化论进行了反驳，并在日本和中国实践的基础上，强调了人类与自然共存，人类共同生存的意义。亚洲众多的民族都相信神存在于自然之中，然而还不至于破坏自然来向神索取恩赐。山本论文之所以这么说，其用意是自然环境在愈来愈严重地遭到破坏的今天，向人们提出能否在人与自然共存的前提下创造出不致于过分地破坏自然的生产结构。

清成忠男的《发展中国家工业化的两种途径》一文认为，根据其可能性，可能选择 NIES（新型的工业化经济）型和 NAIC（新型的农工化国家）型。八十年代中期，泰国加工本地区的农产品以满足内需为原则，出口仅仅是剩余部分。通过加强农业，加工农产品，提高总体效益，指引投资方向，这样的以农业为基础的工业化，带来了地区性的分散工业，同时促使了以地区为主导的内在的发展。

当然以人与自然共生为前提的生产结构和分散工业是一种理

性概念，所以具体实施难免受到时间、空间的限制，这是过渡性、部分性的问题。清成论文重点放在受限制的部分。日本的“振兴乡村”运动的领导者之一的清成忠男对“一村一品运动”的经济效益提出了疑问，这正说明现实的复杂性。尽管如此，山本论文所强调的与自然紧密共存与内发型发展论、地区主义等的“否定现代化论”结合起来，可能形成所谓新的联合体的地区社会。从这意义来说，“内发型发展论”有利于人类去不断探索社会的求知欲。

作为社会科学的社会学，必须冷静地对待现实。对伴随着现代化带给农村的弊端也需加注意。人们应该关注这一严酷的事实：由于青年人及具备高层次文化的人们的外流（向城市）而将出现的由老人和女性为主体的“二老加妈妈”的农业和农村。所以兼业农户、农村人口老龄化的问题提到了重要的议事日程上。安原茂的《中国农民工与日本兼业农户的比较》，把当今中国农村中离乡务工务商的农民工与收入趋增的日本兼业农户相提并论，进行比较，找出二者的相似之处和差异之处。安原茂是农村社会学家，在他的论文中用更多的篇幅反映了日本农村现状。分析的结果是，日本兼业农户因为留守兼业，所以类似中国的“离土不离乡”的农民工；日本另一种兼农户因为自产的农产品不出售，所以其耕作类似于中国农民工的口粮田。同时又指出，中国的乡镇企业是以“内发型发展”为原则在本地区得到发展，而日本的农村工厂是由在大城市的母公司向地方派出的子公司，所以对当地农民来说，含有外来的意思。在论述上述问题的同时，再三强调了户籍制度在社会所起的不同程度的重要性。

王淮冰的《农村人口老龄化与农业现代化》，对目前在中国以史无前例的趋势加剧农村人口老龄的问题敲起了警钟。王淮冰论文运用了双方共同调查的成果，对日本农村和中国农村作了具体的比较，并提出了积极的建议，认为江苏农村随着乡镇企业的发展，人们必须以充满对未来的希望而付出努力。

推动本次中日共同研究的部门是：日方的“日中小城镇研究会”和中方的“江苏省小城镇研究会”。日本和中国的研究团体处于如此平等的立场来相互切磋，合作时间如此之长，跋涉路程如此之远，研究问题如此之切合实际，是并不多见的。支持这项共同研究的单位，日本方面有成蹊大学亚洲太平洋研究中心和上智大学国际关系研究所，中国方面是江苏省小城镇研究会、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联合会、江苏省社会科学院以及苏州市、淮阴市有关各县。

这项共同研究的日方主要成员是鹤见和子教授（上智大学、研究代表）、宇野重昭教授（成蹊大学、总干事）、菊地昌典教授（东京大学、干事）、安原茂教授（成蹊大学、干事）、山本英治教授（东京女子大学）、清成忠男教授（法政大学）、毛里和子教授（日本国际问题研究所）、大和田泷惠（上智大学）、鹈浦裕（北里大学）、汤山土美子（成蹊大学）、田边义明（日中社会学会），这里说的所属单位，是指研究期间的所属部门。作为这项研究的顾问有：福武直教授（东京大学）、中根千枝教授（东京大学）、朝仓孝吉校长（成蹊大学）、棉贯让治教授（上智大学）及其他有关专家。

这项共同研究的中方主要成员有：江苏省小城镇研究会名誉理事长、学术指导、赫胥黎奖和大不列颠百科全书奖的获得者、国际著名人类学家、社会学家费孝通以及朱通华（理事长、兼职教授）、秦廷栋（副理事长）、王淮冰（顾问、研究员）、徐福基（顾问、江苏省社会科学院代院长）、齐康（理事、教授）、吴大声（理事、副研究员）、邬大千（副理事长），还有顾介康、张渭英、赵杰、孙中浩、胡玉成、王雪非等共同参加了研究活动。

这项共同研究自 1986 年 4 月至 1989 年 1 月，在这期间，日本《综合研究开发机构（NIRA）》委托国际文化会馆作为研究联系单位，给予了很大的帮助，其研究成果在《关于研究中国的“小城镇”建设——江苏省为中心》（NIRA 研究报告，NO890037、1989 年 8 月）中，有过公开报导，NIRA 的下河边淳理事长及四柳修常务理

事为首的研究人员和国际文化会馆的加藤干雄专务理事，不遗余力地给予了支持，对此表示衷心感谢。

共同研究期间，受到了中日有关地区的政府、领导、民间团体的帮助，使我们深受感动。我们对日本“一村一品运动”的发源地——大分县，“阿信”的故乡山形县，国际和平城市的中心地区广岛县，热衷于日中友好事业的神奈川县及传统工业为现代社会服务而闻名于世的模范市——馆林市、足利市的所在县厅、市政府等等；对费孝通的故乡吴江县、苏州市，首次对中国农民进行社会学分析的以费孝通的《江村经济》为主题而走上国际学术舞台的开弦弓村，商品经济的繁荣城市常熟市、扬州市，以工业开发区闻名的昆山市，已故周恩来总理的故乡淮安市等地的干部群众，以超出他们业务范围的通力协作，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另外，中国的研究人员对日本的“农协组织”抱有浓厚的兴趣，日本的研究人员对中国的农民企业家的风度很感兴趣，这一点，我们在此特地留下一笔。

本书以鲜明的姿态实现了中日双方同时出版，承蒙中国的江苏人民出版社和日本的国际书院的关照，在此向张渭英副总编、石井社长表示由衷的感谢和敬意，也向承担译稿、审稿的中国方面的徐大光、章其、杨松涛、朱智贵诸位先生，日本方面的汤山土美子讲师及成蹊大学亚洲太平洋研究中心的成员所付出的努力，表示感谢和敬意。

1991 年 2 月

（序言译者：朱智贵）

《江苏百家名镇录》后记

当读者看到这本《江苏百家名镇录》的时侯，一定会为江苏有如此众多的名镇而高兴。它们如璀璨的群星，星罗棋布于江苏十万平方公里的大地上；它们如众星拱月，围绕着江苏众多的大中城市，起着联结城乡的纽带作用；它们实际上是一座座商品经济比较发达、文化卫生诸般设施比较齐全、名胜古迹和旅游资源相当丰富的小城市，象征着未来江苏的城市化道路。它们的兴起和发展，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江苏各方面工作发展的生动表现。曾几何时，1983 年在常州举行的全省城市工作会议上所提出的“建设以城市为中心，以小城镇为纽带，以广大农村为基础的城乡经济文化网络”的设想，经过十年努力，已经初步成为现实。

收集在这本《江苏百家名镇录》里的共有 125 个名镇。其中，无锡县的前洲镇、洛社镇，张家港市的杨舍镇，武进县的湖塘镇，如东县的桐本乡，建湖县的近湖乡等 6 个镇（乡），是被选为“全国乡镇百颗星”而收入本书的。还有 119 个镇，是由“江苏百家名镇”评选委员会通过投票的形式而入选的。这 125 个镇作为“江苏百家名镇”而收入本书，无疑是够格的，但也不可否认，还有若干个名镇虽然够格而未被选上和收入本书，这是由于名额的限制。这一点应该说明。

评选“江苏百家名镇”的活动，是由中共江苏省委研究室、江苏省建设委员会、江苏省民政厅以及江苏省小城镇研究会发起和主持进行的。这几个单位，有的是小城镇的主管部门，有的是小城镇政策的研究团体。评选活动由下而上，多方配合，准备比较充分，历

程前后四月。特别是评选的宗旨十分明确，不是为评选而评选，而是为了配合江苏外向型经济的发展，展示城镇建设的业绩和人文、地理特色，提高城镇的知名度，服务于江苏经济战略，使江苏今后十年的经济建设更上一层楼。在评选过程中，以从俭、务实为本，不搞形式主义，不搞任何摊派活动。在此，还应记上一笔：江苏人民熟悉的、对江苏农村和小城镇作了毕生研究的费孝通教授，参加了"江苏百家名镇"的投票。这些，都可以说明这次"江苏百家名镇"的评选活动，既是朴实无华的，也是具有权威性的。

江苏省小城镇研究会成立于 1983 年秋天，由费孝通先生担任名誉理事长。这 10 年间，先后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小城镇大问题》、《小城镇 新开拓》、《小城镇 再认识》《小城镇 新天地》这四本学术论文集，1987 年 9 月出版了《小城镇干部必读》，1991 年 4 月又出版了中日两国学者的共同研究成果《农村振兴与小城镇问题》中文本（同时由日本国际学院在东京出版了日文本）。现在摆在读者面前的《江苏百家名镇录》，已经是江苏省小城镇研究会经手的第 7 本专著了。因此，有必要回顾一下江苏的小城镇研究，看看理论研究对于实际工作的推动作用有多大的份量。

江苏小城镇研究的发展，大致有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 1982 年到 1983 年。以 1982 年 5 月间在常州举行的江苏省第二次城市工作会议和 1982 年秋费孝通先生五访江村为发端，成立了"江苏省小城镇研究会"和"江苏省小城镇研究课题组"，开始了较大规模的小城镇研究活动。这一阶段，主要是对苏南的小城镇进行典型调查，对小城镇的类型、层次、布局、兴衰规律作了初步的探讨，取得了一批学术成果。第二阶段，从 1984 年到 1986 年。这一时期的调查研究，从苏南地区扩展到苏中、苏北地区，对不同地区的小城镇进行了综合考察，由定性研究延伸到较大规模的定量研究，并对不同区域的小城镇经济状况作了较为全面的统计分析，积累了大量的数据资料。在此期间，全国政协（包括钱

伟长、罗涵先等同志)的一批卓有声望的专家对江苏乡镇企业和小城镇进行了考察。1986年在南京举行的江苏省小城镇研究会第三次学术讨论会,就是对这一阶段研究成果的检阅,那次,正值费孝通先生学术生涯50周年,省委书记韩培信同志到会作了热情洋溢的、题为《学者与农民之间成功地架起了心心相通之桥》的讲话,对江苏的小城镇研究作了充分的肯定。

在此期间,在江苏省社会科学院、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联合会、几所高等院校、各级建委和政策研究部门的配合下,课题组完成了小城镇"六五"研究课题,这一社会科学的国家重点项目,得到了普遍的好评。

第三阶段,从1986年到现在。江苏的小城镇研究进一步扩展为"小城镇与城乡社会发展研究",即以小城镇为研究基点,深入到以整个城乡社会的发展为研究对象,在新的理论层次上进行探索。在此基础上,开展了与中外学术界的交流与合作,开始了不同国家小城镇与社会发展的比较研究,取得了一批宝贵的研究成果。

可以这样认为,江苏的十年小城镇研究形成了如下三个特点:(1)在指导思想上,坚持面向实际,针对国情省情,面向重大实际问题调查研究,不搞空头理论。江苏的小城镇研究,是循着这条科学的思路过来的。对小城镇的研究,根本目的不在于从一般理论上论证,而在于深刻认识小城镇发展的规律,进而把握这种规律去指导实践。小城镇的研究课题,大多是工作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研究成果也就较能引起各级党委和政府的重视,因而也就可能对实际工作起到不可缺少的推动作用。(2)在研究方法上,在研究对象的推移上,坚持从个别到一般,从定性研究到定量研究,从而寻找和发现规律性的东西。实践证明,这是从事社会调查和科学研究的一条切实可行的路子。近十年来,江苏小城镇研究由点到面,由浅入深,由个别到一般,由局部到整体,由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逐步认识、发现、总结小城镇发展对振兴农村和开通城乡关系的一般规

律，从而有了今天的局面。(3)在研究力量上，实行了政策研究工作者、理论工作者和实际工作者的三结合，他们或分工协作，或结伴而行，或默契配合，或协作攻关。这几方面的力量围绕着小城镇的政策问题、社会问题、人口问题、规划与设计问题、建设问题、城乡联结问题、农民进镇问题、乡镇企业布局问题……等等重要而迫切的实际问题进行调查研究，互相学习，互相交流，互相探讨，互相补充，使各自的优势和长处都得到了较为有效的发挥。以上三条证明：江苏小城镇建设的成功实践，同江苏小城镇的生动研究是密不可分的。

我们常说，理论毕竟是灰色的，生活之树才是常青的。江苏的小城镇研究，确实不是为研究而研究，而是为着探索小城镇在中国城市化道路中的地位，为探索中国式的城市化道路而开展研究。城市化是工业化的伴生物，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经之路。它有着共循的一般规律，也有着受时空条件和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所制约的特殊性。这一特殊性决定了推进城市化的不同方式和每一阶段不同的发展重点。

寻找具有中国特色的、符合中国国情的城市化道路，先要找到制约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基本矛盾。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随着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农村劳动力在农村耕作上的游离量越来越大，这在人口稠密、人地矛盾突出的江苏显得更为尖锐。1989 年底，江苏约有 1600 万个农村剩余劳动力急需寻求出路。另一方面，由于种种主客观原因，长期以来城市发展上存在不少弊端，使得现有城市特别是大城市规模失度，超负荷运转，承受能力薄弱。显然，走发展大中城市以全部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城市化道路，是行不通的。这条路在中国不能走，也走不通。如果置国情、省情于不顾，将农村矛盾转移到城市，我们有什么妙棋，可以避免重蹈农村

蔽，农民破产，大城市恶性膨胀的道路呢？这就必须在现已人满为患的城市之外找到新的接纳空间，在城市化的一段规律中找出

更利于解决我国特殊矛盾的具体形式。小城镇作为农村之首、城市之尾的社区，作为城乡联结之网的网结，以其不可替代的功能显示了它在实现我国城市化进程中的独特作用。以规划好、建设好小城镇为特色的城市化道路，或许将是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以人们主观意志为转移的满意选择，如果我在这里不说是最佳选择的话。

探究小城镇与中国式城市化道路的关系，这几年我们比较多地看到了小城镇的“蓄水池”作用和“分洪截流”的功能。诚然，这是我国在推进中国式城市化过程中所要解决的基本问题之一。但小城镇的兴起和繁荣给人们的启示远远不止这些。我们所要探索的是一条在社会主义质的规定下，不同于西方发达国家的新路。它应该是以社会的稳定和共同富裕为前提，以城乡协调、共同繁荣为目的，以尽可能小的代价换取尽可能大的社会综合效益。因而，中国特色的城市化道路应当具有量与质两个方面的规定性：所谓量，即城市发展的规模和数量，城市人口和其国民收入在总人口和国民总收入中所占的份额；所谓质，即城镇体系的合理化程度与城乡关系的融合程度。把我们的认识建立在二者统一的基础上，有助于更科学、更全面地把握小城镇与中国式城市化道路的关系。

这本《江苏百家名镇录》的出版，得到了许多领导同志的支持，得到了省内多方面的配合。首先应该感谢担任过多年江苏省委第一书记的彭冲同志，他现在以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国务活动繁忙之身，欣然为本书题写了书名；省委沈达人书记的序言，概述了江苏小城镇发展的历史进程，提出了今后的希望。这，无疑为本书增添了光彩。江苏省各级建委、各级民政部门和各级政策研究部门的许多同志，为本书付出了许多心血；没有他们，就没有这本书的问世，这并非溢美之词。

（1991 年 7 月 8 日于南京）

《沿海经济开发与发展》序

由于工作上的关系，我多次到过盐城地区的每一个县，并到过大部分建制镇，同沿海一些市、县、镇的同志接触较多。每次相遇，他们表现出来的开发沿海、建设沿海、振兴沿海的急切心情，令人感动。

江苏有1000多公里的海岸线，900多万亩沿海滩涂和丰富的沿海水产资源。搞好沿海开发，不仅是沿海市、县的事情，而且直接关系到江苏经济的发展；放大了看，也和我国三步走的发展战略相联系，因此绝不是一件小事。

在江苏这块地方，要促进沿海经济振兴和社会进步，不高度重视对外开放不行；要抓好对外开放，不高度重视经济开发也不行。开放与开发，互相依赖，互相促进，缺一不可。实践已经告诉我们，我国东部沿海地区物华天宝，资源丰富，有发展经济的良好物质条件；搞好沿海开发，其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是其他地区无法比拟的。国际经济的迅速发展，特别是亚太地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出现的令人注目的经济高速增长，也迫使我们认真思考这一点：我国沿海地区必须加快发展速度，不然，就会在国际竞争中落伍。我们面临的形势十分严峻，必须增强沿海经济开发与发展的责任感和紧迫感。

近年来，人们对沿海经济开发的可行性、必要性、战略性已经明确或正在明确，但对开发的总体思路、政策措施还研究不够或有待研究。朱枝富同志对此做了有益的尝试。他撰写的《沿海经济开发与发展》一书的出版，是一件令人高兴的事情。

《沿海经济开发与发展》一书，以盐城市为重点，对发展中地区的经济开发与发展作了比较系统的调查研究，在认真分析区情的基础上，总结了经验，提出了今后的发展思路，并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回答了盐城地区及其类似区域发展的若干带有规律性的问题。应该认为，这是盐城地区广大群众和基层同志多年来成功实践的结晶。没有广大群众和基层同志的实践和努力，就不可能有理论研究人员的成果，就不可能有这本书。本书采用系统的研究方法，把科技开发、资源开发、外向开发、乡镇企业开发、工农业经济开发、综合开发联成一个有机的整体来考虑，也是一次成功的探索。

沿海经济的开发与发展是一篇大文章，需要更多的人动手一起做。我衷心希望今后有更多这类的作品问世。

（1992 年 1 月 12 日）

《渡村创业纪实》序

在美丽富饶的吴县，渡村这个地方原来不算太出名。你如果不仔细找，地图上还不容易找到渡村的方位。因为吴县著名的乡镇和迷人的地方太多太多了：东有甪直，西有光福；远有东山、西山，近有木渎、枫桥；凡是坐过火车的人，谁不知道望亭、浒关、唯亭？就是从不出门，难道没有吃过枇杷、杨梅、碧螺春？ 妩媚的太湖风光，有赵朴初先生的著名诗句“江南五月风如酒”来形容。吴县的白沙枇杷，被费孝通先生赞为“天下第一”。“小骆驼（电扇）打进了大上海”的新闻，七十年代登遍上海各大报纸，曾是乡镇企业兴起时期拿出高质量产品并进入大市场的代表作，实际上也是开了外向型经济的先河，因而为当时身任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上海市市长彭冲同志的充分肯定，顶住了刮向乡镇企业的一股股冷风。吴县的水，吴县的山，吴县的农副产品和工业产品，无不具有独特的魅力；而首先是吴县的人民，包括历任县委书记、县长以及乡镇村的同志，他们聪明而能干，真是地灵有人杰，人杰创奇迹呵！

在这著名的吴县，近几年，又有许多原来不太出名或名气不大的乡镇村冒了出来，有的各业兴旺了，有的在某一个方面赶到最前列了，有的名特产品成批走向国际市场了，有的社会面貌大改观了，……渡村就是其中之一。

我到过渡村多次，我作过调查，我参加过渡村的某些重要经济活动。我亲身体会到，渡村的道路大通了，渡村的面貌大改观了，渡村的经济大“发”了，渡村创出了独特的经验。

渡村的巨变来之不易，这说明：事在人为。

渡村的大"发"实属必然，这说明：诚则灵。中国的传统道德，要求待人以诚，现在办经济仍然需要这种精神，对大陆人要诚，对香港人要诚，对台湾人要诚，……以诚对诚，事必有成。

渡村的出名应给以历史的解释，这就是：山不在高，有"仙"则名。这个"仙"，就是经济的崛起，农民的富裕，社会的进步，鲜明的特色。

祝愿渡村不断进步，并在吴县的总体繁荣昌盛中占有一定的地位。

（1993年6月28日于南京）

故乡明月千重光

——写在《地方精神的闪光》出版之前

1993年3月，早春季节，略有寒意，我与日本上智大学鹤见和子教授、成蹊大学宇野重昭教授结伴而行，第四次访问“一村一品运动”的发源地——大分县。

（一）

大分县知事平松守彦先生在他宽敞的办公室里，亲切地同我们交谈，目光炯炯，思路清晰，依然是热情豪放，依然是不忘故土。告辞时，他送了我这本《地方精神的闪光》（日文本）。

一书在手，虽然是不厚的一本，却象火团一样地捏在我的手上，不懂日文的我，渴望着了解这本书的全部内容。后来我拜托了南京师范大学外文系的郭常义先生，用一个暑假的时间，把书翻译了出来。因此，当我于同年11月第五次访问大分并见到平松守彦先生时，已经可以把一本厚厚的译稿放在作者面前，征求作者本人对中译书名的意见了。

在两个拟译书名中，《地方精神的闪光》是由平松守彦先生确认的。

（二）

在平松守彦先生的办公室内，挂着一幅苍劲、凝重的中国字：故乡明月千重光。这是中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彭冲先生于1993年年初，应我的请求，写了送给平松守彦知事的。我相信平松先生会喜欢这幅字。

读者在读了本书以后会知道，平松守彦先生是大分县人氏，1949年从东京大学法律系毕业以后，先进入商工省（现称通产省）工作，后来担任过国土厅的地方振兴审议官。1975年毅然离开东京——这个青年一般唯恐进不去的国际大都市——为了实现男子汉的壮志，回到家乡大分县就任副知事。从此一发而不可收，与故乡结下了不解缘。1979年被选举为知事以后，连连当选，迄今已连续担任三届知事，长达12年之久。我不熟悉日本的政界风云，不知道当今政坛有几多要人可以连任县知事四届五届？但我懂得，就这连续被选为知事达三届四届之久的事实足以说明，平松先生在他的故乡所获得的成绩，肯定是高分，是百万家乡父老兄弟姐妹中的优等生。

所以，“故乡明月千重光”对平松先生来说，是最好的写照，是最大的安慰，也是值得自豪的一件事。

（三）

十余万字的这本书，我是用整整三天的时间，一口气读完的。此书文字如行云流水，政治书籍写得如此潇洒，实属难得，但我不是象读小说那样地浏览一遍，而是认真地、细细地读，因为我自认为负着校阅的责任。

译者郭常义先生在日文和中文方面都有很好的功底，可是他没有到过大分。我不懂日文，可是本书所讲到的典型单位我都到过，本书所讲到的带头人物我差不多都访问过。因此我想说，译者郭先生是带着强烈的责任感，很好地完成了译书的任务；我则是带着强烈的亲切感，越看越有味道地校阅了本书。至此，我可以负责地、放心地说一声：《地方精神的闪光》中文本的出版，很有必要，很有意义。我以曾经为此书在中国的出版略尽绵薄之力而感到由衷的高兴。

（四）

从1985年到1993年，我先后5次访问大分。因此我曾自信地认为自己是熟悉大分、了解大分的。读了本书以后我才悟然：过去我尚未真正了解大分。认识大分从本书始。真正要了解大分近20年的发展，仅仅走访几个地方，开若干个座谈会，访问多少家农户，是远远不够的，大概只能了解个皮毛。真正从理性上认识大分，还要读书。我现在觉得，想了解大分的现在和将来，想了解平松守彦先生本人（他的知事生涯的甘苦），这本书，虽然不是全部，也是代表作。

中国与日本的国情大不相同，江苏与大分的省情也大不相同。可是在中国出版这本书很有现实意义。大分县的“一村一品运动”，“视点由物及人，进而面向世界”，“通过造物造就人，通过造人造就物”，……这种见物更见人、物质文明建设与精神文明建设同时并重的做法，与江苏的经验是多么地相通。

本书还用较大的篇幅介绍了大分县建设“临海工业地带”和“科技文化城”的经验，介绍了日本大型企业先进技术向本地企业转移的经验等等，这些，对江苏乃至中国都有宝贵的借鉴之处。尤其可贵的是本书有不少精彩的观点，诸如“区域文化”问题，“地方自立精神”问题等等，犹如黑夜石光，既灿烂夺目，也发人深思。

我在与宇野重昭教授共同主编的《农村振兴与小城镇问题》一书中，发表过一篇《中国苏南模式与日本大分模式的研究》。此文曾说过：

“不能设想，经济振兴运动可以没有政治家的领导。强调这一点，与强调町村的自主精神是并不矛盾的。我认为，只有高明的、明智的政治家，才会特别注意调动基层组织的带头人的自主性、创造性。”

读了本书以后，我确信上述的看法没有错。

（五）

本书的后半部分与前半部分有所不同，但是同样精彩纷呈，我个人还认为精彩得更有特点——如果打个比方：如同品尝佳肴，此肴更有味道。因为后半部分更多的是讲人生和社会。作者对这些问题的阐述，与其说是他的经验，不如说是他的感情。正因为作者对故乡，对自己的岗位，对自己的人民，充满了眷恋之情，因而会想到这些事（老龄化社会，老人，区域文化，先哲丛书，三项挑战，等等），做好这些事，从而说出了这么好的体会。

（六）

我与作者分属不同国家和不同阶层。我无意高攀大人物以自炫。我是通过日本的学者而结识作者，通过研究工作而了解作者的。

可是在我读了本书之后，确实对作者产生了敬佩之情。这是因为我也是一个“月是故乡明”的知识分子，对生我育我的故乡始终怀着深深的眷恋之情。故乡兴则喜，故乡愁则愁，故乡事愿出死力相助。放大的故乡就是祖国。谁不为祖国的兴衰进退而喜怒哀乐？

信笔写来，见诸笔端，发自心底，这是自古惺惺惜惺惺吧？

（1993 年 11 月 30 日深夜，于石城南京）

乡镇企业篇



中国农村工业化和现代化的道路

——江苏乡镇企业的兴起之一

江苏省是一个多集镇的省份。全省有2,200多个县属镇、乡级镇和乡属镇，星罗棋布于大江南北的10万平方公里土地上。近几年来，许许多多集镇的经济和社会建设有了较大的发展，明显地繁荣起来了，并且在城市和农村的经济网络中开始发挥纽带的作用。这是一件大好事。

集镇开始繁荣起来，是农村经济这几年获得较快发展的反映。没有农村经济的发展，就不可能有集镇的繁荣。从1978年到1982年的5年间，江苏省的粮食、棉花、油料总产量年均增长率都在4%以上，各项主要副业的年均增长率都高于10%；乡村工业（即过去所说的“社队工业”）的总产值，这5年翻了1番多，1982年的产值已占农村工农业总产值的42%。1983年又是一个工农业全面丰收的年头。农民住宅的第一次更新已经或正在实现（有的还开始了第二次更新），这就是：草房改瓦房，平房改楼房，屋壳到屋里，户户在变样。而且，农村影剧院、农民文化宫、农民书场、比较象样的中小学和幼儿园、简易而固定的农村集市贸易塑料棚等等，在许多集镇拔地而起。

这里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凡是乡村工业办得好的县，农副业的相应增长速度也快。这种农、工、副三业的正向发展，向人们显示出一种趋势，即以乡村工业为支柱，促进农村经济的全面发展。这也就向人们展示着一种新的农村经济模式。资本主义国家现代工业的兴起，是以农村的崩溃为代价的。世界早期的工业发迹史，也就是一部农业经济的破产史。在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下，从中共十一

届三中全会以来，江苏农村出现的是这样一种模式：乡村工业以巩固和促进农业经济为前提，农副工业同步发展。农民在办好农业、副业的同时，以巨大的热情兴办乡村工业，开创了农村经济不断繁荣的新局面。

以苏州市为例，这个市所辖的 6 个县（市）从 1979 年到 1982 年的 4 年期间，从乡村工业利润中提取了约 3.5 亿元支持农业，其中用于购置农业机械的约 0.6 亿元，用于农田基本建设的约 1.05 亿元，用于支援穷队的约 0.9 亿元，用于举办集体福利事业的约 0.1 亿元。江苏总的说是地少人多，在苏州、无锡、常州、南通这些地区，地少人多的矛盾更是尖锐。因而，农业自身积累的能力十分有限，国家的支持又有一定限度，这不能不影响到农业生产条件的迅速改善。乡村工业的兴起和发展，大大有助于这个问题的解决。而且，乡村工业的发展，增加了农民的集体分配收入。1982 年，务工社员的工资总额和社队企业利润返还，使每个农户增加了 100 多元的集体收入。在乡村工业发展较好的地区，这一部分所占的比重更大，起了丰歉保收的作用。

（载《经济参考》报 1984 年 1 月 2 日）

“节制闸”和“蓄水池”

——江苏乡镇企业的兴起之二

江苏乡村工业容纳了400多万的农村多余劳动力。这些“务工社员”的劳动形式大体上有三种：第一种可称之为“主工兼农”，平时在工厂上班，假期或农忙回家务农。第二种可称之为“亦工亦农”，上班在厂务工，下班回家仍从事一定的农活，或者在农忙时歇工务农。第三种可称之为“主农兼工”，即接受工厂外发加工任务，晚上多做一点，农闲多做一点。这几百万务工社员，大多数劳动在厂，吃住在家，农工相兼，同农业连着“脐带”，与农村是“藕不断，丝更连”的关系。

在小城镇或中小城市的周围，存在着这么一支劳动队伍和这么一种劳动形式，是值得进一步研究的又一件好事。

这些“务工社员”主要是青年、有一定文化水平的小知识分子和妇女这三种类型的劳动力，也就是农村中的新一代和比较活跃的一些人。这些人能够稳定在农村，是一种情况；这些人不能够稳定在农村，又将是另一种情况。陈云同志说过：“农民是个大头。把这个大头安排好了，中国的大局就定了。安排不好，国家就不得安定。”乡村工业的重要作用就在这里：它一方面起到了控制农村人口继续涌向大中城市的“节制闸”作用，减轻了大中城市的人口压力；另一方面又起到了吸收农村多余劳动力的“蓄水池”作用，缓和了江苏农村人多地少的尖锐矛盾。

乡村工业在很大程度上改善了人口流向，使农村的多余劳动力，既没有象资本主义国家的农民那样，以破产为代价，涌向大中城市；也没象他们的先辈那样，背井离乡另谋生计。而是在农村安

居乐业，逐步实现从狭义农业向广义农业转化、农业人口向非农业人口转化、农村人口向城镇人口转化的进程。这一意义，是不可低估的。江苏许多地区的乡村工业的历史已经不短了。这些年来，它们已经经历了一个调整、整顿的过程，这是一个以经济效益作为优存劣亡标准的过程。举例来说，前几年苏州地区有78家企业生产电扇，显然太多了，经过整顿，只有10余家以质量好、成本低而被保留下来。所以，这些地区的乡村工业正在比较稳定地成长，并且在上海经济区发挥它一定的、然而也是确实存在的作用。

从七十年代初期江苏省兴办社队工业算起，迄今已有10来年的实践作了检验。现在是否可以这样说：乡村工业的兴起、存在和发展，是农村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大工业、大中城市生产力发展的客观需要。乡村工业，一头连着广大农村和农民，一头连着大工业和大中城市。正是这两者的“合力”，产生了不断作用着乡村工业的前进的历史。这就是我们今天需要多加研究的一个课题——中国式的农村工业化和现代化的道路，中国农村和农民实现小康和富裕的途径。

（载《经济参考》报1984年1月3日）

小城镇建设关系到“四化”全局

——江苏乡镇企业的兴起之三

在长江两岸，沪宁沿线，乡村工业已经成为农村经济的重要支柱，也是许多小城镇得以迅速发展的主要原因。可以这样说，县镇也好，乡镇也好，不论哪一种类型的集镇，以发展乡村工业来带动集镇的繁荣，并且使之成为一定范围内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可能是目前能够找到一个可靠途径。舍此以外，如果发展农副业和手工业或其它各业的办法，当然也可以使集镇繁荣起来，但可能还很难把小城镇建设成为“三个中心”，这是若干小城镇的兴衰史告诉我们的。

这有三个根据：

第一，乡村工业大多数办在镇上或集镇的周围，自然带动了集镇本身的繁荣。如沙洲县的塘桥镇和乐余镇，常熟市的碧溪镇和福山镇，武进县的湖塘镇，都是由于社队工业的崛起，才使所在镇的旧貌换新颜。反之，有些镇由于乡村工业抓得迟，就没有力量进行城镇的建设和改造。如有名的文化古镇吴县甪直镇，工业产值仅400多万元，利润更是寥寥，既无法安置待业人员，亦无力进行城镇建设。所以，市镇在册人口逐步减少，从解放初期的1万人减至现在的5,000人，市容没有太大改变。这类事例比比皆是。

第二，乡村工业提供了必要的物质基础，直接带动了所在集镇的建设事业。苏州市6个县(市)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每年可以从乡村工业利润中提取1,000万元用于小城镇建设，诸如翻建街道，挖河架桥，兴建影剧院，举办农民文化中心，支持医院、学校建设，改善居民生活设施等等。对此，农民用三句话来表述：“农

业一碗饭，副业一桌菜，工业面貌改。”意思是说：农业和副业过关，充其量不过解决温饱问题和略有积余；只有发展乡村工业，才有力量改变农村和集镇的面貌。

第三，特别重要的是，乡村工业的发展，还促进了小城镇的精神文明建设。常熟市碧溪乡从1979年到1982年，乡村工业利润用在城镇建设上的有200万元，其中有：扩建卫生院4万元，举办幼儿园4.5万元，建造农民文化中心4万元，建造影剧院30万元。如果没有乡村工业，要在一个乡投资40多万元进行文化教育卫生建设，是不能设想的。而且，乡村工业与小城镇精神文明建设的关系，不仅表现在科技、教育、文化、卫生、体育“五业”建设资金的支援方面，还表现在改善人才流动（输入智力）、加快信息流通（政治、经济、文化科学信息的传递）、促进科学技术下乡等方面。这些，是实现农业现代化不可缺少的内容，也是在农村进行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

说到这里，应该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了：过去没有乡村工业，不是也有各种类型集镇的存在和发展吗？这如何解释呢？我们认为，那个时侯各种类型的集镇，是属于那个历史阶段的集镇，反映了那个历史阶段的生产力水平，有的是农副产品集散地，有的是某种手工业产品中心，有的是纯商业性的集镇，但起不了政治、经济、文化“三个中心”的作用。现在农业生产力和农村生产关系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对小城镇应起的作用提出了新的要求，所以，应该把小城镇的建设问题，放到加快四化建设的全局和完善市管县新体制的大局中来重视它和研究它。

（载《经济参考》报1984年1月4日）

起用能人、重用创业者

——江苏乡镇企业的兴起之四

江苏乡镇企业在风风雨雨中站住脚跟，并且不断发展，到1983年的产值达到158亿多元，占全省工农业总产值的五分之一，有着种种主观和客观原因。在主观原因之中，最重要的一条，是县级领导机关敢于起用能人，敢于重用四化创业者。

沙洲县锦丰乡麒麟村塑料印花厂，原来的厂领导不懂经营，不会管理，1981年上半年亏损八千元。后来，乡党委选派较懂生产经营的乡工业办公室副主任王培成去领导这个企业。王培成去了后，马上起用两名熟悉生产和供销业务的工人担任副厂长。他们把农业承包责任制运用到企业管理上，制订了各种人员的岗位责任制，并对四色轮印机进行技术改造，严格质量检验制度，提高产品质量，当年下半年就扭亏为盈，盈利6万元。1982年进一步抓质量，产品销到外省市，被天津一个外贸单位列为免检产品，全年盈利12万元。

该县塘桥化纤纺织厂有个36岁的会计陈正祥，他不仅懂得财务管理，而且自学了《棉纺手册》、《棉纺工程学》等专业书籍。乡党委把他提为副厂长，后来又送他到省棉纺厂厂长培训班学习了几个月，回来后即提拔为厂长。陈正祥主持全厂工作后，又把两名26岁的懂动力设备和生产工艺的工人提为副厂长。他们一心把上海十二棉纺厂作为学习榜样，使企业的经营管理 走上正规化道路，生产和经营大有起色，现已被省纺织工业厅列为定点企业。县委书记陈壁显最近深有感慨地说：乡镇企业选准一个明白人，就能救活一个企业，办好一个企业，就能带动一个乡的经济。

无锡县委书记袁培春幽默地说过这样的话：乡镇企业虽然是“后起之秀”，但它出身“寒门”，在市场上既无“世袭领地”，又无强硬“靠山”，只有在“新”字上做文章，“活”字上下功夫。而“新”和“活”都要靠人才、靠科学技术。否则就不可能站稳脚跟，争得阵地。

乡镇企业起用能人同样是不容易的，有认识问题，也有实际问题。所谓实际问题，就是能人从哪里来？工农业总产值已超过20亿元的江阴县，是靠“挖掘、培训、引进、聘请”八个字来解决的。他们充分挖掘本地的各种人才，发挥农村中现有的技术人员、能工巧匠、知识青年、生产能手的作用。对那些自学成才、学有专长的人，因才重用。县建立技术培训中心，县、乡两级两年来办了各类专业训练班135期，训练4,900多人次，还选派了500多人到外地专业院校深造。他们还通过各种渠道聘请退休工程技术人员和老工人当顾问，同大专院校和科研机构挂钩，进行技术联营、技术承包、技术咨询。与此同时，先后引进了工程技术人员2,000多名。

（载《经济参考》报1984年4月20日）

要有一支好的供销队伍

——江苏乡镇企业的兴起之五

江苏农村经济在实现从半自给商品经济向更大商品生产转化的过程中，乡镇企业担负着重要的责任。那末，乡镇企业依靠哪些力量来抓商品流通、促商品生产呢？江阴县委书记成强说得好："没有一支好的供销队伍，企业就没有经营门路，没有竞争能力。"因此，在那些乡镇企业比较发达的地区，都十分重视供销工作和供销人员。

沙洲县在发挥国营企业的主渠道作用的同时，着重抓了发展集体商业和建立乡镇企业的自销体系。县的经济部门办了4个供销公司，各乡都办了工业公司和多种经营服务公司。大多数乡镇企业形成了一个自销体系，有专门的销售班子，并在外地设立了400多个销售点，派出流动销售服务队，既搞批发，也做零售，做到快进快销，早进早销，冬进冬销，多进多销。现在各乡镇企业在外在地供销人员有300多人，他们的销售商品量占销售总额的60.5%。

江阴、常熟、沙洲、太仓等县市十分注意对供销队伍的建设，具体做法是：从政治上鼓励他们，强调供销人员是发展商品生产不可缺少的专业人才，树立其光荣感、责任感。在工作上支持 他们，具体帮助解决一些难题，鼓励他们大胆工作。在作风上提出严格要求，要求供销人员遵纪守法，不违法乱纪。在生活上关心他们，帮助解决在家庭、生活方面的实际困难，解除后顾之忧。县乡每年都要召开集体供销人员会议，总结经验，肯定成绩，表扬先进，树立典型。这样，就较大地调动了供销人员的积极性，发扬了"千山万水跑，千辛万苦干，千言万语讲，千方百计销"的精神，上天(天津)、入

海(上海)、进山(山东、山西)、出关(东北、西北),常年累月奔波在全国各地。江阴县青阳电扇厂供销科长丁才泉,和其他供销人员出差时,身边总带着"七件宝":样品、广告牌、配件、修理工具、使用说明书、产品合格证和省优质产品证书照片,边宣传,边推销,边修理,人称"顶赚钱"。现在这家工厂的产品行销16个省市,一年四季热销不衰。

许多县、乡领导干部从实践中深切体会到:供销人员的劳动,搞活了流通,创造了价值,促进了生产。他们的作用不是微不足道,而是必不可少,而且日益重要。他们不应该象舞台上的丑角那样,是一个白鼻子,而应该把他们看成是重要的正面角色,因为他们在商品生产的舞台上确实作了有声有色的表演。

(载《经济参考》报1984年4月21日)

从实际出发扬长补短

——江苏乡镇企业的兴起之六

扬长避短，对于乡镇企业来说，是一个完全适用的原则。但苏南许多地方和苏北若干企业的实践，还丰富了这一原则，就是“长”必须扬，“短”不可避，而应该“补”。

乡镇企业有其特有的长处，如“不吃大锅饭”、“不捧铁碗饭”，因而竞争性强，投资少、费用低、自主权较多，因而容易用人、用技术等等。这是多年来的实践已经证明了的。但乡镇企业确也有其短处，如资源短缺、设备简陋、技术落后、信息迟缓等等。面对这些短处，怎么办？据若干县的经验：该避则避，如“小而全”的致命之短必须避，有的应暂时先避，如耗能太高的产品应缓上等。但是，对短处不能一味地避，有些短处应该补，补短才能扬长。

南通县是一个人多地少的大县，150 万人口，人均只有八分田。这是先天的短处。如果还是捆在土地上，以粮为纲，就永远富不了。这个县补短之一法，就是以家庭加工业为主，大力发展多种经营，把一些传统小手工业产品搞得有声有色，如扎帚、编芦席、做柳筐、制竹器、贴脆饼、勾针刺绣、纺纱绢布、加工豆制品等等。这些加工项目，花本小，收益大，见效快，资源不愁，却能转移和用活大量多余劳动力。新坝乡卫桥村改变了过去“砍麻种棉”的做法，既种棉，又种麻，大力恢复和发展麻制品加工业，1983 年农副工总产值达到 150 万无，比 1978 年翻了三番，人均收入也翻了两番。

无锡县补自己之短的一个办法，是通过提供资金、设备、技术、人才的协作，与外地联合开发资源，帮助兄弟地区扩大了煤炭、生铁、木材等生产，支持兄弟地区兴办了当地急需的针织、印染、淀

粉、化工等18个工厂，使自己也补偿了若干急需的原材料。协作互惠，双方得益。这个县前洲乡工业公司1981年帮助山东某地办了一个年产3000吨的化纤印染厂，并代为培训技术力量和安装试车。投产两年，已获利50多万元。这样的协作，既是互相补了短，也是各自扬了长。从实际出发，扬长补短，这就是乡镇企业特有的生命力所在。

（载《经济参考》报1984月4月23日）

小而专　小而精

——江苏乡镇企业的兴起之七

多年的实践证明，江苏许多乡镇企业的活力在于“小而专”、“小而精”，不搞“小而全”、“小而粗”。坚持了这一条，才做到了以小补大，以小搞活；以专补缺，以专配套；以精取胜，以精发展。

前一时期，有些县的一些乡镇工业曾经搞过“小而全”，模仿国营大企业的那套办法，生产最终产品，但因资金、原材料、能源不足，技术装备落后，产品质量不高，导致产品滞销压库，“赔了本钱又搭工”。

武进县是江苏乡镇企业比较发达的一个县，1983 年工农业总产值达到 8.4 亿元。这个县就是乡镇工业走“小而专”道路较好的一个县。他们的企业生产钟表零配件、自行车接头、金属鞋眼、卡介苗注射器、自动结经机、电视机和收音机的零配件、钢窗、玻璃钢制品以及一系列日用小商品。凡是市场和人民生活需要的，重利要干，微利也干。这样，使产品成了“不可缺少的配角”或“最佳配角”。

古语说：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在经济上也是这样，厂不在大小，有名牌则灵。武进县青龙乡灯具配件厂生产的荧光灯启辉器铝壳，由于“小而精”，高质量，成为轻工业部的定点厂，年产量已占部定点任务的 80%以上。这个县还有个芦家巷风动水泵厂，1983 年生产的风动水泵，已占全国煤炭系统当年需要量的 80%，这也是走“小而专”的道路的结果。

从我们国家目前的计划体制和市场需要看，乡镇工业走“小而专”、“小而精”的道路，有其独特的作用和意义。一方面，可以使越来越多的乡镇工业产品直接或间接地同国家计划、地方计划衔接

起来，减少和避免盲目性。我国市场如此之大，计划又包不起来，消费者又确有需要，也就从实际上消除或缓冲了所谓“以小挤大”的矛盾。正是由于 这一点，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城市工业要向乡镇工业提出“心连心，一条心，不变心”的要求了。另一方面，江苏的乡镇工业目前还属于具有一定技术力量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许多工厂已经攀了“高亲”，同城市的科研单位或高等院校挂了钩，建立了技术协作的关系，因而比较容易做到“小而专”和“小而精”，企业本身具备着这样的条件。

乡镇工业以小补大、以专补缺的意义，还在于可以促进城市大工业的结构改革。乡镇工业“小而全”搞不得，大工业难道“大而全”就搞得吗？显然也搞不得。问题是乡镇工业搞了“小而全”，就要吃苦头，产品卖不出，工资发不出，甚至关门大吉。城市大工业的许多单位，总是要逐步实行分散化和小型化，在结构上进行改革的。这是新的产业革命带来的一种趋势。明大道不在高远，乡镇工业“小而专”的实践，可以为有些大工业所借鉴。

（载《经济参考》报 1984 年 7 月 18 日）

面临新竞争　更上一层楼

——江苏乡镇工业的兴起之八

中央四号文件的发布，使乡镇企业的广大干部和工人从心里感到高兴，“有了上方宝剑”，“有信心，有奔头”了。但许多有眼光的干部却“居安思危”，想到了许多新问题。他们认为，乡镇企业正在面临新的竞争，需要考虑新的对策。一是专业户和家庭工业的兴起；二是城市加快改革，企业“松绑”后搞活了；三是商品多了，流通渠道活了。

纵观城乡经济改革的新形势，乡镇企业至少在以下三个方面还大有文章可做：

一是在经济承包责任制的问题上要继续做文章。江苏省正在推行无锡县堰桥乡“一包三改”的经验。“一包”，就是全面实行经济承包责任制。“三改”，就是干部制度由“任免制”改为“聘用制”，用工制度由“录用制”改为“合同制”，工资制度由“基本工资”改为“浮动工资”。他们制订了9个具体条例和规定，落实这些改革措施。堰桥乡1983年实行了“一包三改”的改革，工农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74%，人均收入增长1倍，达到504元。这种切中时弊的改革有普遍推广的意义。

二是在设备更新、技术改造方面大有文章可做。这项有关技术进步、产品升级换代的改革，必须很快摆上议事日程。无此远虑，必有近忧。从多数企业来说，做这件事有必要，也有可能。江宁县碌口乡的裘皮厂，为了提高脱脂、烘干这两道关键工艺的水平，保证出口皮件的高质量，从意大利进口脱脂机和烘干机各一台。这就使这个厂的关键技术提高到了一个新水平，提高了产品的竞争能力。

我们高兴地看到，现在已有许多乡镇企业认识到了这一点，而且开始行动起来了。

三是在产、供、销方面还要多做文章。乡镇企业在七十年代创业伊始，跑材料，搞供销，有的主要是靠人头、靠关系；现在不行了，要靠信息，要靠产品的质量，靠企业本身的竞争能力。与此相联系的，生产和供销方面业务人员的素质和活动方式，也必须积极提高和改进，才能适应生产和流通渠道等方面的新要求。

（载《经济参考》报 1984 年 8 月 8 日）

乡镇企业的改革还大有文章可做

近几年来江苏乡镇工业的新发展，是农村经济改革的产物，是在计划、物资、供销制度方面，在人才引进、劳动力使用、技术政策等方面，敢于突破旧框框，不断进行改革的结果。比如乡镇工业在产、供、销方面，不是什么都依赖国家计划、自己无所作为，而是充分运用价值规律，搞活市场调节，为发展生产服务。又如，乡镇企业所需的人才不是等待国家的分配，而是用各种办法引进各种能人，舍得花本钱定向培养自己的技术人员。正因为实行了这些改革措施，因而广开了财路，拓开了才路，有力地推动了乡镇工业的发展。

但是，乡镇企业的改革并不能到此止步，必须更上一层楼。纵观城乡经济改革的新形势，至少在以下三个方面还大有文章可做。

一是在经济承包责任制的问题上要继续做文章。无锡县堰桥乡的工农业生产，所以能在 1983 年跨出一大步，工农业总产值比 1982 年增长 74%，全乡人均收入增长一倍，达到 504 元，其主要原因，就是他们实行了“一包三改”。“一包”，就是全乡全面实行经济承包责任制。“三改”，就是对干部由“任免制”改为“聘用制”，对工人由“录用制”改为“合同制”，对工资制度由“基本工资 ”改为“浮动工资 ”。堰桥乡乡镇工业“一包三改”，切中时弊，成效显著。这一经验，对全省乡镇企业有普遍推广的意义。

二是在“小而专”、“小而精”的问题上还要多做文章。多年的实践证明，乡镇企业的活力所在，是“小而专”、“小而精”，以小补大，以小搞活，以专补缺，以专配套，以精取胜，以精发展。如果搞“小而全”、“小而粗”，就站不住脚，最后关门大吉。有些县的一些乡镇企

业，曾经搞过“小而全”，模仿国营大企业的那套办法生产最终产品，但因资金、原材料、燃料不足，技术装备落后，产品质量不高，导致产品滞销，“赔了本钱又搭工”。

武进县是乡镇工业走“小而专”道路较好的一个县。这些企业生产钟 表零配件、自行车接头、金属鞋眼、卡介苗注射器、自动结经机、电视机和收音机零配件、钢窗、玻璃钢制品以及一系列日用小商品。这样，产品成了“不可缺少的配角”或最佳配角”，企业本身也就成了城市工业和市场所不可缺少的“伙伴”。这个县青龙乡灯具配件生产的荧光灯启辉器铝壳的年产量，已占轻工业部下达全国启辉器定点生产任务的 80%以上；芦家巷风动水泵厂 1983 年生产的风动水泵，已占全国煤炭系统当年需要量的 80%。这是他们走“小而专”、“小而精”的道路结出的丰硕成果。

三是在设备更新、技术改造方面大有文章可做。这项工作如果不很快摆上议事日程，没有远虑，必有近忧。做这件事，有必要，也有可能。但各地区、各单位的具体情况不一样，要视资金和技术力量等客观条件，有的采用渐进的方式，逐步、逐级地更新；有的采取跳跃的方式，用先进的技术或装备较快地武装起来。我们高兴地看到，现在已有若干乡镇企业认识到了这一点，而且开始行动起来了。江宁县碌口乡的裘皮厂，为了提高脱脂、烘干质量，保证出口皮件的高质量，已从意大利进口脱脂和烘干机各一台。这样，该厂的关键技术就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产品质量也有了明显的提高。

（载《新华日报》1984 年 6 月 28 日）

乡村工业中的实践·政策·理论

乡村工业——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样提问题是否人为地拔高了乡村工业？实践证明至少有三点可以肯定：第一、它对开发农村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发挥了极大的作用；第二、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城乡体系打开了道路；第三、它的方向符合新的革命带来的小型化、分散化的要求。它必然涉及到三个基本战略：一是农业现代化战略；二是人口分散化战略；三是城市现代化战略。以人口战略为例：到2000年我国人口还要增加两亿。费孝通先生认为，人口这盘棋需要两个"眼"才能活：一是向西北地区移民，再就是发展小城镇工业。

理论不仅要阐明实践，而且要指导实践。而政策更接近实践，并先于理论的形成。联产承包责任制是这样，乡村工业的情况也不例外。正确的政策从来是破除框框，促进改革的工具。而有关乡村工业的理论，也到了可以作一定阐述的时侯了。

乡村工业发展的几条规律。农副工三业要正向发展，这是其一。江苏最初是讲"十字经"，即：农林牧副渔，工商建运服；后来提出，要建立以城市为中心、小城镇为纽带、农村为基础的经济网络，也就包含了综合经营的农村经济新模式。现在乡村工业的发展最快的四个县(无锡、常熟、江阴、武进)，都做到了这一点。

苏南的乡村工业，受到了大中城市(上海经济区)的双重辐射，即同时受到苏州等一系列中等城市的辐射，这是苏南的特点。

从实际出发，扬长避短，就是要考虑条件。"短"则有的能避——如"小而全"；有的不能避——如能源，而必须"补"。

启用能人，特别要建立高质量的供销队伍。乡村工业为什么发展快？原因之一是当家人说了算。据统计，江苏乡村工业中三分之一的厂长是供销员出身。

敢攀"高亲"——高等院校和科研单位、国防工业部门，这也是乡村工业崛起的一条原因。

一点忧虑。乡村工业正面临三方面的挑战：一、家庭工业的兴起；二、"松绑"后的城市工业；三、市场变化、产供销渠道和经济活动方式的变化。为了应付这种挑战，乡村工业必须：一、加强经济杠杆的运用——实行承包制；二、注意设备更新、技术进步；三、自己的产供销渠道和活动方式要作相应改变。当然，政策和体制方面的问题也需要解决。

（此系在《财贸经济》杂志举行的座谈会上的发言要点，载《经济学周报》1984年8月13日）

欧桥村的一九八四年

《新华日报》编者按：农村改革取得了巨大成就，广大干部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得到充分发挥，迎来了我省农村经济发展的黄金时代。全省涌现了一批工农业总产值超一亿元的乡、超一千万元的村，它们是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明星。

我们就以“乡村明星”为名，辟一专栏，赞颂这一批农业战线的开路先锋，介绍他们成长的历程，传播他们成功的经验，使全省有更多的乡和村加入明星的行列，使我省农村经济更加繁荣昌盛。

沙洲县欧桥村在1983年已站在全省首批八个“千万富翁”的前列。1984年怎么样呢？他们在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形势下，采取了什么新对策呢？带着这样的问题，十月初我们两次住欧桥作了一点调查。这虽然是我们第四次访问这个村子了，但所见所闻仍然令人耳目一新。村党支部书记张永来留有余地地告诉我们，全年工业产值可望拿到1400万元，农、副、工三业总产值将达到1700万元，这比1983年增长了30%左右。这样高的增长速度，这么好的发展势头，究竟是怎样开拓出来的呢？

经营上采取四条新对策：

一是花色翻新由慢转快。这是欧桥村办工业今年经营上的主要特点之一。欧桥的工业门类，主要是针织、毛呢和服装等轻工业。在市场变化越来越快的今年，为了赢得生产上的主动权，欧桥向上海等地派出了常驻信息员，到各百货公司、服装商店搜集市场行

情，探测变化趋势，反复筛选信息，及时反馈回厂，迅速组织生产。仅纬编厂今年头九个月，就设计出五十多个新花色生产品投放市场。

二是产品批量由大转小。以小取胜，这是欧桥今年经营上的又一新策略。他们适应“品种要多、批量要小”的发展趋势，逐步改变过去大批量生产为每台机单独作战的生产方式。尽管批量小会使劳动效率明显降低，成本升高，但欧桥总是尽一切努力使客商乘兴而来，满意而归。前不久，新疆一个供销员携带一块三色涤纶提花布，跑了苏、锡、常和上海好几家大厂请求按样生产，皆因工艺比较复杂，所需批量又仅五百米，生意没有谈成。失望之余，他抱着试试看的心情，来到欧桥村，一谈即成，纬编厂为他加班加点，从设计到织成，前后只用了一个多星期。

三是产品价格由平转廉。欧桥村办厂的原辅材料，基本上都是市场议价购进来的。购进的涤纶长丝，每吨要比国家牌价高出2000多元，仅此一项，成本就要高出国营企业20%左右。欧桥用电的三分之二是自发电，自发电用的是议价煤、油，每度电成本高达四角五分。产品按平价出售，利润率已经不高。面对这些情况，他们进一步把“高进低出、薄利多销”作为竞争手段，投放市场的商品比通常价格更低。通过多销快销，加快了资金周转，聚沙成塔，变薄利为多利，使不利条件转化为有利因素。

四是销售市场由近转远。一段时间以来，欧桥的工业产品除了北京、天津几个不多的销售点，主要是在上海和省内经销。特点是运输费少，资金周转快。今年，他们开始实行“立足上海，面向全国”，积极疏通各种渠道，跻进西北、东北和西南等边远地区市场，建立了一批固定的协作关系。

企业管理抓三着：

第一着，改厂统一核算为各厂单独核算。欧桥的七个厂是鸡生蛋、蛋孵鸡发展起来的。新厂往往先是老厂的一个车间，这个厂的

产品转过身又成为那个厂的原料。过去采用的总厂统一核算的方式，厂与厂之间经济利益打通帐，不利于改善经营。今年他们取消了总厂统一核算，各厂实行独立核算、自主经营，从而使扯皮大大减少，经济效益不断提高。

第二着，改企业干部由村任免为职工选聘。经过商品生产海洋大风大浪的锻炼，欧桥更加懂得：挑选能人当家，是办好乡村企业的关键。今年一开春，他们对五个厂主要企业的领导班子进行了调整，厂长改由职工选聘。新选厂长，或是经过具有一定的技术专长，或是经过供销舞台的磨炼。从年龄结构来看，十四名正副厂长，平均年龄三十三岁。从文化结构来看，除了农机厂长，全是初、高中毕业生，富有生气。

第三着，大力推行集体承包，鼓励多劳多得。今年欧桥改变了由村向企业下达生产、经营计划的办法，实行由厂长代表全厂职工出面，村的农工商总公司承包，超过规定基数的税后利润，实行三七分成；留给企业的百分之七十，按照企业发展需要和职工贡献大小合理分配。这一做法，大大调动了企业和职工的积极性。

紧跟市场变化又建两个新厂：今年夏天，欧桥村分析了市场变化趋势后预测，随着西装的逐步流行，价廉物美的仿毛西装将会大受欢迎，因而仿毛面料也会成为热门。他们迅速作出决断，利用一个生产队库房，投资不到 10 万元，仅用一个月时间，建立一个生产中长仿毛面料的化纤编织厂。经过服装厂加工成西装，首批销往上海 2000 套，在上海凤翔、利民、天马等几家服装商店代销，不到三天一销而光。上海针织服装百货站随即赶来，三季度订货 27000 套，产值 90 余万元。服装厂本身吃不了，还外发了一部分给邻近的乘航乡的几个服装厂。

八月份着手筹建的拉毛围巾厂，十一月建成。设备是购买妙桥乡闲置的布机重新改装。厂房是几间旧公房略加修建。职工经过考试从外村招聘。技术力量，已经派到上海加紧培养。产品销售，

上海针织百货批发站的同志明确表示愿意协助。这个厂投产后，1985年的村办工业，又可出现一支新军，可增产值约300万元。

一个村子的工业，从产供销到管理，已经井井有条、越来越精明了，农民走上了市场经济的大舞台了。

（载《新华日报》1984年11月29日）

城乡协作产生新生产力

1984年，江苏省乡镇企业实现工业产值226亿元，比上年增长39.5%；上交国家税金14亿元，获得纯利近12亿元，比上年有所提高。

江苏省乡镇企业发展较快，效益较好的原因何在？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城乡协作有了新发展，多层次、多领域的城乡协作，产生了新的生产力。

在乡村工业刚刚兴起的时候，也有城乡协作关系。当时，城乡协作大多是通过“关系户”的狭窄渠 道，以鲜为人知的隐蔽方式进行的。1984年江苏实行了市管县的新体制，城乡协作关系在内容和形式上都发生了新的变化。

首先，城乡的协作和联合形成了多层次、多方位的发展格局。从地区之间的联系来看，有省辖市同所管各县的联合；有乡镇企业同市区工业企业的联合；有省内各县同上海经济区、特别同上海市的联合；还有市县同全国各地的联合。在许多乡镇工业企业中，还发展了同科学研究单位、大专院校的联合，同军工生产单位、原材料或能源基地的联合。在苏州市，1984年乡镇企业发展的各个层次的联合项目就有400多个，比1983年增加了两倍。在江宁县，1984年乡镇企业从各类高等学校引进的新技术和新产品就有58项。全省有35个县的乡镇企业与27个部、省、市属企业建立了协作关系，开办了联营项目。

其次，城乡协作的产业领域越来越广阔。乡镇企业的经营范围已经从工业领域发展到商业、金融业、旅游业、服务业、运输业等广阔的领域，开展了技术、设备、资金、原材料、生产、销售等多环节的

联合。这种多领域、多环节的联合，聚合了城乡双方的优势，发挥了各自的潜力，办成了单方面很难办成的许多事情。沙洲县1984年有486个乡镇企业实行了这种多领域、多环节的城乡联合，实现产值约9亿元，占乡镇企业总产值的60%左右。

（载《经济学周报》1985年7月7日）

江苏农村的四十颗“明星”

1984年的江苏农村，颇有几件令人注目的事情。40个“千万元村”出现在大江南北，就是其中的一件。一个村子的工农业总产值达到千万元以上，是不容易的。江苏省1983年有千万元村11个，1984年发展到40个，而且过了长江、过了淮河，在苏北也有3个。

小康水平，各有千秋

与千千万万个其他村子相比，这些先进村有着自己鲜明的特色，主要是四点：

1. 经济结构有了根本改变。40个村农副工三业的总产值中，工业产值是绝对的大头，平均已占89.8%；最高的沙洲县城西村，工业产值已占98.5%。

2. 发展速度创造了历史最高记录。1984年与1980年相比，这些村的总产值平均增长238%；与1983年相比，平均增长了62%。增长速度之高，令人惊异，而且后劲尚足，大有潜力。

3. 群众收入和生活水平达到了小康程度。这些村的人均纯收入，平均为890元(许多村还不包括社员自营收入部分)，其中1/3的村，人均纯收入在1,000元以上。人均上缴国家税收369元，最高的沙洲县包基村人均上缴国家税收1,500元。

4. 为今后进一步发展经济积蓄了一定的后劲。这些村一般都有200—300万元的集体固定资产，有6个村的集体固定资产在500万元以上。经过多年的磨炼和调整，老厂带新厂，母厂办子厂，

主导工厂和拳头产品已经初步形成，“翅膀”开始硬了，信誉建立起来了，可望起飞得更好一些了。

双层经营，村户共富

农业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巨大威力，使这些村的当家人深受启发，纷纷把它运用到办厂、办工业方面来，实行村办和户营的双层经营，使集体经济发展了，家家户户也富了，做到了全村富上加富。

铜山县青山泉村利用本村的煤炭资源，贯彻“有水快流”的方针，放开手脚，村、组、联户一起上。他们首先抓好村办小煤矿，形成年产5万吨的生产能力；同时从资金、设备、技术上支持村民小组和联户办矿，也生产了近5万吨煤。这种多层次的开发和经营，使煤炭产值达到500多万元，从而形成一定实力去开发其他工业项目，建起了水泥、砖瓦、采石等7个厂子，兴办了运输站、综合商店、饭店和40个商业网点。第三产业的收入，一年即达200多万元。1984年该村工农业总产达到1,100多万元，比1983年翻了一番。农民得到很大实惠，人均收入达到1,000元。现在这个村的集体经济有了实力，集体福利办了十件，10%的农户成了“万元户”。

“飞乐”牌铜质电熨斗是海门县中兴村的主要产品之一，行销京、沪、津、穗等大城市和一些东南亚国家。这个村在设备、技术水平不断提高的前提下，把电熨斗的大部分零件分散到各家各户加工，办法是“材料由厂统一供应，技术由厂统一指导，质量由厂统一把关，成品由厂统一组装，零件由户专业加工”。这种生产形式，既保证了产品质量，又调动了各户的积极性，全村一半以上的农户投资8万多元购置了车床、冲床、抛光机等近百台设备，组成了40多个联合体，形成了生产电熨斗的流水线，全村成为“没有围墙”的大工厂。农民机动灵活地安排劳动时间，农副工三业结合得更紧密了，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结合得更紧密了，劳动时的思想、精力更

集中了，产品零部件的质量更有保证了。归结到一点，致富速度加快了，去年人均纯收入达到1,150元，是这些先进村中最高的一个。

城里有的，我们也有

今日的村办工业，特别这些两个文明一起抓的村，已不再是“因陋就简破厂房，凑凑合合旧车床，叮叮当当老铁匠”的过时形象。江阴县华西村拥有技术员20余人，一年花在智力开发上的投资4万多元。工农业总产值已经达到2,800万元的江阴县三房巷村，有一个由1名助理工程师、6名七级技工组成的技术顾问组。无锡县前洲村常年聘请2位高级工程师主持村办工业的技术工作，还聘请了中央部属厂的9名工程师，再配备本村的9名技术人员，组成了产品质量保证体系。在那里，对技术人员做到了八个字：敢用，关心，放手，优待。因而，这些知识分子爱企业如家，爱产品如子，把一片心血都用在提高产品的竞争能力上。

注重产品质量，保证企业信誉，是现代企业家的品格。我们从这些先进村的若干代表人物身上，已经可以看到这种品格。海门县中兴村生产的铜质电熨斗，虽然处在畅销的“吃香”状态，但支部书记董仁亲在1984年秋季广交会上看到包装装潢不如日本产品，胶木柄光洁度不如上海产品以后，当天就打电话通知本村停止生产，并日夜赶回厂里研究改进，直到这两个问题都得到解决，自己的产品堪与国内外同类产品媲美以后，才允许产品再次出厂。村办工业没有“铁饭碗”可捧，没有“大锅饭”可吃，因而这种对产品质量精益求精、一丝不苟的企业家品格，确实难能可贵，而且必不可少。

在这些先进村，农民的物质生活条件不比城里人差，文化生活享受不比城里人少，已经有着比阳光和绿叶更多的吸引力，不仅吸住了农村青年安居乐业，而且吸引着一些技术人员愿意到那里去，

原因在哪里?著名的沙洲县欧桥村支部书记、全国人大代表张永来说得好,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和政策,使他们创了社会主义的业,冒了社会主义的尖。1984 年人均分配达到 1,010 元;家家户户住进了新楼房,人均住房面积 23 平方米;老有所养,幼有所教,孩子上学包到高中毕业;每年人均听评弹、看电影、看戏、看球一百多场次,每逢大剧团到村的影剧院演出,台前摆满了农民的收录机。张永来说,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方面,城里有的,我们乡下也有了。

(载《乡镇经济手册》1985 年第三辑)

多层次、多领域的城乡联合

——江苏乡镇企业新势头之一

1984年这个时候，我们在这里向读者介绍过江苏乡镇企业兴起的主客观条件及若干情况。1984年它们发展得怎么样呢？据统计，江苏省乡镇企业的产值达到226亿元，占全省工业产值的三分之一；上交国家税金14亿元，比上年增长23%，占全省财政收放的18.6%。有200多万农村劳动力转向乡镇企业和其他非耕地经营。

在乡镇企业发展中，首先值得提到的，是城乡协作、城乡联结的势头。乡镇企业在其中起了“粘结剂”的作用。

苏州市委政策研究室主任邬大千对我们说：苏州市城乡联合的好形势，是伴随着乡镇企业的发展而发展的。但在乡镇工业刚刚兴起的时候，在“左”的思想影响下，城乡经济的种种联合，大多是通过“关系户”这狭窄的渠 道，以隐蔽的方式进行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特别是1983年全省实行市管县新体制以后，城乡联合发生了转折性的新变化。

新变化的特点之一，是城乡联合形成了多层次的发展格局。在苏州市，有各县同乡、村的联合，有各县同上海经济区的联合，有市县同全国各地的联合，有工业企业同科研机构、大专院校的联合，有军工生产单位同乡镇企业的联合。这个市1984年的多层次联合项目有400多个，比1983年增加了两倍。

新变化的特点之二，是城乡协作的领域越来越广阔了，已经从工业领域发展到商业、服务业、旅游业、养殖业、运输业、金融业等等，聚合了城乡双方的优势和潜力，办成了许多过去难以办到的事

情。无锡县开展城乡联合的形式有6大类、20多种，在这方面积累了相当多的经验，成效也颇为显著。1984年，这个县工农业总产值已达30亿元，乡镇工业产值已达20亿元。

新变化的特点之三，是城乡联合从内容到形式都渐趋完备，正在从过去个别企业、个别项目的单线协作，逐步向着以产品为中心的既分工、又协作的企业群体过渡。苏州电扇厂生产的长城牌电扇是部优产品，但过去局限在市区，品种不能翻新，产量上不去，市场影响趋弱。1984年，他们联合9个乡镇建起长城电扇公司，并与50个乡镇企业结成企业群体，实行专业化分工，80%的零部件扩散下乡。这样一来，产量由1983年的20万台，提高到1984年的38万台，今年可望再翻1番，而且提高了质量，增加了品种，也提高了在市场的声誉。

城乡协作、城乡联合是一种经济联合，不能依靠行政命令。因此，城乡双方要本着平等互惠的原则，经济上要“联”，思想上先要“合”。经济联合搞得好的企业的体会是：小厂要克服“得过且过”的思想，摆脱“小而全”的现状；困难厂不能抱着“大树底下好乘凉”的思想，企图到联合体内去吃“大锅饭”；大厂不要担心“砸了名牌”、“肥水外流”、“失去优势”。城乡联合的实质是经济改革，通过提高质量、加强管理产生“合力”和“活力”，使双方都得到好处。

（载《经济参考》报1985年3月28日）

以最快的手段获得市场信息

——江苏乡镇企业新势头之二

高度重视和善于利用经济信息，是商品经济的必然要求，也是乡镇企业增强竞争能力的必要条件。我们去年到沙洲县调查，县里的同志向我们介绍说："我们这里许多乡办服装厂的厂长和其他干部，打开电视机爱看的节目，是音乐大奖赛，评电影最佳演员发奖大会之类，看的不是热闹，听的不是音乐，眼睛盯着演员们穿的什么服装，揣摩着服装的款式和变化趋势。"

如果说，初期的乡镇工业主要靠乡土关系、人际关系来确定生产方向；那末，现在的乡镇工业，主要是靠及时获取市场信息来指导生产了。无锡县堰桥乡在上海、北京等七、八个大城市建立了信息点，乡工业公司设立了信息科，从乡到村有几十个专职信息员，形成了沟通全国的信息网络。他们还聘请了一些教授、专家当顾问。"与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他们认为与这些学者交朋友，清茶淡饭，谈笑风生，却能打开思路，获得意想不到的国内外最新信息。他们这样做，确实大有收获。例如毛线厂从有关方面获得一条信息：羊绒衫在服装市场上正崭露头角，必将风靡一时。乡里就决定扩建一个编织羊绒衫的新车间。土建刚刚进行，设备运到待装时，订户就纷至沓来。这个车间1984年建成投产，1985年产值可望达到1,000万元。

沙洲县欧桥村的村办工业主要是针织、毛料和服装等门类。他们为了赢得生产上的主动权，向上海、新疆等派出了常驻信息员。信息员不停地在各百货公司、服装商店观察。收集市场行情，探测变化趋势，反复筛选信息，及时反馈回厂。工厂根据这些信息做出

决策。1984年他们采取的一条主要新对策，就是实行“品种要多，批量要少”，改大批生产为每台机单独作战的生产方式。尽管批量小会使劳动效率明显降低，成本也有升高，但他们总是尽一切努力让客商乘兴而来，满意而归。新疆一个供销员携带一块进口的三色涤沦，跑了苏州、无锡、上海几家大厂，要求按样生产，皆因工艺比较复杂，所需批量仅有500米，生意没有谈成。失望之余，他抱着试试看的心情来到欧桥村，一谈即成，纬编厂为他加班加点，从设计到编织成，前后只用了一个多星期。欧桥村1984年的工业产值已达到1,450万元，人均纯收入为1,010元。

马克思说过：“每个人总是力求了解普遍的供求情况。而这种了解又对供求产生实际影响”。他还说，通过信息，“可以获知其他一切人的活动情况并力求使本身的活动与之相适应。”《马恩全集》第46卷上册107页）江苏的许多乡镇企业从实践中体会到：信息就是资源，信息就是活力，信息就是财富。

（载《经济参考》报1985年3月29日）

精益求精　狠抓质量

——江苏乡镇企业新势头之三

我们过去介绍过，乡镇工业的真正生命力所在，是靠产品争气，并努力向名牌产品靠拢。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在经济领域也是这样，厂不在大小，有名牌则胜。

但是在有些人的印象里，总是把乡镇企业同“小”、“土”、“陋”联系在一起的。要破除这种并非“高龄”的传统观念，不单是靠宣传和广告，而主要靠乡镇工业自己拿出硬货色来。江苏乡镇工业1984年在这方面有不少新的起色。飞乐牌铜质电熨斗是海门县中兴村的重要产品之一。从1982年起，这种产品已经拥有众多的用户，不仅畅销上海、北京、天津、广州等大城市，而且远销东南亚几个国家。然而，他们并不因此而感到乐观。相反却从热销中看到了问题，从兴旺中预见到衰落 。他们摒弃“产品吃香不愁销”的观念，坚持高标准，研制新产品。1984年上半年，他们下决心停止了老型号电熨斗的生产，根据市场信息和消费趋向，全面更新换代，从造型设计、用料配方到装潢包装的各道环节，重新进行了工艺改革，制造出了造型独特、美观灵巧的三种新规格系列产品。但是尽管如此，他们仍不满足。在1984年的秋季广交会上，当村支部书记董仁亲看到他们的产品在装潢和包装上落后于日本同类产品，胶木的光洁度不如上海同类产品以后，当天就打电话回村通知停止生产，并日夜兼程赶回厂里研究改进的办法。在较短时间内，提高了胶木柄的光洁度，重新设计了包装盒，使产品又添新颜，才让产品投入市场。现在这种产品已赢得了更好的声誉，在上海市场上成为畅销货。

无锡县前洲村是工业总产值已达到1,200万元的先进村。他们的切身体会是“讲究信用，保证质量，交货及时，服务周到”。他们的拳头产品是印染设备，已行销全国29个省、市、区的428个单位。这个厂的产品为什么能行销全国？因为他们从大厂聘请了9名工程师，再配备上本厂的9名技术人员，组成一个质量保证体系，全面负责质量工作。

我们的乡镇企业如果都有象董仁亲那样抓质量的厂长，又建立起象前洲村那样的由技术人员组成的质量保证体系，狠劲加科学，那末，乡镇企业的产品质量就会一年一个样，名牌越来越多。

（载《经济参考》报1985年4月1日）

大力兴办第三产业

——江苏乡镇企业的新势头之四

在发展第三产业方面，江苏省许多县、乡、村干部里在过去的一年里，都有了新的认识和新的探索。他们认为，对于第三产业的地位和效益，不仅应从它能为生活、消费提供服务和转 移多余劳动力去接受，还应当从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战略高度去理解。

无锡市郊区各乡在兴办第三产业时，首先把因地制宜、发挥优势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依山临湖的乡村，用山、水、景的优势，发展以旅游、疗养、游乐为重点的第三产业。靠近城郊的乡村，利用交通要道的优势，主要发展商业、服务业、贸易中心或货栈。靠近车站、码头的乡村，针对流动人口多的特点，发展以饮食、旅馆为主的第三产业。经济实力较强，第三产业已有一定基础的乡村，适当发展中、高档服务设施。经济实力较弱的乡村，先发展小型、低档的服务项目，以后随着资金积累的增加，再逐步发展中档以上的项目。

由于指导思想明确，发展步骤得当，这些乡村兴办的第三产业很有自己的特色。一是向门类多、配套齐的方向发展。无锡市郊区各乡共办了 404 个网点，其中商业 212 个，饮食业 101 个，旅馆业 42 个，浴池、理发、照相等服务业 49 家。旅馆一般都设有餐厅、浴池、停车场、小卖部、会议室和汽车队，做到吃、住、行、买、办事配套成龙。二是向高、中、低档相结合的方向发展。一般先办低档，然后向中、高档发展。现在一批档次较高的宾馆和商场正在兴建。三是逐步形成了农民经商小区。这不仅为农村开辟了新财源，而且促进了信息、技术、人才向农村流动。

无锡市郊 10 个乡大办第三产业的结果，是一年实现了网点、

营业额利润三个翻一番。网点从上年的203个发展到404个，营业额从上年的1,200万元增加到3,300万元，利润从上年的88万元增加到215万元。

（载《经济参考》报1985年4月16日）

领导部门跟着基层转

——江苏乡镇企业新势头之五

近两年，常有人用“中梗阻”“顶门杠”来形容一些没有很好为基层服务的领导部门。但在江苏省的沙洲、海安、无锡、太仓等县，许多乡镇企业的人都不约而同地称赞县里的部门，说“我们这里中间少梗阻”，“我们这里部门跟着基层转，而不是下面围着部门转”。

沙洲县委对县级机关干部进行教育说：“社会主义姓‘富’，不是姓‘穷’，搞社会主义就是国强民富。经济翻番是大局，部门要为大局服务；乡镇企业在农村经济翻番中在挑大梁，部门就要千方百计为乡镇服务。”有了这样的思想基础，在许多闲言碎语和风风雨雨面前，沙洲县级机关为乡镇企业服务的思想没有动摇过。如组织人事部门急乡镇企业需要人才之急，突破老框框，收到商调函件，只要专业对口，有的当天就发回函；档案材料寄来了，快的一周内就办好调动手续。就是象县政协那样的机关，也是主动为乡镇企业多做好事，发挥他们与外界联系较广、接触工商和技术人员多的特点，积极为乡镇企业提供咨询服务和其他支持。

海安县的各个部门，把为农民提供技术、信息服务，放在业务工作第一位。县科协着重抓区乡科协和各种群众性技术协会的建设。县多种经营局建立了全县多种经营技术推广中心，把普及科学技术、传递经济信息作为工作重点。这个县隆政乡成立了一个蛋鸡研究会，农民每买一鸡，只要缴纳一分钱“会员费”，就可以得到研究会提供的种鸡、饲料、技术信息等方面的优惠。1984 年，这个乡的家禽存栏量从上年的 7.5 万只增加到 23.5 万只，禽蛋产量达到 165 万斤，畜牧业的收入相当于粮棉收入。

县级机关的同志认为：跟着基层转，就是跟着经济翻番转，就是为四化作贡献，这是领导机关为人民服务的天经地义。

（载《经济参考》报 1985 年 4 月 18 日）

军民协作多，经济效益高

——江苏乡镇企业新势头之六

军用科学技术是当代科学技术宝库中的瑰宝之一。军工技术向民用转移是加快四化建设的一项战略措施，是一项不花外汇的技术引进。在江苏，军工单位多，乡镇工业多，因此军民协作也多，并且收到了较高的经济效益。

据有关部门对24个军工单位的统计，1984年签订“军转民”合同2,796项，到年底完成2,434项，净收益3,041万元。有一个军工厂将分离技术移殖于民用，已在食品、化工、机械、制药等11个行业的700多家企业中采用，取得了显著的效益。

经济领域内的军民协作、军工协作，在江苏主要有三种形式：一是利用军工单位的技术优势，组织科研攻关，为企业技术改造、提高水平服务。二是以军工单位的民用名优产品为龙头，组织生产联合体，扩大生产能力，适应市场需求。三是军事军院校、军工大厂为乡镇企业培训技术人员，帮助地方开发智力。华东工学院在苏北的盐城市建立了大专班，开设了机械、电子、管理、微机等4个专业。南京航空学院1984年为地方各种进修班、训练班近百期，培训各种生产技术人员近2万人次。

人们从实践中体会到，军工转民用，就是开放和搞活的重要内容，对此没有紧迫感是搞不开的。

（载《经济参考》报1985年6月10日）

论“离土不离乡”

“离土不离乡”，是苏南地区群众和干部对农村多余劳动力从大田作业向非耕地经营转移的形象概括。到1984年，江苏农村离土不离乡和离乡不背井的劳动力，约有900万人，占劳动力总数的30%左右，占多余劳动力总数的50%以上。这对于解决农村多余劳动力的转移问题，在理论和实践上是具有重要意义的突破。

(一)

离土不离乡，就是农业劳动力长期地或间断地离开土地，脱离耕作劳动，聚居在小城镇或小城镇周围的村庄上，从事工业、商业、建筑业、运输业、服务业等工作，而户口关系、口粮关系、家庭仍然留在农村的一种劳动力的转移方式。离乡不背井，是指农民外出到城市里从事各种劳动，与离土不离乡属同一范畴，因此可以统称为离土不离乡。

离土不离乡，从江苏现有情况来分析，主要是指如下几种人员：(1)属于农业人口的乡镇企业职工；(2)到城市全民或集体企业事业单位劳动的农民工；(3)进城的建筑工人和其他劳动者；(4)长途运输经营者；(5)到集镇上从事商业、饮食业、服务业等合法经营的农民；(6)家庭工业劳动者；等等。因此，离土不离乡，是一种范围广泛、形式灵活、社会需要的新型劳动形式。七十年代中期以后，农民离土不离乡在江苏、尤其是在苏南得到了空前迅速的发展。其发展有几个特点：

一是速度迅猛。全省在七十年代中期，务工农民占农村劳动力

总数的比重不过10%左右，经过不到十年的时间，到八十年代初期就上升到15%左右，苏南地区上升到40%左右，靠近城市或镇周围的乡高出40%至50%。

二是人数众多。全省离土不离乡的已达700万人以上，离乡不背井的也在100万人以上。

苏南四市的农村，已有三分之一以上的劳力从农业劳动转入工业劳动。

三是综合经营。据初步匡算，苏州市1983年的250万劳动力中，从事农业的120万人，副业（种、养业）20万人，工业78万人，商业（包括服务业）6万人，建筑业18万人，运输（销）业6万人，也就是说有48%的劳动力脱离农业劳动从事工副业劳动。由于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是从事综合经营，农村已从单一的粮食经营转向多种经营，从传统的小农经济转向大规模的商品经济。这种农村劳动力结构的变化，是一个历史性变化。

在江苏全省，农村劳动力的分布，现在大体上已形成了三个层次的结构：第一层次，在农村从事种植业和林牧副渔业，这是没有离土或基本没有离土的，大约有70%左右。第二层次，在小城镇从事工业、商业、建筑、运输、服务各业，大约有25%左右。第三层次，到大中城市从事建筑和商业服务业，目前大约有5%左右。这种多层次、多行业的结构，一方面说明传统的“农村搞农业，城市搞工业”的状况正在改变，在农村劳动力中已经“分化”出一部分人从事非耕地经营；另一方面又说明目前农业生产力水平还比较低，大部分劳动力还在田里搞饭吃，还有相当多的剩余劳动力需要向更广的领域去开发。因此，还要引导和促进这种结构内部三个层次的变化，使第一层次的比重逐步缩小，使第二、第三层次的比重逐步扩大。

（二）

农民离土不离乡这一现象之所以能在江苏南部各市产生和得到蓬勃发展，有其客观必然性，是和江苏的历史传统、经济特点及其条件联系在一起的。

1. 苏南地区开发较早，物产丰饶，经济发达，从来都是全国人口最稠密的地区之一。解放以后，由于人多地少，全省人均耕地 1.35 亩，农业劳动力人均 3 亩，而苏南的很多县人均不足一亩，农业劳力人均不足两亩。以每一劳力平均耕作四亩的低水平测算，在苏南的苏州、无锡、常州、南通四市所属广大农村，七十年代初约有三分之一的剩余劳动力；到了八十年代初，剩余劳力普遍达到一半以上。人多地少的矛盾虽然一直存在，但在实行农业生产责任制以前，这种矛盾被“大锅饭”的体制、集体劳动的形式掩盖了，有的地方只好用“一家喊一个出工”或“只安排男劳力出工”等办法来缓和矛盾。这样大家捆在一起搞饭吃，只能共同贫困。实行农业生产责任制后，剩余劳动力的问题更突出了，劳动剩余时间也更多了，他们都要找出路，摆脱困境，于是，劳动力离开种植业向其它各业的转移就蓬勃发展起来了。

2. 苏南地区的农业经济从来就有农业、副业、手工业结合的传统，他们一向在经营农业的同时经营家庭手工业和其它家庭副业。十年动乱，家庭副业被视为“复辟资本主义的基础”，被全面砍光，农业多种经营受到严重的破坏，只剩下单一的粮食生产。过多的劳动力只能在有限的土地上进行强化开发，产量虽然有所增加，成本却急剧上升，工分值不断下降，社员收入上不去。据苏南四市十多个县统计，1970 年前后数年内，社员年终分配一直在人均 100—150 元之间浮动，农村经济陷于徘徊不前的境地。七十年代中期以后，江苏农村逐渐走上了“农林牧副渔、工商建运服”综合经营的道路，这使农村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大批的剩余劳动力找到了出路。特别是中央确定了鼓励农民搞多种经营的政策，允许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劳动力、资金、技术的自由组合，不受地区行业的限制，

这个政策极大地促进了农村劳动力的转移。

3. 农民离开土地，向其它劳动部门转移，可以有两种转法：一种是盲目涌向大中城市，另一种是分级截流在小城镇或集镇周围。前一条道路在五十年代曾经走过，大批农民进入城市，变为工人和其他产业的从业人员，加之此后人口增长的失控，使得大中城市人口膨胀，带来了生活和建设方面的一系列问题。七十年代中期以后，社队工业异军突起，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蓬勃发展起来。由于社队工业有机构成低，其发展速度和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进度，快得惊人。1978 年以来，全省社队工业产值年递增率为百分之 23%。无锡市所辖三县的社队工业产值和利润，分别以年均百分之 27% 和 7%的速率递增。近几年在一些乡镇工业中，还实行了零部件委托家庭加工的办法，在一些家庭内设立了拥有一台到两台车床的小车间。它生动地表明，乡镇工业依托于城市工业，联系着千家万户。乡镇工业使农民既离开土地，又留在乡村，亦工亦农，农工结合，农工相辅。

(三)

农民离土不离乡，是我国农村一次新的“分化”，是社会分工进入了新的阶段，是实现中国农村现代化的一条重要道路，也是我国农民实现共同富裕的一条重要途径。它对于城市、小城镇和乡村的发展，对于加快四个现代化的进程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首先从农村来看，离土不离乡的好处至少有如下几条：(1)它使人多地少的矛盾得以缓和。(2)它促进了农村专业化的发展。(3)农业劳动力离土不离乡，其中很多人闲时务工，忙时务农，或白天务工，早晚务农，或每年有一两个月的时间务农，这对农村的农副业生产和社员家庭生活都是有利的。(4)农业劳动力离土不离乡，不仅使自己逐步转化为“新型的农民”或“新型的工人”，还把城镇的技术、文化和各种信息带回农村，以城镇工人的生活方式影响

农村，这对改变农村的传统面貌，改变农村技术和文化落后的状况，也将发生深远的影响。

其次从城市来看，大量农业劳动力离土不离乡，避免了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大中城市盲目流动，减轻了大中城市的人口压力。以大批农村劳动力从事长途贩运以及进入城镇经商来说，他们把大量的、多品种的、新鲜的农副产品及时地提供给城市人民，搞活了商品流通，活跃了城市市场，满足了城市人民的生活需要，但并没有给城市增加多少负担。

第三，从小城镇来看，乡镇、县属镇、县城等各个层次的小城镇，都起着层层截流、集聚人口的作用，把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容纳进去，使他们能够有业可就，各得其所，各展其长，小城镇也随之繁荣起来。把人口稳定在小城镇，既减轻了大中城市的负担，又促进了乡村建设，改变了农村的经济结构和人口结构。在苏南地区，许多小城镇的实际聚居人口，往往比在册人口要多三分之一。在这些集镇上，有三分之一左右的人口是离土不离乡的农民，他们绝大多数家在农村，上班到厂劳动，下班回家住宿。这样，镇上生活区的建设就可以节省，大大节约了城镇建设的资金和土地。

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离土不离乡，使农、副、工三业正向发展，这对于提高农民收入，积累农村建设资金，也起到了很大作用。1984 年，江苏乡镇工业向国家缴税金 14.2 亿元，占全省财政收入的六分之一。在 1978 年到 1983 年六年间，乡镇工业利润用于购买农业机械、进行农田基本建设的共 8.1 亿元，相当于同期国家对全省农林、水利 、气象的投资总额。 乡镇工业的工资和返队利润，增加了农民的收入。据苏州市六个县的材料，农民集体分配数中，来自乡镇工业的占一半以上。

对农民个人来说，在乡镇工业发达的地区，农民家庭的平均收入已经接近、甚至超过了城市职工和干部家庭的经济收入。以常熟市的碧溪乡为例，八千多农户，基本上家家有人做工，有人种田，有

人搞副业，全乡已经实现了共同富裕。在这个乡，一个务农劳动力全年的收入 超过 1000 元，务工劳动力的收入局也大体相等，比县、乡干部的收入要高得多。

在南通市，有不少农民家庭是依靠从事建筑业而致富的。据海门县三阳乡的调查，全乡砌楼房的农户共有 95 户，其中离土不离乡的建筑工人占三分之一；全乡砌高标准平房的有 790 户，其中建筑工人占近四分之一，当年的泥水匠、小木匠，如今很多成了乡间的小"财东"。1983 年，南通全市乡镇建筑工程队上缴给乡镇财政的利润约为 2000 万元，占乡镇财政自筹部分的 44%。这就使乡镇政府有相当的经济实力来发展乡镇企业，补助农业，加速集镇建设，兴办集体福利事业。

资本主义国家实现农业现代化的过程，是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的过程，是经过血与火洗礼的过程。当年农村的破产和农民的赤贫化，驱使他们离乡背井，踏进都市的大门，从土地的奴隶变为资本的奴隶。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是一种工业先进、农业落后的局面，然后再回过头来运用先进的工业装备农业，并采取国家财政补贴等措施来发展农业。这种先牺牲农业、发展工业，再武装农业、发展农业的做法，是使几代农民遭受灾难和流离失所的漫长过程。这种以城乡对立为代价的历史，当然是不足效法的。在我国社会主义条件下，我国要实现农业现代化，不能盲目发展大中城市，更不能以牺牲农民的利益为代价。正确的办法，就是在城市与乡村之间建立起中间地带。这个中间地带，就是以广大农村为腹地、以大中城市为依托、以乡镇工业为主要内容的小城镇。把小城镇建设好，这是中国农村工业化的一个重要内容，它为建设具有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提供了一种新的模式。

我国的基本国情是"十亿人口，八亿农民"。正是基于我国的国情，我们才能够深刻地认识到建设小城镇、加快把农村剩余劳动力转向非耕地经营的战略意义。建设好小城镇，我国的工业现代化才

能有广阔、深厚的基础，我国的农业现代化才能有立足点和坚强的后盾。按照这条路子走下去，我国工业化的结果将是以小城镇为纽带的城乡协作、城乡结合、城乡交融、社会主义的城乡一体化。

对于“离土不离乡”这一社会现象，应该如何认识，过去相当长的一个时期里，并不一致。现行的某些规定和制度也有许多不利于农民“离土不离乡”之处，值得重新研究。在林彪、“四人帮”横行时期，农民离土不离乡从事多种经营，被当作走资本主义道路大批特批，现在虽然没有人再这样做了，但认为离土不离乡是不正之风的看法却依然存在。还有人持“不承认主义”，不承认离土不离乡的“农民工”已经成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因此，有的县一再清退小城镇上的“农民工”，但结果却是越清越多。大家都可以看到，“农民工”成为一支具有特殊性质的劳动大军，涌向小城镇的各行各业，在有些企业甚至行业，人数已占一半以上。农民建筑队伍已经布满全国各大中城市，并且已经走向外国建筑工地。据初步统计，在南京市承包工程的农民建筑工人就有8万多人，加上全民和集体单位使用的农民工，总数约在10万人以上。以农民为主体的农贸市场成为城市市场的一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这样一股“风”，于国于民有利，于现代化建设有利，于当前和长远有利，实在是可长而不可收。

现在尽管务工的农民已经挑起了城镇工业的三分之一的担子，成为工人阶级的新一代的一个组成部分，他们中的很多人已经成为企业的生产、技术和管理骨干，但是他们的社会地位不高，待遇不尽合理。他们与城镇户口的工人不能同工同酬；他们不被全民厂看作是工厂的正式成员，无权参加企业管理；在劳动保护、知识提高、技术培训等方面更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等等。这些不合理的规定和制度，对巩固工农联盟显然极为不利。农民离土不离乡的存在，既然是客观必然的、合理的，就应当受到鼓励和支持，就应当推动农村劳动力的这种合理的转移。在政策和制度上应作调整和

改革，以加速转移的速度。对真正的不正之风，也应当予以堵塞。

（四）

中国农民离土不离乡的趋势如何？我认为，在若干年内，农民离土不离乡作为一种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方式，无疑还会继续有所发展。这主要是因为农村剩余劳动力在一定时期内将与日俱增，大中城市受到多种条件的制约不可能再无限扩展，而小城镇的日益繁荣和大中城市某些方面的需要则为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提供了可能。因此，农民离土不离乡的步伐不会中止。

但是，是否可以这样说：作为社会发展过程来说，农民离土不离乡只是社会主义发展阶段中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一种途径，而不是唯一的途径；是过渡的形式，而不是永久的形式。这是因为，现在离土不离乡的人员中，有的是开发重点建设项目的边远地区的建筑工人，有的是城市里某些全民和集体企业事业单位的临时工、合同工。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的中间一部分人，对自己长期生活和建设的地区，会产生日益深厚的感情，生活也会逐渐习惯起来。只要这些地区和单位确实需要，经济条件较好，国家政策又允许，他们中间就会有一部人愿意定居下来，成为所在地区、单位的新成员。我国很多铁路、矿山和边疆建设就不乏先例。

离土不离乡的人员中，还有一部分是在小城镇上亦工亦农的人员，他们有的主工兼农，有的主农兼工，每天往返于小城镇与乡村之间。随着农业生产力的提高，农业所需要的劳动力将越来越少，耕地将逐步相对集中到少数种田能手或村办农场，因而现在的亦工亦农人员中将有相当一部分人逐步在小城镇上定居下来，成为小城镇上的固定人口。到那时，现在的所谓“离土不离乡”“离乡不背井”的人员，就有一部分离土离乡、离乡背井了。这种趋势将随着某些政策、制度的改变，而得到更快的发展。到那个时候，同现在大批农民离土不离乡一样，离土离乡、离乡背井的发展趋势也是一

种历史的进步，是我国农村工业化、现代化过程的必然结果。到那时侯，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是两种形式，继续有离土不离乡的，这是主要的；也有离土又离乡的，这是一小部分人。随之而来的，必将是工农差别、城乡差别的缩小，社会财富的巨大增长。

通过对现状的考察，将来农村劳动力的去向和分工如何，我们可以这样预测：有 20%左右的劳力搞多种经营，有 20%左右的劳力今后为大中城市、边远地区以及国家重点建设项目吸收，40%左右的劳力在乡镇企业务工或从事第三产业的经营，还有 30%上左右的劳力从事耕地经营。如果能够出现这样一种格局，我国的自然资源和劳务资源将会得到更加充分合理的开发和利用，我国的人口密度将更会得到尽可能合理的调整，恩格斯的“使人口尽可能平均分布于全国”的设想将会变为现实。这是一种希望，真正美好的希望。

（载《江海学刊》1985 年第 2 期）

苏北如何发展乡村工业

在中共江苏省委提出“积极提高苏南，加快发展苏北”的战略设想之后，我们对苏北地区乡村工业的发展情况和问题作了一些调查研究。下面谈一些看法。

(一)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苏北地区的农村经济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突出的表现是，农业生产迅速发展，乡村工业正在崛起，单一经济正在逐步转化为综合经济。

但是，在地域广阔的苏北农村，由于各地的经济基础、自然资源和交通状况、与大中城市的联系、乡村工业水平等方面的不同，而呈现出鲜明的、地域性的差别。宏观地来看整个苏北的农村经济，总的说是“北低南高”，存在着两个不同的经济区域：(1)西北地区。包括徐州、连云港、淮阴和盐城的灌溉总渠以北地区，有24个县，耕地面积占苏北五市的62%，人口占66%。(2)东南地区。包括扬州和盐城的灌溉总渠以南地区；有14个县，耕地面积占苏北五市的38%，人口占34%。这两个区域的形成，不同于行政区划和农业区划，主要是由经济发展水平决定的，体现为两种经济类型。西北地区属“农主工辅”型。农业在整个经济全局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乡村工业规模较小，工农业在整个经济结构中的比重是“三七”开。东南地区的经济结构已初具“工主农辅”型的特点。工副业的比重超过了农业，大体上是“六四”开。上述地区性的差别，实际上反映了苏北农村经济的两个不同发展阶段。

西北地区近年来农村中的一个突出变化，是农业生产的发展速度相当快，1979 年以来的 5 年间就跨越两个不同阶段：从不得温饱到略有结余，从略有结余向较大规模的商品生产发展。1983 年，这一地区的农业产值已占全省农业总值的 30%，粮、棉、油分别占 40%、32%、43%，农副业的商品率（不包括队办工业）达 48%。农业的发展，为乡村工业的发展准备了丰富的原材料。这一地区的乡镇工业以本地资源加工为主，过去由于受到农副业生产水平的限制，农副产品加工工业发展缓慢。近年来，随着农副业商品量的增加，大量以粮食、果品、海产、木材、秸秆等为原材料的加工厂应运而生。著名的铜山县唐沟村村办工业，挑大梁的企业——面粉厂、食品厂、造纸厂等，都是当地农产品原料在作后盾。

东南地区在较早地解决了农业问题以后，七十年代中期就陆续办起了乡村工业。最近几年来，在保持农业不断发展的同时，乡村工业的规模由小到大，实力由弱到强，正在逐步形成一个门类比较多、具有一定竞争和适应能力的农村工业体系，有力地改变着这一地区的农村经济结构。农业所占的比重，从 1978 年的 53.8%下降到 1983 年的 41.4%，乡村工业开始发挥了越来越大的作用。

（二）

苏北乡村工业的真正起步，是在苏南乡村工业已经有了相当的基础，并处在更大规模发展的情势下发生的。总的说来，由于时间不长，加上受苏北的历史基础和客观条件的限制，乡村工业目前还处在初级阶段。但联系苏北农村的历史背景来看，进步还是十分明显的。1979 年以来，苏北 5 市乡村工业以每年 14%的速度递增，有 11 个县和郊区乡村工业年产值翻了一番，还出现了一批在企业规模、技术水平、经济效益等方面堪与苏南媲美的工厂，有些产品获得国家和省的质量奖。

我们认为，在谈到苏北乡村工业的现状及其发展前景的时侯，

不能忽略这样一个事实：苏南的经验正对苏北产生巨大影响，但苏北毕竟与苏南有所不同。如何有选择地借鉴苏南经验，坚持走一条符合苏北实际的发展道路，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

一、城乡挂钩，城乡协作，是乡镇工业发展的一个重要条件。

在这次调查中，我们发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1983 年，苏北乡村工业年产值超一亿的 12 个县，其中有 10 个县集中在东南地区。如果再进一步来看，苏北的这两块地区近 5 年乡村工业发展速度也不同，东南地区提递增 16%，西北地区为 14%。一般地讲，经济发展不平衡在任何地方都存在，但表现得象苏北这样突出，这样具有明显的地域性特点，就值得注意和研究一番了，这两地区过去经济基础的高下、劳力与耕地矛盾的大小、乡村工业起步的迟早、劳动力综合素质的不同等，固然是造成上述差别的原因；但从地理位置、交通条件来分析，苏北乡村工业发达地区，都是不同程度地受到上海经济区大中城市的“辐射”，也就是说，都在上海经济区的“辐射”范围之内。盐城的大冈镇织布厂，过去生产规模很小，去年从上海引进 288 台布机和全套技术，并由上海提供原材料，今年初形成生产能力，将增加产值 200 多万元。地处里下河“锅底”的兴化县，1983 年乡村工业有近 9000 万元是从上海、苏南中等城市的协作中产生的，占该县工业总产值的三分之一。协作的形式有这样几种：(1))技术指导。(2)产品配套。(3)定产包销。(4)原材料协作。这个县与江南的联系，在苏北的东南地区还是一般的，在江都、泰兴、靖江等县，这种联系还要广泛密切得多。西北地区的徐、淮、连地区又是一种情况，与江南大中城市的联系很不普遍，加上本地的中心城市经济实力较差，与城市的关系处于若即若离状态，因而乡村工业的活力不够，发展不快。

这里自然提出了另一个问题：苏北不同区域受到城市经济的不同辐射能力，是由什么原因造成的？我们初步分析，有这样几点：

一是取决于这个城市工业本身是否具有向农村辐射的能力和

要求。淮阴市的同志说，市区工业力量薄弱，还在忙于自身的发展，顾不到农村那一头。这个看法，对连云港、盐城、扬州等市同样适用。1983年上述4市城区工业产值37亿元，还赶不上苏、锡、常一个市区的工业水平。由于技术水平低，产品升级换代慢，没有老产品向农村脱壳；生产规模不大，无需组织城乡间的协作生产。

二是取决于城市工业产业结构是否存在向农村扩散的要求。徐州市是苏北重镇，在北到济南、西至郑州、南抵南京、东及连云港直径500公里的广大区域内，是首屈一指的工业城市，1983年工业产值为25亿元。它对全省的贡献是很大的，但它对周围农村的影响，却相当有限。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受到产业结构的限制，不宜向乡镇扩散的冶金、电力、石油化工、煤炭、炼焦、重型矿山机械等行业的产值，占该市区工业产值的60%以上。

三是取决于地理和交通条件。城市科学技术、人才、信息向农村扩散，要依赖于交通、电讯等条件。目前苏北的交通状况还比较落后，陇海铁路只局隅于西北一角；70%的水路，集中在东南部的通扬地区；腹地与苏北以外地区的联系主要依靠公路，而公路一般只通到乡。因而，交通条件如何，对乡村工业发展的影响，表现得相当鲜明。苏北沿江5个县，除丘陵山区的仪征县以外，1983年产值，江都县为4.8亿元，泰兴县为3.55亿元，靖江县为2.95亿元，邗江县为2.34亿元，都是苏北乡村工业的佼佼者。再往北的里下河地区其它县的水平就要稍差一些。越过苏北灌溉总渠，水平就更差了。城市工业的辐射力与空间距离似乎存在着一种正向相关的关系：空间距离由近及远，辐射力相应由强变弱。

四是取决于人才的流动和信息的流通。乡村工业的初期发展史表明，与城市大工业的联系，主要是通过各种乡土关系引进技术，聘请人才，获取信息。在这方面，苏北东南地区比西北地区来，占有“人缘”之利。历史上盐阜地区有大批农民迫于贫困而流入上海和江南，据说有100万人之多。后来，由于苏北是革命老根据地，

大批干部进了城，掌了权。“文化大革命”中，又有大批苏南干部和知识青年下放到苏北“安家落户”，在那里落过难。因而，这一些地区乡村工业发展得比较快，与这些“故乡人”的穿针引线、牵线搭桥，或者为家乡效力是分不开的。

对苏北乡镇工业今后的发展，尤其相对落后的西北地区的发展，从城乡关系的角度考虑，首先应发展苏北的市区工业，使本地中心城市逐步加强扩散能力；其次是改善交通状况，为加快发展苏北创造有利条件；再次是加强南北对话，开展跨区域的经济协作，用资源优势来弥补地缘、人缘上的劣势。从宏观上是不是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设想：一方面通过连云港的对外开放和徐州市区工业的调整与发展，在江苏西北边缘建成一个具有辐射能力的“经济小区”，由北向南扩展。另一方面随着上海经济区对苏北影响的不断增强，其辐射力向苏北腹地深入。上述两方面的影响，最终融为一体，使整个苏北地区能受到城市工业的辐射，促进乡镇工业和农村经济的进一步繁荣。

二、从本地实际情况出发，扬长补短，走出一条具有苏北特色的路子。

东台县黄海镇乡镇工业发展的经验与教训有力地说明了这一点。这个濒临黄海的小镇，是在一个冷落渔村的基础上形成的。这几年随着传统渔业生产的发展和滩涂资源的逐步开发，乡镇工业已初具规模。镇上的20多家工厂大致分为三类：一类是在赶浪头学苏南时办起的电子、化工、棉织等厂，由于技术构成高，特别是本地缺乏原材料和市场，生产很不景气。另一类是为渔业生产服务的船舶修理和网具厂，这些厂在本地有市场，经营状况比较稳定，但因受渔业生产的限制，发展速度不快。还有一类是以滩涂、海洋资源为原料的加工厂，发展的速度最快，经济效益也最好。1983年这类厂的固定资产占全镇所有工厂的80%，产值占90%，利润占70%。这就提出了一个耐人寻味的问题：为什么在黄海这个地方，

三种类型的企业会有三种不同的命运?可以这样说,这个镇的状况反映了苏北大多数企业的一般情况。同苏南相比,苏北的资源丰富,可供加工的农副产品和矿产品很多,这就是苏北的优势。但苏北也有明显的短处,这就是缺乏资金和技术。

从技术状况来看,苏北的乡村工业大致有三个不同的层次:(1)以劳务为主的工业,其代表性行业是采掘、运输、建筑。(2)劳务和初级技术结合的工业,其代表性行业是农副产品加工、建筑材料等。(3)以技术为主的工业,其代表性行业是机械、纺织等。除苏北东南部乡村工业比较发达,技术为主的层次占较大比重外,广大的西北地区技术相对说来还很落后。

因此,这一地区的乡村工业,亟需提高技术水平;而提高技术水平的主要渠道是来自城市的支持。对于引进技术问题,在现阶段,应以吸收发达地区因技术进步而更新的技术、设备为主。所以这样讲,是基于以下几点:1、这一地区在农业上刚刚翻身,正处在向农村工业化转变的起步时期,客观条件限制了普遍接受先进技术。2、在资金匮乏的条件下,引进小型的、简单的技术和设备,代价要小一些。3、由于文化、教育事业比较落后,农村劳动力素质不高,全省农村 400 万青壮年文盲中,绝大数部分集中在这一地区。当然,这只是苏北农村经济和社会特定阶段的反映,是暂时的,一旦条件具备,普遍吸收先进技术不仅是应该的,而且是可能的。在现阶段,也并不排斥一些地方集中人力、财力、物力,引进较为先进的技术,兴建骨干工厂,以带动一批乡镇工厂的发展。

从苏北发展乡村工业的资金状况来看,自去年以来,农民个人或联户办厂越来越多,成为这一地区农村工业发展的一个引人注目的新趋势,这是弥补集体经济力量还不雄厚的一个途径。新沂县的刘庄乡,家家户户办了生产塑料鞋底的小工厂,产品销到皖北、鲁南等地。今年一至四月,在中央一号、四号文件精神鼓舞下,赣榆县有 560 户农民出资办厂,资金数额达 510 万元,其势头明显超过

乡镇集体。因此，苏北农村在向农村工业化发展过程中，集体和个人同时进行工业投资，形成了农民个人或联户办厂与乡镇集体办厂并举的格局，这是一个不同于苏南的特点。今后如何加强对农民小工厂信息和技术指导，增强其生存能力和经营活力，引导其由小规模向较大规模发展，由分散于乡村向围绕小集镇发展，将是这一地区面临的新课题。

在现有条件下，苏北农村工业要弥补自己的短处，立足本地资源，组织系列化生产，搞产品的多方面、多层次的深度加工，是一种变资源优势为商品优势的有效办法。实践表明：本地资源加工由浅入深的过程，实际上是一个资金不断积累、生产不断扩大的过程；是一个技术不断进步、职工素质逐步提高的过程；是一个产品不断增值、经济效益不断增长的过程。建湖县上冈镇，每年有4000吨大麦直接用作禽畜饲料，如用大麦酿酒，做饴糖，再利用糟粕喂猪，增加一个加工层次，每吨大麦多增值1000元，可使原总产值增加6.8倍。羽毛厂每年调出初加工的羽绒20吨，如制成羽绒制品出售，产值可增40万元，增值78.6%。现在，这个镇的农副产品加工业已具有了一定的基础和规模，在效益上超过了受到原材料、技术和市场限制的机械行业。

从今后的发展来看，随着农副产品加工业向深度和广度进展，将带动起这一地区其它门类的工业生产。目前，系列化生产还局限在农副产品加工方面，且范围有限，潜力很大的矿产品加工基本还是空白。可以设想，在得到城市大工业技术上的支持以后，整个苏北农村工业的面貌将会有根本上的改变。

（载《江海学刊》1985年第2期）

农村繁荣和农民致富的道路

——介绍《苏南模式》之一

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全国广大干部群众大胆探索，勇于实践，创造了一批农村繁荣、农民勤劳致富的新经验。其中，江苏省的“苏南模式”，是尤为引人注目的一种经济社会发展模式。

什么叫“苏南模式”？它的标志和主要内容是什么？是不是可以这样表述：这是由苏南地区的广大干部群众率先实践的，以集体经济为主体，乡镇工业为核心，中心城市为依托，市场调节为主要手段，县、乡政权直接领导的一种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模式。这种模式，使农民走上了集体富裕的道路，给农村带来了经济和社会事业协调发展的局面。具体来说，有 5 个特点：

第一，集体经济是主体。这是苏南模式的主要标志。现在的苏南农村，经济类型中占主导地位的是乡村集体经济。苏州、无锡两市农村 1985 年的工农业总产值 299 亿元中，个体和联合体经济只占 9.2%，集体经济占 90.8%，是绝对多数。

据初步统计，全省乡镇工业的固定资产达 93.6 亿元，比 1978 年增长 3.5 倍，已相当于 1976 年全省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的固定资产总额。

第二，乡镇工业是苏南模式的核心所在。苏南农民所以能较快地由穷致富，集体经济所以能由弱到强，主要得力于乡镇工业的兴起和发展。从全省来说，1985 年的乡镇工业产值为 382.9 亿元，占全省工业总产值（包括村以下办工业）的 37%，“三分天下有其一”，已经接近 1979 年全省工业总产值（385.6 亿元）的水平了。从苏州，无锡两市来说，1985 年乡镇工业产值为 186.4 亿元，已占两

市(九县二郊区)工农业总产值的 49.6%,已经成为"半壁江山"。这说明,农民已成为这一地区实现工业化、现代化的主力军。

第三,以中心城市为依托,同城市工业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苏南模式不是一种封闭的经济模式,而是一种开放的经济形态。它充分利用了较为优越的地理、交通条件,同邻近的大中城市的国营企业、大专院校、科研单位建立了横向联系,在产品、技术、资金、人才、经营等方面实行协作。据了解,无锡市所属各县的乡镇企业,三分之一以上与城市工业建立了各种协作关系,配套产品的产值在 10 亿元以上。靠近上海的太仓县,70%以上的乡镇企业同上海市、苏州市有协作关系,其中一半左右的单位已建立了比较紧密的联合。沙洲县 69 个乡骨干企业,有 62 个企业同 120 多个国营大厂、大专院校、科研单位,建立了各种形式的联合。他们之间的关系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互助合作,平等互惠。

第四,以市场调节为主要手段。在苏南地区的乡镇企业中没有"大锅饭"可吃,没有"铁饭碗"可捧。产供销、人财物,在计划本本上几乎没有位置。资金的调度,原材料的来源,能源的解决,产品的销路,管理的改善,全靠自己去开拓、去竞争。

在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个大学校里,愈来愈多的乡镇经济组织者和经营者从中得到了锻炼和提高。

在前进的道路上,尽管年年有风有浪,但他们心里是踏实的,步伐是稳当的。

第五,县、乡两级的党政领导者是发展乡镇工业的实际决策人。七十年代初期的县、乡、村干部,顶住"四人帮"的压力,带着一身泥巴办工业,把这枝"富民花"扶植起来,十余个春秋过去,乡镇工业由小到大,遍地成长,而他们之中的许多同志已因年龄关系从一线退到二线,许多年青的同志走上发展乡镇工业的领导岗位。无论是当时的奠基者们,还是今日的开拓者们,他们都有强烈的事业心,把经济工作放在第一位,以带领农民实现小康为己任,对本地

区经济和社会事业的发展比较心中有数，因而领导力量较强，走的弯路较少。

以上5个方面，是苏南模式的特点，也是这一模式的优点。十余年的实践证明，这种模式比较活，也比较实，发展虽快然而稳妥，困难虽多然而风险不大。

（载《经济参考》报 1986 年 5 月 16 日）

评价“苏南模式”的三条标准

——介绍“苏南模式”之二

对某一种经济模式作出评价，可以用若干标准。我们认为，关键的是三条：一是发展了社会生产力，还是破坏了社会生产力；二是使绝大数人富裕起来了，还是使两极分化；三是促进了各项社会事业的发展，还是妨碍了它们的发展。对于这三条，苏南模式都给了我们肯定的回答。

第一、它促进了农副工三业的正向发展，使农村商品生产规模不断扩大，创造的物质财富迅速增加。从苏州、无锡两市1970年以来的农村经济主要指标的变化中，可以看出这一点。

苏州、无锡两郊、九县	1970年	1985年	增长率(%)
农副工总产值(亿元)	19.61	219.2	1017.8
人均农副工产值(元)	296	3637	1128.7
乡镇工业产值(亿元)	1.87	186.4	9867.9
农副业产值　(亿元)	17.74	32.78	84.8
粮食(亿公斤)	33.75	38.53	14.2
棉花　(万担)	72.3	86.4	19.5
油料　(万担)	134.47	364.8	171.3

从上表可以看出，随着乡村工业的发展，苏南的农业没有萎缩，而是有了相当的发展。我们以乡镇工业发展最快、增长幅度最大的无锡县为例，这个县从1949年到1970年的21年间，工农业总产值平均递增只有3.2%，其中农业的增长速度只有2.2%；乡镇企业办起来以后，1970年到1978年，工农业总产值年递增率为15.1%，是前21年的4倍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年递增率，又

提高到 24.8%；1985 年的工家业总产值为 46.8 亿元，比全省 1957 年的工业总产值(32.6 亿元)还多。

第二、它使从联产承包责任制下解放出来的大批劳动力有了新的用武之地，他们的思想素质、知识水平有了新的提高，促进了社会安定团结局面的形成。

到 1985 年，江苏全省进入乡镇企事业单位的农村劳动力已超过 600 万人，占农村劳动力总数的 25%左右，苏南地区则普遍上升到占 30%以上。无锡市三县一郊乡镇企业吸收的农村劳动力达 70 万人，占农村劳动力总数 48%。无锡县从事农业、副 业、工业和服务业的劳力的比重已由 1978 年的 60(农)：5(副)：20(工)：9(服)，变化为 1985 年的 22：7：59：12。由于进入乡镇企业的劳动者一般都是农村的青壮劳力，有一定程度的文化知识，经过一定的学习和培训，工业化的劳动方式和不同于小生产者的生活方式，使他们的社会视野、价值观念、思想意识和知识水平都发生很大变化。这部分人在农村稳住了，农村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就确立起来了。他们始终与农村连着“脐带”，不断把城镇的新文化、新思想、新信息带到农村，从而促进了农村传统面貌的改变。

第三、它使城市工业迎接世界新技术革命有了得力助手，并成为国家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之一，在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中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1985 年江苏全省乡镇工业产值占全省工业总产值(包括村以下办工业)的 37%。现在乡镇工业已经成为以城市为中心组成的工业群体的重要成员，成为大专院校、科研单位的实验基地。通过和乡镇工业的联合与协作，使城市许多大企业迅速扩大了生产规模，创出了新产品；使许多科研项目迅速变成科技成果，形成现实生产力。

从 1979 年以来，江苏乡镇企业向国家交纳税金累计为 67.8 亿元，其中 1985 年乡村两级工业上缴税金即达 181.1 亿元，比

1984年增长了28.5%，占全省财政收入的20.6%。在苏南的一些市、县，乡镇企业税金在地方财政收入中已经举足轻重。

第四、它使3,000万 农民普遍大幅度地增加了收入，并使相当一部分农民走上了小康之路。

有了乡镇工业，人多地少的苏南农民的收入才有了明显的提高。1979年以来，江苏全省乡镇工业直接用于农民分配的部分，总计有100多亿元。1985年在农业受灾减产的情况下，农民人均收入没有比上年减少，而是增加了44元，达到492元的水平，这就是“以工补农”的结果。在苏南农村的许多地方，农民收入来自乡镇工业部分所占的比重很高。著名的江阴县华西村、沙洲县欧桥村，每个劳务的月收入平均为200多元，村主要干部和有技术的农民月收入超过300元，那里的农民不无自豪地说：“我们是集体冒尖，共同富裕”。马克思当年预言的“农业人口和非农业人口的生活条件的接近”，已经在苏南这块土地上展现。

第五、它加快了农村社会事业的发展，促进了精神文明建设，为缩小城乡差别找到了现实的途径。

“粮满仓、油满缸、穿西装、盖新房”，农民群众在物质生方面的要求，现在已经达到。“看病要个好医院，看戏要个好剧场，念书要个好学堂”，群众在精神生活方面的愿望，现在正在实现。过去乡镇企业没发展起来，农村文化事业只能依靠国家拨款，杯水车薪，使得乡级文化站长期无法开展活动。苏南模式形成以后，就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好情况。苏州全市六县的180多个乡镇已基本实现乡乡有文化中心，村村有俱乐部；全市建起集镇影剧院150座，电影放映队157个，业余宣传队158个，拥有群众文艺骨干3000多人，图书馆73个(藏书43万册)，基本形成了初具水平的农村文化设施网络。象前面提到的华西村和欧桥村，农民每年在村里看戏、听书、看球、看电影在100场次以上。（载《经济参考》报1986年5月17日）

在农村经济发展战略中的独特位置

——介绍《苏南模式》之三

苏南模式作为我国东部发达地区干部、群众创造的一种经济模式，不仅在现实经济社会生活中正式发挥越来越积极的作用，而且在我国未来的经济社会发展战略中所具有的独特位置也已初见端倪。

首先，它关系到我国的经济翻番战略。实践充分证明，要顺利实现党的十二大提出的到本世纪末经济“翻两番”的目标，国家骨干工业要挑重担，集体经济也要挑重担。城市搞工业、农村搞农业的路子我们走了几十年，费劲不小，投资不少，结果并不理想。苏南模式则向我们展开了一条新的途径，结束了城乡经济相互封闭的“二元结构”，开辟了我国特殊的工业化、现代化的道路。

其次，它关系到我国农业现代化战略。实践告诉我们，依靠农业自身积累来实现农业现代化是不可能的，依靠国家投资也是不现实的。苏南模式的形成，使我们找到了农业现代化的现实可能性。自1979年以来，江苏全省乡村工业用于“以工补农”，包括购置农业机械、农田基本建设的资金达30.6亿元，占乡企税金后利润的30%。无锡市所属各县乡村工业“六五”期间用于“以工补农”的有3.1亿元。常熟市乡村工业五年来提供的农业投资8000多万元，使农业机械化、现代化水平显著提高。近两年苏南乡村出现的适度规模农业，虽然还只是星星点点，所占比重不大，但必须以乡村集体拥有的经济实力为前提。对于广大农户来说，迫切需要是加强农业服务体系，这也需要以乡村工业为后盾。

第三，它关系到我国的城乡联合发展战略。苏南模式可以使我

们走上一条城乡联合，共同繁荣的新路子，这就是大力发展乡村企业，积极建设小城镇的道路。它使农村的剩余劳动力既不是永远捆在土地上，也不是盲目涌入大城市，而是分级截流在小城镇及其周围，从事第二、第三产业。通过小城镇这个纽带和桥梁，使农村剩余劳动力得以“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又使城市能够“扩产不扩厂、扩业不扩城”，逐步向城乡一体化发展。

第四，它关系到我国的人口战略。苏南模式的出现，使我们看到了人口战略实现的希望之所在。随着农村集体经济和乡镇企业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农村劳力从第一产业转入第二、第三产业，从农村转入集镇或集结到集镇周围。工业化的生产方式不同于传统的农业耕作方式，不是一般地吸收劳动力，而是要求劳动者有较高的文化素质。在苏南，一定的文化知识水平和技能已经成为年青一代进企业、换工种几备的基础条件。加强智力投资，发展基础教育，举办各类职业教育已经成为乡村经济、文化建设的重要方面。学知识、学文化、钻技术，正在成为新一代农民的要求。江苏省1985年人口统计材料表明，乡镇企业发展越快的地方，科技文化越发达，劳动力的文化技术素质也越高。苏南的苏州、无锡、常州三市与苏北的徐州、淮阴、盐城三市相比，每千人拥有大学生为2.1：1，中学生为1.6：1，小学生为1.3：1。

（载《经济参考》报1986年5月19日）

有独到之处，亦有待完善

——介绍“苏南模式”之四

纵观苏南模式的发展过程，它得以成功的独到之处，就在于它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一条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路线。尊重群众的愿望，尊重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以当时当地的具体情况作为办事情、想问题的落脚点。

马克思早在1872年《共产党宣言》德文版序言中就指出：共产党宣言的原则“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9年之后在《致纽文朗斯的信》中，马克思又谈到，在将来某个特定的时刻应该做些什么，应该马上做些什么，这当然完全取决于人们将不得不在其中活动的那个特定的历史环境。十月革命前夕的1916年，列宁在《论对马克思主义的讽刺》这篇文章中进一步提出了“多样性”的问题。他说：“一切民族都将走到社会主义”，“但是一切民族的走法都完全不一样，在民主的这种或那种形式上，在无产阶级专政的这种或那种类型上，在社会生活各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速度上，每个民族都会有自己的特点”。

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同志和党中央在总结了中国革命的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了“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奋斗纲领。小平同志并且多次对这一纲领的深刻内涵作了明确的解释，在1985年底会见美国《时代》总编辑时又谈到：如果我们永远依靠过去的经济体制，我们就无法发展社会生产力。小平同志还说，我们应坚持两件事情，第一，在我们的经济中应永远的公有制为主；第二，我们应设法避免贫富两极化，永远坚持致富道路。小平同志阐述的，既是我们党的事业的出发点，又是目的；既体现

了社会主义的共性，又有中国国情的个性；既切实可行，又需要全党不断探索。从苏南模式的形成和它的特点、作用来看，它已经迈出了探索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可喜一步，是不是可以这样说，苏南模式不仅仅是苏南一地的局部财富，而且是全国八亿农民的共同财富，具有积极的普遍意义。

当然，如同一切发展中的新生事物都不会尽善尽美一样，苏南模式仍然有一些弱点，需要进一步实践和完善。比如，在体制方面，“合作经济”的个性还不强，“大锅饭”没有了，还有点“小锅饭”，还有点“一大二公”的尾巴或痕迹；在乡镇工业的发展过程中，存在一定程度的盲目性，有的地方有多占、早占、浪费耕地的现象，有些工业污染也下了乡而没有处理；在流通方面，改革的进展和活跃的程度也还不够。今天，我们来讨论苏南模式，就是试图对它的成功之处予以肯定，对它的弱处进行探讨，同最有发言权的第一线同志一道，为完善和提高这一模式而继续努力。

（载《经济参考》报 1986 年 5 月 20 日）

小农具，大问题

南通市 267 个被称为“乡镇工业的老祖宗”、“农村工业的奠基厂”的农具生产企业，现在处境艰难，后继乏人，产量下降，品种减少。与此同时，农民对小农具常有“要买买不到，要修没处修”的抱怨。

风雨飘摇是何因

南通市铁制中小农具产量逐年减少。“五五”期间年均生产 408 万件，“六六”期间降到年均生产 295 万件，下降 28%。1985 年全市农具生产企业有 45 家亏损，占农具生产企业总数的 16.9%；1986 年上半年亏损户有增无减。可以说，农具生产企业目前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分析其原因有 4 个：

一是原材料紧缺难生产。南通市农具钢材年需 1 万吨，1985 年实际供应 2,790 吨。其中规格钢材 1985 年国家安排实际供货 1,939 吨，又减了 25%。其它如铁丝、元钉、桐油、铁钳等原材料的货源均无保证。电力供应更不正常，海门县白天供电每星期只有 1 次，如东县白天不供电，有的县每月停电 17 天。

二是本大利薄厂难办。据对海门县德胜农具厂调查，生产铁锹的炉灶需 4 个工人，保本工资（包括补贴）每天需 12 元。以每天生产小铁锹 60 把计算，每把赚 0.11 元，合计才 6.6 元，只够开支工人半天的工资。

三是分割平调难调节。许多农具生产企业为了生存下去，采取

“以副养主”的办法开辟其他“吃饭”途径，以盈利产品补贴农具生产，稳定了农具厂。但有些县乡看到农具厂上了一个有前途的项目，就把它划出来另立门户，使母厂又陷于困难。

四是多头无首难巩固。所谓多头，是农具厂的人、财、物、计划、生产分属几个部门，这些部门往往各从自己的需要来指挥企业，企业干部经常变动，使企业领导班子处于不稳定，有时甚至空缺“无首”的状态。如皋县江防农具厂近7年换了7次班子。调来调去，使有的农具企业成了老、弱、病干部的安置场所。

任重道远走新路

中小农具对农业生产必不可少，在目前农业机械化水平不高的情况下尤为重要。农具企业处于产销直接见面的支农第一线，是广大农民评价各级政府部门是否重视农业生产的窗口。因此，农具工作只能加强不能削弱。

当前要正确处理农具生产的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关系，切实帮助农具企业摆脱困境，使农具生产走出一条新路。

农具生产利薄，在物价和工资水平上升、社会负担日趋增加的情况下，单靠生产农具来维持企业难度很大。很多农具企业以开发新产品、寻找其它加工业务等办法“以盈补亏”，使企业有了活力。这是搞活农具生产的好办法。各地对一些缺乏“以盈补亏”门路的企业，应积极扶持，协助做好新产品的开发或其它加工业务的工作，充分启动企业内在“动力”，使亏损企业摆脱困境而不能分割农具企业，平调它们的财产。生产中小农具所需材料和能源要专项安排、保证供应。国家计划材料要按规定保质保量，实行计划价格，所需废次钢材本着“先利用后上交、先利用后回炉”的原则，优先供应给农具生产企业。

农具是常年生产、季节性销售的商品，利润少，资金周转率低，

建议银行在贷款方面、税务部门在税收方面给予更多的优惠。各部门、各单位不得任意向农具企业摊派，尽量减轻农具企业的社会负担，对目前确实因客观因素造成的亏损单位，在一定时期内免收管理费，利润不上交。

农具生产企业后继乏人的状况已很严重，尤其职工队伍老龄化、缺员的情况更为突出。改变这一状况，必须通过多种途径提高企业的创利能力，壮大经济实力，改善劳动环境，增加工人的收入。这一点需急起直追，并经多年努力才能奏效。对离退休职工的退休金应根据具体情况，先由县、乡、企业三级协同解决，逐步向“与企业工资额挂钩、实行以支定收”的全县统筹方法过渡。

（载《经济参考》报 1986 年 7 月 29 日）

“建房热”两面观

一股前所未有的“建房热”潮流，正席卷我国经济发达地区的农村。

据统计，“六五”计划期间，江苏省每年都有百分之十以上的农户翻新或新建房屋，这一数字可以说是空前的。透过“建房热”，人们可以窥见农村新貌之一斑，也会发现一些值得注意的倾向。

江苏省农户注重建房与绿化并举，新建住房周围，往往遍植绿树，农村居住环境得到较大改善。这可以算得“建房热”中的一“新”。

“建房热”中出现的二“新”，是新建住房普遍注意通风、采光，面积扩大，质量提高，一改过去农家住房“三小一暗”（面积小、门小、窗小、光线暗）的老面孔。据调查，江苏省1985年新建的农户住房平均每间20平方米，比1979年建的增加5平方米；砖木结构房屋的比例已达87.2%，有的还铺了水磨石地面，安装了新型天花板；楼房在新建房中已占三分之一。

随着分户经营的生产责任制的落实，过去集体保管的粮食、农机具已改由农户分散保管，兼之畜牧、养殖、工、副诸业发展迅速，农户在建新房时普遍扩大了生产用房的面积。对江苏省农户的抽样调查表明，1985年户均生产用房近9平方米，比1983年增加了一倍，占农房总面积的10%。这是“建房热”中出现的又一新趋势，值得建材生产部门注意。

“建房热”中出现的问题主要有二：

一是由于建房需要大笔投资，使农村的非生产性投资的增长

超过于了生产性投资的增长，有些农户的建房支出超过了现有收入水平。建房一般需要四年准备时间，有的农户只准备了两年就动手建房，必然要向他人借款，为归还借款，只得压缩开支，包括减少生产性投资。此外，建房时的吃喝开支也相当惊人，农民反映，“材料买得起，吃喝招待不起”。据抽样调查，吃喝费用一般需一、两千元，占建房费用的四分之一。

二是新建房屋对耕地的“蚕食”令人担忧，江苏省曾对3400户农民作了调查，建房用地平均为零点一亩，照此数字推算，全省乃至全国新建农民所占耕地，数目相当可观，而建房占地面积还有日益扩大的趋势。这一切，都应引起有关部门的重视。

综观“建房热”，可喜可忧，除了积极扶持外，更需认真引导。

（载《经济参考》报 1986 年 8 月 24 日）

乡镇企业的“三上一高”与三支力量

“三上一高”——产品上质量，生产上技术，企业上管理，提高经济效益——是我省乡镇企业1986年的奋斗目标。怎么使这个目标落到实处？据对常熟市、沙洲县、无锡县等地的调查，提高管理人员、技术员、供销人员这三支力量的素质，是关键所在。

预计1985年江苏乡镇企业的总产值可超过400亿元，已经超过1979年全省工业总产值的水平。这一发展，同乡镇企业“管、技、销”队伍的努力是分不开的。这支队伍的现状是：(1)一批具有一定文化水平、业务比较熟悉的中青年走上了企业领导岗位，“大队书记”在企业当家的历史已经结束。据常熟市对60个乡办企业、200名厂级干部统计，平均年龄为42岁，40岁以下的占一半以上，初中毕业以上文化程度的占63%。(2)以会计员、统计员这主的管理队伍正在形成，经营管理工作开始走上轨道。乡办企业中的少数人员，经过业务考核，已经获得助理会计师、会计员、统计员的职称。(3)本地培养出来的技术人员越来越多，特别是苏南乡镇企业的技术队伍已经历了从无到有、从低到高、从少到多三个阶段，许多企业已由手工业老师傅当家、退休老技工指导的时期，发展到由经过企业培训的本地青年技术人员主持技术工作，有些企业已经拥有自己的助理工程师和技术员。

但部分企业领导骨干的变化问题还没有全部解决，有的人未退，有的权未放；包括有些年纪不大的干部至今不懂业务，也不钻研业务。其主要原因是乡里选配企业干部时，还是从照顾出发，不从工作出发。财会人员中不少来自生产队会计，不懂工业会计知

识，不会成本核算。对本地技术人员的培训缺乏战略眼光，没有长期打算。实行经济承包制以后，有的更加舍不得送人出去培训，认为“抓现的要紧，赔本的不干”。

许多县委书记认为：乡镇企业的发展前景虽好，但面临许多困难。特别在加强宏观控制的形势下，要求乡镇企业必须走内涵发展的路子，避免盲目性，这更加突出了人才的作用。今后一个乡或一个企业经济的兴衰，竞争力的强弱，要看产品质量和市场覆盖率，要看成本高低和经济效益如何，归根到低，取决于“管、技、销”这支队伍的素质。实行经济承包制，必须有利于这支队伍的建设，否则，就是片面的、目光短浅的，也将是后悔莫及的。

常熟、无锡、海门、南通等地的经验是：

县、乡领导机关要把建设“管、技、销”队伍的工作，放在重要位置上，要把它作为落实“三上一高”目标的具体措施，作为今后继续办好乡镇企业的关键一着，克服“远水难解近渴”、“外来和尚会念经”的急功近利思想，加快这项工作的进程。

要严格考核标准，培养当前急缺的人才。企业领导骨干的调整要继续进行，并以多在企业内 选任为宜。实践证明，从乡镇企业内部的技术人员、财会人员、供销人员中选拔企业领导干部，特别选拔那些事业心的开拓型干部，是积极而可靠的途径。对在职领导干部，要加强业绩和业务知识考核，两者缺不一可，以促进工作。

要落实待遇，从生活上关心“管、技、销”这支队伍。现在乡镇企业这些人员的外流现象严重，大多是从不满现有待遇而来的。许多县的同志认为，乡镇企业是集体经济，报酬必须同企业经济效益密切结合，“大锅饭”必须坚决摒弃。因此，有的对供销人员按完成任务情况计酬计奖，有的对技术人员按职称给予补贴，这都起了稳定情绪、鼓励向上的作用。有的地方还认为，在关心他们生活待遇的前提下，对擅离职守、不听劝告者，有乡规民约的，按约规的原则予以处理，以维护集体经济利益。（载《新华日报》1986 年 3 月 13 日）

乡镇企业的观念要更新

江苏省无锡市(辖江阴、无锡、宜兴三个县)是“苏南模式”的诞生地之一,预计今年乡村两级工业总产值可达113亿元,比去年增长29%。其中江阴县33元,无锡县44亿元,宜兴县21亿元,郊区15亿元。国家税收和职工工资总额都将有相应的增长。为了争取明年有个适当的、实实在在的发展速度和比较理想的经济效益,他们要求,乡镇企业在观念上也来一个相适应的更新。主要是:

牢固树立起以优取胜、打持久战的思想,纠正过去单纯求眼前利益、忽视长远利益的小生产观念。过去,乡镇工业“以多取胜”、“船小易掉头”,打“游击战”,现在市场竞争加剧,而且有些船已经不小了,掉头不再那么容易,必须抓紧研究制订长远的发展战略和目标,吃准产品方向,搞好经营决策。船不小的,要发挥马力足的优势,形成优质产品;众多的小企业,要走“小而专”、“小而精”的道路。

从过去“产、供、销”程序转变为“销、供、产”程序,牢固树立以销定产、以市场促生产的观念。他们认为,乡镇企业是市场经济,如果产品卖不出去还不如不生产。乡镇企业的市场观念要抓两头:重视开拓国际市场和国内农村市场。

继续推进横向经济联合,牢固树立起“城乡一体化”的观念。他们提出,城乡联合的基础是自愿平等、互利互惠;城市企业对乡镇企业要加强指导,适当让利;乡镇企业对城市企业则应做到依托而不依赖。在联合中防止盲目性,不要使乡镇企业成为高能耗产品和工业污染的转嫁体。

由只从建多少新厂看“后劲”，转变为主要从企业实力看“后劲”，牢固树立起以内涵为主求发展的观念。他们强调，一年一个形势，步步要求实在，现在全市乡镇企业总的规模已经不小了，农村剩余劳动力已经不多，要当机立“转”，从过去的主要靠外延求发展，果断地转到以内涵求发展道路上来。

为了充分发挥企业的活力，在企业领导体制上，坚决地、有步地推行以厂长为代表的集体经济承包责任制。在企业的所有权与经营权上，明确乡镇企业是合作经济，经营权应归法人代表——厂长，乡(镇)、村要给厂长充分的自主权。在企业内部管理上，实行车间、班组、个人层层承包，进一步理顺企业内部的关系，充分调动各个层次的个人积极性，使企业利益与职工利益结合得更紧密一些。

（载《经济参考》报 1986 年 12 月 10 日）

农民增收与文化程度息息相关

不同的文化程度，对农民的收入高低，会产生相当的影响。你相信这个观点吗？这不仅只是“观点”，而是确凿的事实。如果将信将疑，请看如下的数据：

江苏省1985年农民人均纯收入为492.6元。据有关部门对近千户农民调查分析：文盲半文盲的人均纯收入为388元，小学文化程度的人均纯收入为439元，初中文化程度的人均纯收入为496元，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人均纯收入与文盲相比较，小学组高出50元以上，中学组高出100元以上。

有的同志认为，农民挣的是“汗水钱”，靠的是“体力”，同文化程度的高低有这么直接的关系吗？据分析，完全有直接关系。有三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文化高的农民，在产业结构的调整中起步快，得益早，收入高。统计材料表明，文盲和半文盲组从种植业所得的收入占68.2%，从林牧副渔多种经营中所得的收入只占31.8%；而中学组从林牧副渔多种经营中所得的收入要占35.3%，高出文盲半文盲组4%。

第二、不同文化程度的劳动力，在不同产业中的构成不同，经济效益也就明显不同。据分户分析：文盲半文盲组从事第一产业的占93%，从事第二、第三产业的只占7%；而中学组从事第二、第三产业的50%以上。经济效益指标亦有明显不同，每百元固定资产提供的纯收入，文盲半文盲组为457元，初中组为467元，高中以上组为579元；每百元生产费用获得的纯收入，文盲半文盲组为

274元，初中组为323元，高中以上组为340元。

第三、文化程度越高的农户，用于生产性的积累越多，特别舍得在智力、文化方面投资。以1985的为例，这一年购置生产性的固定资产，文盲半文盲组人均7.6元，小学组11元，初中组13.1元。购置教育、文化娱乐用品的支出，文盲半文盲组人均2.4元，小学组人均6.4元，初中组人均10.2元，高中以上组人均13.6元。

以上这些数字，无疑是一个重要信息。它反映了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农民同文化已经结下了不解之缘，农民增加收入同提高农民文化已经息息相关。经济、文化比较发达的江苏农村所呈现的这一新情况，不是一件小事，将给广大农村和领导机关提供启示：建设中国式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应该向哪些方面努力。

（载《农民日报》1986年9月4日）

欧桥村的经营对策

沙洲县欧桥村，是江苏省“四大名村”之一，1983 年就已进入全省首批八个“千万富翁”的行列，欧桥村办工业速度快，效益好，重要原因之一是经营有四条对策。

一是花色翻新由慢转快。欧桥产品主要是轻纺产品，在市场变化越来越快的今天，不少轻纺产品的生命周期只有半年甚至两三个月。为了赢得生产上的主动权，欧桥向上海等地派出了常驻信息员。到各百货公司、服装商店，搜集市场行情，探测变化趋势，反复筛选信息，及时反馈回厂，迅速组织生产。这个村的纬编厂，去年头九个月，就设计 50 多种新花色投放市场。

二是产品批量由大转小。以小取胜，是欧桥经营上的又一新策略。他们适应“品种要多、批量要小”的发展趋势，正在逐步改变过去大批量生产为每台机单独作战的生产方式，尽管这会使劳动效率明显降低，成本升高，但是欧桥总是尽一切努力使客商乘兴而来，满意而归。一次，新疆一个供销员携带一块进口的三色涤沦提花布，跑了苏、锡、常和上海好几家大厂请求按样生产，皆因工艺比较复杂，所需批量又仅有 500 米，生意没有谈成。失望之余，他抱着试试看的心情，来到欧桥村，一谈即成。纬编厂为他加班加点，从设计到织成，前后只用了一个多星期。

三是产品价格由平转廉。欧桥村办厂的原辅材料，基本上都是市场议价进来的。购进的涤沧长丝，每吨要比国家牌价高出 2000 多元，仅此一项，成本就要高于国营企业 20%左右。国家电网供电有限，欧桥三分之二的是自发电，每度成本高达四角五分。产品按

平价出售，利润率高。面对这些情况，他们进一步把“高进低出、薄利多销”作为竞争手段，投放市场的商品比通常价格更低，一套中长仿毛女西装，投放到上海市场，开价只要20多元。通过多销快销，加快了资金周转，‘聚沙成塔，变薄利为多利’使不利条件转化为有利因素。

四是销售市场由近转远。一段时间以来，欧桥村的工业产品除了北京、天津几个不多的销售点，主要是在上海和省内经销。为的是运输费用少，资金周转快。近几年来，他们改变这个传统方式，开始实行“立足上海，面向全国”，积极疏通各种渠道，挤进西北、东北和西南等边远地区市场，建立了一批固定的协作关系。在服装厂里，我们遇见了西安的客户，正在提取订做的毛料服装；在针织厂里，我们碰到了前来订货的乌鲁木齐某百货公司的女采购员；在毛织厂里，我们看到了正在装包待发丹东市的雪花呢、大衣呢。

（载《乡镇企业厂长函授班辅导教材》1986年第8期）

八仙过海，各显其能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江苏乡镇工业发展比较快，走出了一条实现农村工业化和现代化的道路，也找到了一条使农民生活尽快富裕起来的途径。在这方面，各地都有“高”招，可谓“八仙过海，各显其能”。

扬长补短

多年来的实践证明，乡镇工业有其特有的长处，如“不吃大锅饭”，“不捧铁饭碗”，当家人说了算数等，因而竞争性强，投资少，费用低，自主权较多，容易用人、用技术等等。乡镇工业也有其短处，如资源、能源短缺，设备相对简陋，技术比较落后，信息迟缓等等，面对这些短处，怎么办？据若干县的经验是，该避则避，如“小而全”的致命之短必须避；有的应暂时先避，如耗能太高的产品应缓上。然而，对短处不能一味地避，有些短处应该“补”，补短才能扬长。

南通县人均只有八分田，他们补短之一法，就是大力发展多种经营。新坝乡卫桥村改变“砍麻种棉”的做法，大力恢复和发展麻制品加工业，农、副、工总产值 1983 年比 1978 年翻了三番。

江阴县补自己资源、能源之短的一个办法，是通过提供资金、设备、技术 、人才，与外地联合开发煤炭、生铁、木材等，协作互惠，双方得益。

江阴县补自己信息迟缓之短的办法，是在全国 27 个省市设立

了1400多个销售窗口，建立起从县到乡到企业的信息系统。1985年年初，他们从销售点上了解到上海儿童用品商店需要大批“大头娃娃”，供“六一”儿童节销售，立即组织一个村的工艺美术厂进行生产，很快同上海签订了一万元的供销合同。该县舍得花路费，经常派人参加各种订货会、展销会、交流会，摸市场行情，供信息“反馈”，及时更新产品。

敢用能人

江苏乡镇工业在风风雨雨中站住脚跟，并且不断发展，有着种种的主观和客观原因。在主观原因之中，最重要的一条，是县乡领导机关敢于起用能人。

沙洲县锦丰乡麒麒村塑料印花厂，由于原来的厂领导不懂经营，不会管理，1981年上半年亏损八千元。后来，乡党委选派较懂生产经营的乡工业办公室主任王培成去领导这个企业。王培成去了后，很快起用两名熟悉生产和供销业务的工人担任副厂长。他们把农业承包责任制运用到企业管理上，制订了各种人员的岗位责任制，并对四色轮印机进行技术改造，严格质量检验制度，提高产品质量，当年下半年就扭亏为盈，盈利六万元。1982年进一步抓产品质量和企业管理，产品销到外省，被天津一个外贸单位列为免检产品，全年盈利12万元。沙洲县委书记陈璧显在这一次会议上有深感慨地说：乡镇企业选谁明白人，就能救活一个企业，办好一个企业，甚至带动一个乡的经济。

乡镇企业起用和重用能人，会遇到种种阻力，有认识问题，也有实际问题。如果把乡镇企业当作安排“老、弱、病”的场所，就起用不了能人，也害了企业本身。所谓实际问题，就是能人从哪里来？1983年工农业总产值已经超过20亿元的江阴县，他们是靠“挖掘、培训、引进、聘请”八个字，来解决乡镇工业所需要的各种骨干

的。他们注意发挥农村中现有的技术人员、能工巧匠、知识青年、生产能手的作用。对那些自学成才、学有专长的人，同样评定技术职称。县里办了电视大学、职工大学和业余大学。县、乡两级办了纺织、电工、机械、财会、企业管理等各类专业训练班，先后培训了乡镇企业骨干五千人次，并送了五百多人到各类专业学校去定向培训。他们聘请退休工程技术人员和老工人当顾问，同高等院校和科研单位挂钩协作，进行技术联营、技术承包、技术咨询，解决技术上关键问题。

善攀"高亲"

乡镇工业的生命力，是产品质量。沙洲县塘桥乡有个计算机存贮器厂，该厂聘请了一个由教授、副教授、研究员和工程师等18人组成的高级技术顾问组，从技术、信息等各方面得到具体指导，产品质量大大提高，现在成为电子工业部的定下点厂。

太仓县的横泾塑料厂，原来盲目生产增塑剂，产品积压，企业亏损。后来在上海有关科研单位的技术指导下，成为省的定点产品。江阴县周庄乡橡胶厂与上海市一个区的九三学社科技咨询服务部挂钩，签订了技术资询协议，因而开发了两只新产品，打开了局面。现在这个乡70%的社队企业，都聘请了技术顾问或拥有自己的技术人员。这样，全乡的工业企业生产大有起色，年工业产值达到7000多万元，比上年增长32%。

摒弃"小而全"

多年的实践证明，江苏许多乡镇工业企业的活力在于"小而专"、"小而精"。坚持了这一条，才做到了以小补大，以小搞活；以专补缺，以专配套；以精取胜，以精发展。

武进县是江苏乡镇企业比较发达的一个县，1983 年工农业总产值接近 20 亿元，乡镇工业产 到 8.4 万元。这个县就是乡镇工业走“小而专”道路较好的一个县。他们的企业生产钟表零配件、自行车接头、金属鞋眼、卡介苗注射器、自动结经机、电视机和收音机的零配件，钢窗，玻璃钢制品以及一系列日用小商品。凡是市场和人民生产需要的，重利要干，微利也干。这样，产品成了“不可缺少的配角”或“最佳配角”。青龙乡灯具配件厂生产的荧光灯启辉器铝壳，由于“小而精”，高质量，成这轻工业部的定点厂，年产量已占部定点任务的 80%以上。这个县的芦家巷风动水泵厂，1983 年生产的风动水泵，已占全国煤炭系统当年需要的 80%，这也是摒弃“小而全”走“小而专”道路的结果。

（载《乡镇企业厂长函授班辅导教材》1987 年第 6 期）

农民投资意识为何薄弱

据对盐城市大丰县南阳乡308户典型农户的调查，1986年与1985年相比，这些农民的人均收入增长13%，消费水平提高了23.2%，但用于生产投资的资金只增加10.8%。这说明，现在农民对生产的投资意识还是薄弱的，其主要原因有四：

一、不敢投资。有的农民说："投在田里，不如吃在肚里；吃在肚里，不如摆在家里。"这一思想，反映了农民对消费领域不动产的产权比较放心，而对生产领域的产权还不大放心。有些农民认为生产投资的利益"太远"、"太悬"，怕政策多变，缺乏安全感。

二、不愿投资。由于传统观念的影响，普遍满足于"小富即安"，存在"吃饱穿暖住瓦房，抱个胖娃乐洋洋"，"养猪为过年，养鸡养鸭为买盐，挣上一吊钱(1000元)，太太平平过一年"的思想。加上近几年来，农民负担过重，农业生产资料如化肥、农药、中小农具、农药器械等价格普遍上涨，农产品价格偏低，致使农民普遍不愿在农业上多投入。

三、不想投资。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后，工业、商业、建筑业、运输业、服务业发展了，农民感到种田不如做工经商，纷纷弃田从事工商业。有的人庄稼播种一结束，就外出做工经商挣现钱，直到收获季节才回来，根本谈不上投资。

四、不会投资。不少农民不懂商品生产，不知道资金是最重要的生产要素，不晓得把死钱变成活钱。还有一些农民把劳动挣来的钱藏在墙里、埋在地下或放在房梁上，致使有的被窃，有的烂掉。

怎样引导农民增强投资意识，调动农民增加生产投资的积极

性？笔者认为：政策要“明”，舆论要“正”，引导有“方”，具体来说就是：(1)从政策上进一步明确，使农民不致产生“政策迟早要变”的观望心理；制定优惠的政策，鼓励农民增加生产性投入。(2)舆论宣传上不能“摇摇摆摆”，正确宣传积累与消费的关系，引导农民把有限的资金投入到扩大再生产中去。(3)农民接触最多的一些报刊、电台，如中国农民报、经济参考报、中国乡镇企业报、省报省台等等，应通过典型报道、调查报告、短评、讲座等形式，向农民宣传积累和消费的基本知识，宣传扩大再生产与致富的途径，帮助农民学会发展生产。

（载《经济参考》报 1987 年 8 月 8 日）

真诚地为乡镇企业服务

一般说，三周岁的孩子是最讨人喜欢的，天真未失，活泼有余，虽尚牙牙学语，然而一身茁壮之气。《江苏乡镇企业》也满三周岁了，办得怎么样呢？这是应该由身处第一线的乡镇企业的同志们来打分的。他们打的分，才是具有权威性的。以我看来，至少不惹人讨厌，因为她始终紧跟和反映着江苏乡镇企业一步步前进的足迹。急乡镇企业之急，忧乡镇企业之忧，呐喊乡镇企业之所求。这就是特色。

短短的三年，江苏乡镇企业经历了多大的风浪呵！从被指责为“不正之风 的风源”、“拆社会主义的墙脚”到肯定为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异军突起”、“创汇生力军”，乡镇企业的同志们付出了多少汗水和泪水呵！ 这期间，《江苏乡镇企业》是尽了自己的责任，无愧于面对全省几万个乡镇企业及其读者的。

现在乡镇企业正面临着新的形势，肩负着新的任务，前进在更为艰巨的历史道路上。居安尚需思危，何况我们江苏乡镇企业现在并非所居甚安，那末，应该是“居危更思危”了。现在强手如林，竞争激烈，稍有懈怠，拔步难追。处于这样的环境中，《江苏乡镇企业》的任务就严重了，要更多更快地给信息，给经验，提问题，出主意，敲警钟，象一个知心朋友那样地为乡镇企业服务。

人们常说：领导就是服务，话并不错，但多少带点“赐予”之嫌。《江苏乡镇企业》是朋友，而且应该是知心朋友，为乡镇企业服务是天职，是责任，是义不容辞。

信笔写来，作为对《江苏乡镇企业》的三周年敬。

（1988 年 4 月 20 日，载《江苏乡镇企业》1988 年第五期）

改革乡镇企业管理体制的新思路

六月下旬我们在无锡县作调查时，东亭乡的同志向我们提出了改革乡镇企业管理体制的新思路。

他们认为，自 1983 年开始，无锡乡镇企业逐步推开以“一包三改”为主要内容的企业承包经营责任制，打破了在我国沿袭了几十年平均主义、吃“大锅饭”的分配分式，调动了大部分企业和职工的积极性，在前几年乡镇企业发展中起到了决定性的推动作用。但由于承包经营责任制本身的不彻底性以及承包工作上的不配套，大多数乡镇企业在貌似欣欣向荣的背后隐藏着危机。

由于乡镇企业的所有资产都属乡镇合作经济组织所有，甚至还包括企生产经营过程中的增值和负增值。在这样的体制下，出现企业领导和职工任期内或工作期内的短期行为，很少关心企业的长远发展现象并不奇怪。即使是前几年推行了承包经营责任制，而由于考核指标只局限于产值利润等，对其它如财产折旧等企业经营活动的参数缺乏具体的考核标准，或者即使有，但奖惩的刺激力不够，因此，企业出现“掠夺性”经营的现象较为普遍。东亭乡乡长朱家放同志说：“现在的乡镇企业为什么只是转产而没有倒闭，有的甚至转向生产同以前完全不搭界的产品？一个重要原因是这些企业关不起，而转产却掩盖其中存在的问题。有的乡镇企业从账面上看有多少固定资产，有多少流动资金，其实是废物一堆。比如，有一次检查乡办福利厂，账面上有一万元自有流动资金，但大多数都是卖不出去的产品，其实一千元也值不了。还有大多数乡镇企业的应收款是要打折扣的，有的由于产品质量问题等已经收不回来的，

但账上还挂着一大笔帐。当然，这样的情况决非东亭乡所特有，全省乡镇企业自有流动资金公诸报端的数据是25亿元，是否真有那么多？是个很大的问号。

另外，由于承包经营责任制实际上是在确定承包人以后，乡镇政府向企业经营者下达生产任务，并不是真正通过招标、接标手段来确定的承包关系，因此，并未形成最佳的经营机制。加上近几年宏观经济环境的不稳定，对承包经营的影响较大，真正能兑现承包合同的为数不多。职工吃企业"大锅饭"，企业吃全乡"大锅饭"的体制还没有真正革除，分配中"大拉平、小差距"的现象相当普遍。因此，这种承包工作中的问题也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企业的发展。

东亭乡的同志认为，要使乡镇企业具有较强的积累动机，在较长时期中取得持续稳定的发展，必须对现行的乡镇企业管理体制实行较为彻底的改革。这一改革总的思路是：租赁和拍买双管齐下，使乡镇企业的所有权和经营权彻底脱离，即在乡镇集体经济组织继续掌握包括土地、厂房、大型机器设备等不动产或不易贬值资产的基础上，把企业中一些易损、易贬值的物品，如专用设备、工具以及原料、产品等流动资产作价拍卖给经营者；乡镇除收取保留部分财产的租金以外，不以合股者的身份参与企业管理，而购买部分产权的经营者拥有生产、经营、分配、用工等一切自主权，企业资产的增值部分归收买者所有。按照企业规模的大小，具体可分为三种形式：(1)对于20人以下的小企业，可由私人收买并承租，租凭后的企业除保留集体性质及向集体缴纳租金外，按私营企业的经营方式经营。企业在生产经营活动中的资产增值部分归承租、收买者个人所有。(2)对于中等的企业，可由几个人合伙收买承租，租赁后的企业同样保存集体性质并向集体缴纳租金。企业按合伙企业的经营方式经营。企业在生产经营活动中的增值部分归承租、收买者集体所有。(3)对于较大规模的企业，可由企业全体职工认股收买并承租。租赁企业的负责人由职工代表大会产生，生产经营活动受

全体职工监督。企业在生产经营中的资产增值部分属全体职工所有。此外，鉴于乡镇政府及工业公司具有一支较强的经营管理队伍，也考虑到改革的平滑过渡，他们认为对乡镇中的一两个骨干企业可仍然保原来的管理体制，作为乡镇直属企业。同时，通过租金收入又可继续创办乡镇直属企业，待成熟后再逐步转让。这样，乡镇企业就能在不断循环中得到扩大和发展。

当然，改革乡镇企业的管理体制也面临着较大的困难。比如，改革真正打破了大锅饭体制，不同企业的经营者之间、经营者和职工之间、职工与职工之间的收入差距会扩大，很可能会使一些低收入者难于承受；又如，有可能使职工在企业中的地位有所变化，职工在生病或遇到其他意外事故后的基本福利得不到保障；再如，这一改革使政企真正分开了，乡镇党政干部对企业将失去直接控制能力，部分不肯放权的干部势必会成为这一改革的阻力；等等。因此，又要看到改革中可能遇到的困难，认真仔细地加以分析，并在实践中不断解决。

目前，东亭乡正在对这一改革进行试验。

（载《法策参考》1988 年第 36 期）

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方式

《海南特区报》编者按：

当被称为“盲流”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在经济整顿的形势下寻找出路的时候，人们终于发现随着经济发展的进程，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问题，是一个在理论和实践上，都不可忽视的新课题。本报发表《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方式》一文，对这一问题作出了一定的思考，希望理论界同志继续发表卓见，以期找出这一问题解决的科学方法。

我国农村可耕地少，而农业人口众多。随着生产的发展，必然要产生大量剩余劳动力，在经济发达地区，按照目前的生产条件，每个劳动力可以经营 5 亩地，将来农业机械化程度提高了，每个劳动力可经营 10—15 亩土地，还会有更多的剩余劳动力产生。

从全国来看，“七五”期间大约有 1 亿 4 千万个剩余劳动力需要安置。其中，农村剩余劳动力是大头，占到了 1 亿人。这 1 亿人连同他们的家属，将有 3 亿人之众，要重新考虑出路。这个问题得不到妥善解决，我国农村的劳动生产率就始终只能在低水平上徘徊，农业产业结构的调整就无法顺利进行，农业的现代化就无法实现，这无疑是中国农村发展所面临的一个重大现实问题。

目前，已经形成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方式有以下几种：

发展农民的兼业生产。它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农村经济结构趋于合理。但由于它是兼业的小生产方式，从长远看来，不适应农村发展商品经济的要求，而且这种方式对剩余劳动力的吸纳量也

很有限。

鼓励农民外出承包土地，这是“离乡不离土”的方式。这种方式以在一定程度上拓宽农业内部劳动力流动的渠道，但它同时受到发达地区与不发达地区农业比较效益及中国农民“热土难离”传统观念的双重制约。所以，这种方式提供给人们的活动空间是狭小的。

严格说来，上述两种方式只是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地消化，并不构成真正意义上的剩余劳动力转移，当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农村劳动力剩余的问题。

农民进入城市，是所谓“离土又离乡”的方式。这种方式在一定程度上被农民自发地采用了，且逐年增加。他们当中，小部分进入城市正式就业，多数则成为城市流动人口一部分农民离土又离乡是一个发展趋势。但需要一个过程，这个过程的长短和农民进入城市数量的多少，直接受到国力、财力及城市承受能力的制约。

一般说来，国家的工业化过程，必须伴随着人口的城镇化过程。城镇化水平，是反映一个国家工业化、现代化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之一。在工业化程度较低的发展中国家，城镇人口比重一般在30%以下。1949年，我国城镇人口只占总人口的10.6%，到1984年上升到了31.9%。建国以后，凡是国民经济发展较正常的年份，城市人口的增长与粮食产量、工业产值、人均国民收入的增长是基本同步的。需要注意的是，这里说的城镇化不等于大城市化。在城镇化趋势中，城是一头，镇也是一头。一些发达国家在城镇化过程中，农业人口转移主要采取了行业流动与区域流动相结合的方式，即离开农业的人口基本上都进行了跨区域流动，由农村流向大城市。以日本为例，它的大量人口集聚在东海岸一带的城市群中，仅东京、大阪、名古屋三大城市圈就集中了全国50%的人和70%的产值，而这三大城市圈只占全国土地面积的6%。大城市的畸型发展、规模膨胀所带来的一系列“城市病”，已成为这些国家难以下咽

的苦果。从本世纪70年代开始，在这些国家里大城市居民迁往郊区或中小城市，工厂在政府鼓励下迁出大城市，已逐渐汇成一股其势不小的潮流。这些国家在城镇化过程中走过的曲折道路，我们应该引以为戒。

“离土不离乡”的方式，是一些发达地区多年来实践着的方式。这种方式的主要特征就是：农业人口的行业流动与区域流动相分离，建设小城镇与兴办乡镇工业相结合。实践证明，这种方式的作用是积极的，效果是明显的。

调查资料表明，小城镇每安排一个劳动力，需要提供生产、商业、服务方面的投资约为4500元，与大城市每安排一个劳动力仅生产投资就需11000元相比，节省的不是个小数字。随着乡镇工业的兴起，小城镇正以一种引人注目的姿态在中国的经济社会舞台上扮演着重要角色。

小城镇不仅起到了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蓄水池”和控制农业人口盲目涌向大城市的“节制闸”的作用，也开始改变了农村搞农业、城市搞工业的传统格局，使城乡联合发展的战略真正成为群众的实践。作为这一联合发展的“媒介”，小城镇在我国农村经济由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转化，历史进程中所起的作用，已为人们所普遍承认。

根据上面的分析、比较，我们认为，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方式应以“离土不离乡”为主。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对其它方式的排斥。近年来，一些省的乡镇企业已经吸收一大批农村劳动力，如“侯鸟式”地春天出门、冬天回乡，平均在外工作10个月的也为数不少，仅这两项合计，约能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一半以上。同样，提倡大力发展小城镇，也并不意味着不能发展中等城市，或大城市规模一定不能扩大。在这些经济发展较慢，城镇布局过于稀疏的地区，则应有计划地建设中心城市，以使城镇布局更趋合理，使众多的小城镇有所依托。

由于地区间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生产力发展的多层次性，以及中国农民商品经济认识程度上的差别等因素，决定了各地区发展经济的路数、劳动力转移的方式，不全是一个模式，而是千差万别的。这应当是考察当前中国农村的现状后得出的合乎实际的结论。

（载《海南特区报》1989 年 6 月 3 日）

同乡镇企业同志谈政治体制改革

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长远目标，是建立高度民主，法制完备，富有效率、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政治体制。这是需要长期努力才能实现的。值得高兴的是，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政治体制改革已经摆上党委的议事日程，正在开始起步。对于这一进程，我们客观地说，一是不要估计过高，二是不要估计过低。不能估计过高，是因为现在还只是开始起步，有好多事还没出台，即使出了台的还有个工作相适应的过程，有个完善、提高的过程。没有出台的则往往是难点，是需要做更多准备工作、并且在出了台以后还要付出更大努力的。

据我们在南京市、苏州市和金湖县、盱眙县调查，乡镇企业家和市县干部希望政治体制改革的进行能符合如下的原则：

(1)政治体制改革的目的是促进经济体制改革，有利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应当先做。

而且，从根本上说，政治体制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唱的是一台戏”，不仅不互相矛盾，而且是互相促进的。但是，经济体制改革的出台早于政治体制改革，实践赋予它的机制需要由实践来检验，因此需要时间，需要看一看，不宜过早地从政治上予以肯定或否定。

(2)政治体制改革应该从大多数群众关心的“热点”着手，同大多数群众利益贴得更近一些，“子忧予忧，子惧予惧，子喜予喜”，这样，才能得到广大群众的关心支持。

政治体制改革要解决的问题很多，有长远的和当前的，有政治

的和经济的，有多数人直接感受到和只少数人意识到的。情况不一，那么从哪里着手呢？是绕开难度大的“热点”还是贴近“热点”克服困难呢？比如说，现在企业和群众特别关心企业自主权、企业活力、价格问题、市场问题等等，迫切希望有高效廉洁的各级领导机关为下面服务，党中央不失时机地举行了几次会议，及时地提出了“经济要繁荣，政府要廉洁”的口号，这一口号包含 了相辅相成的两句话，包含了群众认为缺一不可的两层意思，因而是得民心的响亮口号，也是政治体制改革的现实任务。这些，既贴近民意，又符合“政改”要求，因而是深受欢迎的。

(3)如果说政治体制改革和经济体制改两者有所不同的话，我们的体会，其中之一是：经济体制改革主要由下而上地推动，活力首先来自基层；政治体制改革主要应由上而下地推动，发动首先来自上面。这样，对各级领导机关的要求就高了；从一个省、一个县来说，领导机关应自觉地意识到这一点，真正起表率作用。

还是在前年，对机构改革进行试点的时侯，有的领导部门曾要求中间层次的机关率先实行。当时下面就有这样的反映：“下动上不动，越动越被动。”后来这句话果然应验了。倒不是说持此看法的同志是如何地高明，而是实践使他们料事比较符合实际的发展。这说明，有实践经验的人们的意见，是最值得重视的。

（载《江苏乡镇企业》1989 年第 3 期）

六年办厂无失误的奥秘

——常熟市王庄乡的经验

依靠市场调节的乡镇企业，投入较准、办得较好的工厂为数不少；而在一个乡的范围内，连续几年没出投入失误、生产瘫痪的企业，则为数不多。江苏省常熟市王庄乡从1984年以来的6年中，共投资4080万元，兴办57个企业（乡办10个，村办47个），个个成功，无一失误。

成功的投入带来了明显的效益。1989年王庄乡实现工业产值2.17亿元，利润1900万元，分别比1983年增长6.7倍和6.3倍。20家乡办企业中，有5家利润超过100万元；19个村中，11个村的村办企业利润超50万元。

王庄乡6年办厂无失误的主要经验是：

（1）决策人亲自出马抓市场信息。了解市场是正确决策的前提。过去农民办厂往往以左邻右舍的举动为信息，人办我办，一哄而起，于是造成布点重复，结构失调。王庄乡的乡、村干部亲自走南闯北，掌握市场信息，然后作出决策。塘湾村在80年代初曾办过两个小厂，终因对市场了解不多，产品大量积压而倒闭。1987年初，新任党支书吸取教训，把了解市场信息放在首位，认真分析市场信息，然后才办“红星电讯厂”，投资当年就获利70多万元。

（2）有关方面严格把关抓论证。6年来，王庄乡办厂有个规矩：每上一个新的企业，都要约请有关专家作顾问，银行、财政、税务、工商等部门作参谋，从资金、设备、技术、工艺、销售、经济效益等六个方面进行充分评估。为防止低水平重复，他们明确规定新办企业三年内务必收回投资；凡经济效益不高，不够成熟的项目，一概不

上。1984年5月，他们得悉有一种配套电子元件紧缺，而且投资仅需要16万元，但他们同样组织专门力量对市场作了5个月的调查，并聘请专家进行多次论证。由于论证严密，产品很快投入批量生产，经济效益明显。

(3)发展横向联系找依托。王庄乡近几年新办的57个企业，大多数与上海、南京、苏州、无锡等大中城市的一两个单位建立了固定联系。这些单位或提供信息，或支持技术力量，或提供资金联营，或帮助推销产品，为乡村企业立于不败之地出了大力。

(4)内外结合抓人才培养。新办企业在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的首要条件是人才优势。王庄乡因地制宜，从三个方面抓人才培养。一是抓引进，先后从全国各地引进工程技术人员近120多名，其中高工20多名。二是抓培养，先后选送了100多名本地青年到大学和中专、技校学习，提高专业技术，学成回厂。三是抓提高，开办各类专业培训班120多期，培训职工7300多人，使全乡新办的57个企业中，70%左右的职工达到三级工以上的水平。

（载《中国金报》1990年12月7日）

《明星》有黑点　原因堪深思

乡镇企业在它发展的过程中培养、造就了一批能人和企业家，许多从实践中锻炼出来的企业家和能人为乡镇企业的成长作出了贡献，还创出了一批“明星”企业。现在，既充分肯定乡镇企业的作用，也注意帮助它健康成长，包括让“明星”抹去其自身的灰尘，是并行不悖而极有意义的事。

据江苏省有关部门最近对扬中县三个企业的调查和分析，这三个“明星”企业所暴露出来的经济犯罪情况，除一般经济犯罪的共性外，还具有三个特点：(一)经济犯罪分子成串。在这三个企业中，揭露经济罪犯 21 人，经济违法人员共 58 人。(二)犯罪金额大。三个单位的经济犯罪分子侵吞公共财物共 50 余万元，其 万元以上贪污、受贿案犯 7 人。(三)对集体经济危害大。由于“小洞不补，大洞一尺五”，这三个企业有两个亏损，一个出现了严重的生产危机。

剖析这三个企业出现这么严重的问题，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一、居功自傲。据调查，这三个厂的负责人过去对企业的发展都曾立下汗马功劳，有的把濒临倒闭的企业发展成为初具规模的乡镇骨干企业；有的白手起家，使企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有的被誉为一心为公的“优秀共产党员”、“农民企业家”。他们过去曾得到群众的尊重，有过较高的威信。但是，“家大业大，业大胆大”，他们中的有的人居功自傲起来，见财眼开，从而走上了犯罪的道路，由“功臣”变成了“罪人”。

二、任人唯亲。他们喜欢搞“一言堂”，个人说了算，用会计、用保管员用“贴心人”。这些人互相间失去监督，甚至同流合污。三个企业揭出的21名经济罪犯中，厂级干部有7名，会计和仓库保管员有4名，都属于从“心照不宣”、互相包庇而一起堕入法网。

三、管理混乱。这三个企业中，有的缺乏必要的管理制度，有的虽然建立了各项制度，但有章不循。如原料进出仓库不建账，产成品进出厂门没有手续，门卫形同虚设，几名仓库保管员从1987年至1989年仅两年时间，贪污达3万余元。

四、法制观念淡薄。从调查的情况看，有的把犯罪当作是一般思想认识问题，甚至把犯罪所得当作正当收入。有一个厂的厂长是个工作肯干、常受表扬的中年干部，在逮捕他时，自己竟然还惶惑不解。

五、有关领导溺爱。有些领导干部对一些“能人”往往看成绩多，看缺点少，平时只表扬不批评，对已发现的问题往往视而不见，使他们成了说不得、碰不得、动不得的“惯宝宝”。还有个别领导干部甚至受到一些小恩小惠的腐蚀拉扰，上梁不正下梁歪，自觉或不自觉地成了“明星”企业少数犯罪分子的保护伞。

少数“明星”企业中有些“能人”走上经济犯罪道路都有一个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由于他们的犯罪，对乡镇企业所造成的危害是不可低估的，因此，“明星”上的灰尘尤需注意抹洗，这方面的教训尤需引起警惕。

（载《中国金报》1990年12月21日）

“草根工业”的现代化之路

20世纪80年代初期，在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同时，长江中下游两岸的辽阔平原上，又发生了一场同样令世人瞩目，其意义也决不亚于前者的伟大变革，这就是江苏乡镇企业的崛起。它的崛起，犹如一股清新的春风，给我国恬静的经济生活和广阔的农村大地带来了勃勃生机。

农民自己的选择

江苏乡镇企业的出现和形成，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哪个领导人的“灵机一动”拍出来的，它是农民实践的创举，是农民自己的选择。乡镇企业从其诞生之日起，就与农民的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它孕育于农业，依靠农业发展壮大，又服务于农业，巩固了农业。基于对这种关系的认识，费孝通先生把江苏的乡镇企业称之为“草根工业”。他说：“苏南的乡村企业到处蔓延，落地生根，历经艰难而不衰，这种强盛的生命力和普遍的适应性，不能不使人联想到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小草，草根深深地扎在泥土之中。一有条件就发芽，就蓬勃地生长。”费先生的这一比喻，极其生动，也符合当时的实际。

值得欣慰的是，十年后的今天，江苏的乡镇工业已经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不仅顽健如昔，而且正在“升级换代”，它们有的长成了小树，有的连成了“草皮”，“草根工业”正在实现着走向现代化道路的飞跃。到1989年底，江苏乡镇企业数已达到113万个，从业人员

接近1000万人，乡镇工业企业的固定资金达到277亿元，超过了1957年全国国营工业企业的固定资产总量。1989年，江苏乡村两级工业企业产值为916亿元(80年不变价)，比1978年的63亿元增加13.5倍；乡镇工业总产值 占全省工农业总产值的比重，从1978年的19%上升到49%，在国民经济中已占“半壁江山”；在苏州、无锡、常州这些乡镇企业起步早、发展快的地区，乡镇企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已是“三分天下有其二”。不仅如此，江苏乡镇企业在推动农村经济以至整个国民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中也起着十分重要的积极作用。(1)它支持了农业发展，富裕了农民。1980年以后，江苏乡镇企业用于“以工补农”的资金近30亿元；乡镇企业吸收了900多万农业剩余劳动力，占农村总劳力的32%；乡镇企业支付的工资占全省农民人均收入的30%以上。(2)它成为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1989年，江苏乡镇企业上交的税金31亿元，占全省财政收入的30%；在1978年到1988年十年间，全省财政收入绝对额增长54.4亿元，其中乡镇企业上交的占59%。(3)它为出口创汇注入了新的活力。江苏全省有400多家乡镇企业直接出口创汇。出口总额已达54亿元，相当于全省外贸收购额的29%。(4)它是农村集镇建设和社会事业发展的重要依托。这几年，江苏乡镇企业每年有3亿多元用于教育事业，有2亿多元用于集镇建设、计划生育、公路桥梁、治安、民兵、文化卫生等其它社会事业。

“草根工业”三步曲

乡镇企业和其它新生事物一样，走过了“产生——发展——提高”这样一个历程，它是在实践中不断发展、不断完善的。如果我们在乡镇工业发源地江苏，循着它二十多年走过的足迹作些剖析的话，可以清晰地看到：它在各个发展时期都呈现了冲击旧框框的特征，从而在跨跃每一个阶段的过程中都实现着自身的飞跃 。

江苏的乡镇企业，萌生于五十年代，重新发展于七十年代初期。“人多地少”是这个地区创办乡镇企业（当时叫社队工业）的内在动因。在人均耕地只有一亩左右的江苏，当时也和全国的所有农村一样，执行着“以粮为纲”、单一经营的政策，结果是在“鱼米之乡”竟出现了追加投入渐次大于产出的趋势，增产不增收已成为普遍现象。1970年，即使是农业生产水平很高的无锡县，农村人均年分配也只有七、八十元。这么低的收入，在今天看来实在是难以置信的。现实迫使这里的一部分农民去从事农业以外的其它产业，通过副业上获得的收入解决除吃粮以外的另一半生活需求。以后，随着生产力的逐步提高，客观上要求过于分散的家庭副业逐步集中，建立比较高级的生产关系。这样，具有一定规模的社队工业便应运而生了。当然，在当时的政治气候下，这里的农民和干部们只能悄悄地兴办社队工业，并巧妙地提出了“围绕农业办工业、办好工业促农业”的口号，以争取社会的认可和领导机关的支持。这是“三步曲”中的第一曲。

江苏乡镇企业真正进入高速发展时期，是在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一方面，发展乡镇企业的政治环境趋于宽松。1978年12月，党中央提出“社队企业要有一个大发展”的号召；1979年3月，国务院颁发了《关于发展社队企业若干问题的规定》；特别是1984年中共中央和国务院转发了农牧渔业部《关于开创社队企业新局面的报告》，使乡镇企业有了强有力的后盾，为广大乡镇企业工作者消除了疑虑，让大家能够大胆放手去发展乡镇企业。另一方面，经济改革的推行和深化，大大改善了乡镇企业的经济环境。农村经济核算单位的逐步划小直至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打破了沿袭了三十多年的传统经营方式，解放了农业的剩余劳动力，为乡镇企业的高速发展准备了充足的劳动力资源；计划管理体制的松动，以有计划商品经济的逐步展开，又为农村经济跳出半封闭的自然经济圈子，走向开放式的大规模商品生产轨道

提供了现实可能。于是，压抑了多年的乡镇企业，终于冲破重重封锁和羁绊，势不可挡地迅猛发展起来。这“第二曲”的气势是不同凡响的。

当然，如同一切发展中的新生事物都不会尽善尽美一样，乡镇企业也并非完美无缺的，特别是在前几年的高速发展中，不少地方确实出现了“三高一低”的现象（基建规模过量、负债经营过度、消费基金增长过高、企业自我积累过低）。1983 年到 1988 年五年间，江苏乡镇企业的固定资产翻了二番，产值翻了二番多一点，而同期的银行贷款翻了三番，资产负债率高达 59.5%，企业自有流动资金占定额流动资金的比例从 51.1%下降到 9.3%；职工工资平均年递增高于利润增长水平；相当一部分企业停留在粗放管理的水平上，不少企业设备比较陈旧，工艺比较落后，技术素质低下。乡镇企业的这些问题如果不及时克服，就会削弱甚至丧失它的市场竞争能力，以及市场调节为主要渠道的乡镇企业也将失去生存发展的能力。

面对上述现实，江苏的乡镇 业从 1989 年开始，进入了治理整顿、自我调整的阶段。这无疑是痛苦的，然而是必需逾越的难关。通过一年多艰苦的调整，正逐步走上健康的轨道。它表现为：(1)过高的发展速度有所回落。去年乡村两级工业实现产值 916 亿元，比上年增长 6.25%，比过去三年的年均增长速度回落了 30 个百分点。(2)过大的固定资产投资得到了有效控制。1989 年，乡村工业企业投资比上年减少 32%，非生产性建设基本停止。(3)过快的消费基金增长得以遏制，去年全省乡村工业支付的工资总额为 66.2 亿元，仅比上年增长 1%，比过去五年的工资年平均增长速度减少了 20 多个百分点。(4)上交国家税金继续增长。去年在乡村工业面临重重困难的情况下，上交国家税金仍比上年增长了 2.5%。(5)外向型经济保持了好的势头。1989 年完成出口产品交货额 48.5 亿元，比上年增 24.1%。“三资企业”新增 51 个，累计达到 166 个。

(6)企业的素质有了提高。目前全省乡村工业产品标准化覆盖率达85%以上，计量定级、升级取得证书的企业达2500多家。由于素质提高，有8家企业晋升为国家二级企业，72家企业被评为省级先进单位，有一批产品获国家银奖、部优产品奖、科技进步奖和省优产品称号，还有一批企业获得了部里和省里颁发的质量管理奖。这些都表明，江苏的乡镇企业在这次治理整顿中，不但没有垮下去，而且在经历了这一场严峻考验以后，更加生机勃发了。可以说，江苏乡镇企业在迈向现代化的道路上跨出了有意义的一步。

“草根工业”的第三曲，对第一曲、第二曲有继承也有否定。它继承了“草根工业”与农业的血肉联系，把“以工补农”、“以工建农”办得更扎实了，使稳定农业、发展农业更有把握了；它继承了“草根工业”与城市工业的血肉联系，并通过联营、企业集团等形式，实现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更加不可分割了；它继承了“三上两创一提高”(上质量、上管理、上水平、创汇、创新，提高企业经济效益)的做法，使“草根工业”中的一部分企业提高为现代化企业。它否定了产值中的水份，否定了以盲目扩大基本建设来求发展的指导思想，否定了“广种薄收”、“粗放经营”、“种而不管”那些从旧农业带到工业上来的做法。因此，“草根工业”的第三曲，虽无轰轰烈烈、大张旗鼓之势，却有弃旧图新、脱胎换骨之效。

实践赋予的历史任务

——乡镇企业应该在自觉调整中稳步发展。就江苏的情况看，无农不稳、无工也不稳，这一点已属无可回避的事实。作为江苏国民经济的“半壁江山”，乡镇企业不能倒退，这是时代赋予的使命。同时，进一步深化治理整顿、不断搞好乡镇企业的调整，也是十分必要的。治理整顿，就是要改造乡镇企业，使乡镇企业脱胎换骨，这既是痛苦的，也是积极的，是乡镇企业长远利益之所在，是“逼上梁

山一条路”。认识到这一点，积极主动去做，情况就大不一样了。去年张家港市提出“四抓、四扩、四争”的调整路子，即对畅销产品抓质量、扩信誉、争产量；对平销产品抓经营、扩市场、争销路；对滞销产品抓转向、扩思路、争主动；对新产品抓开发、扩批量、争领先。实践证明这种做法效果很好。

——坚持集体经济为主、多种经济成份并存。依靠集体经济发展乡镇企业，首先是利于企业技术水平的提高，形成规模效益。实践证明，一定的规模和实力是不断开发新品、增强发展后劲，在市场竞争中站稳脚跟的重要条件。二是集体企业可从利润中合理安排支农资金和兴办各种社会事业的资金，有利于乡镇企业与农业和社会事业的协调发展。三是发展集体企业有利于农民共同致富。集体经济发展了，普遍地增加了农民收入，而且，它还可以把以手工劳动为主的产品分散到各家各户去做，既扩大了生产规模，又容易形成拳头产品和系列产品。当然，作为集体经济的补充，个体和私营经济的发展也不能忽视，特别是经济不发达地区，发展个体企业和联户企业，也确实是繁荣经济、增加税收、致富农民的有效方式。以“耿车模式”而闻名的淮阴市耿车乡，这几年一直坚持“四轮驱动、双轨并进”的发展路子，全乡农民的人均收入四年就翻了一番，昔日的“讨饭乡”已被鳞次栉比的新楼房所替代。

——必须十分注重乡镇企业和农业的协调发展。江苏乡镇企业的发展道路被誉为“苏南模式”，核心是两条，一是以集体经济为主，二是工、农业协调发展，这是可贵的经验。苏南地区从七十年代就开始实行“以工补农”，后来又以展到“以工建农”，把支农建农的资金，用在提高农业的物质技术装备上，保证了农业的稳定发展。农业状况的不断改善，又为乡镇企业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和其它有利条件。两者是互存，互为发展的。现在，乡镇企业上了一定的规模，就更应该为农业多作贡献。反哺之义，人之大节，否则就是“忘本”，就会失去舆论的支持，乡镇企业就失去了依托，

反过来便会影响乡镇企业的发展。当然，补农建农也要取之有度，从长计议，任何杀鸡取蛋、竭泽而渔的做法，都会给乡镇企业和农业的发展带来不利的后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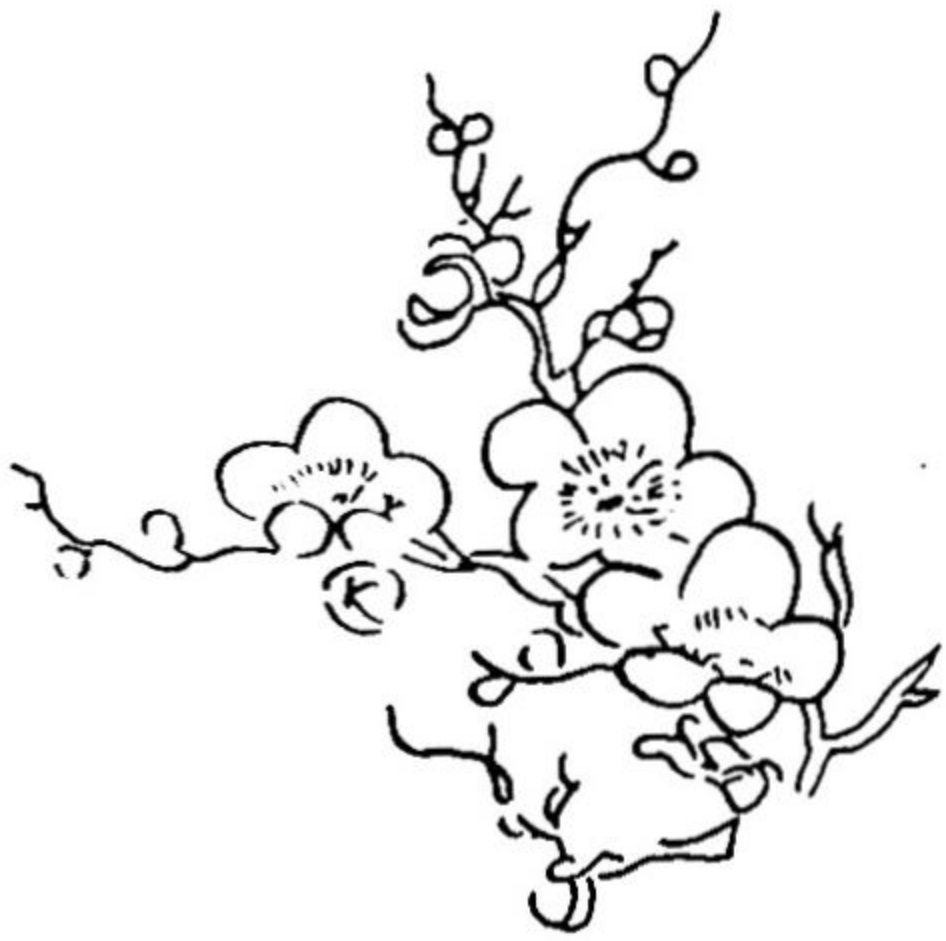
——搞好横向联合，发展外向型经济。江苏乡镇企业充分利用了较为优越的地理和交通条件，接受上海、北京、天津、无锡等大中城市的"辐射"，同国营企业、高等院校、科研单位建立横向联系，在产品开发、技术指导、资金融通、人才培训、产品销售等方面进行广泛协作，取得了显著成效。1988 年，江苏乡镇企业为大工业配套部分的产值就有 100 多亿元。象苏州的长城牌电扇、香雪海电冰箱、孔雀牌电视机，南京的熊猫牌电器、蝙蝠牌电扇、伯乐牌电冰箱，常州的金狮牌自行车、手扶拖拉机等名牌产品，无一不是与乡镇企业有紧密联合的。发展横向联合，光有"内联"还不行，还必须搞"外联"，特别是在调整期间，更要把发展外向型经济作为突破口来抓，充分利用"网开一面"的有利条件，发展"三资企业"和"三来一补"企业，发展对外贸易。吴县乡镇工业外贸出口在连续三年成倍增长的基础上，1989 年完成外贸收购额 5.33 亿元，比 1988 年增长 70%，占全县外贸收购总额的 64%。乡镇企业批准"三资"企业 27 家，占全县的 90%。这个县的乡镇企业已成为发展外向型经济中名副其实的生力军。

——苦练"内功"，改进技术、强化积累。增强企业的竞争能力和发展后劲。几年前，江苏就提出了"三上两创一提高"的方针，也取得了较好的效果。现在，江苏已有一万多家乡镇企业的基础管理验收合格，一大批企业在"抓管理、上等级"的企业升级活动中提高了素质，这些企业在去年的治理整顿期间，都保持了较好的发展势头。但是，从总体上看，乡镇企业的管理 水平还不够好，素质还不高。因此，乡镇企业在经过一个高速度发展阶段以后，应不失时机地转到强化管理、提高产品质量上来，增加产品的竞争能力。提高产品质量关键还在于改进技术，特别是在目前资金紧张，上大的项

目比较困难的情况下，更需要围绕提高质量，增加品种，开发新品，降低能耗、物耗，积极进行技术改造。张家港市塘桥镇，长期重视技术改造，可谓硕果累累。仅去年一年，就开发新品72只，当年形成产值6240万元。此外，乡镇企业还要妥善处理好积累和消费的关系，增强企业的自身经济实力。扬中县仅有12个乡，由于重视企业的自身积累，自有流动资金占定购流动资金的比重一直保持在40%以上，在市场疲软，资金奇缺的去年，仍保持了良好的发展势头，实现利润增长31.3%。相反，有些过度'负责经营的企业，治理整顿一开始，生产就难以为继了。这说明，只有搞好企业的自身积累，乡镇企业才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1990年6月4日，发表于《了望》杂志1990年48期）

小　城　镇　篇



乡镇工业的兴起与小城镇的繁荣

近些年，我省许许多多集镇的经济和各项建设事业有了较大的发展，明显地繁荣起来了。小城镇的繁荣，不是偶然的，是农村经济较快发展的反映。没有农村经济的发展，就不可能有小城镇的繁荣。

我省从1979年到1983年的五年间，种植业持续增产，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农业生产专业化、商品化的水平逐年提高。1983年，我省粮食总产量超过了600亿斤，提前两年实现了“六五”规划；农民交售的商品粮达到150亿斤，有47个县的商品粮在一亿斤以上。特别可喜的是乡村工业（即过去所说的“社队工业”）的总产值五年间翻了一番多，1983年达到158亿多元，占全省工业总产值的四分之一以上。其中社队工业产值在一亿元以上的县（市）和省辖市郊区有38个。可以说，这五年，江苏农村发生了历史性变化。

这种历史性变化，带来了小城镇面貌的历史性改观。农村影剧院、农民文化宫、农民书场、比较象样的中小学和幼儿园、简单而固定的集市贸易塑料棚……，在许多集镇拔地而起。而且，这种历史性改观的最重要的内涵，是许多小城镇正在实现两个转化：一是从单一功能向多功能转化，二是从封闭性向开放性转化，逐步成为广大乡村的政治、经济、文化和技术的服务中心。当然，在目前阶段，已经实现这两个转化的，还只是一部分小城镇不是所有的小城镇。有的转化的表现比较明显，有的表现得还不太明显。

实践证明，小城镇繁荣的支柱和动力，是乡村工业的兴起和发展。这有三个根据：第一，乡村工业大多数办在镇上或集镇的周围，自然带动了集镇本身的繁荣。如沙洲县的塘桥和乐余，常熟市的碧溪和福山，武进县的湖塘，吴江县的莘塔等集镇，都是由于乡村工业的崛起，才使集镇的面貌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第二，乡村工业提供了必要的物质基础，直接带动了所在镇的建设。苏州市六个县（市）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每年可以从乡村工业的利润中提成1000万元用于城镇建设。对此，农民用这样三句话来表述："农业一碗饭，副业一桌菜，工业面貌改。"意思是说，农业和副业过关，不过解决了温饱问题，最多略有积余；只有发展乡村工业，才有力量从根本上改变农村和集镇的面貌。第三，乡村工业的发展，促进了小城镇的精神文明建设。这是特别值得重视的。以常熟市碧溪乡为例，这个乡从1979年到1982年，乡村工业的利润约有200万元用在城镇建设上，其中扩建卫生院4万元，举办幼儿园4.5万元，建造农民文化中心4万元，建造影剧院30万元。如果没有乡村工业，要在一个乡投资40多万元进行文化教育卫生建设，是不能设想的。而且，乡村工业与小城镇精神文明建设的关系，不仅表现在资金的支持方面，还表现在改善人才流动（输入技术人员）、加快信息流通、促进科学技术下乡等方面。这些，是实现农业现代化不可缺少的内容，也是在农村进行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

也许有人要问：过去没有乡村工业，不是也有各种类型集镇的存在和发展吗？我们认为，那个时候各种类型的集镇，是属于那个历史阶段的生产力水平，有的只是农副产品集散地，有的只是某种手工业产品中心，有的是纯商业性集镇，但起不了农村一定范围内政治、经济、文化三个中心的作用。现在农业生产力和农村生产关系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对小城镇在城乡经济网络中应起的作用提出了新的要求，所以，应该把小城镇和乡村工业的关系问题，小城镇的发展和建设问题，放到加快四化建设的全局和完善市管

县新体制的大局中，放到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高度，来重视它和研究它。

（载《新华日报》1984年2月28日）

从乡村工业看到小城镇

——随同费孝通教授苏南调查见闻

从1983年11月11日起，由费孝通教授率领的全国政协调查组，在江苏作了25天的小城镇调查，行程1700公里，到了常州、无锡、南通、苏州四市所属的11个县，前后看了9个县镇、9个乡镇、28个社队工厂、5个居民村、5全农村文化中心、1个国营农场。我们虽然长期在省里工作，也经常下去跑跑，但象这次这样地集中时间和力量，围绕一个专题进行调查研究，也是机会难得的。何况这次调查组内有几位著名的学者，有几位行家，如钱伟长、罗涵先、李梦白、齐康等同志。因此，对我们来说，虽然还是走马看花，然而确实是一次向实际学习，向专家学习，向同行学习的过程，虽行色匆匆而获益匪浅。而且这次调查工作进行之前，已经有了良好的基础，这就是费孝通教授及其助手已经对吴江各镇做了系统的调查研究工作，江苏有关各市、县做了大量的材料准备工作。如果说调查组的活动不过25天，调查时间有一定限度，其实，调查组这次拿到的、听到的材料，则是由更多的人，花了更长的时间，比如两个月甚至半年的时间作了准备的。因此，这次所产生的“功”，应该是多于25天所用的“力”。

（一）

这次调查组看得最多，议得较深的是社队工业的问题。社队工

业在江苏农村，究竟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调查组在看到了活生生的客观存在以后，看法是容易一致的，是有共同语言的。有人对社队工业看得不多或只凭一些传闻而作判断的，就不尽然了。打个不一定妥当的比方，对社队工业，往往象看待刘姥姥进大观园一样，认为不是走正道，是向大户“告贷”、“打秋风”而嗤之以鼻。事实上，对社队工业，农民不是这样看的，县社队干部也不是这样看的。这里先摆几个综合性的数字：

(1)社队工业在全省占有重要地位。1983 年，全省工农业总产值突破了 800 亿元，社队工业产值达 158 亿多元，约占工农业总产值的 19%，即五分之一。1983 年，社队工业上交国家税收达 12 亿元，占全省财政收入的八分之一。

(2)社队工业有力地支持了农业生产。1978 年到 1982 年，社队工业利润用于购置农业机械 2.89 亿元，用于农田基本建设 4.74 亿元，用于支援穷队 2.07 亿元，用于集体福利事业 4.07 亿元。以上四项，合计 13.7 亿元，占社队工业这几年利润总数的 20%以上。江苏省总的说是地少人多，人均耕地 1.3 亩左右。在我们所到的苏州、无锡、常州、南通地区，人均耕地只有 1 亩左右。因而，农业自身积累的能力十分有限，依靠国家财力又有一定的限度，这不能不影响到农业生产条件的改善。而社队工业提供的支农资金，对这几年农业生产的稳定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

(3)社队工业增加和保证了农民收入。社队工业工资总额和利润返还参加集体分配给社员数：1978 年为 9.4 亿元，人均 18.55 元；1979 年为 10.22 亿元，人均 20.31 元；1980 年为 15.03 亿元，人均 25.85 元；1981 年为 16.84 亿元，人均 29.27 元；1982 年为 17.93 亿元，人均 34.94 元。

前面数字是讲全省，还看不出社队工业利润返还比重的份量。在苏州、无锡、常州、南通这些市就明显得多了。以苏州市为例：

项目 / 时间 / 数字	社员人均分配（元）	来自农业%	来自副业%	来自社队企业%
1970年	91.20	72.7	17.8	9.5
1976年	155.3	54.3	19.7	26
1978年	134.0	41.4	17.1	41.5
1979年	156.90	55.5	16.8	27.7
1980年	156.1	31.6	28.8	39.6
1981年	175.54	28.0	22.7	49.3
1982年	255	39.1	10	50.9

上列数字有力地告诉我们，农民从社队工业获得的收入，所占比重越来越大，起了丰歉保收的作用。广大农民已经从切身利益中，抱住社队工业不放了，可以说，产生了“与荣俱荣，与枯俱估”的感情。

(4)社队工业容纳了近400万农村多余劳动力。这些劳动力，主要是青年，有一定文化水平的小知识分子、相当数量的妇女这三种类型，也就是农村中的新一代和比较活跃的一些人。这些人能够稳定在农村，是一种情况；这些人不能稳住，又将是一种情况。社队工业的巨大作用就在这里：它一方面起了控制城镇人口继续涌向大中城市的“节制闸”作用，减轻了大中城市的人口压力；另一方面又起到了吸收农村多余劳动力的“蓄水池”作用，缓和了农村人多地少的尖锐矛盾。陈云同志说过：“农民是个大头，把这个大头安排好了，中国的大局就定了。安排不好，国家就不得安定。”社队工业已经发挥的作用，符合陈云同志提出的要求。

社队工业改善了人口流向，使农村的剩余劳动力，既没有象资本主义国家的农民那样以破产为代阶涌向大中城市，也没有象他们先辈那样背井离乡另谋生计，而是在农村安居乐业。随着社队工业的发展，逐步实现从狭义农业向广义农业转化、农业人口向非农业人口转化、农村人口向城镇人口转化的历史进程。这一意义是不

可低估的。

从上面所摆的四个方面的数字，是想说明一下社队工业已经发挥的作用，说明一下同它农村、农业、农民的血肉关系，说明一下它的产生和发展的必然性。这里还应该说明，江苏、主要是长江两岸的社队工业，这些年来，已经经历了一个调整和整顿的过程，这是一个以经济效益作为优存劣亡标准的过程。举例来说，前几年苏州地区有78家社队办电扇厂，显然太多了。经过整顿，只有十余家以质量好、成本低的因素被保留了下来。所以，这些地区的社队工业正在比较稳定地成长，并且在上海经济区发挥着确实存在的一定作用。

从七十年代初期江苏社队工业兴起，迄今已有十多年的实践作了检验。是否可以说，社队工业的兴起、存在和发展，是农村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大工业、大中城市生产力发展的客观需要。社队工业，一头连着广大农村和农民，一头连着大工业和大中城市。正是这两者的“合力”，产生了和不断作用于社队工业。这就是我们今天需要多加研究中国式的农村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的道路，中国农村和农民实现小康和富裕的途径。

（二）

社队工业与小城镇的关系，是调查组二十多天来接触多、问得多的另一个问题。大量的材料告诉我们，两者是谁都离不开谁的密切关系，是相互带动、相互依存的血肉关系。可以这样说，县镇也好，乡镇也好，不论那一种类型的集镇，以发展社队工业来带动集镇的繁荣，可能是目前能够找到的、使小城镇成为一定范围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可靠途径。用发展农副业和手工业或其他各业的办法，当然也可以使集镇繁荣起来，但仅仅这样，还很难把小城镇建设成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这是若干小城镇的兴衰史所告诉我们的。这有三条理由：

第一，社队工业大多数办在镇上或镇的周围，自然带动了集镇本身的繁荣。象沙洲县的乐余和塘桥，常熟市的碧溪和福山，太仓县的浮桥和横泾，吴江县的莘塔和黎里这些镇，都是由于社队工业的崛起，才带来了所在镇的旧貌换新颜。反之，有些镇由于社队工业抓得迟，就没有力量进行城镇的建设和改造。如有名的文化古镇吴县甪直镇，社队工业产值仅 400 多万元，利润更是寥寥，既无法安置得业人员，亦无力进行城镇建设。所以，市镇在册人口逐步减少，从解放初期的一万人减到现在的 5000 人，市容也没有太大的改变。这类事例比比皆是。

第二，社队工业提供了必要的物质基础，直接带动了所在集镇的建设事业。苏州市五个县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每年可以从社队工业利润中提取 1000 万元用于小城镇建设，包括翻修街道，挖河架桥，兴建影剧院，兴办农民文化中心，支持学校、医院建设，改善生活设施，等等。对此，农民用三句话来表述："农业一碗饭，副业一桌菜，工业面貌改。"意思是说：农业和副业过关，充其量不过解决温饱问题和略有积余；只有发展社队工业，才有力量改变农村和集镇的面貌。

第三，社队工业的发展，促进了小城镇的精神文明建设。常熟市碧溪乡从 1979 年到 1982 年，社办工业利润用在城镇建设上的共有 200 万元，其中有：扩建卫生院 4 万元，举办幼儿园 4.5 万元，建造文化中心 4 万元，建造影剧院 30 万元。如果没有社队工业，要在一个乡投资 40 多万元进行文教卫生建设，是不能设想的。而且，社队工业与小城镇精神文明建设的关系，不仅表现在对科、教、文、卫、体"五业"建设资金的支援方面，而且还表现在改善人才流动（输入智力）、加快信息流通（政治、文化、科技和商业信息的传递）、促进科学技术下乡等方面。这些，是实现农业现代化不可缺少的内容，也是在农村进行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

说到这里，应该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了：过去没有社队工业，不

是也有各种类型集镇的存在和发展吗？这如何解释呢？我们认为，那个时候各种类型的集镇，是属于那个历史阶段的集镇，反映了那个历史阶段的生产力水平。有的是农副产品的集散地，有的是某种手工业生产中心，有的是纯商业性的集镇，但起不了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作用。现在农业生产力和农村生产关系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对小城镇应起的作用提出了新的要求，所以，应该把小城镇建设的问题，放到加快四化建设的全局和完善市管县新体制的大局中来重视它和研究它。

（三）

这里想提出两个问题。

社队工业是有生命力的。有的同志说它是得天独厚，因为它们靠近上海这个大城市和若干中小城市，在沪宁铁路沿线。但这只是一个方面。它们还有先天不足和营养不良的另一个方面。所以，问题不少，困难很多。江苏有2000多个小城镇，但情况很复杂，发展有快慢，苏南、苏中、苏北的差异性很大，在规划和建设方面存在不少难题。提出这一点，是为了使大家有个清醒的认识。我们还要努力，还要进一步做调查研究工作，从而对小城镇的不同类型及其发展的客观规律进行探索。

“社队工业”这个名称，反映了当时由人民公社和生产大队办工业的实际。从现在已经变化了的体制情况出发，特别是从工业体系的不同组成部分这个实际情况出发，我们认为，应该把“社队工业”正名为“乡村工业”为好。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 顺则事不成。让我们把社队工业放到整个中国农村工业化、现代化的大局中，来认识它、研究它、支持它。据此设想，把“乡村工业”作为本文的题目，以供对这个问题有兴趣的同志共同探讨。

（载《群众》杂志1984年第3期）

三千里路镇和乡

——随同费孝通教授苏北调查见闻

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教授继去年十一月的苏南调查之后，今年四、五月间又风尘仆仆来到苏北，考察了徐州、连云港、盐城、淮阴、扬州五市的乡镇企业和小城镇。我们有机会与费老同行，途径二十余县，在其中的九个县作了停留，同当地的各级干部进行座谈，参观了一些小城镇，走访了十家工厂和一个农民新村，赶了两次"集"，历时二十余天，行程三千华里。一路所见所闻，令人振奋，也发人深思。

小城镇的状况如何，集中反映了一个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水平。近几年来，苏北农村经济的巨大的变化，不能不给本地区小城镇的建设带来积极的影响。当然这种影响还不象苏南那样广泛和明显，苏北小城镇建设的总的水平还远不及苏南，但联系苏北的历史来看今天的小城镇，确实有了新的起色、新的发展、新的希望。

目前，苏北农村小城镇的形态大体上有三种：一种是县城，一般都建设得比较好，功能也比较多。第二种是面广量大的乡镇，由于经济状况不同，大小不一，功能多少不等，乡镇之间的差别很大。第三种是"集"，赶集时人山人海，散集后冷冷清清。

苏北地区由于受历史条件的限制，过去建制镇很少，尤其在西北部的徐州市，所属六县都是一县一镇（县城）。近年来，在农业和乡镇工业的推动下，出现了一批在经济实力、聚居人口、市政设施等方面初具规模的乡镇。仅连云港市的三县农村，就有 15 个乡镇工业产值在 500 万元以上、聚居人口在 3000 人以上。这类乡镇近几年的变化是很大的。以盐城郊区的大冈镇为例，出现了五个转

化:(1)从单一功能向综合功能转化。昔日只是单一的商品集散地,今天已成为附近地区的经济、政治、文化和科技中心,"乡脚"有三十里。(2)从单一经济成分向多种经济成分转化。仅办在镇上的商业就有国营、供销社、合作、联办、个体等多种经济成分。(3)从消费为主向生产为主转化。设在镇上的各类工厂已有 28 家,1983 年产值达 2000 多万元。(4)从对外封闭向对外开放转化。镇上的工业同全国 30 多个大专院校和工厂建立了协作关系,先后从外地招聘了 73 名技术人员。(5)从乡村模式向城镇模式转化。镇上的工厂、商店鳞次栉比,公用设施基本具备。这些情况说明:只要确实具备条件,苏北应该发展建制镇。设立建制镇以后,有利于加强对乡村工业的领导,有利于扩大与外界的联系,也有利于吸收人才和增加信息流量。

通过此行,我们感觉到:苏北小城镇的发展和乡村工业的起飞是紧密相连的。同苏南一样,苏北小城镇发展主要得益于乡镇企业。如赣榆县沙河乡的乡镇工业,从 1978 年以来向集镇建设投资 190 万元,兴修了七华里长的道路,建造了自来水塔、影剧院、文化中心、商店,改善了医院和学校的条件,使集镇面貌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从小城镇兴衰的演变中,人们认识到只有抓住了乡镇工业这一头,才能促进小城镇的繁荣。

在考察小城镇的同时,我们还深深感到:苏北乡镇工业在借鉴苏南经验方面也是有其独到之处的,它们正在走一条扬长补短、适合本地特点的发展道路。很明显,苏北最大的优势是自然资源优势,它为苏北的经济振兴提供了优越的条件。苏北地区可供加工的矿藏和农副产品很多,这是它发展乡镇工业的长处所在,短处则是缺乏资金和技术。长期以来,苏北许多的乡镇企业之所以靠出售原料和只能进行初级加工,就因为受到资金和技术的掣肘。实践表明,如果不能补其所短,势必不能扬其所长。据此,苏北的发展应当是走"多利用资源,少耗用资金"的经济发展路子。具体地说:就是

在农业不断得到巩固和发展的基础上，立足本地资源，大力发展农副产品加工业，建立系列化的生产组织形式来搞产品加工业，逐步走出一条“资源优势——产品优势——商品优势——综合经济优势”的新路子。苏北经济发展的事实证明：产品加工由浅入深的过程，实际上就是资金不断积累、生产不断扩大的过程；是职工素质由差到好、技术水平由低到高的过程；也是产品不断增值、经济效益不断提高的过程。铜山县唐沟村积极利用本地资源形成了生产系列：从面粉加工到制做挂面、糕点；从家禽孵化、饲养到制成家禽腌制品；从造纸到生产纸板、纸箱，使村办工业很快发展起来，使社员收入和集体积累明显地增多了。从苏北整个情况来看，目前系列化生产生还局限在农副产品加工方面，而潜力很大的煤产品深度加工基本还是个空白。可以设想，一旦这个领域得到了开发，苏北乡镇工业的面貌将会有一个很大的改观。

这里还有一点值得提出，农民个人或联户办厂和乡镇集体办厂同时并举，这是近年来苏北乡镇工业发展中出现的一个引人注目的新趋势。今年中央一号、四号文件下达后，一至四月赣榆县就有 560 户农民出资办厂，投资数额达 510 万元，其势头明显地超过乡镇集体。现在苏北农村，农民自办的小工厂已经不是“星星点点”，而是有那么一批了，正在成为苏北地区乡镇工业一个不可忽视的部分。今后，如何加强对农民工厂的信息和技术指导，增强这些厂的应变能力，并逐步引导数量众多的农民小工厂由个体向联合发展，由小规模向较大规模发展，由分散于乡村向集中和围绕着小城镇发展，从而促进“以工建镇”，将是苏北面临的一个新课题。

同时我们也应看到，在苏北还存在着大量的“集”和小集镇，其主要特征是停留在一个区域内的商品交换、商品集散的传统职能上。这些小集镇的工业基础很差，集镇设施相当简陋，在农村商品生产的推动下，这些集市也出现了一些明显的变化：一是“集”越赶越大，邳县 47 个农村小集镇中，有 44 个集市规模由小转大，其中

万人以上大集占 40%。二是国营和供销社商业把生意做到了集市上。沛县敬安集的许多摊点，是由国营和供销社商业设立的，这就改变了传统集市只进行农副产品交换的状况，工业品的成交额大大高于农副产品成交额。三是商品流通突破了行政区划的界限。睢宁县大李集不少交易者是来自京、津、冀、川、鲁、皖等省市的。我们认为，“集”的形成既有历史的原因，也是农村商品生产发展的客观要求：(1)集市规模日趋增大，既反映了当前农村商品生产对流通的一种要求，同时又反映了商品生产的集约化程度还比较低，商品率只能通过赶集这种形式来实现。(2)集市的存在是对现在商业流通渠道不活、不畅的一种补充。实行生产责任制后，“集”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大商业的不足。(3)苏北的小集镇随着经济的发展，今后会有变化。有的要兴，有的要衰。但从总趋势看，它们是小城镇的胚胎或雏型，这是不以行政意志为转移的，而是由经济规律所决定的。

（载《群众》杂志 1984 年第 8 期）

古镇名镇建设中的一个重要问题

在江苏省众多的小城镇中，有一部分是颇具特色、需要注意保护原有风貌的集镇。如有的文化古镇，镇上有大量明清时代的建筑群和小园林；有的是水乡集镇，河湖环绕，小桥流水，乡土风貌令人神往；有的是历史名镇，镇上或出过文化巨子、历史名人，或保存着珍贵文物。保护和发展这些小城镇特色，是保留和发扬中华民族文化传统的需要，也是建设各具特色的小城镇的需要。

但是，这将遇到若干矛盾。比如说，对有的集镇来说，积极发展乡镇工业与保护水乡风貌，就是一个矛盾。对有的集镇来说，改善居民现有的居住条件与保护明清时代的建筑群，也是一个矛盾。还有的集镇，为了方便交通运输，与保护古桥等古建筑，又产生了矛盾。如此等等，都存在着一个积极繁荣经济与保持原有风貌的关系问题。这个问题，许多镇的党委和政府感到棘手。如何摆正这个关系？总的来说，应该将建设与保护统一起来，在建设中求保护，在保护中搞建设，全面规划，行动稳妥。

建设小城镇，不可能依赖国家投资，主要应当依靠自己的力量，依靠发展生产、繁荣经济来积累资金。因此，积极发展工业、手工业、加工业、服务性行业，开辟各种生财、聚财之道，是各种类型小城镇的首要之事。如果我们站在时间座标的一个点上，也就是从当前来看，则经济建设与保护特色可以出现四种关系：一是经济建设发展，名镇特色得到保护；二是经济建设发展，名镇特色受到破坏；三是经济建设发展不快或停滞，名镇特色暂时得到保护；四是经济建设发展不快或停滞，名镇特色也被破坏。

在这可能出现的四种关系中，最理想的是第一种关系，就是在发展经济中注意保护文物和原有风貌。这对那些文化古镇和水乡名镇来说，是极其重要的原则。随意填河拆桥、破坏古建筑的做法，是没有文化修养和不讲精神文明的表现。破坏容易建设难，把一个文化古镇或水乡名镇保护好，并且把它建设得更加健康、美丽，对国家、对子孙后代是一个贡献。对于少数典型性很强的古镇、名镇，如果不注意保护其特色，搞得洋不洋，土不土，面目全非，会使子孙后代回忆故土时，找不到痕迹，这是一件既有负于前人也对不起后代的事。

必须指出，从历史的观点来看，没有经济建设，就没有文物和古迹。以吴江县的同里镇为例，镇内河流纵横，石驳岸峭然壁立，河上石桥高踞，与清清的流水动静相处，刚柔相济，恰到好处。这项古建设，多少年来有效地保护了河床，便利了船只和行人，反映了同里当时的经济发展水平。一座小城镇的生命力，在于经济建设的不断发展，经济建设搞好了，文物和历史遗迹才能得到最好的保护。否则，就会出现 上面讲的第三、第四种关系，人民群众就会不满意。当然，在那些具有特色的小城镇上进行建设，也要注意另一种结果，即那种没有规划、乱来一气、污染环境的“建设性破坏”，出现上面所讲的第二种关系，这也是巨大的不可弥补的损失。过去，有过这方面的教训，现在和今后仍然值得注意。

（载《新华日报》1984 年 4 月 10 日）

实行镇管村体制势在必行

最近，国务院批转了民政部关于调整建镇标准的报告。新的建镇标准明确规定：凡具备建镇条件的乡，撤乡建镇后实行镇管村的体制。从我省一些试点情况看，撤乡建镇或镇乡合并后实行镇管村的体制，对于加快小城镇的建设步伐，更好地发挥小城镇作为农村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作用，推动农村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都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随着党的各项方针、政策日益深入人心，农村商品经济和乡镇工业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迅猛发展，出现了小城镇聚居人口日益增多，城镇规模日益扩大的好现象。象沙洲县的塘桥、常熟市的碧溪、吴江县的莘塔、无锡县的玉祁、江都县的宜陵、盐城市郊的大冈、睢宁县的大李等镇，聚居人口都已有几千人乃至上万人。这些小城镇的建设和管理任务十分繁重。但是，按照现行的城镇体制和行政层次来看，集镇仅与村政权平级，不但级别很低，而且没有管理人员的编制。大多数乡集镇只是由乡党委、政府指派一两位同志分管。可以想象，一个有成千上万人居住的集镇，生产、生活、规划、建设，千头万绪，单靠一两位同志是很难把各方面的工作组织协调好的。

去年以来，我省在农村体制改革过程中，有一些具备条件的地方，如大丰县的辛丰、吴江县的黎里、南通县的小海、江都县的宜陵、盐城县的大冈等，开始撤乡建镇或镇乡合并，试行镇管村的体制。一年多的实践证明，这种镇管村的新体制，可以避免镇乡分设带来的一系列矛盾问题，有利于促进城乡经济的协调发展和共同

繁荣，有着比原来的镇乡分设或乡管镇的体制所不具备的许多优越性。以吴江县黎里镇的情况为例，镇乡合一、镇管村以后，镇乡经济在过去已经互相渗透的基础上，进一步联结起来了；过去小城镇建设扩不大，转不动，可以说是长期在“螺蛳壳里翻跟头”，现在这种状况得到了改变；过去一个镇上“两驾马车”，很难制订统一的规划，现在镇乡建设有了一个总体布局，并正在有计划地实施；过去涉及到镇乡两家的一些工作，双方往往是客气有余，配合不够协调，现在从根本上起了变化，许多长期拖下来的课题正在陆续得到解决。所有这些，使黎里镇的建设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进展，使党的工作重心放到了城市，实行城市领导农村的体制是客观的需要。但是，中心城市与面广量大的农村，不可能直接发生联系，城市对农村的辐射力一般要通过小城镇这个城乡纽带来起作用。胡耀邦同志说过：“如果我们的国家只有大城市、中城市，没有小城镇，农村里的政治中心、经济中心、文化中心就没有腿。”要使小城镇作为城市联结农村的“腿”得到加强，纽带作用得到充分发挥，选择一个符合客观实际的镇乡管理 体制非常必要。镇管村体制之所以受到镇乡两方面的普遍欢迎，主要原因在于：首先，镇管村可以更有力地促进乡镇工业的发展，使镇的经济实力得到壮大。过去，有些地方在镇乡分设的体制下，往往是乡村工业围镇不能进镇，城镇建设“望乡”难以依托。实行镇管村，镇上、乡里都是一家人，无论是由谁牵头办起的企业，只要是于国于民有利，服从镇政府的统筹和规划和安排，都能在小城镇上争得一块“风水宝地”。按照“利益均沾，义务共担”的原则，乡镇企业大家出力，小城镇建设就不愁搞不起来了。

其次，它可以帮助专业户和乡镇企业疏理流通渠道，给他们提供科学技术和市场信息。盐城郊区大冈镇实行镇管村后不仅迅速建立起了为农民推销农副产品的贸易货栈，而且利用乡镇原有的联系渠道，在全国不少城市建立起协作点，为乡村工业推销产品，

捕捉了许多经济信息。

第三、实行镇管村有利于市镇建设统筹规划，合理布局，避免畸形发展，避免"建设性的破坏"。我省绝大多数建制镇都是镇、乡共居一地。在城镇建设工作上常常是镇有镇的长远目标，乡有乡的远景规划，开工厂各不通气，办商业互不联系，同一块地皮，镇上盖个百货公司，乡也要办个百货商店，造成市镇建设畸形发展。实行镇管村，改两个头领导为一个头当家，就可以按照镇乡经济发展的客观实际，对城镇发展作出合理的规划布局，减少矛盾和扯皮。

第四，镇管村体制有利于城乡共建精神文明。古人云："城中好高髻，四方高一尺。城中好大眉，四方眉半额。城中好广袖，四方全匹帛。"这种影响，自古到今，历来皆然。在社会主义的今天，小城镇是传播社会主义新思想、新道德、新风尚的阵地，是广大农村文化、科学、教育、卫生、体育的指导中心和活动中心，实行镇管村的新体制，有利于发挥小城镇的中心作用，使镇乡协调、共建文明。

（载《新华日报》1984 年 12 月 18 日）

日本小城镇见闻

年前我应日本成蹊大学的邀请，以江苏省小城镇研究会总干事的名义，在日本考察了十二天。在主人的安排下，访问了十七家专业户、小企业、家庭作坊和两个村级农协，也参观了由东京扩散到小城镇的三家大企业分场，还同成蹊大学、上智大学、东京大学、法政大学的十四位学者座谈了一次。所见所闻，颇有启迪。

在这次访问的馆林市(5.7 万人)，看到了富士通电器公司的分场，是前两年从东京下伸到这里来的。生产电气、通讯、信息三个领域所用的各种电脑，年生产总值 一兆日元，出口占 24%。在诹访市(4.9 万人)，看到了精工表的分场和日本光学的分场(生产五种型号的照相机)。当问到为什么要扩散到这些小地方来时，公司的人员回答有三个原因：(1)我们这种公司该到处都有分场；(2)交通方便，当地招的工人条件比城市好；(3)这里有一片土地可用。

据介绍，日本大工业分散的趋势是最近五年出现的。一是政策的决定，一是信息、营业、金融上的需要，主要分散到日本的东北地区，到西部的九洲、四国去的还比较少。因此日本工业的分布是东高西低，高技术工厂扩散到小城镇去的不少，主要是到人口流动方便之地，新干线或飞机可去之地，高速公路已到之地，有特殊条件之地，如水质好、有空地等等。

日本西部的大分县，有 129 万人口，是个靠海多山的偏僻地区。本世纪六十年代以来，农村人口纷纷外流，1978 年以后，县知事平松守彦为了解决农民进城、人口过疏的问题，先是发动“怀念家乡”运动，没有成功；后来发动“一村一品”运动，在全县树立一批

"一村一品"带头人，出现了一批年产一亿日元的专业户。这些专业户（蘑菇、酱菜、鱼类加工、灯笼、旅馆等），夫妇两人月收入在60万日元（折人民币9000元）以上，比大学教授的收入要高。我所访问的几个专业户，本人都是大学毕业生，40岁左右，在城市工作几年以后回来振兴家乡的，因此颇有抱负，也熟悉门路。

据介绍，大分县现在已有246品，打进全国各大城市和国外。由于解决了务农收入不低于、甚至高于务工的问题，因此在"一村一品"成功的单位，人口已比前几年有了增长。当鱼类加工厂厂长高桥治人（"一村一品"带头人）向我介绍到本村比去年增加了16个人口时，眉飞色舞，颇为自豪。大分县总的面貌确实不错，所有山头都郁郁葱葱，仰首才能见到树尖的松柏杉竹蔚然成林，蜿蜒的山间公路四通八达，各种类型的小城市颇具自己的特色。

无论在馆林、诹访、足利三个小城镇，还是在大分县若干村、町，我所看到的那些基本生产单位，都是人数很少（三五人或十余人），固定资产有限，有的还是几十年一贯制的手工作坊。但确实做到了小而专，只承担生产过程中的一二个环节，更大量的前道、后道、生产、供应等都由社会服务体系承担起来了。以高桥治人的鱼类加工厂为例，高桥一家三口（妻子、父亲），联系本村二十多个互助组，年产值22亿日元，全家月收入90万日元。他拥有的生产手段是一座300吨的冷库和一条生鱼脱水的流水线。销售由自己负责，每年到市场去考察十次，每次在市场呆五、六小时，以了解行情，指导生产。除此以外，其他生产、经营环节，都由社会服务体系去承担了。

据介绍，日本农民的离农倾向仍然存在，根本原因也是收入低于城里人。在这种情况下，促使农业继续得到发展的种种因素中，各级农协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日本现在已经有三个半团体研究小城镇问题。一个是以上智大学教授鹤见和子（研究美中对比专家）、成蹊大学教授宇野重昭

(研究中共党史的专家)为首的"日中小城镇研究会",这个团体还包括东京大学、东京女子大学、法政大学等单位的学者。一个是以东京大学教授小岛晋治为代表的团体。小岛最近翻译出版了费孝通先生的《江村经济》。一个是NIRA,其全称可译为"国家综合开发研究机构",属于受政府影响的专家团体,首脑是已经退休的国土开发厅次长下河边淳。除了以上几家外,农林省下面也有一个团体研究小城镇问题。

日本朝野如此注意小城镇研究,说明他们对外界的发展是敏感的,对东方模式的研究有着高度的兴趣。他们对与江苏进行这方面的交流,进行对比研究,有很大兴趣,其原因有二:一是江苏的经济在中国走在前列,又靠近上海,有城有乡有镇,对比研究最有条件。二是他们知道著名学者费孝通先生的研究基地在江苏。我认为,开展这项学术交流,对江苏的对外交往和学术研究,都是有好处的。

(载《苏州报》1986年1月19日)

务实·致用·多学科攻关

——评江苏小城镇研究

理论联系实际是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根本方针。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发展，需要哲学社会科学提供更多更好的研究成果。毋庸讳言，目前理论界存在着某些轻视实践、脱离实际、不注重中国国情，甚至绕开现实问题走的偏向。当然，一扫书卷之气，走出书斋，步入生动活泼的生活，以极大的兴趣和科学的态度研究现实重大问题，也是有的，并且越来越多。这几年的江苏小城镇研究便是一个典型。这项研究在着眼点、方针和研究力量上都颇具特色，显示出研究者强烈的实践观点和客观精神，体现了他们摒弃蹈空学风，开拓理论通向生活之路的不懈努力。

（一）

关注现实，抓住当代中国社会经济生活中的热点进行开拓性的研究，是江苏小城镇研究的根本特征。

近几年，随着经济制改革的深入进行，我国农村社会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农村经济正在向专业化、商品化、现代化发展。在江苏，农村工业的比重逐年增大，多种经济长足发展，苏南地区的农村经济较早地转变为“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的农工结合型经济。与此同时，曾一度萧条冷落的小城镇重新焕发生机。原来的农村集市、集镇逐步演变为工农融合、多功能、开放式的新型城镇。

农村经济与小城镇发展的相关变化，引起了不少领导机关的重视。江苏省委于1983年提出，要把小城镇建设成为农村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同时，这种变化也引起了以费孝通先生为代表的

一批社会学工作者极大的兴趣，他们及时将目光倾注于小城镇建设这一现实运动，并会同有关部门的政策研究工作者和实际工作者，从1983年开始，对小城镇问题开展了调查研究。许多同志通过对小城镇兴衰演变的历史考察和对现实经济社会状况的体察分析，认为小城镇作为我国城乡网络中面广量大的层次，既是乡村经济和社会生活的集中点，又是城乡和工农业发展的协调点，它的发展，关系到我国生产力和人口的分布，关系到我国城乡结构和农村现代化、城市化的模式和道路。大量的研究文章围绕小城镇人口战略、小城镇与农村城市化、小城镇的规划与布局等专题展开讨论，相互阐发，实际上体现了研究者对我国农民命运的关注和对农村现代化过程中面临的紧迫问题的探索：如何解决广大农村日益迫切的劳动力过剩问题？怎样免蹈西方社会工业发展、农业破产的覆辙，走出中国式的农村城市化道路？如何指导仍在相当程度上是自发状态的千百个小城镇的建设走向合理化、科学化？正是基于这种对小城镇意义的深刻认识和解决现实问题的高度责任感，这项研究没有把小城镇当作一般的农村社区，孤立地就小城镇研究小城镇，更没有陷入概念和本本的圈子，而是以实践为基础，以现代化建设的进程和社会主义新型城乡关系的形成为背景，历史地、综合地、系统地研究、把握建设小城镇的客观规律，探索农村现代化的道路。

这种背景广阔、意向明确、时代感强的研究，是富有生机和扩张力的。目前，对“小城镇的地位和作用”、“小城镇的工业发展”、“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小城镇的规划布局”、“小城镇的人口规模”、’小城镇的发展前景”以及“ 中心城市的关系”、“小城镇合理的城乡产业结构体系”等问题的研究，已达到一定深度，提出了多种可供选择的发展方案。部分研究成果，如《小城镇大问题》、《小城镇新开拓》、《小城镇建设探讨》等论文集，已相继出版。作为江苏第一项走上国际学术界的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已多次进行了国际交

流。这项研究，目前还在向深度和广度拓展，一方面，在研究了大量小城镇的经济问题的基础上，对小城镇的社会结构、家庭、婚育、人际关系等社会问题的研究，也正在陆续展开；另一方面，随着城市改革的全面突破和横向经济联系的深入发展，部分研究者正在拓宽视野，把对小城镇的研究扩展为对城乡关系的综合研究，诸如《具有中国特色的城乡融合之路》、《小城镇与城乡协调发展》等论文进一步深讨了社会主义新型城乡关系的具体形式和缩小城乡差别的具体道路。目前，这项研究已吸引了许多学科的学者，初步形成经济学、社会学、人口学、生态学、地理与环境保护学、规划学、建筑学等多学科结合的局面，为城镇学理论的创设迈出了可喜的一步。

从实践上看，这几年的小城镇研究不仅紧紧跟上了小城镇建设的步伐，还实现了对小城镇建设的超前指导，充分显示了理论研究在决策中应有的地位和力量。国家对小城镇的政策已从抑制、削弱转变为积极的引导发展。从江苏来说，各级党委和政府都比较注重小城镇研究动态，比较自觉地吸收运用小城镇研究的成果。这项研究，为各级领导机关对小城镇问题的决策提供了最基本的参谋意见和科学基础。这几年小城镇建设的卓有成效的合理发展，与小城镇研究的迭有成果是分不开的。

（二）

经年累月地深入第一线，虚心向实际工作者请教，是江苏小城镇研究拿到成果的重要基础。

社会科学研究应当充分认识社会，按照本来面目研究问题，否则，研究必然缺乏事实基础，难免对实践作出错误的判断，导致决策的失误。在这方面，江苏小城镇研究的步子是坚实的。关于小城镇问题的各种研究文章，内容多种多样，观点有深有浅，但大多由长期艰苦的调查研究所得。小城镇作为独立的社会经济实体和动

态变化的社区，形态各异，发育程度不一。而长期以来理论界对此问津不多，知之甚少。江苏小城镇研究课题组从 1983 开始，一个镇、一个镇地做调查，在镇上一住几十天，接触了几十个、成百个实际工作者，看遍了各种镇志，认真解剖了小城镇发育比较成熟的吴江县，了解县内各镇的基本情况。通过横向、纵向的分析和专题调查，比较完整地把握了一些单个小城镇的真实面貌和历史演变，这样的研究文章有《丝绸之乡盛泽镇的形成和发展》、《对江南文化古镇——同里镇建设的初步研究》等。进而又以一年时间，对苏南的沙洲、常熟、无锡等县，苏中的扬中县和泰州市，苏北的盐城、东台等县，作为面上的调查。到了第三个年头，研究由点到面，由定性分析进入定量分析。他们将小城镇放到“城——镇——乡”网络整体中，充分考虑到小城镇的复杂性和多面性，设计了有 400 多个指标的统计指标体系，通过划类选点，对江苏的七个县的 190 个镇进行“卷地毯”式的普查。这种精密方法的运用，一方面是从整体上、宏观上把握不同地区小城镇的现状和动态反映的需要，是研究方法的自然深化；一方面也反映了研究者没有满足于前一段调查所获得材料和初步结论，而是通过精密方法的运用和多方面多层次的考察，力求真正认识中国社会的实际，认识小城镇的实际；力求结论与客观实际相符合，为决策提供可靠的科学依据。定量研究还使“蓄水池”（表述小城镇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作用的概念）等命题的内涵得到更精确的规定，并帮助研究者开拓了新内容，提出了“不同地区小城镇发展模式比较研究”等新课题。方法上的更加精密和科学，对社会科学研究来说，既是对命题的检验，也是求学风的进步。

正因为小城镇研究坚持了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研究者普遍比较了解社会实际，比较善于理解和尊重群众的实践。对群众在实践中的创新，反应敏锐，能及时作出理论升华。“离土不离乡”的命题，准确而形象地概括了农村剩余劳动力从大田作业向非耕地经

营转移的内容和形式。“辐射”这一自然科学的名词，1983年在一个调查报告中被用来作为城市向农村经济扩散的命题，迅即被全国接受和应用，至今已成为社会科学中的特定新概念。其他如“城乡融合”、“进厂不进城”、“扩业不扩厂”等命题，都已引起人们的广泛兴趣。对各种问题的讨论和评价不玄乎，绝少以抽象的原则评判事物或用笼统的政治概念“贴标签”、“扣帽子”，而是从人民群众的现实利益和长远利益出发，从事实出发，注意客观效果，即：是不是有利于社会事业的发展？是不是使广大农民走上富裕之路？是不是促进了各项社会事业的发展？以这样三条作为检验任何调查材料的标准，而不论其他。如评价“离土不离乡”时，研究者指出：这是中国农民自己走出的一条致富之路。目前江苏每年新增劳动力的80%可以在乡镇就地消化。在五年时间里，全国有7000万农民转移到工业、商业、建筑、运输、服务等行业上去。这不仅缓和了农村人多地少的矛盾，促进农村专业化的发展，还有效地减轻了大中城市的人口压力，有利于城乡协调发展。“离土不离乡、发展小城镇”，既是中国农民的现实利益选择，也是实现我国农村城市化最经济、最合乎中国条件的办法。

尽管这项研究充分肯定了发展小城镇的积极意义，研究者并没有就此不分时地、不分条件地要求各地照搬照套。不少文章强调指出：对小城镇的建设，必须根据不同地区的条件和需要，实施分类指导；各地区有不同特点，一刀切就要出问题，有的地方工业很不发达，没有城市依托，这个地区就应首先致力于中心城市的建设。

小城镇研究这种求实的学风和客观精神，是这项研究容易和实际工作者、农民群众沟通心灵、产生共同语言的重要原因；也是其成果容易被人理解、为人接受的重要原因。这种学风的发扬，对于理论工作中某些不尊重客观的研究态度，也不啻是严肃的鞭辟。

(三)

理论工作者、实际工作者与政策研究工作者紧密合作，协同攻关，是小城镇研究的又一重要特色。

长期以来，在我们的意识形态领域，在理论工作与实际工作之间，存在着条块分割的倾向和严重的壁垒意识。理论研究互不通气，各自为战，满足于小生产作坊式的研究方法；与实际工作者缺少信息交流，理论兴趣常常与实践要求相去甚远，研究难有建树；纵或有一些有用的成果，也难以对实际工作发挥较直接的作用。理论工作者、实际工作者、政策研究工作者三者不能形成综合优势，许多实践中生出来的重大问题得不到科学解答，新的经验得不到及时的理论升华。这种局面，既妨碍了理论向实践吸取营养，又阻碍了实践接受理论的指导，更影响了实现决策的民主化和科学化，对理论的繁荣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都十分不利。

江苏小城镇研究打破了这种局面，实行理论工作者、实际工作者与政策研究工作者三结合。他们直接见面，互相合作，围绕共同的课题分头进行调查研究，并在同一个讲坛、同一个报刊版面上发表各自的见解。1983 年以来的各次小城镇研究讨论会和汇报会，《新华日报》发起的关于小城镇建设的专题讨论，都有来自理论界、党政领导部门、小城镇建设第一线等各方面同志的参加。四年来，从北京到南京，从省、市到县、乡，从研究到实际工作，“雪球”越滚越大，形成了一支由多方面人员组成的研究队伍。其中有中央、省、市各级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的专业理论工作者，有高等院校的教师和学生，有各级党政部门的政策研究人员，更多的是在小城镇上做实际工作的领导干部和管理骨干。这种研究力量的新格局，通了社会科学研究的若干领域和各个层次，加强了理论工作者之间的横向、纵向联系，也改变了理论工作者与实际工作者接触不多、互相脱节、缺少交流的状况，促进理论研究参与决策，为理论与实践的

携手并进提供了更为直接的条件。

（四）

理论工作务实致用，在我国是源远流长的传统，从“学必经世”、“经世致用”到“理论联系实际”，莫不是强调了理论与现实的紧密关系。而每当社会面临重大改革时，又总会格外强调理论的务实与致用问题，显示出实践对理论寄予的厚望。当前正在进行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的伟大实践为发扬光大这一传统提供了新的起点，赋予了新的时代涵义。从小城镇研究的实践来看，倡导和发扬务实致用的学术精神，就是理论工作者对现代不是隔岸观火，而是探珠其中。只有将研究的兴奋点放到社会经济生活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上来，努力使理论的发展跟上时代的步伐，为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的实践照亮前进的道路，才能使理论真正成为时代精神的体现；理论研究只有彻底摒弃剪裁事实求取本质的做法，才能使理论的抽象建立在对中国国情的深切了解把握的基础上；只有摒弃重观念轻实际甚至“以名责实”的做法，尊重实践，才能从时代要求出发，建立立足点坚厚的标准，客观而现实地讨论评判人民群众的各种实践活动。只有这样，理论才能释放更大的能量，沟通人民群众的心灵，实现与实践的融合、与时代的融合，促进自身的繁荣和社会的进步。

（1986 年 11 月 26 日）

小城镇建设与中国城市化道路

小城镇是我国城市化体系中的基础层次。小城镇的建设与发展是我国城市化进程中具有特殊意义的一部分。许多年来，小城镇以其在一个社区范围内居于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地位，在城乡协作、城乡结合、城乡一体化以及促进城乡关系变革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并且直接影响到我国的人口战略、科技战略和经济发展战略。而近几年的实践是否更在告诉我们，它的发展，正在开辟着中国城市化的新途径呢？我们是否可以这样提出问题：研究中国的城市化，不能不研究中国的小城镇；要抓住中国城市化问题的某些关键，有必要从小城镇来“破题”呢？

小城镇的十年变化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改革、开放的政策使我国城乡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1980 年，国务院批准确立了“严格控制大城市规模，合理发展中等城市，积极发展小城镇”的城市发展方针，由此带来了我国城镇发展历史上的“黄金时期”。1987 年我国建制镇总数增加到 10200 多个，比 1980 年的 2600 多个增加了近三倍，建制镇人口也由 1980 年的 5800 万人增加到 24300 万人，此外，还有未列入建制的乡级集镇 58000 个。从 1978 年到 1987 年的十年间，有 190 个小城镇升格为县级市或省辖市。从江苏来看，到 1988 年底，建制镇已达 524 个，比 1984 年增加 333 个，人口 1266 万人，占城镇人口的 39%，占全省总人口的 19.67%。反映城市化水平的两个

重要指标：工业化率和城镇化率，1987 年分别提高到 48.08%和 45.39%。建制镇的大量增加，小城镇工业化程度的提高和农村人口 向小城镇转移的加快，表明我们正在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不同于西方发达国家的城市化道路。

小城镇的发展与变化，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

（一）从单纯的工、农产品的集散地向城乡之间生产要素双向流动的"纽带"转化。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我省城乡间的交流，仅限于工业品下乡、农产品进城的单向对流。乡镇企业向小城镇集聚，带来了人才、资金、技术、信息、原材料等生产要素的集中，也带来了小城镇人流、物流、信息流的增大。小城镇一头连结农村，一头延伸到城市，成为城乡之间双向交流的"枢纽"和"差转台"。这一特点，在苏南地区表现得尤为明显。

（二）从封闭、半封闭状态向开放状态转化。在改革、开放的形势下，小城镇作为农村发展商品经济的舞台而引人瞩目。最突出的是三点：一是小城镇的市场打破了行政地域的界限，按照商品经济自身应有的规律运行，从而出现了一批综合市场与专业市场。苏锡常地区集聚在小城镇上的各类专业市场就达百家，形成了万商云集的局面。二是以小城镇为依托的乡镇企业，广泛寻求经济的横向协作和联合，从而成为促进城乡关系发展的重要动力。1987 年，我省乡镇企业建立各类联合体 3172 个，联合的产值达 80 亿元，占乡镇企业总产值的 12.27%。三是发展外向型经济，开拓国际市场。江苏对外开放镇已达 962 个，1987 年全省乡镇企业的出口收购额为 32 亿元，直接出口额占全省出口额的 1/4，并开办了一批中外合资企业，出现了一批发展外向型经济的明星城镇，小城镇已日益成为我国对外开放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从盲目、无序发展向科学、合理、有序建设转化。"六五"期间，在有关部门的努力下，江苏省首先完成了 56 个县城和一大批中心镇的总体规划，城镇建设基本结束了盲目、无序发展的历史，

进入了统一规划、合理建设的新阶段。苏南地区，小城镇建设已由“办厂兴镇”，着力增强生产功能，逐步转向生产、生活并重，工业、商业并举的阶段。部分小城镇已开辟了经济技术开发区，正在调整、整顿，以创造条件实现乡镇企业的适当集中，达到企业供给的社会化和生产经营的集约化。如果这方面取得较大进展，将是小城镇发展进程中具有深远意义的一步。苏北地区的广大小城镇，得益于农业基础的稳固和乡镇企业经济上的支持，也正在改变“集市”式的面貌，走向农村“政治经济中心”的台阶。

（四）从简单的集聚人口、发展生产的功能向两个文明建设并举转化。小城镇在一个社区范围内居于中心地位，集中反映一个社区内政治、经济、文化的综合水平。以发展集体经济为主体的苏南模式，其鲜明特色之一是：小城镇在发展物质生产的同时，也责无旁贷地起到了精神文明建设的“窗口”作用。许多小城镇建起了综合性的农村文化中心，广大农民学习科学文化知识，开展业余文体活动有了自己的场所，为促进和加强城乡科技、教育、文化交流提供了条件。与文明建设相适应的思想建设近年来更加注重内容，讲求实效，从最初的治理脏、乱、差，发展到包括精神文明建设多方面的内容在内的文明单位和文明城镇的创建。在思想风尚方面，小城镇在社区范围内影响着农村，带动着整个农村的两个文明建设向前发展。

小城镇在中国城市化道路中的地位

城市是工业化的伴生物，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经之路。它有着共循的一般规律，也有着受时空条件和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所制约的特殊性。这一特殊性决定了推进城市化的不同方式和每一偕段不同的发展重点。

寻找具有中国特色的、符合中国国情的城市化道路，先要找到

制约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基本矛盾。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随着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农村劳动力在农业耕作上的游离量越来越大，这在人口稠密、人地矛盾突出的江苏显得更为明显。1988年底，我省有1500万个农村剩余劳动力急需寻求出路。另一方面，由于种种主客观原因，长期以来城市发展上存在不少弊端，承受能力十分薄弱。显然，走发展大中城市以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城市化道路，是行不通的。这条路在中国不能走，也走不通。如果置国情、省情于不顾，将矛盾转移到城市，我们有什么妙棋，可以避免重蹈农村　敝、农民破产、大城市恶性膨胀的道路呢？这就必须在人满为患的城市之外找到新的接纳空间，在城市化的一般规律中找出更利于解决我国特殊矛盾的具体形式。小城镇作为农村之首、城市之尾的社区，作为城乡联结之网的网结，则以其不可或缺的功能显示了它在实现我国城市化进程中的独特作用。以大力发展和规划建设小城镇为特色的城市化道路，或许将是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以人们主观意志为转移的满意选择，如果我们在这里不说是最佳选择的话。

探究小城镇与中国式城市化道路的关系，这几年我们比较多的看到了小城镇的"蓄水池"作用和"分洪截流"的功能。诚然，这是我国在推进中国式城市化过程中所要解决的基本问题之一。但小城镇的兴起和繁荣给人们的启示远远不止这些。我们所要探索的是一条要社会主义质的规定下，不同于西方发达国家的新路。它应该是以社会的稳定和安定为前提，以城乡协调、共同繁荣为目的，以尽可能小的代价换取尽可能大的社会综合效益。因而，中国特色的城市化道路应当具有量与质两个方面的规定性：所谓量，即城镇发展的规模和数量，城镇人口和其国民收入在总人口和国民总收入中所占的份额；所谓质，即城镇体系的合理程度及城乡关系的融合程度。把我们的认识建立在二者统一的基础上，有助于更科学、更全面地把握小城镇与中国式城市化道路的关系。

江苏实践的三点回答

十年来，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江苏的城镇建设有了可喜的进展，与其相伴的是城乡关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无论是苏南还是苏北，城乡协作，城乡联合，城乡一体化，都愈来愈成为一种客观发展趋势。以发展小城镇为重点的城市化道路，在实践中愈加表现出丰富的内涵。

一、小城镇的"中介"作用有所强化，推进了城乡之间横向经济联合的发展

长期以来，城乡经济发展中存在着城乡封闭、自成体系的现象。城乡两种资源，两个市场，各自的优势难以互补融通，与商品经济内在要求相适应的生产力要素的全方位、跨区域流动被人为割断。究其原因，这固然与城乡管理体制、城乡生产方式差异及商品经济发展水平有关，但从区域经济的空间组织结构看，也与缺少小城镇这一城市与农村的中介体有关。从城市作用发挥的方式和过程看，城市对农村的辐射，一般先递给城镇，再通过自身的功能，把这种能量传递到"乡脚"。没有小城镇功能的发挥，城市作用的发挥将受到限制和削弱。

十年改革，横向经济联合的兴起和发展，成为江苏经济生活中的一大特色。以积极发展小城镇为主要内容的城市化发展战略对中心城市的壮大和充分发挥中心城市的辐射作用，推动城乡横向经济联合的发展，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已有的实践表明，小城镇的合理布局和发展，是城市作用得以充分发挥和城乡经济联系得以推动的必要条件。据不完全统计，1988 年江苏全省已建立跨越城乡的企业集团 420 多个，其中工业企业集团创造的产值和税利约占全省的 30%。特别是苏南地区的小城镇较为发达，与苏、锡、常和上海、南京等大中城市，构成多层次的城乡经济、科技、文

化、信息网络，由此形成了一条面积 1.75 万平方公里，人口 1260 多万的城市工业带，创造了 701.3 亿元的工业总产值，占全省产值近二分之一。

二、发展小城镇可以改善城镇结构，变"倒宝塔"为"正宝塔"

纵观我国城市化的发展过程以及由此形成的城镇体系，我们可以看到三种现象：第一，城镇化水平很低。城镇人口所占比重与世界各国相比，我国在 120 位以后。第二，城镇化进程缓慢。世界城镇人口比重 1950 年为 28.2%，1980 年提高到 40%，年均提高 3.9 个百分点。同期，我国从 9.05%提高到 13.65%，年均提高只有 1.3 个百分点。不仅如此，在这为数不多的新增城镇人口中，仅有三分之一来自农村人口向城镇的转移。第三，城市体系表现为头重脚轻的"倒宝塔"状，即大城市人口占城市总人口的比重过高，小城镇人口占人口的比重偏低。

调整城市体系的不合理状况，不外两种途径：一是在既定总量水平不变状态下的存量结构调整，即削多补少，重新排列组合；二是在总量水平提高下的增量结构调整，即通过不同类型城市的非均衡发展，主要是提高薄弱层次的比重来改变总体结构。如前所述，由于我国城市结构的不合理与城市化水平较低同时并存，因而采用增量结构调整，并把非均衡发展的重点放在小城镇这一层次上，具有特别积极的意义。它可将城市结构的合理化、城市化水平的提高以及发展小城镇为内容的中国式城市化进程的推动，有机地统一起来。

这几年来，江苏在提高城市化水平的同时，大力发展了小城市、特别是小城镇，1982 年至 1987 年的五年间，全省新增了 10 个建制市、222 个建制镇，新增城镇人口 1500 多万。1987 年城镇总人口占全省总人口的比重达到 45.39%，比 1987 年的 13.72%增加了 31.67 个百分点。与此同时，城市体系的"倒宝塔"型结构也得以改观：到 1987 年底，全省特大城市、大城市、中等城市、小城市、小

城镇之比为 1:3:6:11:315，小城镇人口占城镇人口总数的比重升至 69%，特大城市和大城市人口比重下降到 16.87%。这些数字表明，逐步形成一个比较全理的呈“正宝塔”状的梯形城镇体系，是可以做到的。

三、星罗棋布的小城镇，成为城乡互补和协调的物质载体

中国特色的城市化道路是以城乡协调、共同繁荣为质的规定性的，这就决定了城市化进程中绝不能忽视以农村工业化和现代化水平的提高为基础。在目前工农产品比价不合理的条件下，缩小工农差别的关键在于农村非农产业，主要是乡镇工业的发展。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江苏乡镇工业已经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支柱，1988 年全省乡镇工业产值达 980.8 亿元，占全省工业总产值的 48.1%。一方面，乡镇工业的崛起和发展促进了小城镇的繁荣；另一方面，小城镇建设不断完善又成为发展乡镇工业不可缺少的外部条件。江苏小城镇研究课题组在 1986 年对六县一区 190 个乡镇的普查资料表明，集聚在小城镇上的工业产值已占 72.86%，这表明了小城镇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地位。

积极发展小城镇，推动乡镇工业发展，在城乡互补和协调中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一是伴随着乡镇工业的发展，农业的剩余劳动力向城镇转移越来越多。这部分人虽然还没有完全割断与土地的“脐带”关系，但亦工亦农的工作方式，使得他们的生活方式和生活水平逐步向“准城市化”过渡。二是在目前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有增无减的情况下，乡镇工业成为稳农、建农的主要物质手段。1980 年至 1988 年，江苏乡镇工业反哺农业的各项支农、建农资金约 33 亿元，这是稳定农业的物质基础，对稳定农村、连结城乡、推动城市化进程，是不可缺少的。

小城镇发展中的问题与思考

经济发展是小城镇发展的根本动力。江苏经济发展的历史，亦是小城镇兴起与繁荣的历史。从总体上看，小城镇在量的扩展与质的提高上，都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不仅表现在建制镇的成倍增长，也表现在中心镇作用的日益明显以及城镇体系的形成和渐趋完善。小城镇建设与经济发展的这种共生关系，表现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明显。

正因为这样，近几年经济发展中出现的问题，也往往表现为小城镇发展中的问题。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所指出的经济发展过程中"脱离国情，超越国力，急于求成，大起大落"的教训，同样可以作为我们考虑小城镇发展中教训的思路依据。"治理整顿、深化改革"的方针，给我们在更大的空间内对小城镇的发展进行反思，指出了方向。对小城镇发展中的问题，如果 不及时地加以分析、研究和解决，小问题会变成大问题，一般问题会变成严重问题。等到这些问题成了堆，积重难返，我们将后悔莫及，难以面对历史。

对江苏小城镇发展中的问题如何看待呢？这里我提出一些不成熟的看法。从江苏看，城市建设中存在的"脏、乱、差、费"问题，在小城镇建设与发展中也同样存在，只是其性质有所不同，程度有所不同，表现形式在不同时间、不同地区有所不同。

"脏"——是指污染下乡，贻害农村。城乡横向经济联合的同时，一些污染严重的工业项目，如电镀、铸造、印染、造纸亦都"下放"到了小城镇。我们发展了乡镇工业，却在相当程度上失去了原来洁净的空气和清澈的流水，"鱼米之乡"受到了严重威胁。长此以往，我们将愧对子孙后代。

"乱"——是指规划不够，建建拆拆。无庸讳言，现在不少小城镇的建设仍然缺乏科学的规划，或没有条件进行规划，或有了规划不执行。换一个领导改一次规划，随心所欲瞎指挥。个别很有保护价值的古镇，既缺乏总体规划，又没有规划指导下的设计，老街里随意冒出若干新楼，黑瓦白墙与钢筋水泥大楼并立，搞得不伦不

类。工厂、商店、学校、医院在见缝插针中穿插而起，因而无法形成工厂区、商业区、文教区。各种车辆穿镇而过，灰尘滚滚，更增加了乱的程度。

“差”——是指管理 混乱，互不配套。小城镇是一个社会，它的管理牵涉到方方面面，具有很强的系统性与科学性。但相当多的小城镇上的各项设施分属条条管理，实际上管而不理，缺乏有权威的管理机构，造成了管理 的困难与混乱。工厂有人建，马路无人修，即是一个难题。收费政出多门，建设无人问津，又是一个难题。生产设施与生活设施不配套，生产设施与文化设施不配套，在一些地区已成为相当严重的问题。究其原因，固然与经费不足直接有关，更主要的原因，还是我们没有把管理体制真正理顺，缺乏一套科学的管理体制与管理方法。

“费”——是指土地使用上的浪费，乱占耕地，圈而不用。乱占耕地的问题，几年前就提出过，国家制订了《土地管理法》后，情况有所好转，但仍不能令人满意，在个别地方已成为顽症。在城镇建设上的不顾民力财力，一味贪大求全的思想仍然有一定的市场，占地越多越好，围墙拉得越大越好，摊子铺得越开越好，盖工厂是这样，盖私人住宅也是这样。江苏省 1987 年这一年，被占用的耕地 43.7 万亩，其中未按规定批准的有 17 万亩。这确实是一个令人忧心忡忡的数字。

从效益的角度对城市化的重点和发展小城镇问题进行深层探讨，是近年来这一领域的一个热点。在这个问题上，最根本的一点还是要坚持经济效益、环境效益和社会效益三者的统一。只讲一面，不讲另两面，都是不客观的。只有经济效益，没有环境效益不行；只讲社会效益，放松对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的追求也不行。经济效益、环境效益最终归属于社会效益，即统一到为人民群众创造美好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条件这个目标。

《城市规划法》(草案)对我国城市发展方针进行了调整，原来

的三句话改成为两句话："控制大城市规模、合理发展中小城市"。这一调整，对小城镇的发展来说，是重点由量的扩展向质的程度提高提出了新的要求。对此，我们了解不多，研究不够，未必有多少发言权。但是，考虑到中国的国情，考虑到中国目前所处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考虑到小城镇在整个国民经济发展和城市化进程中的重要地位，新的城市发展方针仍有必要对小城镇提出专门要求，因此，两句话还是三句话？我们愿意看到，小城镇在我国城市化进程中继续发挥着它的不可替代的作用，我们也希望从政策上对小城镇的建设给予更多的支持，这是我们的一个愿望。

（1989年12月2日于南京，载《经济社会体制比较》杂志1990年第2期）

一介书生的六十个春秋

——费孝通《经历·见解·反思》读后

三年以前，费孝通教授曾和美国人类学教授巴博德进行了六个小时的交谈，《经历·见解·反思》即是根据这次谈话整理而成的（已发表于民盟物刊《群言》）。因此，它没有通常的字斟句酌，它时常还带有跳跃性，有着直抒胸臆式的坦率。我们不仅可以从这一谈话中了解到费先生关于人类学、社会学的见解，还可以真切地感受到费先生的心声——他五十年来生活与治学的历程，他对他个人参加民族解放斗争和民主斗争这段历史的反思。从中，我们可以从较为重要的角度看到一介书生为“解救中国”而坚定地与共产党合作的百折不挠精神。坎坷的经历，坦荡的见解，深沉的反思，构成了这一现今尚不多见的谈话录。

从所周知，费孝通是一位学者，一位放洋留学、执教京都的学者。他出生于江苏的吴江县松陵镇，十岁那年迁居苏州，并在那里渡过了至今还“故园梦寐绕苏州”（费的诗句）的中学时代。之后的六十个年头，大部分时间生活和工作在北京、伦敦、昆明等地。他从乡土中国起步走向世界，他的学说和见解也声誉日隆。很多朋友称道费先生的著作和费先生本人在国际上取得的荣誉，但给我印象尤深的，则是他与中国农民之间已经成功地架起了心心相通之桥。我的这一可谓与众不同的印象，来自我对费先生的亲身感受。我举一个实例，那是 1985 年 8 月，南京《新华日报》上发表了费先生的《九访江村》，好长的一篇大块文章，其时我正因调查任务在江苏省太仓县的乡下。我读了这篇文章，并问了好几位乡干部和村办企业干部，问的结果表明，他们虽然整天忙忙碌碌，竟无一不读这篇文

章，无不对此文的主要观点表示赞赏。学者与农民之间，心电感应如此之快，心曲如此相通，不能不使我于惊奇之余，认真地想一想为什么？

记得1983年8月我陪同全国政协调查组作苏州、无锡、常州、南通四市农村调查那一次，费先生登南通狼山归来写的一首诗中的两句："一介书生逢盛世，著书耻为稻粱谋"。学者欣逢盛世，一心为国献策，与当年龚自珍笔下的时代和文人，当然不可同日而语，这就是原因之一吧？

还有更深一层的原因，费先生说过："人不过是宇宙发展过程中的一个小小的环节。个人总是要死的，但是用它来实现发展过程的那股宇宙间的活力是不会死的。我们个人可以消失，但是我们的社会影响继续存在。我要求我留给后世一些积极的影响。""我不能把自己和社会分开，我们不能对自己的社会、国家袖手旁观。世界正在发展，我们必须在近期中建造一个强大的、独立的、繁荣的中国。我相信我们应该从自己的土地中生长"。我完全能理解费先生这段话的心情，他在《和常州钱小山先生》的一首诗中是这样写的："盛世文人属儿流？故园梦寐绕苏州。老来不慕归田乐，随众奔波为国谋。"这，完全可以理解为所有饱经忧患的中国知识分子的使命感、责任心和一片赤诚的爱国之情。

费先生的学术道路，是一条从中国实际出发的道路。他半个多世纪以来的学术生涯，系统地考察和研究中国农村问题，从而与中国农民结下了不解之缘，在学者与农民之间成功地架起了心心相通之桥，做到这一点，是多么地艰难曲折和"好事多磨"！然而，"皇天"不负苦心人，费先生的实践令人信服地表明，这一高度毕竟是可以达到的。

费先生与中国农民结下的不解之缘有一定的偶然性。青年费孝通最初是学医的，后来才转向社会科学，因为他不再满足于仅仅帮助个人治疗身体上的病痛。他认为。那个时代里人们的疾病不

仅来自身体，人们来自社会的病痛更加严重。后来，在广西大瑶山考察时受伤，来到江苏的开弦弓村姐姐那里养伤，这给费孝通研究中国农民问题提供了最初的契机。在开弦弓村，著名的《江村经济》有了第一手资料，从此一发而不可收。

费先生与中国农民结下的不解之缘更有其必然性。中国的学者要有不同凡响的成就，就必须研究中国的实际，就必须脚踏在中国这片土地上。中国的学者研究中国的问题不仅是为了方便，还因为他负有责任。历史的责任感，使学者和农民真正达到了同呼吸、共命运的境界，督促着费孝通不断地跑、多多地问、不停地写。看得多了，问清楚了，想到一起去了，农民喜欢看的文章就一篇一篇写出来了。费先生对农村中的事情都感兴趣，高龄已届八十，仍然什么事情都想去实地看一看，如愿则兴高彩烈，力不从心颓然作罢时，则无可奈何地怅然若失。我每见此种神态，不免引起“此老何其不自量力”之感，继而顿起可敬之心。其为学之诚，岂常人之能及。

费孝通与中国农民结下的不解之缘还在于他的忧国忧民之心。任何一位正直、认真的学者，都会和费先生同此心曲。费老数十年如一日地努力，就是为了中国这条巨龙早日腾飞。因而，他说“为知识而知识是游戏，只能提供有趣的娱乐，但是它们不影响世界，在一个富裕的社会，在一个富有的国家，可以供养得起一群人过那样的生活，就好象玩麻将。而我们应该用我们的精力和才智做些建设性的事情。”他主张，中国的社会学应该致力于解决中国的具体的紧迫的问题，同时，这种研究和理论上的深讨也密不可分。

费先生这样地主张，也是这样地身体力行。基于此，他近十年的研究兴趣集中在两点，如他所说，有两个“棋眼”：一是乡镇工业和小城镇，研究基地在江苏；二是中国的少数民族地区。

对于第一点，我们至少可以从两个方面来估量其意义：一方面，对于理论工作来说，“乡镇工业和小城镇”作为当代中国农村发展战略中的关键问题之一，给已经中断了二十多年的社会学研究

带来了生机；这个实践性很强的课题，促使理论研究和现实问题的研究更好在结合起来了。另一方面，对于实际工作来说，这种研究给在基层工作的同志提供了不可估量的支持。这种研究始终面对实际，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坚持从个别到一般的认识过程，不为非本质的现象所左右，从而为决策提供了比较科学的依据。这一点，在他的家乡江苏各地已见明显的成效。费先生曾说：爱国必爱乡。这一观点，无疑是较易为大家接受的。人非草木，孰能无情？诸情之中，乡情是最值得珍贵的一种。“月是故乡明”的感情，照我看，就是爱国之情的表现。所以，为自己家乡的繁荣而高兴，为家乡的进步而出力，推而广之，无疑是爱国心和责任感的体现。

说到第二个“棋眼”，我想起了一件事情。1987 年 6 月，我们陪同费先生作农村调查，天气已经很热，我们完成了在吴江的调查任务后转到吴县已经两天了。甘肃临夏回族自治州的一个访问团到了吴江。尽管费先生离开吴江时向吴江的东道主作过再三的交待，他还是感到心意未尽，于是，从吴县重新折回吴江，同临夏自治州的同志亲切叙谈了两个半天，对临夏州同吴江县的经济协作问题，发表了具体的见解。虽然我是当时参加谈话的一员，然而我这支拙笔实难全部表达他与回族朋友之间的亲切愉快之情。有一个印象是留下来了：那个时候，在费老的心目中，家乡吴江和吴江的朋友们已退居第二位，临夏州的客人则居于第一位了。用费先生自己的话说：我对民族地区有点“偏心”。所谓“偏心”，就是有特殊感情。“主要是感到历史上对少数民族很不公平，以致他们在经济和文化上落后了。我有一点‘抱不平’的心情去帮助少数民族。”这种感情最早可以追溯到五十多年前，他的新婚妻子就是在民族地区落水殉难的，为了中国的民族学研究，他失去了亲人。

费先生近几年跑了内蒙、甘南、海南、福建、湖南等地，大草原的蒙古包，河西走廊的驼铃古道，海角天涯的黎族之乡，都留下了他的足迹。马不停蹄地走着，风尘仆仆，挑灯夜谈，他希望尽早看到

整个青藏高原繁荣起来；他参预拟订了一个办法以增加甘肃一些地区农民的收入；他设法给回民提供发展现代商业的手段；他在内蒙寻找发展畜牧业的突破口。“以东支西，以西资东”的想法提出来了，并自己牵线搭桥，付诸实践，以检验自己想法的可行程度。

正因为深深地植根于民族与社会生活的沃土中，他的社会学理论才为更多的人接受和理解，《乡土中国》再版后在书店一露面即告罄尽。对江村经济，他已持续考察了半个世纪，这种锲而不舍的“开掘”，凝聚了一个饱经风霜的社会学家对社会和民族生活底蕴的不倦探索。也正是因为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和中国气 派，他的学说在社会学的世界讲坛上独树一帜。

《经历·见解·反思》这本谈话录，也是一本“袖珍版”的社会风云录，透过这篇谈话，我们可以具体地看到政治和社会变迁如何左右着一代学者的命运，如何给一代学者带来悲喜苦乐。国运昌则学运盛。学者的命运，无不和国家民族的命运息息相关、荣辱与共。学者欣逢盛世，就能有不同凡响的成就。在旧中国，费孝通因为支持民主运动，曾经上了国民党的黑名单，生命尚且有虞，何谈治学！1957 年到 1976 年，他又失去了人生中最可宝贵的二十年。从 47 岁到 67 岁，盖房、植棉、烧饭，无可回顾，更无法展望，智力上完全停滞。这是一场悲剧。

费先生谈到，他应该死过三次。第一次是在瑶山，那次极少有机会活着出来，碰巧有人发现了他，背他离开绝境。第二次是在昆明，有位朋友把他从国民党特务的枪口下救了出来。第三次是在“文革”中，他考虑过自杀但是没有去做。这真是一件幸事，他终于等来了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

仁者寿。尽管有时他不无忧伤地说：我老了。但正如他评价自己的老师马林诺斯基那样，仍然有着“值得夸耀的头脑，敏捷的反应。领会得深刻，立论明确。说得很少，总能说到点子上”。与他在一起，你可以懂得学者怎么能同基层干部和农民谈到一块去了，你

可以学会怎么探讨问题，怎么分析，怎么阐述。

古人有三不朽：立德、立功、立言。费先生有仁者之风，敦厚超脱；为国谋画，不计荣辱；著作丰盈，自成一体。人生有此一得足矣！可费先生仍然深深地遗憾"从未达到真正充分理解中国社会的水平。"他说："也许我太懒惰，我原可以有更好的成绩。我不愿为自己辩护，去指出我的限制是出于我不可避免的遭遇。我应当充分熟悉我自己的人民，那是他们希望于我的。"所以，他经常提起，自己得到的评分不可能很高，但也许在最后的评分发布之前还能把这个分数提高一点。"1985年在梅兰芳的故乡泰州作调查时，我曾向费先生出了一个上联：早作前后，大江南北，一例前生事。费先生应的下联是：千秋功罪，文章高下，尽付后人评。这副对联，或许可以作为一个注脚。

《经历·见解·反思》的问世，使读者看到了费孝通先生半个多世纪以来生活和思想的轨迹，正如他在这篇谈话结束时所说的那样："个人头脑里的东西可以通过社会积累起来，成为公共的财富。每一个人必须有助于文化的绵续和增积，因此人可以通过社会而不死的"。人们将会继续看到：一位学者，一位八十高龄的老人，一直没有放下手中的笔，仍在祖国的边区、在沿海、在这片滋养培育着他的土地上不停地走着。

（1991年2月再改于南京，曾发表于《群言》杂志）

小城镇的纽带作用

——江苏经济发展的特色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苏锡常地区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在大中城市周围涌现出一批各具特色的小城镇群体，它如众星拱月，分布在江南15,050平方公里的锦绣大地上。据1992年末统计，苏锡常地区有430个小城镇，平均每35平方公里有一个，其密集程度大大超过全国平均3000平方公里有一个小城镇的水平。在众多的江南名镇中，工商业重镇有无锡县的前洲镇、洛社镇，张家港市的杨舍镇、塘桥镇，太仓市的沙溪镇，昆山市的玉山镇，武进县的湖塘镇，等等；外贸重镇有吴江市的盛泽镇，江阴市的祝塘镇，无锡县的长安镇，等等；港口重镇有江阴市的澄江镇，张家港市的港区镇，太仓市的浏河镇，等等；名特产品之乡有华夏陶都——宜兴市的丁蜀镇，珍珠之乡——武进县的洛阳镇，大理石之乡——宜兴市的张渚镇，等等；文化之乡有吴文化的发祥地无锡县的梅村镇，教授遍神州的宜兴市宜城镇，柳亚子先生故里的吴江市黎里镇，等等；风景旅游胜地有吴县的东山镇、角直镇，常熟市的虞山镇，吴江市的同里镇，昆山市的周庄镇，无锡市马山区的马山镇，等等。这些璀若星辰的小城镇，实际上是一座座经济文化较为发达、各种基础设施较为齐全、自然景观和人文资源赏心悦目的乡村里的小城市，充分发挥了联结城乡的纽带作用，象征着未来江苏特色的城乡一体化之路。

苏锡常地区商品经济发达，农村城市化水平高于全国，固然有其历史的原因和特定的区位优势，如历史上商品经济萌发较早，水陆交通便利，又紧靠全国最大的经济中心上海市，等等，但更为重

要的是近10多年来当代苏锡常人民的辛勤劳动和建设。一方面，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是小城镇日益繁荣兴旺的根本原因，也使小城镇联结城乡的纽带作用得到了充分发挥；另一方面，省委、省政对发展小城镇给予了高度重视，如在1982年6月在常州市举行的全省第二次城市工作会议上，就明确提出了以城市为中心、小城镇为纽带、广大农村为基础、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方针，从而把苏南地区小城镇建设推向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今年7月，省委、省政府在全省城区工作会议上，又要求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充分发挥中心城市的功能作用和小城镇的纽带作用，增强其对周围农村地区的辐射力，促进城调发展，共同繁荣。

回顾江苏尤其是苏锡常地区这10多年城乡一体化的发展进程，我们看到，小城镇作为农村一定区域范围内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它在发展城乡关系中具有特殊的地位和不可代替的作用。一方面，它接受城市的辐射；另一方，它又辐射周围地区的广大乡村，即在发展壮大自己的同时，又成功地带动周围乡村经济的发展。所以说，在一定的社区范围内，经济发达和城市、城镇密集程度是相互联系、相辅相成的。农村经济的发展，促进了城市和小城镇的兴旺；城市和小城镇的发展，又极大地推动了周围地区广大乡村经济的繁荣昌盛。在这一相互作用过程中，城镇发挥着联结城乡的纽带和桥梁的作用。具体说来，表现在如下五个方面：

第一，小城镇是农村商品流通的中心。过去的小城镇，大多只是农副产品的集散地。而现在，已发展成为农村一定区域范围内城乡商品交汇的中心，或者说是工业品，包括各种日用品和农村工业生产所需要的各种机器设备及原材料进入农村的“中转站”，这就使小城镇的流通中心地位和作用显得更为突出。1992年，苏州市社会商品零售额达122.2亿元，其中县(市)及县(市)以下实现的商品零售额达68.5亿元，这其中的90%正是通过小城镇的流通来实现的。还要指出的是，随着农村工业的发展，大量的农村工业

产品源源不断地进入城市。小城镇作为流通中心功能的内涵更加丰富了，它已经打破了仅仅担负“农产品进城，工业品下乡”的传统格局，而且把农副土特产品送进城市的同时，也把大量的农村工业品送到城市”。1992 年，苏锡常地区农村工业产值为 1790.3 亿元，应该说，这些农村工业产品中的很大一部分是经由小城镇流转到城市或其它地方去的。

第二，小城镇是农村工业发展的中心。这一重要地位和作用，可以从 3 个方面看：(1)小城镇是乡镇工业的“发祥地”或根据地。乡镇工业的前身大多是农村“五小工业”，即小农机、小化肥、小水泥、小机械、小棉纺等等。在当时的体制和条件下，这“五小工业”几乎全部集中在公社所在地的乡镇上，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小城镇是农村工业的发祥地。(2)小城镇是乡办工业的集聚地。从乡村企业的分布情况看，乡办企业基本上布点在乡(镇)政府所在的集镇上，村办企业基本上办在本村的区域范围内。1992 年，苏锡常 3 市有乡办工业企业 11,717 家，年产值为 974.82 亿元，平均每个小城镇上有企业 27 家，创造工业产值 2.27 亿元。在农村工业产值中，乡办工业产值是 54.5%。这使我们得出结论：小城镇是乡办工业的集聚中心。(3)从乡镇目前兴办工业小区和今后乡镇工业布局相对集中的趋势看，小城镇作农村工业发展的中心地位和作用将得到进一步强化。1992 年，苏锡常地区大量乡镇工业小区的出现，是农村工业化水平提高一个显著标志。因为农村工业布局的相对集中，有利于集中供水、供电、供热和排污；有利于节省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和土地的使用；有利于统一规划小城镇建设和保护小城镇的特有风貌。

第三，小城镇是农村第三产业发展的中心。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小城镇的人流、物流和信息流等迅速增加，必然要求第三产业的发展与之相适应，因此，小城镇必然成为农村一定区域范围内交通运输、邮电通讯、信息传递、文化教育、科技咨询、法律

服务、医疗卫生等多方面、多功能的服务中心。在苏锡常农村，每个乡镇都有科技活动中心和职工学校，它们是农村科技服务和职工培训的重要阵地。小城镇则是科技人才汇集的重要场所。近年来，许多外地的科技人才，技术工人和大中专毕业生，纷纷到苏南企业一显身手、展其所长。这些外来科技人员中的大多数都工作、生活在小城镇。

第四，小城镇是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蓄水池"。据有关部门测算，到本世纪末，我国的农村劳动力将达到4.5亿人，其中有一大半剩余劳动力必须从农业生产中转移出来。这么多的农村人口要进入城市，必然是个大难题，即使再建一大批百万人口的大城市也难以容纳，国力也难以承受。苏锡常农村的实践表明，发展星罗棋布的小城镇，是解决这一矛盾的一种有效途径。1992年，该地区的小城镇容纳了乡办企业职工180多万人、外来劳动力近200万人，还有大量的流动人口。目前，苏南许多小城镇出现了外来劳动力多于本地劳动力的情况。大批农村剩余劳动力集聚于小城镇，从事工业生产、经营商业服务等非农产业，同时又"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虽然身居乡村，却能享受城市文明。这就好比一个"蓄水池"，随到随贮，随要随放。

第五，小城镇是农村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阵地。在形成社会风尚方面，历来是城镇影响农村。现在，小城镇作为农村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方面将对周围农村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农民在生活富裕之后，必然要告别那种传统的"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方式，追求现代化的丰富多彩的生活内容，学政治、学技术、学科学文化知识，要求享受健康向上的娱乐生活，等等。能够担当起这一重任的，在农村只能是作为城乡结合部的小城镇。鉴于小城镇在城乡关系发展中所处的地位和发挥的联结纽带作用，我们应该更加重视小城镇的建设和繁荣。要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实

现城乡一体化的高度，进一步加深对搞好小城镇建设重要意义的认识。在实际工作中，首先要切实加强小城镇的科学规划和合理布局。要重视建制镇的建设，形成小城镇体系的骨干框架。小城镇的建设规划和设计也要跟上。如果小城镇的布局过于分散，规模过小，那就既难以发挥其辐射功能，也难以解决城镇建设方面的种种问题。其次，小城镇的建设要从本地实际情况出发，形成特色。比如，有些小城镇地处水陆交通要地，有些旅游资源丰富，有些乡镇工业相当发达，有的则以名优土特产品而著称，等等。发展小城镇一定要注意发挥这种各具特色的本地优势，形成“一镇一品”、“一乡一品”的新格局。第三，对小城镇的经济发展、基础设施和精神文明硬件的建设，要实行倾斜政策给予有效扶持。总之，通过各种努力，尽早建成一大批经济发达、服务功能完善而又各具特色的小城镇，使之在探索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加快城乡一体化的进程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载《群众》杂志 1993

喜看《江苏名镇》播出

从1983年对全省小城镇作系统的调查研究开始，迄今已有十年之久。这十年，是江苏省经济发展最快的十年，也是小城镇大发展大繁荣的十年。

这十年里，在费孝通教授的指导下，我们出版了《小城镇、大问题》、《小城镇、新开拓》、《小城镇、再探索》、《小城镇、新天地》四本系列研究论文集，出版了《中国小城镇》（英文版）、《小城镇建设探讨》、《小城镇干部必读》、《论苏南模式》、《乡镇工业与小城镇》、《农村振兴与小城镇问题》（日文版）、《小城镇投资指南览要》等等专著。最近又出版了《江南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丛书》的第一批三本书，即《苏南模式发展研究》、《锦绣江南的现代化蓝图》、《地方精神的闪光》，引起了较大的社会反响。还于1991年评选了"江苏百家名镇"，出版了《江苏百家名镇录》，使全省119个名镇大大提高了知名度。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宣传和反映江苏名镇的历史文化和经济发展，扩大江苏名镇的社会影响；归根到底，是为了促进江苏经济和社会的发展。

我们高兴地看到，现在有越来越多的部门和人士在关心小城镇、宣传小城镇，这是好事。希望这件事在正确的方向下健康地进行。

《江苏名镇》电视艺术系列片在江苏电视台分批播出，是我们所作努力的一部分，希望在继续宣传名镇以及报道一部分近几年脱颖而出的中心镇方面，引起各界的关心和注意。

（1993年12月4日）

甪直人的精神

吴县甪直镇是我常去的地方。这十年来，差不多是我密切注视、常年观察的基点之一。今年6月初我陪同彭冲同志考察苏南农村，又来到了甪直镇。甪直镇党委书记顾子然同志在向我们介绍情况时，忽然离开正题对着我说：我们要感谢你的一篇文章，感谢你十年前对我们的批评。我们一直把这篇文章压在台板底下，天天看看，作为动力。我们这十年的进步，是有压力、有动力才取得的呀！

顾子然同志所讲的，是怎么一回事？原来，1984年年初我曾在北京的《经济参考报》上，以《江苏乡村工业的兴起》为题，连续发表了8篇文章，其中第3篇《小城镇建设关系到"四化"全局》一文（见本书《乡镇企业篇》）中，举了吴县甪直镇的例子。文章是这么说的：

"如有名的文化古镇吴县甪直镇，工业产值仅400万元，利润更是寥寥，既无法安置待业人员，又无力进行城镇建设。所以，市镇在册人口逐步减少，从解放初期的一万人减至现在的五千人，市容没有太大的改变。"

写者无意，见者有心。我在文章中这一举例，当然是小小的批评，但想不到对在镇上担任领导工作的同志却起了敲警钟的作用。他们从此树立起了"古镇要保护，经济更要发展，变相互矛盾为相互促进"的思路。他们上下一心，发奋图强，既注意保护古镇特色和名胜古迹，又大力改善了交通、通讯等硬件，数年努力，几乎是奇迹般地成为"外向型明星镇"。他们的"奥秘"是：在改善投资环境的同时，还着重改善了投资的软环境，做到了"有良好的社会治安，有优良的高效服务"，营造了良好的投资小气候，吸引了77家外商来投

资兴办企业，利用外资3亿多美金。

思路一改天地宽，几年努力面貌换。1993年角直镇工业产值已突破20亿元（比1984年增长了五十倍，惊人的发展！），1994年可望达到35亿元。古镇水乡，特色依然；新区新貌，生机勃勃。角直人的精神，是发奋图强的精神，是实干创新路的精神，是使保持特色与实现现代化取得完美结合的精神。这种精神，为苏南各名镇提供了可贵的经验和榜样。

（1994年6月10日）

对乡镇开发小区应有全新的观点

随着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精神所带来的东风，江苏十万平方公里土地上又出现了一股令人瞩目的新潮——市县镇三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工业小区、台商投资区……等等，如雨后春笋般地出现在大家面前。有的已经办了几年，如吴县、无锡县、武进县的新区，吴江市的松陵开发区，江都市的新区，那里已经开通了道路，摆满了工厂企业，从投入走向产出；有的只是初具规模，可是势头良好，如苏锡常的经济技术开发区，大丰的王港经济开发区，南京浦口、吴县渡村的台商投资区，金坛的华罗庚科技城，它们抢先一步，乘势而上，冲破蛋壳，喜见新雏。多年来小城镇功能分区的设想，在发展外向型经济的大潮中实现了。这些乡镇经济开发小区的上马和突破，无疑是受了自费开发的先河——昆山开发区的启发。然而，在新的条件下，它们又各具自己的特色，概括起来主要有三条：

——开发区靠近老城(镇)区，又独立于老区，硬件软件投入集中，立时立刻见规模。

——规划超前(或一步到位)，分步实施，筑巢引凤，全方位开放，好戏还在后头。

——既是工业小区，又是经济技术开发区和高层次的第三产业密集区，也是社区建设重点投资区，集几任于一身，叩跨世纪的现代化大门。

正因为具有上述几个特点，缓和了资金相对不足的矛盾，解决了改造老城(镇)区所遇到的不可调和的矛盾，改变了乡镇工业原来那种“村村点火，处处冒烟”的不得已格局，争取了时间，抓住了

机遇，提高了规模效益和服务化水平。可以说，这是小城镇建设迈出的突破性一步，使小城镇建设跨入了新的历史阶段。

市县镇三级联动大开发新局面的出现，是我省乡镇企业进入高起点、大规模、外向型、跳跃式发展阶段的前兆，是城市工业转换机制、紧贴市场经济的实际体现，是科学技术与生产建设紧密结合的新成果，是江苏经济走上新台阶的重要内容。没有这个客观基础，就不可能具备这样的要求和冲力，也不可能具备联动开发的实力。说到底，新区开发也好，小城镇建设也好，必须服务于并服从于发展生产力的要求。

机遇切不可失，冲破定式，天地自宽。思虑必须缜密，走出一步，想好两步、三步。关键是抓准项目，标好规划，分步实施，务求实效。

（1993年8月14日）

经 济 篇



比较·内因·思考

研究今后10年的江苏经济发展战略，不能不研究近10年山东、广东两省的发展状况。因为粤、鲁两省对江苏来说，可比性最大，最值得我们认真思考和借鉴。

苏、鲁、粤的三大指标

这里先以江苏、山东、广东三省的国民生产总值、国民收入、财政收入这三大指标，从1978年到1989年这10年的变化，列表比较如下：

三大指标		1978年（亿元）	1989年（亿元）	近十年平均增长%	1989年比1988年增长%
国民生产总值	江苏	249.2	1286.1	11.7	2.4
	山东	229.1	1190	11.6	7.8
	广东	184.7	1283.9	12.9	7.5
国民收入	江苏	208.2	1113.2	12.4	1.6
	山东	195.5	1050	11.1	8.1
	广东	160.7	993.2	12.2	6.0
财政收入	江苏	61.1	124.0	6.6	7.4
	山东	64.1	104.3	2.6	26.1
	广东	39.5	128.9	10.5	19.7

上表所列，虽然只是三项指标，但这是几项反映一个省经济实力最主要的综合经济指标，它可以告诉我们：(1)鲁、粤两省近10年、特别近两年经济发展势头上得很快。1978年时，广东的三大综合经济指标与江苏差距较大；到1989年时，已不相上下，而财政收入已超过了江苏。山东的三大综合经济指标与江苏历来相近，但从1989年山东的经济发展势头看，其发展后劲显然大于江苏，近期超过江苏是预料中事。

(2)在1989年遇到的宏观紧缩是同样的，而鲁、粤两省的经济增长幅度均大于江苏，这说明，江苏经济的承受能力比鲁、粤两省要弱得多。这一现象，不能不从江苏经济自身的发展找原因。

且从自身找原因

如果从更多的经济指标来看苏、鲁、粤三省经济近几年的发展，客观地说，应该说各有长短，各有特色。而三个省经济发展的其长其短，又各有其多方面的原因。但在当今研究江苏经济发展战略之际，在思考江苏经济转折的突破口时，应该主要从江苏自身经济工作的指导思想、体制、政策等方面找原因，才是各级领导机关的当务之要。这里，再提出一组工业经济效益的数字来作分析：

1989年	江苏	山东	广东
全民工业企业全员生产率(元/人)	23818	21628	27097
全民工业企业预算内资金利税率(%)	17.89	23.51	17.03
工业销售利税率(%)	11.29	15.07	13.12

在上列三项指标中，江苏的全民工业企业全员劳动生产率，略好于山东，落后于广东，这同江苏的产业结构和工业结构有关系；还要看到，因为我省工业结构中加工工业比例较大，全员劳动生产

率通常均是工业总产值和全体职工平均人数之比，而加工工业产值又有重复计算问题，所以扣除这一因素，我省全民工业企业全员劳动生产率不一定好于山东。这也从另一角度反映了山东的基础工业远比江苏雄厚。江苏的工业企业资金利税率，与广东差不多，比山东差得多，这也同江苏的产业结构、工业结构不合理有很大关系。江苏的工业销售利税率，不仅低于山东、广东，而且居全国最末位，是最值得我们注意的一个数字，这说明我们的工业经济效益很不理想。

下面请看近10年产业结构比重的变化情况：

	1978年			1988年		
产业结构	江苏	山东	广东	江苏	山东	广东
第一产业比重(%)	27.6	32.8	29.9	27.9	32.1	27.9
第二产业比重(%)	52.6	50.0	46.4	51.3	46.6	40.4
第三产业比重(%)	19.8	17.2	23.7	20.8	21.3	31.7

上列的数字告诉我们：10年期间，江苏的产业结构，在比重上基本没有变化，其特征是第二产业比重过大，10年前和现在都占50%以上。广东则在近10年发生了较大变化，第二产业比重下降，第三产业的比重已占30%以上。

至此，在首先从自身找原因这个问题上，我们是否可以得出如下几点看法：

(1)我们应该从经济工作的指导思想上找原因，重速度、轻效益的倾向必须改变。

(2)对产业结构、工业结构的调整必须果断，看准了的要抓紧进行。这是一项周期较长的系统工程，现在不抓紧，多年难见效。

(3)江苏原有的若干经济优势正在消失，有些主要经济指标在全国的位置正在下降，对江苏经济发展战略的转变必须持紧迫感。

及时转型尚可为

对建国40年来江苏经济的发展，有些研究工作者曾经用三句话来概括，即：坚持不懈 做基本功，稳定中求突破，从农村开始振兴。这是说，江苏几十年坚持不懈地抓农田水利等基本建设，有力地促进了农业的发展，实现了人均千斤粮，并带动了多种经营的发展；乡镇企业"异军突起"，使农村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农村经济的振兴，支持并带动了全省经济的突破。

现在，江苏经济又到了新的转折关头，那么，历史的经验是值得借鉴的。比如说，调整产业结构和工业结构就属江苏经济求突破的基本功，必须坚持不懈地抓，扎扎实实地抓，象抓农田水利建设那样，既有长远规划，又有年度计划；既有主体工程，又有配套设施；既是全省"一盘棋"，又是市县各有重点，这样地坚持不懈，积以时日，必见成效。又比如说，乡镇企业的兴起，是江苏经济的一次战略突破，这一突破，说到底就是改革。根据这一历史经验，现在调整经济结构和加快对外开放的根本办法，也是在体制、政策、工作等各个方面坚持改革、深化改革。而实行改革的一切主意和点子都来自实践者，特别来自实践中的"始作俑者"。"基本功"求其实，"突破"需要闯。

实现江苏经济战略的转变，未雨绸缪与当机立断应该同时注意。举例来说，江苏的交通和通讯，是今后10年必须有所突破而应该未雨绸缪的。比如：沪宁高速公路，南京机场，几个重要港口，苏北铁路，对外通信设施，……均属前10年的薄弱环节或未及兴办者。为求我省经济实现发展战略的转移，进一步对外开放，促进经济上一个新台阶，这些方面实需当机立断。

（载《群众》杂志1990年第10期）

致省长的一封信

××同志：

这两天新华社总社和全国性报纸在开始报道江苏了。但报道之着重点是令人不安的。

昨天中央台的广播，是报道苏州市产值列上海、北京、天津之后的第四位。苏州市是包含六个县的产值而突破200亿元的，以此来说名列全国第四位，能这样算吗？今天新华社又报道江苏工业总产值连续三年名列全国榜首，这是事实，然而据我所知，省委、省政府的领导同志议过此事，不愿这样报，现在确也不宜这样报，然而传媒还是这样报了。

我觉得这是在衔接上出了问题，你们的精神没有通给新闻单位，所以还是在循老一套的办法在"吹"。所见妥否，供您参考。

给您打了两次电话，想在电话上说说，找不到，只好书面奉达。

（1988年1月12日）

赞县办大学——沙洲工学院

九月下旬，我们前往江苏省沙洲县访问了刚刚创办的全省第一所面向乡镇企业的县办大学——沙洲工学院。看了教室、图书室、实验室、学生宿舍、学生食堂，同几位教师谈了话，也听了副院长秦豪和县委书记陈壁显的介绍。这些，都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该校筹备时间虽短，由于县委、县政府全力以赴，基本办学条件准备得比较充分。今年3月21日着手筹备，9月13日举行了开学典礼，从动议到开办仅用了五个月零二十天。

基建投资，县政府首次拨款90万元。已经建成或购置的固定资产有教学大楼，教职工宿舍楼、外聘教学人员招待所小楼各一幢和食堂一座。新建的教学楼，宽敞明亮，布局合理；阶梯教室大小有别，桌凳齐全；阅览室8000多册图书、资料已经上架；实验室仪器、设备正陆续购来。

师资力量，除了聘请的客籍教师，已正式调入23名教学人员，其中讲师7名，工程师4名。到目前为止，学院收到外地自荐申请200多份。学院正在逐个排队了解，拟有选择地调进。首先要调进有实际经验的讲师以上人员。

整个后勤工作安排得井井有条。学生每五人一间宿舍，配备有钢丝床、小书桌，还有五斗橱。学生食堂窗明几净，饭菜花样不少，菜有七至八个品种，伙食标准不高，荤菜每份价格一般不超过二角钱。学生每月发生活补助费15元，个人再补3—5元。

办学方针明确，不包分配，利于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新生

来源，是从本县参加高考未被录取的考生中择优录取。该院今年录取的最低分数线为459分。培养目标明确规定，主要是为乡镇企业培养技术和管理人才。分配形式，实行学校推荐与单位选聘相结合。学院制定了若干考核和衡量学生德智体全面发展的管理办法，并实行奖学金制。奖学金分一、二、三等，每学年评选一次，毕业分配时作为向社会优先推荐的依据。

现在该院设置了三个专业：纺织、电子、建筑，这是从沙洲县现在的工业实际情况出发的。县委书记说，下学年还将增加企业管理专业，为乡镇企业培养管理人才。

充分调动全县各方面力量，千斤重担大家担。县委和学院的领导同志介绍中都谈到，沙洲工学院之所以能在五个月多时间内开办，首先依靠省委、省政府以及省、市有关部门的关心和支持，一路开绿灯，同时也得到了上海工业大学、苏州大学等不少高等院校的大力帮助。名誉院长钱伟长教授，不是挂名，而是切实帮助，开学前特地从上海赶来，对办学方针、课程设置、教学安排等方面提出了具体意见，最近又把上海工业大学研究生科科长推荐给工学院做教务长，以加强教学领导工作。

在沙洲县内，从县直机关到乡镇和企业，对工学院的创办都表现出很高的热情。县委提出的"农民办大学，大家来支援"，得到了热烈响应。不少教学设备和后勤用具都是社会各个方面赞助的，其中有小型发电机组、摄相机、电影放大机、英文打字机、客车等。

《光明日报》编后：

要使乡镇企业更上一层楼，创造更好的经济效益，解决人才奇缺问题已成为当务之急。江苏省沙洲县对创办沙洲工学院的积极性和热情，充分地说明这一点。县办大专院校看来是一条多出人才、快出人才的路子。但是，办大专院校，必须具备各方面的条件，特别是师资力量和教学设备等等，不是有几幢房子就可以办一所学校的。因此，我们不赞成一哄而起新办大专院校。解决人才奇缺

的主要途径仍然是依靠老校挖潜。当然，要发挥老校的潜力，关键在于教育体制改革。但是，沙洲工学院的现状是够办学条件的，希望主管部门和地方帮助他们不断总结经验，不断提高完善，把学校办好。

（载《光明日报》1984 年 11 月 30 日）

学 习 三 得

——《陈云同志文稿选编》读后

这次在党校学习，有机会细读了《陈云同志文稿选编》。这些文章虽然讲的是二十年前的事，然而于今读来，仍如春风扑面，使人头脑清醒；又如夏雨及时，点滴入土，把问题讲得透澈极了。深感《文稿》是三个实实在在，即：提出的问题实实在在，解决的办法实实在在，文风实实在在。从中得益匪浅，受用无穷，兹记其三得。

立足现有

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这是一个宏伟的目标。那么，我们建设现代化的基地在哪里呢？陈云同志指出："现有工业是基础，在这个基础上加以改造、引进新技术。""现有技术人员是我们技术力量的基础。我们有大专学校毕业生和自学的技术人员共几百万人。他们经过了一、二十年的实际工作的锻炼。"这就为我们进行现代化建设，阐明了立足点和出发点。可以这样说，搞建设必须立足现有，稳步前进，这是陈云同志的一贯主张。这一主张，完全符合我国的国情和国力，是很切合实际的方针。

立足现有，就是量力而行。这个"力"，就是现有的生产力。量力而行，可以解释为从现有的生产力情况出发办事。这就是说，对现有的企业和生产资料，要不嫌弃其旧，不嫌弃其小，不嫌弃其土，不嫌弃其不全。旧，经过改造，是可以"返老还童"的。小，并不是缺点，有些工业化程度很高的国家，其工厂、企业的规模并不大。土，经过革新以及引进技术，可以转化为"洋"（技术先进）。不全，是就

一厂、一地来说的，就全省、全国来说，就可以配套成龙。所以，是不是立足现有搞建设，是一个是不是按唯物论办经济、是不是按辩证法办经济的问题。

立足现有，就是循序渐进。这个循序，表现在各个方面都要分别轻重缓急，不能“排排坐，吃果果”，平均分摊，一拥而上，一分而光。几十年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循序渐进是实实在在的进，这比急躁冒进、盲目大上，要好得多、快得多。可以设想，这些年来如果按照陈云同志循序渐进的主张办事，建设规模同国力相适应，以每年增长百分之几的速度上升，那末，几个五年计划执行下来，我国的经济建设会取得很大的进展，我国的经济面貌也会大大改观。

正常温度

陈云同志一再强调，在几亿人口的大国里进行经济建设必须稳步前进，他说：“把生产数字定得少一点（实际是可靠数字），是否一定会泄气，也不见得。”还说：“站稳以后的前进是更踏实的前进”。在采取重大措施时，陈云同志强调必须“慎重从事，稳步前进，经过试验，逐步推行。”

中央还有一位领导同志最近说过，搞经济建设要正常温度，不要打摆子。这是对“稳步前进”这一方针性的观点，作了形象而通俗的注解。

正常温度，是自然界万物生长不可缺少的条件之一。春耕、夏耘、秋收、冬藏，谁都违背不了。不是有暖房吗？暖房就是为了给生物以开花结果的正常温度。不是有恒温室吗？这是赋予没有生命的仪器设备之类的外部条件。同样，人需要的也是正常温度。一个人保持在摄氏三十七度左右，说明这个人的身体处于健康状态。有没有正常的体温，是反映人这部“机器”运转是否正常的一种标志。体温太高，就是发高烧了；体温过低，也不正常，都该去求医服药

了。

在一个几亿人口的大国里组织经济建设，是一件比维护一个人的健康不知要复杂多少万倍的浩大工程，更需要正常温度。如果发高烧、发低烧或温度过低，都会造成极大的损失。

我们所理解的"正常温度"，一是要有"温"，二是要正常。所谓"温"，就是办事要讲点精神，艰苦奋斗，自力更生，几亿人都有一股生气和朝气，精神面貌是热气腾腾的，不是松松垮垮的，更不是冷冷冰冰的。生产的发展要有一定的速度，这个速度既实实在在没有水份，又是看得见摸得着鼓舞人心的。搞经济建设没有一定的速度，对扩大再生产不利，对树立信心、鼓舞士气不利。所谓"正常"，就是不头脑发热，不心血来潮，不大上大下，而是脚踏实地稳步前进。正如陈云同志所指出的："建设规模超过国家财力物力的可能，就是冒了，就会出现经济混乱；两者合适，经济就稳定。当然，如果保守了，妨碍了建设应有的速度也不好。但是，纠正保守比纠正冒进更容易些。"

有以为继

办事必须考虑有以为继。办好事尤其要注意有以为继，经济建设亦然。

一位善于用兵的指挥员，无论兵力如何拮据，手里总是掌握着一定的预备队，在关键时刻拿出去突破最重要的一点，从而夺取战役的胜利。如果兵力无以为继，孤注一掷，就意味着迟早要打败仗。

一位家庭主妇是否称得上能干，其主要标志，无非也要看她持家是否掌握了有以为继的原则。如果她上街买菜时，有客无客一个样，冬天夏天一个样，只顾上顿而不顾下顿，那末，这个家将是不会搞好的。

同样，抓生产，搞建设，办福利，也都要考虑有以为继。

有以为继，就是办事要留有余地。竭泽而渔，杀鸡取蛋，谁都知道是办了蠢事。这就是因为庶乾了池塘，宰掉了母鸡，就无以为继，再也打不到鱼、取不到蛋了。对于计划工作上的综合平衡，陈云同志强调开步走就应该综合平衡；主张按短线平衡，不是按长线平衡；强调财政应该略有结余，消灭赤字等等，就是为了有以为继，有继则无患。

有以为继，就是办事要考虑左邻右舍，瞻前顾后，而不是单枪匹马只顾一头。比如搞年终物质奖励，不仅是考虑今年，还要考虑明年；不仅要考虑一个厂、一个行业，还要考虑其它厂、其它行业将引起的连锁反应。这样，调动起来的积极性是一大片，而不是一小块；是持久不衰的，而不是下气不接上气的。

有以为继，就是为了要充分考虑人力、物力、财力的允许程度，办其可办者，分别轻重缓急，不满载，更不超载，做到源源活水，徐徐而来，源源不断。这样就把事业置于客观现实性之上，不靠偶然性吃饭，也就能立于不败之地。

（载《唯实》杂志 1982 年第 2 期）

稳定的农业　兴旺的副业　发达的工业

——吴江县经济工作指导思想探讨

最近几年，吴江县在经济工作中有意识地注意了农副工三业的协调发展，在大力抓好乡村工业的同时，注意农业的稳定和副业的兴旺。今年，他们又明确提出：经过几年努力，使吴江县的农村经济出现"稳定的农业、兴旺的副业、发达的工业'的局面。这个符合吴江县实际的指导思想，如果政策跟上，措施跟上，切实解决好当前存在的一些问题，几年后的吴江县就可能以崭新的面貌出现在苏南农村。

吴江县农村经济的现状是，乡村工业已达到一定水平，副业生产颇有特色，农业（粮食）生产基本保持着稳定。1984年，农副工三业有六项居全省前列，这就是：一、96万亩水稻，平均亩产1189斤。二、养兔60多万只，收购兔毛54万斤。三、出口真丝绸1400万米，为全国出口量的六分之一。四、外贸收购额1.18亿元。五、人均提供肉、禽、蛋、鱼等荤食品167斤。六、淡水鱼总产量36万担。除了这六项外，还生产蚕茧7万担，羊毛10万斤，羔羊皮5万多张，羽毛8万多斤，以及其他许多名特产品。1984年全县多种经营收入2.8亿元，比1980年翻了两番。他们把"传统戏"演出了新水平，有着太湖之滨鱼米丝绸之乡的鲜明特色。

这几年，吴江县的工业发展也比较快，特别是乡村这两级工业，在农村经济中所居的地位越来越重要。1984年，乡村工业产值占全县农村产值的60%，已经成为农村经济的支柱和农民收入的主要来源之一，也是农村各项建设的主要财源。吴江县的工业，尤其是乡村这两级工业，又是根植于农副业的，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

农副业生产的相应发展。这主要表现在吴江县的工业，以农副产品为原料的部分占很大比重。以1984年为例，全县利用本县蚕茧生产真丝绸1700多万米，丝绸纺织工业产值就达6亿多元，占全县工业产值的50%左右；以本县农副产品为原料的食品工业产值1.2亿元，占工业产值的10%。为适应本县养兔业发展的需要，1983年引进了兔毛加工生产线，去年生产十六支兔毛混纺纱295吨，产成品打入国际市场，产值1200多万元，创汇137万美元。干部群众有志把吴江建设成为鱼米之乡、丝绸之乡、兔毛之乡、蔬菜果品之乡、禽畜兴旺之乡。目前，吴江已初步形成了从生产到加工到销售的六条"龙"：一是从栽桑、养茧、缫丝到织绸、印染、服装加工一条龙；二是从养兔到毛纺、针织一条龙；三是从蔬菜种植到收购、加工、销售一条龙；四是从养禽到加工、羽绒产品一条龙；五是从养鱼、捕捞到冷冻、销售一条龙；六是食品加工一条龙。随着这六条龙的完善壮大，更多的这样的"龙"的形成，吴江县的经济形势将出现各业兴旺、群"龙"齐舞的大好景观。

可见，在吴江县，工业的发展离不开农副业的相应发展，是以农副业的较快发展为基础的。而工业的发展，又就地消化了日见增多的初级农副产品，提高了农副业生产的经济效益，从而又带动了农副业生产的发展。农副工三业协调发展，就是发扬优势，就是从实际出发，就是有战略眼光的一种表现。

为实现稳定的农业、兴旺的副业、发达的工业，吴江县的领导重视在政策措施上解决出现的新问题。他们清醒地认识到，实现稳定的农业，农业政策要根据新的形势作调整，当前特别要从加快农业现代化的高度着眼，积极提高农业机械化程度，花力气建立和完善产前、产中、产后的服务体系，使农业在发展中实现稳定。同时努力解决副业产品的保鲜、增值问题，解除副业生产的后顾之忧。发展乡村工业，要迅速扭转在低水平上增加投资、增加劳力、扩大再生产的状况，把市场竞争的外部压力转化为内部加强技术改造、改

善经营管理的动力，搞联营，上水平，不断提高经济效益。

（载《经济参考》报 1985 年 8 月 23 日，《新华日报》1985 年 9 月 21 日重新发表）

“方寸地”上做出大文章

——赞苏州“庭院经济”

最近从太湖之滨传来喜讯：“庭院经济”犹如一枝枝生机勃勃的小荷，在苏州农村的一池碧波中点点放绿。许多农民把家前屋后都利用起来——有的搭起葡萄架，有的种了中草药，有的养了螃蟹、甲鱼，有的饲养肉鸽、鹌鹑。于是“方寸之地”或废水潭变成了“聚宝盆”，获得了过去从未达到的土地产出率和经济效益，使苏州这一传统的鱼米之乡的农业向商品化、多样化、多层次发展。

种养结合　立体开发

苏州市所辖六个县，人均耕地只有一亩，农户庭院内的土地更少，宅基周围的池塘也不多。苏州的“庭院经济”得以发展起来，是农民们以巧取胜的。他们的经验是：种养结合，巧用空间，立体开发，通过集约经营获得规模效益。

太仓县陆渡乡三巷村农民孙克勤，利用住房前面的一分宅基地和屋后的三分多自留地进行立体种养，综合经营。他根据葡萄需要空间多、占用地面少的特点，栽种了高产优质的“巨峰”葡萄 90 棵，在葡萄架下又散养“海新”肉鸡四批 1000 只，还在自留地上栽插葡萄苗 600 枝，三项合计年纯收入 4600 多元，平均每分土地收入 1150 元。

发展名、特、优、稀产品

苏州的农民一般收入比较高，这决定了他们不搞“大路”产品。苏州农村紧靠上海这个大城市，市、县、乡之间的交通比较方便，市场信息也比较灵通，因此，苏州“庭院经济”的第二个特点是经营起点比较高，不少农户主要发展名、特、优、稀品种，以求较高的经济效益。

许多过去农民不种不养的新品种，甚至闻所未闻的新道道，如今都相继进入庭院经营的范围。吴江县苑坪乡农民朱德兴，在屋前挖了一个占地不过三分的池塘，放养甲鱼 150 公斤，在其它庭院的空地栽种了 51 棵无核蜜桔。一年精养细管，甲鱼增重 80 公斤，并孵出小甲鱼 100 多只，增值 1600 元；收获蜜桔 700 公斤，卖出 600 公斤，净收入 1000 元。

“一村一品”、“一乡一品”

人多地少的苏州农村，历来就有农副结合、农工相辅的传统，并形成了颇具特色的工艺、技术、手艺或经验，有的是父传子，代代相传；有的是邻里相助，全村俱兴。这一传统优势，加上不同的资源条件，使苏州农村的庭院经济（特别在吴县、吴江等地）具有“一村一品”、“一乡一品”的特点。

吴县由于地理、资源条件不同，历来分东南西北四个片，现在正逐步形成以食用菌、苗木盆景、养蚌育珠、果树栽培为主体的地域性优势。西部的藏书乡沿山 11 个村，村村发展苗木生产，以篴里村为例，全村 475 户农户，除 14 户以外，家家见缝插针，户户种花育苗，整个村庄如同一个自然植物园，雪松、龙柏、香樟、铁树、山茶、杜鹃、含笑……经年长春，四季有花。庭院苗木生产成为这些村农户经济收入的首项，全村户均收入为 5000 元。

这种逐步自然形成的“一村一品”、“一乡一品”的格局，有竞争性较强的一面，也有互帮互学相互带动的一面，而且有利于县、乡

业务部门做好良种供应、防病治病、技术指导、产品销售等服务工作。

（载《经济参考》报 1987 年 5 月 4 日）

当前苏南农业的经营形式和规模

最近，我们到常熟市和无锡县就农业的稳定和发展问题进行了调查，所见所闻，使我们强烈地感到，这里的干部和群众，在农业发展遇到新的矛盾和困难时，不是束手无策，而是进行了许多新的探索。在进一步完善经营方式和加强社会化服务方面，他们既注意调动农民家庭经营的积极性，又重视发挥集体经济的优势，创造了若干好的办法，并取得了明显的效果。可以说，1985 年是农业得到明显加强的一年，也是探索适度规模经营取得某些突破的一年。

目前，无锡、常熟两县（市）农业的经营形式大体可分为四种：

第一种，人分口粮田，劳分责任田，分户搞经营。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家家农副工，户户小而全”，目前为主要形式。从粮田面积看，在常熟市要占到 80%左右，在无锡县要占到 70%以上；从户数来看，常熟市为 90%，无锡县为 80%。

第二种，口粮田家家自种，责任田适当集中，由种田能手承包。无锡县东　乡，从 1983 年秋开始，经过群众自愿协商，全乡 2,000 多亩责任田，已有 1,500 多亩陆续集中到 85 户手中，户均 18 亩。村级经济实力较强的无锡县玉祁乡蓉南村，1984 年春将原来分散在 337 户手中的 529 亩责任田，调整给 60 户、70 个劳力承包。这就是人们常说的“种粮大户”。村建立起包括供秧、机耕、植保、排灌和技术指导在内的服务体系，为他们提供服务。在无锡县，承包 5 亩以上责任田的有 3,700 多户，占农户总数的 1.43%。他们承包责任田 25,900 多亩，占全县责任田的 10.4%；合同定购商品粮 2,125 万斤，占全县合同定购任务的 9.7%。常熟市承包责任田 20 亩

以上的有50户，其中最大的一户经营162.5亩。如把售粮万斤以上的也叫种粮大户，共有1,272户，占农户的0.5%；耕地17,800多亩，占粮田面积的2.5%。

第三种，农业与乡村企业直接挂钩。即把农业生产管理作为乡村经营的一部分，把从事商品粮生产的劳力和为农业服务的专业人员作为乡村企业的成员。基层同志的说法是："平时生产各有责任，基本报酬以工为准，福利待遇一视同仁，超产奖励各跳龙门"。在无锡、常熟有四种具体做法：

一是"厂村合一管理"。常熟市支塘乡长桥村是这种形式的典型。1984年，该村在900个整半劳力已有80%务工的情况下，实行了厂村一套班子、农工一起管理的体制，村企业设农副业管理科和村民事务科，农业经营纳入企业管理的范围，务农的农民也是村办企业成员，企业统一组织、协调全村农副工三业，统一对务工成员和务农成员进行考核和收入分配。

二是"厂办农业车间"。无锡县有30%的村采取这种办法，把7,500多户承包责任田3亩以上的农户，纳入村办企业，作为"农业车间"。责任田实行承包制，收入归厂，超产自得。工厂参照本企业工人基本收入水平，按责任田面积给农民基本工资。

三是"村办企业分别包队，承包责任田"。常熟市支塘乡阳桥村有四个村办企业，由三个厂分别包三个生产队，厂队签订合同，承包责任田，企业有专人务农，大忙时企业还临时调度其他职工下田帮忙。责任田收入交承包企业，务农人员报酬由企业支付。

四是厂办农副业基地。常熟市现有173个乡村企业办起了农副产品基地，耕种4,700多亩土地。以福山乡人造革厂所办的基地规模最大，在长江边上种植700多亩粮食、水果和蔬菜。无锡县凡有一定规模的乡镇企业，都建立了副食品基地，种植蔬菜6,000多亩。有的是开发废河荒滩，有的是接受原有集体的农林场圃，有的是集中转包农户的承包田。农场人员的基本工资大多参照企业务

工人员的水平，浮动工资和奖金按生产实绩考核结算。

第四种，村办农场。常熟市现有两家，一是琴南乡元和村，一是大义乡小山村。位于常熟市郊的元和村，有耕地556亩，人均3分地。村办工业发达，工业产值占农工副三业总产值的93%。1976年实行大队核算。1982年苏南全面实行以家庭为主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元和村没有包田到户，而是由原来的四个耕作区向村分别联产承包。1984年进一步完善承包关系，改由四位妇女（原生产队长）各自向村承包，常年聘请18个劳力，把工区改称农场。村设农业服务专业队，为四个农场提供从耕种到收割脱粒的一条龙服务，计价收费。常熟市大义乡小山村，有耕地112亩，由四个劳力承包种植，村提供服务。这种形式，在无锡县还没有出现。

以上四种农业经营形式，实际上是两大类：第一种属家家分散经营，后一种属适度规模经营。前一类面广量大，后一类只占少数。

调查中，我们与县（市）、乡、村的同志对这两大类的四种不同经营形式的现状和前景进行了讨论，综合他们的意见，初步形成两点看法。

第一点看法是，**家庭分散经营形式，目前仍有较强的适应性和生命力，相当时期内还将继续大量存在。**其原因是：

一、多数农户现在仍有自己种口粮田的愿望。我们接触的基层同志都提到，这里农民现在普遍的心理状态是，“不愿不种田，不愿多种田”。为什么“不愿不种田”？因为“以食为天、以土为本”的传统观念仍在起作用，特别是40岁以上的农民，他们有田可种，心里才感到踏实。即使是在乡村企业工作的农民，也感到乡村企业有风险，还不是铁饭碗，有几亩田在手就有了后路。而且务工确有剩余时间可用，早晚两头紧一紧，几亩地就捎带种出来了。这一笔带出来的收入，对精于算计的农民来说是不肯轻易放弃的。1985年，虽然遭受严重自然灾害，减产幅度较大，但无锡县平均每个农户还获农业净收入640元。在工业办得好的乡村，还有一笔以工补农收

入。所以不少农民说："丢掉田就是丢掉钱"。另外，他们还认为自己种出来的粮食，质量最有保证，"吃自己种出来的最放心"。还有，地相当一部分地方，不种责任田，烧的柴草就不够。所谓"不愿多种田"，实际是农民不愿多种责任田。主要是因为种田收入低，劳动强度又大，纯农户的社会地位低，"万元户找不到千金姑"。

目前也有极少数农民要求不种口粮田，主要是四种人：①常年在外从事商业、服务、建筑、运输等的农户和有较高收入的个体户。②缺乏家庭辅助劳力的乡镇企业负责人和供销员。③夫妻双方都在乡镇企业工作的青年农民。④因年老、身残、久病，实在无力耕种的农户。

二、向规模经营转移的基本条件，多数乡村短期内尚不具备。从两县(市)探索适度规模经营的实践看，实现耕地的转包，必须具备几个基本条件。①劳动力能相对稳定地转移出去，并能取得比种田更高的收入。②农田水利设施和农业机械配套达到较高水平，使务农人员不把种田视为畏途。③社会化服务功能比较健全，使务农人员有"安全感"。这些条件，虽有主有次，但缺一不可。据测算，在现有的基础上，农田基本建设要达到排灌畅通，路、渠、沟、桥配套，农业种、管、收主要环节实现机械化操作，每亩还需投入资金400—450元左右。从农村现有经济承担能力着，无锡县一年亩只能投入25元左右，常熟市22无左右。可见，向适度规模经营转移，还需要一定时日才能实现。

第二点看法是，**适度规模经营肯定是有前途的，要不失时机地探索，允许多种形式并存并进。**

实现农业专业化和现代化，是国民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适度规模经营的推进，要着重注意两个方面的问题：

一是步骤上要循序渐进，水到渠成；形式上要多种多样，因势利导；工作的重点应放在创造条件上。不刮风，不搞一刀切，不急于求成，成熟一个搞一个。常熟市委农工部的同志说，元和村办农场，

平均每个劳力能种25亩地，主要依靠集体经济实力强，机械配套成龙和健全的服务体系。其他许多村虽不具备这样的条件，但也可以搞别种形式的规模经营。无锡县的同志认为，发展种粮大户加社会化服务比较有前途。希望有关领导部门（如计经委、农机部门）多作调查研究，帮助总结经验，并作出为基层服务的具体规划。

二是经营规模的适度要掌握好。从现有条件看，家庭经营一般以20亩左右的规模为宜，超过30亩的种粮大户，多数不稳定。规模适度，农民有条件增加农业的投入，土地生产率可以提高，经营效益也是好的；规模过大，就可能导致粗放经营，使土地生产率下降。

规模的适度，是个动态的概念，不可能给以一个十分精确的规定，但也不是不能把握的。常熟、无锡的同志都认为，在他们那里经营规模的适度，主要应以经营承包单位（家庭或集体农场）拥有的劳力、机械和社会化服务，能否保质保量地完成夏收夏种为依据。这个标准，还需在实践中作进一步的验证。

我们的调查表明，农业经营无论采取哪种形式，都应该做到既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又提高土地产出率。能否做到这一点，取决于农业的社会化服务办得如何。常熟市和无锡县从1985年下半年以来，十分重视发挥集体经济和统一经营的优势，在建立、加强、完善农业服务体系方面，采取了许多有力的措施。

一是抓服务工作的领导。去年秋天，常熟市专门召开了农业服务工作会议，要求各级领导和各个部门全力加强农业服务工作。由市政府负责这项工作的组织协调，市有关部门都有专人负责，并层层建立岗位责任制。今年年初，常熟市就如何在资金、物资、能源等方面搞好农业服务，作出了具体规定。到目前为止，该市已有509个村建立了农业综合服务站（占总村数的79%），下设专业队1，450个，农业服务体系已经初步形成网络。无锡县从去年夏天全面推广后宅乡建立六条服务专业线（水、电、农技、植保、农机、供秧）

的经验以来，各级领导部门都把健全农业服务体系作为责任目标，一级抓一级。到目前为止，无锡县555个农业村全部建起了农技管水队，96%的村建立了农机队，89%的村建起了植保队，42%的村办起了综合服务站，全县有近两万人从事农业服务。

二是抓服务队伍的稳定。农业服务体系的建立和完善，首先要有一支稳定的队伍，而关键是要给服务人员以稳定的报酬。常熟、无锡的做法是：

第一种，以村为依托，办专业服务队或综合服务站。一般是实体性质，实行低费服务，兼营工副业，独立核算，自负盈亏。对自负盈亏有困难的，村给予定额补贴，使专业队人员收入水平略高于村办企业职工平均工资。

第二种，以村办企业为依托，企业办服务专业队或专业组。服务人员编制在厂，专职务农，服务收费归厂，工资福利与其他职工一视同仁。常熟市以这种形式居多数，现在已有173个村采取了这一形式。

第三种，群众自办，集体协调，统一标准，收费归己。这种形式，主要存在于乡村工业基础较为薄弱，集体原有的农机具已折价归户或承包到户的地方。村加强了户有农机的管理，明确规定了为农服务的指标。村还规定了具体的收费标准，既保证拥有农机的农户取得合理的报酬，又使广大农户乐于使用农机。

三是抓农业机械的配套。常熟市的同志认为，加强农业的社会化服务，如果缺乏配套的农业机械，就很难真正落实。为此，他们运用多种方式搞好新型农机具的推广工作。去年秋播前在辛庄乡专门召开了三麦免耕条播机操作现场会，会后农机公司的100多台三麦条播机被抢购一空。但从面上的情况看，农业机械“头大尾小”、“有头无尾”的状况仍很严重，动力大、配套缺的矛盾十分尖锐。常熟市现有农机总动力已达56万马力，而插秧机只有11台，收割机只有22台，不是农民不想买，而是整机质量不过关，不敢

买。常熟市的农民不无揶揄地说："我国人造卫星早就上了天，就是插秧机、收割机下不了田"。今年，两县(市)都采取措施，一方面加强配套小农机的生产，一方面挤出外汇进口插秧机和联合收割机。但基层的同志都感到，依靠进口，不是解决我们的农机配套问题的根本办法。无锡县机械工业实力雄厚，生产农业机械的历史很长，但上面对该县的农机生产尚缺得力的扶持措施和鼓励政策。有的工厂是硬着头皮用赚钱产品补贴生产农机的亏损，有的工厂因赔钱太多而难以为继。我们认为，国家和有关部门应把农机配套这项工作尽快列入议事日程，从政策和布局上做必要的调整，提高企业生产农机的热情。

四是抓服务水平的提高。怎样解决目前务农劳力素质下降的难题？基层的同志一致认为，提高专业队伍的服务水平是上策。常熟市在服务体系初步建立的基础上，又进一步抓了完善工作，提出"三要"：一是服务质量要高。要求服务人员确立光荣感和责任感，热爱服务工作，精通技术和管理，提高素质，提高服务水平。二是应变能力要强。要求服务人员急农民之所急，想农民之所想。三是服务项目要全。要求专业队伍不仅提供产中服务，还要有产前、产后服务。为了使产前、产后服务和和产中服务紧密结合起来，常熟市去年下半年在福山乡进行了体制改革试点，把供销社、信用社、食品站等原属"条条"管理的单位放到乡里，实行"条块结合，以块为主"的管理体制，已经初见成效，市里正在总结推广他们的经验。无锡县后宅乡组织六支服务队伍的人员互相学习，共同提高，许多人做到了一专多能。无锡县堰桥乡为了尽快提高农业干部和服务人员的专业技术水平，投资兴办了农业培训中心，在全县引起了较大的反响。

健全农业服务体系，提高农业机械化水平，都离不开对农业的大量投资。很显然，现阶段国家不可能直接对农业进行大量的投资，农业自身的积累也很有限。从常熟和无锡调查情况看，有效的

办法还是发展农业之外的多种产业，特别是乡镇企业，实行以工补农。因此，乡村工业的命运，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农业的命运。

（载《红旗》杂志 1986 年第 20 期）

城乡联合的基础和原则

最近举行的全国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工作会议强调：从现在起，应该把横向经济联合作为一项重要工作，作为经济改革的组成部分来抓。抓联合可以出效益，抓联合可以促改革。江苏多年的实践证明，这一论断是完全正确的。在江苏，城乡协作、城乡联合，已经出现了很好的势头，并取得了明显的经济效益。1982 年提出的“以城市为中心，以小城镇为纽带，以农村为基础，形成城乡经济文化网络”的指导思想，从 1983 年起全面实行的“市领导县”体制，有力地促进了这种新型城乡关系的建立和发展。

城乡联合形成新的优势

江苏是一个中小城市较多的省份。长江以南有苏州、无锡、常州、镇江、南京等 5 个大中城市，纺织、化工、轻工、电子、机械工业有很好的基础。长江以北有南通、扬州、泰州、连云港、淮阴、徐州等 6 个中小城市，这些年来，煤炭、重型机械、纺织、农机、盐化工等工业有了较大的发展。特别是江苏背靠着全国最大的工业城市——上海，有沪宁铁路连结着上海——苏州——无锡——常州——镇江——南京这一串“东海边的明珠”，有滔滔长江沟通了上海与南通、苏南与苏北的一大片城乡。因此，苏南的乡镇工业，一般都受到上海经济区的“双重辐射”。据江苏有关部门匡算，苏南乡镇工业有 40%以上的产品是同大中城市挂钩协作的，这是一个不小的比例。无锡市到 1985 年前后，已有三分之一的乡镇企业同城市大工业建

立了各种配套协作关系，配套产品的产值达 10 亿余元。据无锡县的统计，全县 2000 多家乡镇企业有 900 多家与城市大工业建立了协作关系，协作产品 900 多个，产值 4 亿多元。江苏最东部的昆山县，多年来由于以农为主，单一经营，经济发展比较缓慢。近两年同上海联营的项目 146 个，同苏州等城市的联营项目 56 个，其中有 59 个项目在 1984 年就发挥了效益，已创产值 1.6 亿多元。就是在距上海较远的江苏北部地区，凡是乡镇工业较为发达的地方，同样不同程度地受到上海经济区大中城市的“辐射”，也就是说，都在上海经济区的“射程”之内。苏北的盐城市郊大冈镇织布厂，过去生产规模很小，1983 年从上海引进了 288 台布机和全套技术，1984 年初已形成生产能力，增加了产值 200 多万元。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这说明了两点：(1) 乡镇工业一般皆在城市经济的“辐射”下，才能产生和发展；(2) 经济的“辐射”作用，是不受行政区域的限制的。

实践证明，城市“辐射”作用的大小，要受到三个条件的影响。一是取决于这个地区的城市工业本身，是否具有向农村辐射的能力。以江苏北部的淮阴、扬州、连云港等城市来说，都是些中小城市，市区工业力量比较薄弱，工作的大头要放在自身的发展上面。二是取决于城市工业产业结构是否存在向农村扩散的要求。徐州市是江苏重镇，在北到济南、西至郑州、南抵南京、东至连云港直径 500 公里的广大区域内，是首屈一指的工业城市，1985 年工业产值为 32 亿多元。这个城市对全省的贡献是很大的，但它对周围农村的影响却相当有限。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受到产业结构的限制。在徐州，不宜向乡镇企业扩散的冶金、电力、石油化工、煤炭、炼焦、重型矿山机械等行业的产值，占该市区工业产值的 60%以上。三是取决于地理和交通条件。城市的科学技术、人才、信息向农村扩散，很大程度上要依赖于交通、电讯等条件。交通不便，电讯条件差，必然影响到城市工业向乡村的扩散。

综上所述，我们应当致力于本地区中小城市的发展，致力于城

市产业结构的调整，致力于改善交通、电讯等条件，以增强城市的“辐射”能力，带动乡镇企业的发展。

城乡联合需要思想基础

城乡联合、城乡协作的兴起，不是偶然的，是由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决定的，是建设中国式的社会主义所必需的。

从农村方面来说，要进行产业结构的变革，发展工业、商业、服务业以及其它非耕地经营，只靠农村的自身力量，没有城市先进生产力的配合，是十分困难的；而一旦这些新产业从农业中分离出来以后，也必然要与城市发生各式各样的经济技术联结；这些产业的发展越具规模、越上水平，就越需要城市工业和先进技术的介入和协作。

从城市方面来说，作为国民经济重要支柱的城市经济，肩负着不断提高生产力和不断开拓新的科学技术领域的历史使命。由于经济翻番和发展生产力的需要，又由于受到人力、资金、地域种种条件的限制，也由于生产力的发展有着不受地域、行政隶属关系约束的巨大冲力，它必然要跳出城市的圈子，向外寻找新的空间和广泛的协作。

因此，城乡双方对相互之间的联结各自有着内在的需求。党的十届三中全会的路线和十二届三中全会的决定，犹如春风化雨，促进了这种客观需求成为现实。关于横向联合，：不是要大家一哄而起，去拼凑或捏合这样那样的名义上或形式上的联合。这说明，有许多认识问题需要端正。经济上要“联”，思想上先要“合”。城乡双方认识上的统一，思想上的合拍，是实行联合的必要前提。

据了解，对联合认识上的片面性，往往表现在以下方面：有的企业由于产品质量不错，销售上问题不大，经济效益也可以，因此往往只想维持目前“大而全”的现状，唯恐联合以后被对方“吃掉”，

怕“寄人篱下”。有的企业的产品质次价高，销路上有困难，他们急切想联合，认为联合以后“大树底下好乘凉”，想在联合体内“吃大锅饭”。有的企业的产品是名牌，经济效益较高，担心联合后“砸了名牌”，“肥水外流”，失去优势。

解决上述这些认识上的片面性，首先要作理论上的分析：

第一，专业化协作是生产社会化的必然发展趋势，“小而全”、“大而全”是不符合这一趋势的。随着国民经济的进一步搞活，社会主义的竞争也将充分展开，固步自封的经营方式很难适应新的经济形势。如果作茧自缚，不开拓新的生产领域，就会有被淘汰的危险。

第二，经济联合的目的是为了提高整个社会的经济效益，把潜在的生产力发挥出来，因此想在联合中吃“大锅饭”是行不通的。谁想吃“大锅饭”，必然危及联合体内其它企业的经济效益，从而影响整个社会的经济效益。对外厂提供先进技术，不是什么“肥水外流”，这是社会主义企业对提高社会经济效益应负的责任，何况这种技术输出是有偿互利的。

第三，城乡联合，无论是大厂小厂、富厂、穷厂、有名牌产品没有名牌产品，现有的优势和劣势总是相对的。在商品经济时代，城市与农村，大厂与小厂，谁也离不开谁。社会主义的城乡关系，是平等互助的关系。社会主义企业之间的联合，是互利互惠的联合。经济的联合要有长远的眼光：联合可以扬长，联合可以补短，联合产生力量。

城乡联合的原则是互利互惠

经济联合不能“同床异梦”，其基础是实行互利互惠。

上海自行车厂与南通自行车总厂于 1984 年 6 月实行厂际联合，联合生产“永久”51 型农用载重自行车，这也是一种城乡联合。

这两个厂显然各自有着自己鲜明的优势和不足。上海厂技术水平和管理水平较高，产品是名牌，但要大批量增加产量，在厂房、劳动力方面困难很大。南通厂有场地、厂房、劳动力，但受到技术、管理水平的限制，经济效益还不高。双方联合起来，其效果是显而易见的：南通厂取得上海厂在技术、工艺、设备等方面的帮助和转让，很快就承担起生产名牌车、优质车的生产任务，使自己在技术质量、管理和经济效益上得到较大的提高；上海厂可以利用南通厂的厂房、设备、劳力，进一步扩大自己的生产规模，使自己的经济效益同样得到大幅度的提高，还可以腾出手来进行新产品的开发和国际市场的开拓，为新的起飞打开通道。这样的联合，就能扬长避短，使各自的优势充分发挥出来，使潜在的生产力变成现实的生产力，并且形成新的潜在能力。这种联合的基础是互利互惠，用经济的办法实行联合才是社会主义的原则。

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参加联合的各企业，既是联合体的成员，又是相对独立的经济实体。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下的各种企业，虽然生产目的是共同的，但又独立核算，各负其责，这是经济联合的一个重要原则。同时，不论大厂小厂，不论是哪一种所有制，在经济地位上是完全平等的。不是大鱼吃小鱼的关系，而是大鱼帮小鱼、小鱼帮大鱼的互助关系，这是经济联合的又一个重要原则。

城乡联合是管理体制上的一次大变革

城乡联合，是经济管理体制上的一次根本性变革。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城乡联合是按照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特别是按照生产专业化的要求进行的，实行联合的各种企业，一般都是跨地区、跨行业的，不联则已，一联就要从体制上冲破原来的条块分割和所有制的限制。因此，城乡联合带有经济改革的“先天基因”。

(2)城乡联合的涉及面，不只是有关的几家工业企业，还关系到财政、银行、商业、税务等许多部门。这些部门如果不在资金使用、贷款、税收、销售等方面采取相应的措施来跟上，对实行联合的企业"松绑"，经济联合就不可能成功。因此，实行联合的是几家企业，所产生的经济改革的"冲击波"要影响一大片，影响上级许多业务部门。

(3)城乡联合这一改革的"冲击波"，不仅冲及领导部门，也要影响配套各厂各企业。经济联合的必然结果是扩大生产规模，提高产品质量，加强经营管理，这样，对产品的配套件协作厂的要求也相应提高了。在第一"冲击波"之后，还有第二"冲击波"来促进配套件协作厂的改革。

城乡联合的根本目的

城乡改革的新要求和新形势，向发展城乡联合提供了一个极好的历史机缘。城乡联合不是为联合而联合，有个根本目的，就是要建立社会主义的新型的城乡关系。

什么叫新型的城乡关系？最重要的一条，是把城乡经济建成一个互相依存的统一整体。随之而来的是人们传统观念的改变，从根本上改变那种农村理应为城市服务，城市支援农村是"单向恩赐"的观点，确立社会主义的城乡关系是"谁也离不开谁"的新观念。社会主义的新型城乡关系是平等互助的关系，应当协调发展，共同繁荣，不能走资本主义国家曾经走过的城市繁荣、农村　敝的老路。

在建设新型的城乡关系方面，必须继续从四个方面进行努力。首先必须努力缩小城乡差距，努力促进农村经济的迅速发展。一要大大提高农村劳动者的个人产值——每个人的劳动生产率；二要逐步减少务农劳力，转向其它商品生产，只有先做到这两点，农村经济才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城乡联合的经济基础和现实条件才

更加扎实。这就要认真进行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改变八亿农民搞饭吃的局面，不仅使农村的第一产业即农业的经营更加合理化，而且把第二产业，第三产业进一步发展起来，为越来越多的从大田上解脱出来的农民开辟广阔的生产领域。这样做，农村经济就会充满更多的活力，摆脱单纯依附城市的状况。

建立新型的城乡关系，必须继续开展多层次、多领域的城乡经济协作。城市具有技术、人才、设备、资金、信息、管理经验等方面的优势，应该以主动的姿态向农村渗透，帮助农村发展乡镇企业。城市的国营企业、集体企业，可以同农村的集体或个体联合开发自然资源，也可以同乡镇企业搞"一条龙"式的或企业群体式的经济联合，有计划地、积极地把适宜分散生产、需要密集劳动的产业以及零部件生产项目向农村扩散，逐步形成城乡之间有分工、多层次、一体化的经济体系。农村要采取一些优惠条件，吸引城市的技术人员和各种知识分子到乡村去施展才能，为四化建设作出贡献。

建立新型的城乡关系，还必须全面进行流通领域的改革，把城乡之间的流通渠道真正打通。无论城市还是乡村，都应建立互为市场的新观念。农村是城市工业品的大市场，城市是农村农副产品和乡镇工业产品的大市场。城乡联合搞好了，产品更丰富，质量更提高了，还要共同走向国际大市场。城乡要共同努力打开一切可以开通的流通渠道，商品要流通，技术要转移，人才要流动，资金要对流。农村剩余劳动力要"离土不离乡，离乡不背井"，兴办服务行业，承办各种劳务，参加某些城市基础设施的建设。

建立新型的城乡关系，必须发展小城镇，建设小城镇，把城乡之间的"纽带"建设成为经济实体，在城乡联合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实践告诉我们，城乡经济日益紧密联结的过程，也是大中城市用现代工业、交通、科学技术、文化教育逐步武装小城镇的过程，是大中城市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向小城镇渗透的过程；小城镇的日益繁荣和发展，必然产生越来越大的吸引力，反过来又对城乡联合产

生积极的影响。

（载《江海学刊》1986 年第 4 期）

“七五”计划与乡镇企业

中共中央在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七个五年计划的建议中指出：发展乡镇企业是振兴我国农村经济的必由之路。这是中央对乡镇企业的高度评价，也反映了农民群众对乡镇企业的切身感受。第七个五年计划的第一年——1986 年的到来，意味着乡镇企业在振兴农村经济方面所负的责任不是轻了，而是重了；应该跨出新的步伐，而不是停滞不前甚至倒退；应该得到更多的重视和扶持，而不是得到不应有的指责和不公正的对待。

江苏乡镇企业在第六年五年计划时期的表现是令人瞩目的，对振兴农村经济、推动全省经济协调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

(一)

到 1985 年，乡镇企业的职工已达 570 万人，占农村劳动力总数的 25%。在人多地少的江苏，乡镇企业吸收了如此众多的农业剩余劳动力，发挥了如此明显的“节制闸”和“蓄水池”作用，是值得大书特书的。这些劳动力“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拔出萝卜地皮宽”，有利于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有利于增加农民收入，也有利于种植业和养殖业向深度进军。

更重要的是它以生动的实践向全世界表明：“十亿人口、八亿农民”的中国解决剩余劳动力的就业问题，现在才真正成为可能。据报纸公布的数据，“七五”期间我国将有 1.4 亿劳动力需要就业，其中农村要向非种植业转移的劳动力有 1 亿之多。1978 年以前，我国城市经济和社会事业所能安排的劳力有限，几乎连城市自身

的就业问题还解决不了，因而还要从城市“下放”人员。如果没有乡镇企业，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谈何容易？有位中央领导同志前不久这样说过，中国每年有700万17、18岁需要就业的人口。怎么办？我们找到了路子，就是发展乡镇经济。我看到一个材料，通过这种方法，五年解决了就业人口2000多万，平均每年500万人。……如果说我们的农村改革取得了成绩的话，就是因为这些方面起了积极作用。

（二）

“七五”计划的进行是不是顺利，对实现党的十二大提出的宏伟的战略目标，关系甚大。实现这一目标，城市经济要挑重担，农村经济也要挑重担。从江苏的实际情况看，挑起农村经济这一重担的大头，无疑要落到乡镇企业肩上。这个任务是艰巨的，也是光荣的。

据统计部门的资料，第六个五年计划执行的结果，全省工农业总产值预计将比1980年增长99.8%，接近翻一番，5年平均增长14.9%。其中农业总产值预计将比1980年增长110%，5年平均增长15.9%。这个数字表明，苏南和苏北有的县曾经预测，经济翻番任务的55%要由乡镇企业来承担，这个预测是有根据的。

可贵的是乡镇企业对于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还表现在这两个方面：一是它已成为国家财政收入新的重要来源，二是它对支农、补农、建农的作用愈来愈明显。据有关资料，第六个五年计划期间，江苏乡镇企业上缴国家的税收在70亿元以上，其中1985年预计在20亿元以上，约占全省财政收入的20%左右。乡镇企业的上缴税金，在国家财政收入中占有如此比重，对于加强宏观控制来说，是十分重要的。不仅如此，乡镇企业对于农民的分配收入，有着“旱涝保收”的作用。据有关资料，从1978年到1984年，乡镇企业利润用来购置农业机械和投入农田建设的约10亿元，投入分配、支援穷队和举办集体福利事业的约16亿元。1985年，乡镇企业可向乡

和村两级上缴利润7亿元，为举办稳农所必需的农业基础设施和产前产后服务设施，提供了资金上的可能。因此，乡镇企业对于农业的稳定和发展，不是有过而是有功的。

（三）

“七五”计划的实现，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科学技术。在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七个五年计划的建议中指出，积极帮助乡镇企业实现技术进步，是“七五”期间科技发展战略的重要内容。国家科委今年五月提出的一项计划，要求把科学技术引向农村，争取到本世纪末，使我国为数众多的中小企业和乡镇企业普遍得到科学技术的武装，造成星火燎原之势，因而这项计划被命名为“星火计划”。这是一项既有现实意义又有长远利益的事业。农村产业结构调整不发展乡镇企业不行，发展乡镇企业不依靠科技也不行。两者结合将可能闯出适合中国国情的新路。如果把这作为一项基本政策长期坚持下去，必有意想不到的效果。

在江苏组织实施“星火计划”，是江苏落实“七五”计划的需要，也是乡镇企业“三上一高”（上质量、上技术、上管理，提高经济效益）的需要。前不久举行的中共江苏省委七届三次全会上，对乡镇企业的“三上一高”问题进行了讨论。“三上一高”的提出，是城乡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也是乡镇企业本身增强活力的需要；是我省乡镇企业跨出新的步伐的一种标志，是一个新的转折。落实“三上一高”不是轻而易举的事，需要统一认识，需要培养提高队伍，需要做许多技术工作和组织工作，比铺摊子的难度更大，花力更多。然而这是非上不可的关键所在，谁掉以轻心，谁就可能落后。

（载《江苏乡镇企业》1986年第一期）

对农业基础地位的再认识

建国已经四十周年，改革、开放也已经十年。面对治理整顿的现实，回顾江苏农业的发展历程，我们完全可以得出这样的印象：什么时候农业为基础的观念强烈，措施扎实，农业就发展，就前进；什么时候农业为基础的观念淡薄，措施不落实，农业就停滞，就徘徊。如今，党中央号召“全党全国动员起来，集中力量办好农业”，江苏农业要再上新台阶，有必要对农业的基础地位有一个再认识。

建国初期，江苏的工业基础远不如上海，也不如辽宁、天津；农业（那时候多种经营极少，主要指粮食）处于第五位，落在四川、广东、河南、湖北的后面。

由于全省人民的努力，四十年来，江苏经海里脱颖而出，令人瞩目，如果要用最简单的语言来概括，可用这么两句话来表述：**稳定中有突破，以农村带全省**。这就是说，江苏经济发展的特点是“稳”，不是冒冒失失，不是大起大落，但也不是老牛迈步，而是在稳定中求得突破，城乡第一、第二、第三产业都有比较大的发展。尤其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十年，是江苏建省以来经济实力增长最快、人民得到实惠最多的时期，工农业总产值从 1979 年的 419 亿元增加到 1989 年的 2257 亿元，增长 4.4 倍；国民收入从 1979 年的 257 亿 9 千万元增加到 1989 年的 1114 亿元，增长了 3.3 倍；农民每人平均收入从 1978 年的 176 元 3 角增加到 1989 年的 876 元，增长了 3.9 倍。

江苏经济的崛起是多种因素促成的，我认为最主要的是三条：

第一，从农村开始振兴，是江苏经济脱颖而出的基础；而农村

的振兴，首先得力于几十年坚持不懈地进行的农田水利建设。

我手头有个资料，从1949年到1985年，江苏人民持续治水36年，完成土石方269亿立方，投资151亿元，使地处淮、沂、沭、泗四河下游、水旱灾害频繁的江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这是改变农村面貌的基本功。没有这项基本功，就不可能有江苏农业的稳产高产，就不可能在对农业的领导有所削弱、对农业的投入不断下降的情况下，连续五年每人平均占有粮食仍然在1000斤以上，多种经营也有了很大的发展。

从农村开始振兴，符合中国的国情，也符合"人多地少"矛盾特别突出的江苏省情，它的重大意义是显而易见的。

第二，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无论在数量和质量方面、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方面，都对江苏经济的崛起产生举足轻重的影响。

据1989年的统计，江苏乡镇工业的产值是910亿元，占全省工业产值的46%。乡镇企业在江苏的分布并不平衡，大致可以分为三块：一块是苏、锡、常地区，乡镇工业比重已经占这个地区的50%以上。一块是宁、镇、扬、通地区，乡镇工业比重占40%。一块是徐、淮、盐、连地区，乡镇工业比重也占到30%。这表明，无论在苏南还是在苏中、苏北，乡镇工业的"块头"已经不小，已经是"半壁江山"或者"三分天下有其一"。

乡镇工业的兴起，消化了江苏将近一千万剩余劳动力，支援了农业，稳定了农村；繁荣了市场，增加了国家的财政收入，也小康了农民；发展了农村社会事业，促进了精神文明建设。最重要的是，乡镇企业的兴起和发展，带来了一种新的灵活的机制，冲破了几十年来存在于我国的那种僵硬的经济模式，成为探索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新的契机之一。

第三，县级经济的壮大，市县两级领导机关在经济工作中的自主性、创造性，是江苏经济崛起的许多主观因素中最重要的一条。

县级党委和政府，既处于生产和工作的第一线，又是相当重要

的一级领导机关。县级经济，既依托于大城市和大环境，不能搞自主经济或“小而全”，又有城镇和乡村，农林牧副渔、工商建运服各业无所不包，具有相对的独立性，江苏的县级领导机关善于运用自主权，发挥了主动性，把经济工作当作第一主业。全省几十个县基本上都在“年年有困难，年年有进步”的情况下，把江苏经济推向现在这样一个规模。

江苏经济崛起的三条主要原因告诉我们：农业的稳定，农村的振兴，对于人多地少的江苏来说，是建省之本，固本之道，十分重要。如果今天没有人均粮食500公斤、年产皮棉1000万担、林牧副渔产值100亿元这么一个“基础”，就不难设想，人口密度如此之大、城镇人口和大中城市如此之多的江苏，会面临多大的困难。我们对农业基础地位的重要性应该再认识。我认为，在三个问题上应该有新的内容。

首先，决不能因为农村面貌有了比较大的变化，农民的温饱问题基本解决，就认为粮棉生产已经过关了。

就粮食生产来讲，江苏虽然每人平均占有量在500公斤以上，但是，并不是只给人食用的。粮食上的两项大开支是工业用粮和饲料用粮，全省每年大约需要120亿斤以上，占粮食总产量的20%。江苏的粮食还需调出支援大城市和国家建设。就棉花生产来讲，江苏现在拥有纱绽460万以上，如果开足，所需要的皮棉在1200万担以上，而且江苏还有调出棉花的任务。两项相加，全省年产1000万担皮棉的产量是不够用的。这说明，江苏现在的粮棉生产量还供不应求，还没有过关。“温饱”只是贫困与小康之间的一个过渡状态，也是一个低标准的要求，搞得不好就会逆转。何况当前农业生产上的困难还很多，稍有松懈，粮棉生产就会下跌。

第二，决不能因为产业结构的调整，发展了农村的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农业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小，就认为农业无足轻重了。

江苏1989年的农业总产值是273亿元，只占工农业总值的

12%。然而，取得这273亿元的农业产值，5000多万农民要付出多少汗水！事实上呢，人们又往往难以掂出12%的实际份量有多重。几十年的经验告诉我们，在农业产值大于工业产值的时候，应该看到农业的基础地位，当工业产值超过农业产值的时候，更不能忽视农业这个基础。忽视就会停顿，忽视就会被动，忽视一年就会被动几年。

第三，决不能因为农村多种经营有了发展，拓宽了新的生产领域，就不注意继续推进农业开发、增加农业投入了。

近七、八年来，江苏农村的多种经营发展很快，副业、水产、禽蛋、特种养殖业成倍地增长。从1978年到1987年的10年间，油料增长223.7%，生猪出栏量增长52.2%，茶叶增长167%，蚕茧增长215.5%。但是，这只是跨向多种经营领域深层的第一步，农副业开发还有大量工作可做。许多县的耕地中还有50%左右的中低产田；全省有几百万亩滩涂有待开发；成千万亩的水面利用率不高，产出量很低；近海养殖和远洋捕捞没有达到先进水平；经济林面积在整个林网中所占的比重很少；庭院经济立体开发还没有形成全省性的规模，创汇农业说得多、实践少，没有取得突破性的发展。这七个方面，说明潜力很大，要做的工作很多。

尤其值得忧虑的一个问题是农业投入的不断下降。无论是地方财政支农资金，集体投入的农业资金，农业银行、农村信用社的农业贷款以及农户投向农业的资金，农村的劳动积累这五个方面，都有所下降。这五项农业投入的下降，意味着对城市投入的倾斜，结果是原有的水利设施恶化，农村路况太差，拖了农村商品化生产的后腿，农用工业严重滞后，农业机械化程度很低，滩涂开发摆不上日程，中低产土地的改造缓慢。所以，我们应该从上述的三个方面，重新认识农业的基础地位。

最后，讲一讲什么是发展农业的基础。我们常说，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那么，什么是农业的基础呢？过去通行的说法是：粮食

是基础的基础。实践已经证明，粮食十分重要，重要不等于就是基础。农业发展的历史和现状告诉我们，决定中国农业命运的不是粮食，而是农民本身——农民的素质，这才是“基础”的基础。

农民的素质是指什么呢？我认为，是指农民对合法权益和物质利益的追求的积极性和实际本领。只有积极性，没有实际本领，不行；有一定本领，没有追求的欲望和冲动，也不行。因此，对农民素质的表述可以用两句话来概括：劳动致富的积极性，发展种植业、副业、多种经营的专业技术。

农民劳动致富的积极性，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靠行政命令、指令性计划就可以完全调动起来的。东台农村的一位村长去动员一户农民种棉花，要求在他的五亩责任田中种两亩棉花，农民不同意，村长就说：“这是指令性计划！”这句话可把农民惹火了，抽了村长两个耳光，说：去年多种棉花，吃了大亏，今年你还要来“指令性计划”，就要请你吃耳光。这件事告诉我们：不按照价值规律办事，不以实际经济效益吸引农民，单纯靠“指令性计划”，是要误事的。

提高农民素质的实际途径在哪里？一定的文化程度是必需的。农村发展商品经济的实质是技术的竞争，就是在有限的土地和空间获取数量尽可能多、质量尽可能好的产品，以最佳时间投入市场。这样的要求，没有一定的文化水平是难以办到的。农民劳动大军如果是一支文盲半文盲的大军是不行的。很可惜，江苏二千多万农业劳动力，高中以上文化水平的只占 5%左右，初中文化水平的占 40%左右，小学文化水平的也在 40%左右，文盲，半文盲在15%左右。

怎么解决这个问题？从江苏的省情出发，也考虑到当今农民送孩子接受教育时间的承受能力，在近期就要求在经济收入差别比较大的江苏实行九年制义务教育是不太现实的。第一步先普及小学教育比较现实。提高农民素质最现实的办法，是推广实用农业科

学技术，让农业劳动力在生产实践中提高专业技术，使他们做一行专一行，逐步提高当今一代农民的素质。

兴化市每年生产粮食22亿斤以上，是江苏的“粮食第一县”。兴化更显著的特色是因地制宜发展多种经营，林粮兼作，林、垛、鱼兼顾，走出了一条“以副稳农，以副兴工，以副促技，以副致富”的路子。副业就是多种经营，它的位置就象苏南的乡镇工业那样重要，对社会贡献很大，对农业支援很大，给农民实惠很多。兴化最可贵的一条是“以副促技”，因为发展多种经营必须掌握专业技术：养鱼育蚌需专业技术，养蟹喂甲鱼需要专业技术，庭院经济立体开发需要专业技术，配制饲料、防瘟治病、改良品种、立体放养……没有一样不需要专业技术。没有专业技术就是没有高产量高质量，也就没有竞争力和高收入。因此，兴化市把有计划、分层次、多渠道地提高农民的科学技术水平，摆上了重要的议事日程，并且取得了明显的成效。兴化的做法，是提高一代农民素质的现实道路。

上面是我对农业基础地位再认识的思考。过去，我曾经专门写文章讲过“苏南模式”，现在看来，“模式”不能照搬，必须从本地实际出发，走出自己的路子。又比如“无工不富”的提法，这也应该因地制宜，苏北许多地方的“副业不副”、“以副致富”，就给了我们新的启示。生活之树确实是常青的，丰富多彩的实践逼迫我们不断思考新的问题。

（载《群众》杂志1989年第8期，江苏人民广播电台《农村节目》重播）

重视企业和群众的要求

政治体制改革是一件大事，是上上下下普遍关心的大事。对这样的大事，很值得我们议论一番。

我们认为，首先值得议论的是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之间的关系问题，就是两者“‘唱的是一台戏，还是两台戏”？因为有的同志认为：“经体改革”是“放”，“政体改革”是“收”；“经体改革”是“搞活”，“政体改革”是“求紧”，因而“唱的是两台戏”。这样的认识，当然是一种误解。党的十三大的有关文件说得很清楚，“政体改革”和“经体改革”都是为了更好地发展社会生产力，建立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新秩序，达到“实现四化、振兴中华”的伟大目标。在近两年，都要为“治理、整顿”创造更好的环境和条件。两者之间的关系，正如赵紫阳同志一再强调的：不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不可能最终取得成功。

政治体制改革应有通观全局的篮图，有长远考虑，也有近期目标，这是极为重要的。而总体监图或近期目标，都必须特别注意企业和群众对政治体制改革的要求。企业是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基本单位，群众是一切改革的主力，只有充分注意和考虑了企业和群众的要求，政治体制改革才能成为经济发展的动力，才具有吸引广大群众的魅力。只有得到群众的支持，有利于企业发挥活力，政治体制改革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据我们在南京市和几个县的调查，企业和群众对政治体制改革是这样提出要求的：党政分开也好，机构改革也好，我们希望领导机关是一个办实事、办好事、高效办事、民主办事的机构。一个形

象化的说法：头顶青天搞四化。

为什么提出“办实事”的要求？目前，基层和群众对上面干部作风飘浮、做表面文章有很大意见。他们说，现在有一些干部长期蹲在机关下不去，常年住在招待所里开会，靠发文件、印报表、打电话指挥，不了解下情，不了解实际问题。有的组织商品生产，向企业和群众空喊“掌握市场，敢于竞争”，可市场在哪里？怎样去竞争？干部不开展具体实在的服务。一旦经营受挫，又责怪下面“商品意识不强”。他们说：“我们基层和群众希望政治体制改革要“革”这些不办实事、不担风险的逍遥官，太平官。”

“办好事”的内涵是什么呢？企业和群众反映，现在有些政府官员办事有“三多三少”：考虑任期内目标多、考虑长远目标少；考虑当年经济指标多，考虑社会效益少；考虑“硬任务”多，考虑“软任务”少。说到底，只博一时之“官声”，少求群众之实惠。还有的干部弄权谋私、索贿受贿、挥霍浪费、办事拖沓，“党的政策是好政策，念歪嘴经的太多了。”

“高效办事、民主办事”的要求也是有针对性的。他们说，现在机构重叠，冗员成堆，办事扯皮，大包大揽是通病，企业和群众要办成一件事，实在太难了。他们希望少些“打排球”、“踢足球”的，多些“打篮球”的。

尽管我们对企业和群众的呼声的了解，还是很浮浅的。但就上述这些朴素而热切的要求来看，他们所企盼的，不正是都与党政分开、政企分开、机构改革、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等诸项目标相密切联系吗？企业和群众的要求是实在的而不是空洞的，是与发展经济密切相连而不是远离经济发展目标的。

（载《党的生活》1989 年第 2 期）

对长江三角洲开发的经济思考

最近两期的《十望》杂志透露了一个信息：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曾约见中国民主同盟的两位最高负责人费孝通和钱伟长“促膝谈心”。谈什么呢？讨论长江三角洲的开发问题。这一议题，差不多是在开发上海浦东的同时提出的。此事并不意外，可是值得重视，表明了中南海对进一步对外开放的重视程度和实际步骤。

开发长江三角洲，包括开发上海、江苏、浙江这一片“上海经济区”，也包括开发南京、镇江、合肥、芜湖、马鞍山这一片“南京经济区”。两者都是为了建立一个能带动长江流域腹地的经济开发区。按照有些专家的设想，这个开发计划的实现，将通过长江和陇海铁路这两条大动脉，把富饶的长江三角洲同中国西部的原材料基地以及三线所蕴藏的科学技术力量相沟通，加速发展外向型经济，形成一条横贯中国大陆的经济脊梁，迎接21世纪新时代的到来。

长江流域横跨中国东、中、西部三大地带，与沿海地带构成了中国大陆“T”字型的产业密集地区。长江不仅是中国交通运输的黄金水道，而且是中国实现经济技术东靠西移、把沿海开放地带的优势和能量引向内地的重要通道。长江流域的各个地区，江、浙、沪、皖、鄂、赣、湘、川，在自然、经济、文化、社会等各个方面都有联系，特别在经济方面的联系是受经济规律的影响而不受行政区域限制的。但在长江流域内部，不同区段又各有特点，有着明显的差异性，大体上说，**从下游到上游，存在着两个相反的梯度现象，即：经济技术水平和人口密度递减，而资源密度和土地面积递增。**从这一实际情况出发，发展区域内和区域间的经济协作，有利于取人之

长补己之短，有利于科学技术和人才的交流，有利于产品开发和市场开发，有利于区域整体生产力的发展。从这一意义上讲，发展区域经济并非只是有关省区的局部之事，而是关系到中国四化的全局之事。

从长江流域的开发来说，“抓区域，促流域”，是并不矛盾的。眼光不能只局限在一个市、一个地区的范围，也不能只局限在一个省的范围，而要看到整个长江流域和全国范围。没有这样的宏观意识，区域经济就可能出现“块块分割”，与经济改革的大方向就会不合拍。当然，作为一个城市、一个地区的领导机关，在现行的行政体制下，把本地区的经济利益放在重要位置上来考虑，是十分自然的。但是这种“利益倾斜性考虑”不能走到极端，走到极端就会成为发展区域经济或流域经济的离心力，整个区域的经济形不成“合力”，最终仍然影响本地区的发展。

看来，在区域经济问题上需要发扬“合作精神”和若干“行为规范”。这主要是指：

(1)**要以平等互利为原则**。在一个经济区域内，由于经济实力、地理位置以及种种历史原因，势必有其经济上的“龙头”，如上海经济区内的上海，南京经济区内的南京。这种“龙头”的作用，不同于行政体制上的领导作用，是历史形成的。不承认、不重视这一点，不符合客观实际。但这决不意味着在一个经济区域内各方、各地有不平等地位，可以“以强凌弱，以优斥弱”，相反，应该互相支持，互补不足，形成合力，共同发展，平等地位的体现，主要是实行经济上互利互惠的原则。我们无疑仍要利用市场机制，也要讲竞争和竞赛，其目的是互相促进，提高效益和效率，而不是谁吃掉谁。经济区内没有互利互惠，就是没有灵魂，就会失去生命力。

(2)**要以资源、技术互补和联合开发为重点**。在一个经济区内，资源互有长短，技术力量互有多寡强弱，为了求得共同发展，经济协作远比行政命令有效得多。举例来说，马鞍山市同南京市，苏州、

无锡同上海市，历来有经济、技术协作的传统，虽然它们分属安徽、江苏、上海三个省市，但它们的经济、技术协作已经超出了行政辖区的范围。经济区内的协商办事，协作开发，是各方有益的好事，远比打什么“蚕茧大战”、“羊毛大战”、“棉花大战”要有益得多。

(3)**要承认必要的社会分工，不搞一块一块的“小而全”**。社会化大生产的现状，要求实行科学的专业分工。没有必要的分工，就没有效率和高效益。这种分工，包括从原料到最终产品的纵向分工，也包括社会生产各个部门的横向分工。如果不实行社会分工，每个地区都搞“大而全”、“小而全”的独立体系，是小农经济的落后做法。在一个较大的经济区内合理分工，可以避免内耗型的竞争。注意合理的社会化分工，可以扬长避短，有利于产业结构的合理化，经得起宏观调整的冲击。

(4)**要以进一步改革、开放和产品走向世界市场为目标**。无论哪个经济区的开发，都应该一不离全国大局的要求，即中国实现四化的需要，二不离本地区经济建设目标的需要，即实现每个五年计划所需达到的指标。目前，每个地区均面临完成“七五”计划和为“八五”计划作准备的重要阶段，如何才能做到上述的“两不离”呢？这就是进一步改革开放，发展外向型经济，拿出第一流产品走向世界市场。这样，就可以迫使把产品结构合理化摆上议事日程，可以把生产技术和管理水平带上去，可以使经济效益指标得到最可靠的检验。

(1990 年 9 月 17 日)

面向21世纪的构想

《群言》杂志编者按：以上海为龙头，开发长江三角洲，这是费孝通教授代表民盟中央提出的一项重要建议，已引起各有关方面的注意。本刊编辑部特邀几位专家和有关方面人士进行座谈，各抒己见。

△这是个好主意。今年(1990年)暮春时节，我陪同费孝通先生在江苏考察，走访了苏州、昆山、吴江，也到了南通、镇江。所到之处，费老总是认真听取地方上各级干部的意见。这是费先生的一贯作风，有了一些想法，形成了方案，总要听听基层同志的意见，从而使自己的思想更丰富，更贴近实际。江苏的同志对这个设想可以说是人同此心，形成了共识。苏州的同志希望长江三角洲开发区快点搞起来，早搞比晚搞更有利。从历史上看，江浙沪的发展就存在着相互依存的关系，这种关系不仅表现在地缘上和人缘上，还表现在现代工业发展所要求的分工协作和对区域范围的突破上。苏南的乡镇工业，在一定程度上因为有了上海的技术才得以发育成长，上海的工业也因为有了这种辐射和扩散而固本强身。共同的利益把两个省市的许许多多企业纽结在一起，这种力量是巨大的，它要顽强地表现自己，是任何行政性干预所拆不散的。从这个意义上看，民盟中央的设想明智地反映了客观实际，实践的发展将证明这是一个好主意。

△这是面向21世纪的设想。从林则徐到孙中山，中华民族的有识之士无不为祖国的振兴苦苦求索，但积贫积弱的局面长期没有改观。人民共和国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经过四十年的奋斗，我们

这个民族才挺起了脊梁。但是国际格局的新变化容不得我们乐观，容不得我们好整以暇，我们只有在本世纪末真正实现了翻两番，才有可能在未来群雄并起的世界新格局中占据应有的一席，才能高举起社会主义的旗帜迎接新世纪的到来。国际间的竞争说到底是经济实力的竞争，在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发展经济如果经不起国际环境的变化而大起大落，那么我们永远也不会做到自立自强。这就是说，我们一方面要适应国际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而扩大对外开放，另一方面一定要构造起经得住国际风浪考验的民族工业体系，这才能立于不败之地。我理解，费老的建立长江三角洲开发区的设想和中共中央开发浦东的决策在总体目标上是不谋而合的。浦东的开发将给上海重振东方大港雄风注入新的生机和活力，上海的经济实力增强了，这个龙头才能带动起江浙两翼的发展；长江三角洲的经济登上一个新台阶，将进一步沟通中国的中西部地区，进而牵动中国整体经济实力的增长。在未来十年，长江三角洲的开发是一步大棋，这步棋下好了，全盘皆活。从这个意义上说，民盟中央的设想未雨绸缪，是多党合作、民主决策的生动体现。

△**好主意要大家来实行。**有一段时间，地方保护主义有所抬头，筑垒封界的现象时有发生。看来，长江三角洲开发区的设想付诸实施还要经过艰苦努力。但这只是个时间问题，因为经济发展的规律总要起作用，有识之士们也正为此而尽心尽力。前不久江苏派了一个阵容强大的代表团到上海，商谈借浦东开发之势进一步发展苏沪间的合作，上海也表示了相同的意向。浙江也有类似的动作。这是一个好的开端，好主意需要大家来实行，大家总归要走到一起来的。

（1990 年 8 月 27 日，发表于《群言》杂志 1990 年 12 期）

“万无一失”与“一失万无”

江苏省扬中县是我国很有特色的一个小县。它是扬子江中的一个“岛国”，四面环江，单一圩区，全县16万亩耕地，地面高程在吴淞真高4—4.5米，汛期长江潮水位一般都高于田面，易洪易涝。可是这个小县却有颇大的名声，全县27.4万人，每平方公里1210人，人均占有耕地仅0.6亩。1990年全县粮食总产12.23万吨，平均亩产764公斤；工农业总产值18.43亿元，人均6722元；财政收入6041万元，其中上交国家财政3625万元，人均上交达132元。扬中县原来是以粮食高产、乡镇企业发达、人均创收这几项名列全国前茅而著名的。

今年5月以后江苏遭遇特大洪涝灾害以来，这个扬子江中的“岛国”又以抗洪保堤而引起了人们的瞩目。“万无一失”与“一失万无”，就是扬中县27万群众对确保长江大堤安全的认识和决心。他们的正确认识和坚强决心，是有实实在在的行动的。从5月18日入梅以来，扬中境内连降暴雨，至7月14日为止，全县平均雨量高达893毫米，比往年平均降雨量高700毫米左右。如此大的降水量，加之客水压境，扬中县120公里江堤的高潮水位达到7.53米，超过了1954年的水位0.09米。从而使扬中江堤险情不断，频频告急，先后出现险情、险段141处，长达10779米。

面对这样的雨情、水位和险情，扬中县的党委、政府和人民群众，处险不惊，临危不惧，上下一心，奋起抗洪保堤。他们的指导思想是：(1)预防在先，防重于抢。(2)立足于抗御更大的洪水，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3)工作做细做实，宁可做“过”，决不“错过”。

(4)依靠群众,依靠基层。(5)干部、党员冲锋在前,做出榜样。这样的指导思想是何等好啊!实践证明,有了在这样的指导思想下所产生的物质力量和实际行动,扬中县安然度过了五月以来的一场场暴雨袭击和江水冲击,堤外江水如虎,堤上严阵以待,堤内庄稼茁壮、工厂照常生产。扬中群众从内心发出感叹:今年这场大灾要是在过去,扬中早就淹光了,我们早就逃荒在外了,还是共产党好,社会主义制度好,集体经济好。而扬中县委和各级干部则深有体会地说:江堤保住、扬中安全的首要条件和基础,是人民群众好。没有这些顾全大局、一方处险、八方支援的群众,我们将一事无成。他们举例说:7 月 12 日那天遇到大险情,县防汛指挥部通过广播下达命令,要求家家户户各送泥袋 2 只。一呼百应,八小时之内,全县就集结了 15 万只泥袋送到各个重点工程和险工地段。

扬中县保住江堤的经验是可贵的,扬中人民已经取得了初战的胜利。当然,汛期险情未过,考验尚在后头。但我们相信,保住江堤贵在领导有力,措施落实,这两条,扬中已经做到了,因此,他们取得抗灾斗争的胜利是可以预期的。

(1991 年 8 月 5 日)

交流篇



初访日本追记

在春光明媚的日子里，以韩培信、顾秀莲为正副团长的江苏省经济友好代表团，访问了日本国的东京、大阪、京都、仓敷等地。随后，又以江苏省政府友好代表团的名义，访问了江苏的友好县——爱知县。前后参观了工厂、企业、港口、商场、仓库、大学、科学研究所，共二十多个单位；会见了日本的一些经济企业界人士，爱知县和名古屋市的政府、议会领导人，东京、大阪等地的一些知名人士和华侨组织负责人，同他们广泛交换了意见。

这是一次友好访问，也是一次经济考察；会见了日本的许多老朋友，也结识了不少新朋友。代表团是以考察中小企业在工业现代化中的作用为重点，为江苏的经济建设寻求有益的借鉴和平等互利而去的。所到之处，受到了日本各界热情的接待。春意盎然，满意而归，是代表团对这次访问的总的印象。

中小企业与研究机构

随着日本经济的发展，中小企业所占的比重、所发挥的作用，不是越来越小，而是越来越大。从日本全国来说，据六十年代的数字，中小企业约占企业总数的52%。近几年，中小企业已占企业总数的99%，从业人员占80%，产值占60%。爱知县的情况亦大体如此，大企业只在重工业、化学工业中占优势，其他行业都是中小企业占优势：纺织业占78%，食品业占80.3%，木材及其制品业占89.3%，服装业占97.2%，家具业占81%。为什么在一个资本主义

现代化的国家里，中小企业却居有这样的位置？看来既有其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也同当局有意识地扶持是分不开的。这种扶持，表现在各个角度，有立法上的，资金上的，还有经营指导上的。在这方面，各种工业研究机构和技术中心，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他们不是空头研究机构，既研究理论，掌握世界和国内各种信息，又注意联系企业，指导经营，指导技术，把重点放在应用技术的推广和经营管理的指导方面。当然，这都是要收费的。

我们参观了大阪府立户业能率研究所。它们的工作范围有四个方面：(1)研究当地生产中的突出问题。(2)接受企业委托，代为解决技术问题。(3)利用先进设备，代企业进行产品的测定试验工作。(4)应邀到企业进行技术指导，帮助企业训练从业人员。技术指导的具体方式，有现场诊断，窗口相谈(企业带着问题到所面谈)，情报处理等。培训从业人员的具体方式，有举办养成讲座(脱产短期培训性质)、巡回讲座(业余辅导性质)等。这个研究所，1982年到工厂诊断249件，到商店诊断118件，窗口相谈113件，据称都达到了预定的要求。

江苏的中小企业占99%以上，看来，今后扩大再生产主要依靠内含，挖掘内部潜力，而不是主要靠外延，靠铺新摊子。在这个指导思想下，依靠中小企业，充分发挥它们的作用，抓紧对现有企业的技术改造，是我省经济发展的一项战略任务。因此，日本的经验，很值得我们研究和借鉴。

吃饭方便住房难

代表团在参观驯马县食品软包装厂时，该厂厂长介绍词中有这么一句话："除了空气和水，我厂都能印刷。"骤听之下，觉得口气真不小。在仔细参观该厂的主要车间之后，当我们看到了该厂印刷包装品之色彩鲜艳，图案设计之工于心计，印刷设备之现代化以

后，确实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厂长介绍词之是否海口，不是值得注意的。值得我们重视的，是通过这个厂，使我们看到了日本食品工业的现状和特点。

日本食品工业的主要特点之一，是花色品种多样，质量把关严格。既有日本传统食品，也有我国风味的“中华料理食品”，还有欧洲流行的各色食品。日本生产的各种食品罐头，据称有1400多个品种，满足着从高收入到低收入的各类消费者的需要。包装比较讲究，密封程度很高，开用则很方便。从驯马包装厂可以看到，为了在高度竞争的条件下求得生存和发展，它们在生产过程中十分重视质量管理，生产作业线上都安装着检测仪器，道道把关，不合格的制品不准流入下一道工序，严格地保证产品的质量。

日本食品工业的又一个特点，是方便食品日益发展。各种各样的方便面条和方便米饭，大量投入市场，品种有蒸煮面条、油炸面条、什锦米饭、鸡肉米饭、鳗鱼米饭、牛肉米饭等，也有中国特色的饺子、馄饨、春卷和西方的“汉堡包”。这些食品由于具有食用方便、携带方便、贮存方便、节省时间、价格相对便宜的特点，已逐渐成为“大路货”——食品的主体了。

从一些日本朋友的言谈中，我们感觉到，他们吃饭是方便的，住房就不是那么简单了。三月二日是星期日，一个晴朗的好天气，我们去参观爱知县青少年公园和名古屋市动物园。途中经过一座树木葱茏的别墅，陪同我们的一位先生指着告诉我们：象这样的别墅，占有这么大的庭院，在日本只有极少数人才住得起。然后又指指另一位陪同先生，并说：象这位先生，为了盖一所自己的小房子，花了3000万日元，向住宅银行贷的款。以这位先生的收入，要30年才能还清。说到这里，那一位盖了房子的先生喟然叹曰：到还清贷款的时候，我已该退休了，我实际上是背了一辈子的债！这两位先生的一席话，把我带入了沉思，眼前的高楼大厦和美妙景象竟是朦胧而过，转眼已经到了动物园门口，该下汽车了。

喜得岚山雨中见

热情的日本人为我们安排了一次岚山之游。那是3月13日的上午，由日中经济协会理事长井上猛先生亲自陪同。岚山，是周恩来同志于1919年东渡日本游览过的地方，并写下了《雨中岚山》那首著名的新诗。因此，到岚山一游，去瞻仰日本友人所兴建、廖承志所写字的"周恩来诗碑"，是我们向往已久的一桩心愿。好心的主人，为了让我们在星期日多休息一会，安排在十时出发，可我们早早就起来了。好心的主人，看到窗外细雨霏霏，带着歉意地打招呼："喔，雨下个不停呢！"可我们觉得天公作美，毕竟让我们也见到雨中岚山了。

当我们一个个兴致勃勃，涉水登山时，如丝的春雨一阵阵打在脸上，甜甜地浇得人精神为之一振；使我这个不会作诗的人，不禁为迷人的景色所醉，得七言四句：

喜得岚山雨中见，
两岸妩媚着意添。
片片春雨施粉黛，
拜读名诗巨石前。

送我们游览的客车上有一位导游小姐，看年龄不过十八、九岁。稚气的脸上整天带着笑容，一路上不停地向我们介绍京都的著名建筑物，还为我们唱"怀念京都"的民歌。歌声是动听而感人的，但更感人的是她的服务态度。我们都看得出来，她是一心一意地希望客人感到满意，因而竭尽自己所能，为客人服务得更周到一些。其实，岂止是这位姑娘呢！服务人员之有干劲、有礼貌，是到处都很突出的。从高级饭店到街头小酒馆、咖啡店，从业人员以年轻人占

绝大多数，端盘送盏，送往迎来，个个劲头十足，注意礼貌，看不到懒散拖沓的现象。究其原因，据日本朋友介绍，是服务性行业在日本社会里有着应有的位置，在人们心目里不是低三下四的行业，从业人员也毫不认为自己的职业有什么不光彩，因而工作起来有一股热情，无丝毫勉为其难之感。这种局面是如何逐步形成的？这对于正在对“吃大锅饭”现象持批评态度的我国，是一个值得研究和学习的问题。

留得樱花再见君

代表团是三月初抵达日本的。此时，樱花含苞待放，尚未盛开。所以，从我们抵达东京之日起，每到一地，日本朋友就盛情而不无惋惜地说：你们晚来半个月就好了，那时候樱花就盛开了！樱花，对于日本来说，是美丽的春天，樱花盛开之时，是春天最美丽的日子，是他们的骄傲。我们充分理解这种心情。但是，樱花虽然还没有盛开，日本各界人士和朋友对于代表团的盛情，对于江苏经济建设的浓厚兴趣，是一点也没有受到影响的。

日本经济协会为代表团的前期访问，作了周到的安排。常任顾问冈崎嘉平太，以八十六岁高龄，会见了代表团，并参加了座谈。公明党委员长竹入义胜以及两位副委员长，于公务繁忙之中，专程从东京赶到大阪宴请代表团，并进行了友好的交谈。周恩来总理纪念诗碑的创建人吉村孙三郎，在家中热情接待了韩团长、顾副团长等。

在代表团的后期访问中，爱知县厅的接待是热烈而隆重的。新知事铃木礼治对代表团的来访，表现了极大的热情，并称爱知县、江苏省之间的友好和合作“具有亚洲的意义”。当代表团登门访问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已故的后藤钾二先生的夫人时，她们一家三代，十多口人在门口迎接。韩、顾团长同后藤钾二的夫人深情地回

忆了中日友好之情。代表团在她家里，度过了美好的春分节的两个小时。当代表团的汽车离开她们住所已有几十米了，她们全家还在向我们频频招手。后藤钧二为中日友好作出了贡献，是值得怀念的。有感于此，留言以志：

春分佳节访后藤，
后人岂敢忘前人。
乒球身轻弹指物，
落地有声重千钧。

代表团的这次访问，不是一次泛泛之行。我们带着经济交流和技术合作的具体要求出访，也围绕着这样的目的进行考察，为以后专业人员的具体工作打下了基础。

当代表团离开名古屋飞返祖国时，樱花还没有盛开。花信来迟，不足为憾，留得樱花，以后再见吧！

（1983年4月30日，载《新华日报》）

江苏小城镇及其研究

——接待日本小城镇研究会代表团时的讲演

尊敬的鹤见和子教授、宇野重昭教授、安原茂教授：

首先，我代表江苏省小城镇研究会和我的同事，对各位先生的来访，表示热烈的欢迎；对江苏学者和日本成蹊大学、上智大学的学者就小城镇研究问题进行交流，感到由衷的高兴。我们双方之间的学术交流，是由我国的著名学者、江苏省小城镇研究会名誉会长费孝通教授牵线搭桥的，虽然这位“红娘”今天不在场，但我想，我们都是不会忘记这一点的。而且，各位先生已经访问了费先生的故乡——吴江县同里镇，参观了他的学术研究基地——吴江县开弦弓村，这是很有意思的。现在，请允许我把江苏省小城镇的情况及其研究，向各位朋友作一总体的介绍。

一、江苏小城镇的基本状况

地处长江三角洲上的江苏，是一个小城镇众多的省份。据1984年的统计，全省共有不同规模、不同层次、不同类型的小城镇2097个。

(一)从行政层次分析。可分为县城镇、县属镇(这两种都是有建制的镇)、乡镇和农村小集镇这样四个层次。

县城镇。全省64个县(市)，共有县(市)城镇56个。这些镇一般是全县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镇的规模较大，基础设施较好，功能比较齐全，是小城镇结构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县属镇。全省有135个，它们一般是几个乡的经济、贸易中心。

这些镇多数是由于有优越的地理位置，如交通要道，或是两县交界地，以及拥有某种资源和名特产而形成的。这类镇的形成历史一般比较悠久，聚居人口比较多，规模通常在万人以上。

乡镇。全省共有1732个。它们是一个乡的政治、经济中心，不仅是农副产品的贸易集散地，又是城市工业消费品下乡的主要销售市场；在乡镇工业发达的地区，则又是乡镇工业的基地。它们是小城镇结构体系的基础单元，是联结城乡的纽带和农村的重要阵地。

农村小集镇。全省现有174个。这类小集镇一般都有一段或长或短的繁荣历史，由于行政区划、经济区划的变动而衰落。有简易的商业和文化教育等设施，因群众生活需要仍然起着集镇的作用。

（二）从分布密度分析。全省小城镇的平均密度为52平方公里。从地域分布来看，苏南地区为42平方公里一个小城镇，苏中地区为36平方公里一个小城镇，苏北地区为70平方公里一个小城镇。

（三）从人口规模分析。191个县城镇和县属镇，平均每镇21600人。其中，5—10万人的占总数的4.44%；2—5万人的占28.89%；1—2万人的占15.6%；万人以下的占51.11%。

1732个乡镇，平均人口728人。其中5000千人以上的占0.91%；2—5千人的占4.3%；1—2千人的占12.3%；千人以下的占82.49%。

我认为，小城镇的实际人口规模将不止这个数字。因为随着我们国家积极发展小城镇指导方针的确立，到小城镇从事工业、商业、建筑、运输、服务业等生产、劳务活动的农民越来越多，在小城镇上实际聚居的人口每年都在增加。

（四）从主要的社会、经济功能分析。小城镇大体分为六种类型：

(1)属于政治中心。这类镇，一般是县城或乡镇政府所在地，是一个县或一个乡经济、社会生活的中心。例如你们在那里逗留过的吴江县城松陵镇。

(2)属于区域性交通中心。这类集镇一般都处在交通干线的交汇点上。如吴江县的平望镇，南邻浙江，东到上海，北通苏州，宁杭公路、京杭大运河穿镇而过。

(3)属于由传统的农副产品集散地发展起来的商业贸易中心。这类集镇一般是一个区域内多种商品流通渠道的汇聚点。这类镇的服务半径约二十公里。

(4)属于地方传统特色的工业产品或手工业产品基地。例如吴江县的盛泽镇，素称"绸都"。宜兴县的鼎蜀镇，以"陶都"著称于世，千家以陶为业，万户与陶有缘。又如泗洪县的双沟镇，酿酒已有一千多年历史，"双沟大曲"是国家金质奖获得者。相传我国北宋著名诗人苏轼渡淮巡游泗州时，曾赋诗讲到双沟"酥酒"："冷砚欲书先自冻，孤灯何事烛成花。使君半夜分酥酒，惊起妻孥一笑哗"。

(5)属于历史文化古镇。这类小城镇历史悠久，出过文豪或名人，存有文物和古迹。例如你们已经参观过的吴江县同里镇。

(6)属于新兴工业镇。这类小城镇的特点是乡镇企业发展快、密度大，务工人员多。例如你们已经参观过的沙洲县锦丰镇。

我在上面讲到了小城镇的层次、密度、人口规模、主要功能这些情况，是为了说明一点：小城镇的形成和发展，总是与一定区域内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相联系的。江苏的小城镇发展史，同江苏的社会经济发展史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社会安定了，经济发展了，小城镇就兴；社会不安定，经济不发展，小城镇就衰。我们作为小城镇研究工作者，深深体会到了这一点。

解放初期，江苏省平均每县有 25 个小城镇；今天，平均每县有 33 个小城镇。从数量看，有了较大的发展，内在变化则更大。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大多数小城镇的经济结构，由单纯的消费

型向生产、消费型转化。这一转化过程在七十年代以后表现得特别明显，这是中国共产党的经济政策发生了重大的作用。二是由单一功能向多功能转化。解放初期，大多数小城镇的主要功能表现在商品流通方面。七十年代以前，有的小城镇主要是作为政治中心而存在，有的小城镇仅仅是集市贸易的场所，它当时发挥的功能无法满足当地社会经济生活和文化生活多方面的需求。近些年来，这一状况在各地都有了不同程度的改变，在一个区域内，小城镇已经或正在发挥着政治中心、经济中心和文化中心的作用。这使我们研究小城镇的领域和内容，广泛和丰富多了。

二、乡镇工业的兴起是小城镇繁荣的主要动力

我说了江苏的小城镇比过去繁荣多了，应该说一说是什么原因。小城镇繁荣之基础，是广大农村的经济状况。七十年代中期以来，江苏小城镇以崭新的面貌出现，就在于江苏的农村经济在这些年里发生了历史性的变革，商品经济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城市务工、农村务农”这一束缚被冲破了，单一的经济已经向农业、林业、牧业、副业、渔业、工业、商业、建筑业、运输业、服务业的多业结构转化。特别是乡镇工业的发展，使江苏农村经济和社会面貌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1984 年的统计，全省乡镇工业总产值为 225 亿元，在整个农村经济中第一次超过了农业。乡镇工业的发展，使许多小城镇进入了以工业生产为主，商业、运输、建筑、邮电、服务各业综合发展的新阶段。

如果从乡镇工业真正起步的 1970 年开始算起，至今也只 15 年的时间。乡镇工业发展成今天这样的规模，我认为不是一件偶然的事。

(一)历史传统的追溯。

江苏是个人多地少的省份，全省 6100 多万人口，只有 6900 万

亩耕地。地域之间又不平衡，太湖地区和苏中沿江高沙土地区人均只有九分地。

在一定范围内，人口密度越大，人均耕地必然越少。在农业社会里，人口密度与经济发展水平是相矛盾的。然而我们的祖先却闯出了一条使人口稠密与经济发达巧妙结合的路子，这就是“男耕女织、农工相辅”。这种农业与手工业的结合一直延续了几千年。正是地少人多这一客观矛盾，农工相辅这一传统，使我们看到了乡镇工业为什么率先在江苏兴起的历史原因。

(二)特定的外在条件。

解放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我们曾经忽视了商品生产的发展，在农村表现最为突出的是一味强调粮食生产，忽视了家庭副业和手工业。

到了七十年代中期，有大批城市工人和知识青年下乡，有的是从上海这个大城市来的，有的是从苏州、无锡、常州这些中等城市来的。通过这些人的牵线搭桥，机器、原料和技术就下了乡。后来这些人又回到了城市，然而同农村的关系没有割断，相反，他们以及他们的家长，都很愿意为农村的商品生产，为农村发展工业生产帮忙。这样，乡镇工业的发展就加快了步伐。这就是当时乡镇工业发展起来的特定的外部条件。

(三)富民政策给乡镇企业安上了起飞的翅膀。

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端正了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以后，乡镇工业就发展得很快。从江苏来说，1984 年同 1978 年相比，乡镇工业产值增长了 2.7 倍，对国家、对集体、对农民实现小康作出了很大贡献。1984 年，全省乡镇工业向国家缴纳税金 14 亿元，为农业税的四倍多；净利润 15 亿元左右，除了一部分用于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工业企业技术改造和扩大生产规模，相当一部分是用于兴办集体事业，增加农民收入。一些市、县的农民人均收入，有一半以上来自乡镇工业。

（四）乡镇工业直接带动了小城镇本身的建设。

对于乡镇工业的地位和作用，中国共产党中央和国务院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在费孝通先生的《小城镇、大问题》等文章中，也有详尽的阐述。这里不一一再谈了。今天我只就乡镇工业发展起来以后对小城镇产生的影响，向各位介绍一点情况。

一是增大了小城镇的人流量。人口的增加、人口素质的提高，是一个社区兴旺发达最核心的标志。到现在为止，我省小城镇上的乡村办工厂已发展到27000多个，平均每个镇15个。总产值在千万元以上的乡镇有472个，占乡镇总数的16.7%。在乡镇企事业单位的亦工亦农人员有580万人，占农村劳动力总数的23.8%。这些劳动者一般都是农村的青壮劳力，有一定程度的文化知识，经过学习、培训，工业化的劳动方式和不同于小生产的商品交换形式，使他们的视野、价值观念、思想意识、生活方式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已定居在镇上，多数人则在镇与村之间每天作钟摆式的流动。用我们的话说，叫做"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农民喜欢这种做法，他们可以继续与自己亲人团聚在一起，可以就近照顾家里的副业和家庭生活，国家鼓励这种做法，这可以避免农民大量涌进城市，城市不致于膨胀得那样快，城市里交通、住房、供水供电的紧张状况不至于加剧。乡镇工业的发展，还使城市里的知识分子、技术工人、采购人员在小城镇上往来频繁。这些日益增多的常住人口和流动人口，汇成了巨大的人流，使小城镇昔日那种冷冷清清的市容消失了，代之而起的是充满活力的人群，为小城镇增添了生机。

二是扩大了小城镇的流通渠道和商品市场。商品流通的规模是小城镇繁荣与否的重要标志之一。过去我省城乡之间商品流通范围，仅仅限于城市向农村提供工业消费品和农业生产资料，农村向城市提供农副产品，渠道单一，小城镇上的交换规模不大。乡镇工业的崛起，打破了传统的城乡单项对流的商品流通格局，城市向

农村输送工业生产资料，农村也向城市提供工业产品，这已经成为现在城乡间商品交流的一项新内容。这就使作为城乡商品流通中介的小城镇，其集散能力和流经的商品量大大增加。

这里我想举苏州市作为例子，你们在那里作过访问。过去的苏州市小城镇，吞吐的无非是化肥、农药、燃料、日用工业品和粮食、副食品等，约五百万吨。今天的苏州市小城镇，从城市和外地运进的商品大类为：煤炭 200 多万吨；工业原辅材料，包括钢材、木材、矿石、化学原料 300 多万吨；农用物资 100 多万吨，日用工业品近百万吨。从小城镇运出的有砖瓦近 20 亿块(张)，折合 600 多万吨，水泥、石灰、玻璃、钢窗等建筑材料 100 多万吨，粮食 90 余万吨，其它工业品 100 多万吨。进出总量达 2500 万吨左右，为过去的五倍之多。在流通渠道上，形成了国营商业、集体商业和个体商业同时并存、互相竞争的局面。

三是带动了小城镇第三产业的发展。乡镇工业的发展，带来了小城镇人流、物流、信息流的增大，同时要求小城镇上的商业、服务业、运输业、邮电业、建筑业等多样产业有相应的发展。近年来，苏州一市从耕地上转移出来从事第三产业的劳动力就有 70 多万人，其中绝大多数是聚集在小城镇上。在我国，第三产业的发展还很不够，国家的财力又不允许近期就来大量投资于第三产业。乡镇企业的兴起，农民的巨大兴趣，我相信，将成为第三产业进一步大发展的重要因素。

四是推动了小城镇公用设施的建设。我国人口太多，经济基础薄弱，在现阶段要完全依靠国家财力来建设面广量大的小城镇，财力上不允许。在单一的农业经济时代，由于人多地少，农业本身几乎没有积累。因此，大规模地建设小城镇，只能是在乡镇工业发展起来之后，而不可能在此之前。举例来说，常熟市 1978 年以前的 30 年，小城镇上新增的建筑面积共 9.3 平方米，近六年来就增加了 50 多万平方米。

随着乡镇工业的发展，全省绝大部分小城镇近几年都新辟了街道，通水通电，增加了新的建筑和商业服务设施，例如你们到过的无锡县，近十年来，每年用于小城镇建设的投资都在一千万元以上。全县34个小城镇，全都新建了百货大楼，影剧院，铺设了水泥或沥青路面，建成了自来水厂，使小城镇的面貌大有改变。

五是发展了小城镇的教育、科技、文化、卫生和福利事业，增大了小城镇对农民的吸引力。全省大多数小城镇建起了影剧院、图书室（馆）、医院、球场等文化、卫生设施，新建的文化宫有一千多个，设在小城镇上的农村医院有2千多个（有8.5万张床位）。这些建设，我们统称之为精神文明建设。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强调物质文明建设与建设与精神文明建设并举。有国家投资办，又有集体参加办，建设的速度就可以快一些。而且，乡镇企业拿出一部分钱来办这些事业，农民是愿意的、欢迎的，不认为是“平调”，因为首先是他们自己得到了好处，得到了文化享受。

三、小城镇的地位和作用

小城镇的繁荣，要靠城乡经济的发展和社会政治局面的安定。但事情的另一方面，小城镇的繁荣与否，又极大地作用于整个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小城镇，大问题，它在我国社会、经济发展中所具有的特殊地位，已经被越来越多的人们，特别是实际工作部门的同志所认识、所接受。小城镇的地位和作用，我想从六个方面来说。

（一）从政治影响来看，小城镇起着“龙头”的作用。因为小城镇一般均是一级政权机构所在地，是一定区域内的政治中心。国家的政策、法令要通过这个“中心”去贯彻实施；人民群众的呼声和要求，也要靠这个“中心”去汇集、反映。广大人民群众把小城镇称为“龙头”，把农村称为“龙尾”，说龙头怎么动，龙尾就怎么摆，这个比喻很形象。

(二)从人口战略来看，小城镇起着“蓄水池”的作用。据有关部门测算，到本世纪末，我国的农村劳动力将达到四亿五千万，其中三亿以上的劳力可以、也必须从农业生产中转移出来。这么多的人口要进入城市，是不能想象的；再建一大批百万人口的大城市来容纳，也是国力所难以承受的。

江苏的实践表明，发展星罗棋布的小城镇，是解决这一矛盾的根本途径之一。小城镇发展起来了，大批农村剩余劳动力集聚到这里，就地从事工业生产、经营商业服务业，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虽身居乡村，又能享受城市化文明。这就好比一个“蓄水池”，随到随贮，随要随放，不是需要的时候没有水，不需要的时候又满地乱流。这几年，我省城市劳动就业工作搞得比较好，压力比较轻，广大农民安居乐业，整个社会比较安定，经济发展速度比较快，这无疑和小城镇发展起来了，截住了近千万的农村劳动力不向城市涌流，是分不开的。

(三)从城乡联系来看，小城镇起着“纽带”作用。小城镇是农村之首，城市之尾，“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城市要做到“扩业不扩城”，必须以小城镇为桥梁；农村要实现工业化、一代化，必须以小城镇为依托。因此，它的纽带作用，不是虚无飘渺的，是一个经济实体。

城市领导农村，在任何制度的国家里，都是一条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城市是先进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的代表和集中地，它是一个更大区域范围内的政治、经济、文化和信息中心。但是从城市对农村的作用方式来看，它不可能一步作用到分散在农村的千家万户，只能逐渐地、由近及远地、分层次地扩展开来。小城镇发展起来了，作为联结城乡的“纽带”就宽大结实了，乡村就能更好地接受城市的“辐射”。这几年来，我省苏南一些市、县城乡一体化日趋明显，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小城镇的纽带作用得到了加强。

（四）从商品流通来看，它起着“媒介”的作用。随着我国农村经济由半自给半商品经济向较大规模的商品经济转化，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化，这一历史性变革将使农村生产力极大地解放出来。如果说这一转化过程是发展社会主义经济不可逾越的必然阶段，那么小城镇的存在和发展便是这一转化过程得以顺利实现的必要条件。离开了小城镇，城乡之间、地区之间的商品交换就快不了、活不了，商品的价值和使用价值就不能实现。农村活不了，城市的市场也将缩小，“两个转化”的步伐势必减慢。我省近年来不少县、市农村经济发展较快，仔细分析，与小城镇流通渠道的开拓、增多不无关系。以我省农村人均产值名列前茅的太仓县为例，在小城镇上已形成商业、外贸、物资、供销社、乡镇办贸易贷栈、多种经营服务、企业自销、个体商贩、农民自己经营等近十条流通渠道，所以这个县的商品经济是比较发达的，农民生活水平也是比较高的。

（五）从社会服务来看，它起着“后方基地”的作用。商品生产不同于小生产，无论是个人经营、联户经营，还是乡镇工业的再生产过程，必然要分解成产前、产中、产后三个部分。任何一个企业或生产者个人，要包揽再生产的全过程，经济效益不会高。现在，乡镇工业和农民要求小城镇提供产前、产中、产后的服务，要求在技术、资金、供销、储藏、运输、市场、信息、科技知识、经营方法等方面提供帮助。在这方面，近年来，我省小城镇做了不少工作，成绩比较显著。普遍成立了科普协会、科技小组，开办了科技培训班、咨询服务点，新办了多种经营服务公司，扩大了运输能力，建起了一批储藏仓库，加强了社会服务工作。

（六）从加强精神文明建设来看，小城镇起着“窗口”的作用。在思想风尚方面，历来是城镇影响农村。我国有首古诗是这样描绘的：“城中好高髻，四方高一尺。城中好大眉，四方眉半额。城中好广袖，四方全匹帛”。这种影响，从古到今，历来皆然。现在，开始走向富裕的农民，他们要求和古老的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方式

告别，要求有现代化的丰富多彩的生活内容，要求学知识、学文化、学技术。能够担当起这一重任的，在农村来说，只能是作为城乡结合部的小城镇。把小城镇建设好了，广大农村就有了文化、科学、教育、卫生、体育的指导中心和活动中心。

四、江苏小城镇研究

最后，我想介绍一下江苏的研究工作。

小城镇问题的提出，不是哪一个人头脑中杜撰的，更不是天上掉下来的，而是现实社会、经济生活向社会科学工作者们提出的一大课题。开展小城镇的研究，从根本上说，是适应经济日益发展和社会不断进步的需要。正象费孝通先生所形象地譬喻的那样，在我国经济、社会的这个大"棋盘"上小城镇是个"棋眼"。实践使我们相信，抓住了小城镇这个重要环节，有些令人烦恼的社会问题就有希望找到解决的办法。

早在三十年代，费孝通先生在一访江村之时，就萌生了对小城镇这一农村社区的中心进行剖析研究的念头。但由于势单力薄和各种社会原因，一直未能如愿。五十年后的今天，中国的大地上起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社会学作为社会科学的一门重要学科，在我国受到了高度重视，开展对小城镇的研究得以成为现实，费先生的夙志得以实现。

江苏开展对小城镇的系统研究，从着手的 1983 年初算起，至今只有两年的时间。这一当代中国社会学的重要论题，之所以能在不长的时间内，首先在江苏获得突破性进展，我想是不是有以下三个方面的主客观条件：

第一，是有费先生这样一位学术上造诣精深、治学严谨的专家的直接指导。特别是费先生身体力行，不顾古稀高龄，奔走于大江南北，亲自调查，为我们做出了榜样，推动了整个研究的进展步伐。

我想告诉各位，费先生在大量调查研究基础上写成的《小城镇、大问题》，由于对小城镇建设的实际工作产生了巨大反响，受到了胡耀邦总书记的赞誉。年青一代的社会学工作者从费先生身上学到了深入实际、勤于思索、实事求是的调查方法和研究方法。

第二，是有各级党组织和政府的大力帮助和支持。几十年来，特别是1978年以来，江苏的城乡经济、特别是农村经济开始繁荣，小城镇的突出地位和作用，在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日益显现出来。1982年5月，在江苏省城市工作会议上明确提出，要以城市为中心，以小城镇为纽带，以农村为基础，组织城乡新的经济、文化、科技和信息网络，实现城乡经济的协调发展。特别强调了要积极发展小城镇。省的领导机关同费孝通先生在这个问题上的不谋而合，成为在江苏进行小城镇研究的良好起点。

第三，江苏省小城镇众多，形态各异，相当一部分小城镇发育成熟，是研究工作客观上的有利条件。从江苏开始研究小城镇，一下子就触到了小城镇问题的"塔尖"——这里小城镇的今天，有可能将来在别的地方的小城镇建设中同样遇见。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们是否可以说，从江苏着手开展对小城镇的研究，有着普遍性的意义和一定的指导意义，国家把"江苏小城镇研究"作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第六个五年计划期间的重点项目，主要考虑也在于此。

在费先生的倡导下，小城镇研究一开始就摆脱了在概念中兜圈子，从书本到书本的模式，不是从过去的经验出发，不是从原则、定义出发，而是注重实地调查，从实际中提出问题、讨论问题并提出解决问题，并把它上升到理论上来，努力体现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原则。

从研究工作的发展过程来看，呈现出五个鲜明的特点：

（一）在研究步骤上，分析"解剖麻雀"和"卷地毯"两个阶段。

所谓"解剖麻雀"，就是深入到各种类型的小城镇，作实地调查、观察和研究。所谓"卷地毯"，就是从宏观方面抓住一些专题进

行研究并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案，用一批问题解决一块地区普遍遇到的实际问题。

第一阶段，我们用了大约一年半左右的时间，按照费先生提出的“类型、层次、兴衰、布局、发展”十个字的要求，解剖了一大批不同地域、不同成因、不同类别、不同层次的小城镇，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在这个基础上，举行了两次学术交流会，让各方面的学者和实际工作者来“赶集”（就是把自己的论文带到会议上来交流），交流了调查成果，锻炼了研究队伍，扩大了社会影响，为进一步研究带有共性的重大问题准备了必要的条件。

从1984年下半年开始，研究工作转入了“卷地毯”阶段。一套力求切合小城镇实际的统计指标，已经设计出来。对小城镇带有共性的问题，诸如政策问题、体制问题、农村商品流通问题，科学技术人员的流动问题、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问题、发展第三产业问题、城乡进一步联结问题、小城镇建设的规划设计问题、乡村工业的技术进步问题、农村环境保护问题等的研究，已经展开。

（二）在研究地域上，从点到面，从经济发达的苏南逐步推进到相对不够发达的苏中、苏北，力求对实际工作具有指导意义。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江苏省社科院社会学所组成的小城镇研究课题组，1983年上半年，首先在小城镇发育健全的吴江县展开，费先生的《小城镇、大问题》就是在这一段调查的基础上写成的。下半年接着又扩展到苏州、无锡、常州、南通四个经济发达、小城镇建设搞得比较好的地区。如果不是这样由点到面、由少到多地进行，小城镇研究的进展就不会这样快，成效和反响就不可能这样大。

（三）在研究力量上，我们是理论工作者与实际工作者携手合作。

过去一段时期里，我们的理论研究工作者与实际工作者之间存在相当一段距离。往往出现这样一种现象：理论工作者奔走呼吁

的事情，实际部门的同志并不经心在意；实际部门为之苦恼、困惑的难题，理论工作者又不很感兴趣。造成搞理论的了解实际很少，文章写得空泛；做实际工作的理论少，感性认识很难上升到理性认识。

江苏的小城镇研究，在二者的结合上做了有益的尝试。围绕共同的课题，让理论研究工作者和实际部门的同志直接见面，互相合作，在同一个讲坛上，在同一个报刊版面上，就小城镇问题发表各自的见解，质疑问难，相互切磋。改变了过去那种理论工作者与实际工作者接触甚少，互相脱节，缺乏交流的状况。

两年来，随着研究工作的展开，“雪球”越来越大，在全省范围形成了一支由多方面人士组成的研究队伍，其中有中央、省、市各级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的工作者，有高等院校的教师和学生，有各级党政部门的政策研究工作者，更多的是在小城镇上做实际工作的领导干部和管理骨干。

（四）在研究内容上，体现了多方面和多学科的相互渗透和结合，小城镇的研究内容愈来愈丰富。

两年多来，有志于小城镇研究的各方面人士，围绕“小城镇的地位和作用”、“小城镇的兴衰规律”、“不同地域小城镇的发展模式”、“小城镇的工业发展”、“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小城镇的环境保护”、“小城镇的规划布局”、“小城镇的商品流通”、“小城镇的管理体制、“小城镇的人口规模”、“小城镇的公用设施建设”、“小城镇的发展前景”以及“小城镇与中心城市的关系”、“小城镇与人口问题”、“小城镇与合理的城乡产业结构体系”等若干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做了大量的分析、研究工作，发表了许多很有见解的文章，提出了一些可供选择的发展方案。这些成果的部分，有的已经编成第一本小城镇研究论文集，有的收入了行将出版的第二本小城镇研究论文集和由新华日报主编的《小城镇建设探讨》一书。研究内容已经涉及到经济学、社会学、伦理学、人口学、规划学、建筑学、地理

学、管理学、环境保护学等多种学科。

（五）在研究方法上，把定性与定量、静态与动态、宏观与微观、一般与个别有机地结合起来。

许多研究者们没有沉湎于社会学书本知识，不是满足于对一般情况的泛泛了解，并非强调一个方面否定另一个方面，不是只看到小城镇的今天而不看到小城镇的明天，而是坚持了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遵循从特殊到一般、又从一般到特殊的辩证的认识过程，来钻研自己的论题，以创新之意，射"四化"之的，使研究工作同实际生活尽可能结合在一起。

实际生活是如此丰富多彩，辛勤耕耘从来不会没有收获。由于小城镇研究扎根于城乡人民实际生活之中，所取得的研究成果言之有物，因而对实际工作颇有裨益，为领导机关作出正确的决策提供了科学的依据。江苏的小城镇研究者们，为取得这样的积极成果，感到由衷的高兴。

已经过去的两年，为我们的研究工作开辟了道路，打下了基础，但也为自己提出了许多新的课题。下一步，我们将在前一阶段侧重于微观的、定性的基础上，转到宏观的、定量的分析研究上；将从侧重于小城镇发展的外部条件，转到小城镇"内部器官"的研究上；将在研究了大量小城镇经济问题的基础上，腾出部分力量转向小城镇的社会结构、家庭、婚育、人际关系等社会问题的研究。

谢谢各位先生听了我的介绍。我们深有兴趣了解日本同行们的丰富的研究成果的介绍。

（1985年3月21日于南京）

振兴农村乃建国之本

——日本大分县“一村一品”运动介绍

最近两年我两次访问日本时，都去考察了日本西部的大分县（相当于我国的省）。为什么对大分县这么感兴趣，跑得这么勤？因为大分县是以“一村一品”运动而闻名海内外的。我国的好几个省市早就开始注意研究大分县“一村一品”运动的经验了。上海开展了“一街一品”活动，武汉开展了“一街一宝”活动，开津开展了“一村一计”活动，江苏的吴江等地早有“一乡一品”、“一镇一品”的经验。

大分县位于日本西部的九州岛上，与江苏隔海相望。全县6337平方公里，125万人口，靠海多山，百分之四十的面积是山区，与我省的连云港市相似。大分县在1979年以前，农村人口大量外流，全县58个町、村（相当于我国的镇、乡）中有44个单位人口下降，他们称之为“人口过疏”，当局为此大伤脑筋。县知事（相当于我国的省长）平松守彦先生是1975年到大分县任职的，先是任副知事，由于工作出色，后来两次连任知事。他为了解决农民进城、人口过疏的问题，先是发动“怀念家乡”运动，想发动为谋较高收入而进了城的大分人回来工作，此举没有成功。后来平松守彦发动“一村一品”运动，要求每个町、村从本地资源和具体条件出发，努力生产出高质量的、全日本第一流的产品，首先打入东京市场，进而在世界市场上具有竞争力。

由于大分县靠海多山，因而“一村一品”首先向农产品的深度加工进军。我们拜会平松知事时，他送给我一张“大分县展望图”，上面以鲜明的图案标明着“一村一品”的分布状况，有姬岛村的大

虾，大田村的蘑菇，米水津村的水产加工，大山町的梅蜜（与我省吴县有协作关系），汤布院町的“丰后牛”（某牛的品种）和温泉旅馆，等等。我问平松知事：八年工作，大分县“一村一品”运动的结果怎样？平松先生告诉我：现在大分全县已有260品，其中销售额在一亿日元以上的有113品，销售总额在10亿日元以上的有16品。在“一村一品”运动获得成功的单位，收入大大增加，人口外流的现象已经停止，有些在城市里工作的知识分子跑回大分来“振兴家乡”了。据大分县厅农政部长后藤义昭先生介绍，“一村一品”运动激发了人们的创造性和信心，使每个町、村都出现了活力。这一看法，在我们后来访问的专业户身上，得到了证实。

我们在一座深山老林里访问了大田村蘑菇专业户奥口广喜。他是九年前从城市里回来的，夫妇二人，在自己的两公顷山地上经营蘑菇，现已年产3.5万株，年收入可达2000万日元，这在日本也是很高的收入水平，已两倍于一个名教授的工资收入了。我第一次去访问奥口的时候，他正在家里读厚厚的一本《家庭教育论》。宽敞的会客室，正中挂了湖北一位书法家的对联，原来奥口1985年曾随平松守彦知事到武汉访问，并作了蘑菇栽培技术的报告。奥口告诉我：他过去很穷，幼时做过小僧，后来靠自己努力进入农学院读书。他很动感情地说：如果没有“一村一品”运动，就没有自己现在的高收入和理想，庸庸碌碌地度过自己的一生罢了。他还这样告诉我：“日本农民现在还有自卑感，这是由于社会对农民有偏见，认为农民是小百姓，要打掉这种自卑感，必须创造出对全国有影响的产品，这样收入也就大大提高了，可以到全国和国外旅游，可以提高自己的文化素养，对农民的价值观才能得到根本改变。”奥口自豪地告诉我，他见过县知事平松守彦四十次，还见过中曾根首相。他愿意做一块垫脚石，为改变家乡大田村的面貌作出努力。

振兴家乡，抱负不凡，是我对这位普通的蘑菇专业户奥口广喜的印象。在后来访问了更多的“一村一品”带头人以后，这种印象进

一步加深了。两次访问大分县，我都遇到了米水津村的鱼类加工厂高桥治人。他是国立神奈川大学法律系的毕业生，在大城市工作了三年，因为他是长子，有义务继承父业，也为了振兴家乡，回来办起了联系 20 个互助组的鱼类加工厂。他拥有的生产手段，就是一条生鱼流水线和一座容量为 300 吨的冷库。他腿勤、手勤、脑勤，同县立水产研究所联系密切，经常去请教种种技术问题；每年到东京、大阪等大城市的鱼市场去考察十次，每次在市场里观察五、六小时，因此，作为一个法律专业知识分子不到两年时间，就熟悉了鱼类加工技术和销售业务。现在他一家三口（妻、父）的月收入为 90 万日元，比在城市里工作的收入高得多了。高桥治人更感到自豪的，是他的水产加工事业使本村人丁兴旺起来了，1984 年比 1974 年增加了 175 人，1985 年又增加了 40 人。他说：较高的收入，使我这个村留得住人了，而且能吸引城里人回来了，还有什么比这更有意义的呢！

我曾问过平松守彦知事，“一村一品”运动的核心是什么？他毫不迟疑地回答说：不仅出产品，而且出人才，我们要培养为振兴家乡感到自豪的年青一代。他在全县十二个地方办了“书塾”，自任塾长。每塾 30 人，每月集中一次，聘请“一村一品”的带头人当教师，交流技术，交流经验，也交流各人在理想等问题上的观点，从下午谈到晚上，然后各自驱车返回。书塾为期二年。平松守彦采用这种传统形式，起到网罗人才、结士收民心的作用，也把发展“一村一品”的经验传播开了。访问米水津村高桥治人归来的途中，我以《海边杂感》为题写了一首七言诗赠与陪同我的日本朋友：

细雨蒙蒙访大分，
壮哉高桥不羡城。
塾中平松能结士，
百村佳品百村人。

我们在安心院町访问时，见到了五、六位“一村一品”带头人，一边共进午餐，一边谈话，又一次证实了平松守彦的“书塾”是办得有成效的。以经营“三和酒”的西太一郎为例：他利用当地资源生产清酒和葡萄酒，1980 年前的年销售总额为 5 亿日元，1985 年达到 150 亿日元，并远销东京、北京。我向这几位“一村一品”的带头人提了一个问题：你们有没有比城里人低一头的思想？西太一郎回答说：我原来有农村太艰苦的思想，现在则有制造第一流产品的满意感。插花葫芦的设计者沟口荣治说：我的产品有个性，我本人也有个性。我因为在读书时参加学生运动，后来没有职业，从东京回到家乡来搞这门手艺，已经十三年了。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产业与农户是脱节的。我则通过自己的小小工作，使产业与农户结合起来。人生的意义莫过于完善环境和改造自然，我实现了这一点，也振兴了地区经济，因此我感到比住在东京幸福。沟口荣治的这番话，确是体现了他的个性，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大分县的“一村一品”，并非只指农产品或工业产品，也包括旅游、观光等第三产业。如中津江村利用一个废金矿办起了地下展览馆，保留当年开矿的机械设备，修好通道与灯光，布置了若干与真人差不多的机器人。当观光者到来时，让机器人重复当年开矿时的操作，让旅游者了解当年开金矿的风貌和艰苦性。这也属“一村一品”。一年的观光者约有 50 万人，门票收入有 10 亿日元，给这个村带来一笔可观的收入。又如汤布院町是以旅馆业著称于日本的，中曾根首相曾去访问过。平松守彦在这个町抓出这个特殊的“一品”，是依靠了两条：一条是利用当地的温泉资源，以温泉办旅馆，以温泉培养花卉、蔬菜；一条是培养两个善于动脑筋的带头人，做出样子，带动一片。一个带头人是中谷健太郎，原来是东京东宝电影制作中心的副导演，回到家乡办起了“龟之庄”温泉旅馆，由于经营得法，现在年收入 4000 万日元以上。另一个带头人是沟口熏平，素性

爱爬山、爱捉蝴蝶，高中毕业以后因患肺结核没有升学，办起了“玉之汤”旅馆。据安心院町的町长吉村先生介绍，他们把发展农业与办好观光业结合起来，利用温泉的天然资源，保护它，开发它，每年吸引了 300 万旅游者，一年观光业方面的收入达 80 亿日元，同时带动了商业亦获得收入 80 亿日元。

两次访问大分，三点印象特别深刻：

(1)大分县“一村一品”的内涵是广泛的，不是狭义的，既包括农副产品的深度加工，也包括观光、旅游等特殊“产品”。他们的目标是明确的，全日本第一，进入东京市场和国际市场。因而，一个拳头产品，可以振兴一个地区。

(2)不仅出“产品”，而且出“人品”，产品靠人品，人品靠产品。社会制度不同，在人与物、人与自然的关系上，道理是相通的。

(3)我看来看去，无论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什么阶段，振兴农村乃建国之本。现代化程度发展到如日本那样的高度，仍要回过头来解决振兴农村的问题。

它山之石，可以攻玉。大分县的经验，很值得我们乡镇企业同志的思考和借鉴。

(载《江苏乡镇企业》杂志 1987 年第 5 期)

中日农村发展的共同思考

——同日本民族学振兴会和东京大学专家座谈时的讲演

尊敬的中根千枝教授，各位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

东京的三月，是樱花初绽、春色宜人的季节。今天，我有幸在这里与各位学者和专家就共同感兴趣的问题进行讨论，感到由衷的高兴。现在，请允许我从中国的江苏省谈起，探讨一下当今社会农村发展的一些问题，以及解决这些问题的思路。

一、江苏的特点及其在中国的地位

江苏，位于中国大陆东部沿海的中心，地处美丽富饶的长江三角洲，与日本隔黄海相望。总面积 10.26 万平方公里，占全国土地面积的百分之一，境内有长江横穿东西，大运河纵贯南北，太湖、洪泽湖等大小湖泊星罗棋布，有“水乡泽国”之称。

大约与北京猿人生活的年代相仿，江苏境内就有了一批拓荒者。西汉时，江苏北部已开始牛耕。

吴、东晋、宋、齐、梁、陈、后来还有明朝、太平天国曾建都于江苏的南京。还有大家所熟知的孙中山先生也曾在南京宣誓就任临时大总统。清朝康熙六年(公元 1667 年)设置江苏省，取江宁府和苏州府的首字而得名。隋唐以后，中国经济中心南移，有所谓“天下大计，仰于东南”的说法。十九世纪末，面粉、造纸、火柴、采煤等中国近代工业也在江苏陆续兴起。

与经济繁荣相适应，江苏又有“人文荟萃之地”之称。在这里，哺育过许多杰出的科学家和发明家，产生过许多大艺术家和大学

者。

江苏现有人口 6400 万，占全国总人口的 6%，人口密度占全国首位，每平方公里 623 人。全省辖 11 个市，64 个县(市)，1962 个乡(镇)。

1978 年以来，江苏的国民生产总值平均每年增长 11.6%，社会总产值增长 14.4%，国民收入增长 12.2%。工农业总产值连续八年居全国首位，人均国民收入超过人民币一千元。

江苏是中国重要的农业区之一。全省盛产大米、棉花、蚕茧、水产、烟叶、麻类等作物，素称“鱼米之乡”，主要农产品在全国占有重要地位。江苏的粮食产量居全国第二位，人均占有量超过 500 公斤。

江苏的工业以轻工为主，加工工业比重较大，在 36 种主要工业产品中，江苏省有六种产品产量占全国第一(水泥、硫酸、棉纱、棉布、化学农药、合成洗涤剂等)。

近年来，江苏省实行对外开放，大力发展外向型经济，与海外的交往合作日益广泛和深入。

各位都知道，中国人民正在为实现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的经济目标而努力，在发展战略上，东部沿海发达地区先行一步，进而带动中部地区，再扩展到西部地区。如果把中国比喻为巨龙的话，东部地区就是龙头。江苏省在今后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将继续起着重要的作用。

二、“苏南模式”在中国的出现

苏南，是指江苏南部的苏州、无锡、常州三个市，十二个县，中根千枝先生等许多学者到过那里。苏南是江苏的发达地区，也是中国人多地少的矛盾尤为突出的地区。在这里，每平方公里的人口密度高达 640 人，人均耕地面积只有一亩。在历史上，苏南农民世代

精耕细作，同时又巧妙地把种植业、畜牧业和手工业结合起来，在农业之外分出了家庭副业，形成了男耕女织或女耕男匠的局面。随着生产的发展，大批剩余劳动力需要寻找新的出路，应运而生的苏南模式，就是农民群众在实践中的创造。

苏南模式，是一种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模式。它的主要内容是以集体经济为主体，乡村工业为主导，中心城市为依托，市场调节为主要手段。

(1)集体经济为主体。这是苏南模式的主要标志。苏州、无锡两市(九个县)农村 1987 年的乡镇企业总产值 298.2 亿万元中，个体和联合体经济，占 5.7%，集体经济占 94.3%。

(2)乡村工业占主导地位。苏州、无锡两市，1987 年乡和村这两级的工业产值为 317 亿元，占两市(九县二郊区)工业总产值的 55%，已经是“半壁江山”。

在农村普遍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乡村工业逐步取代了农业的主体经济地位，并且负起了稳定农业、建设农业的重任。无锡市第六个五年计划期间，全市乡村两级工业利润用于支援农业的资金达 4.5 亿元，相当于同期国家对无锡市农业投入的 3.8 倍。苏南农民所以能较快地由穷致富，集体经济所以能由弱变强，主要得力于乡村工业的兴起和发展。

(3)以中心城市为依托。苏南的乡村工业有 40%以上的产品，是同大中城市挂钩协作的。无锡市所属的三个县、一个郊区的乡镇企业，三分之一以上与城市工业、科研单位建立了各种协作关系。苏南模式中的城乡联合，是一种经济技术上的协作和渗透，自愿与互利，平等互惠，同行政干预完全不同，因而形成了一种多层次、多领域、多形式的格局。

(4)市场调节是主要手段。乡镇企业具有商品经济所共有的经济机制，即以价格为中心的商品货币体系作用以及影响市场供求变动的各种因素的相互作用，由这两方面的作用进行自动调节。乡

镇企业产品的原材料、能源、产品销路、技术力量和管理的改善，全靠自己去开拓、去竞争。

从上面所述“苏南模式”四个特征的介绍可以看出，苏南模式是社会主义公有制与灵活的市场机制的巧妙结合，它既符合中国的国情，又具有世界现代经济的特点，因而具有较强的生命力和蓬勃的生气。

上面谈了苏南模式的内容，那么如何评价它的意义呢？我认为，评价任何一种经济社会发展模式，可以站在多种角度，用若干标准，关键的有三条：是否发展了社会生产力？是否使大多数人富起来了？是否有利于各项社会事业的发展？苏南模式对此都给予了肯定的回答。

（一）社会生产力有了很大发展。苏州、无锡两市（九县、二郊区）1987 年与 1970 年相比，农业、副业、工业总产值增长 17 倍，人均农副工产值增长 16 倍，农副业产值增长了 122%。

（二）大多数人富裕起来了。在 1970 年，历来被视为富庶之地的苏州、无锡两市的九个县，农民人均分配只有 102 元，乡村工业大踏步发展后的 1987 年，这两市的农民人均分配达到 900 元，这个变化是不小的。

（三）促进了各项社会事业的发展。苏南模式形成以后，苏州市六个县的 180 个乡镇实现了乡乡有文化中心，村村有俱乐部，建造在集镇上的新剧院有 160 多座，亦工亦农的演出队 160 个，基本形成了初具水平的农村文化设施网络。

三、苏南模式与大分模式

各位，现在我想谈一谈日本的“大分模式”。我称它为“模式”，不仅是为了比较的方便，还为大分县的影响已经超出了国界，引起了中国学者的浓厚兴趣。我曾经两次访问过大分县。那里的一切，

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中国的苏南模式，日本的大分模式，两者之间相隔着浩荡的黄海，如果把这两面引人注目的旗帜加以比较的话，那是很有意思的，我们会从中发现不少相似的东西。

（一）这两个省（县）**各自从实际出发的原则是多么的相似。**前面说过，对人多地少的苏南农民来说，只向土地讨生活是不足温饱的，更谈不上富裕，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中国的国情没有条件也不允许大批农村的剩余劳动力涌进城市去做产业工人。在这种情况下，素有农工相辅传统的苏南农民开始动手办起了工业，乡村工业发展起来了，进而带动了小城镇的建设，这好比建造了一个个“蓄水池”，使农民在这里安居乐业，又减轻了大城市的压力。从这个意义上说，苏南模式既是苏南农村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矛盾运动的产物，也是苏南农民从本地实际出发的一种创造。

再来看“大分模式”，它的“一村一品”运动既体现了当地传统，又可以焕发农民的乡土观念。它巧妙溶合了物质和精神两方面的力量。而且，在实施“一村一品”运动时，各市、町、村根据自己的特点和条件，自主选定开发项目，不搞脱离实际、徒有虚名的花架子。如有的村一时拿不出最好的产品，就联合起来搞“二村一品”、“三村一品”，条件好的，就搞“一村二品”、“一村三品”，大分县的灵魂也是从当地的实际出发。

（二）**农业里面出工业。**“苏南模式”和“大分模式”都是从农业的母体上发育成长的，而后又在农业与工业之间架起了桥梁。苏南地区初期依靠农业的原始积累办起工业，然后又用工业的利润反哺农业。“以农兴工”和“以工补农”互为因素，相得益彰，基于这样的认识，我国著名的社会学家费孝通教授把乡镇工业叫做“草根工业”。

大分的“一村一品”，来源于农业及其加工工业，从农业起步，逐步发展到现代工业。到目前为止，农副产品的加工仍然占“一村

一品”相当大的部分。

（三）农民开始走入科学技术的广阔天地。“苏南模式”是以中心城市为依托的，依托中心城市开展各种形式的城乡协作和城乡联合，实质上就是依靠科学技术的力量。苏南农民在发展乡镇工业的实践中深深体会到：科技人才就是“财神”，因此千方百计广招人才，他们称之为“借脑袋发财”。

大分县“一村一品”运动的骨干是当地的青年人，他们有的是土生土长的中学毕业生，也有大学毕业或辞去公职返回故乡的人，有了这样一批青年知识分子，“一村一品”运动才能取得卓著的成效。“技术立县”则直接体现了科学技术介入经济开发的精神。中国的苏南和日本的大分，在发展经济中花很大气力搞科技开发，因为他们明白当今世界经济的竞争归根到底是科技的竞争，科学技术可以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从这一点上，我们会发现，两地的人们是多么地明智！

（四）他们都有一批能人和带头人，而这些带头人是在政府积极有效的指导下发挥作用的。苏南县、乡两级领导人，是发展乡村工业的地区经济的实际决策人，这些人了解当地实际，了解农村和农民，对改变农村面貌有强烈的责任感和紧迫感，相对而言，他们的官僚习气较少，办事注意效率。“苏南模式”能有今天的局面，是与他们的努力分不开的。

大分县的“一村一品”运动，是由县知事平松守彦倡导和推动的，县里成立了“一村一品”运动推进协议会，知事亲自挂帅，各市、町、村也围绕“一村一品”运动，形成了一批带头人和骨干。我在中国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曾经讲过这一观点：经济的发展毕竟离不开政治家。

当然，由于两地所处政治经济环境的不同，历史条件和观念习俗也存在着差异，因而，两个模式也就各有千秋。

（一）所处商品经济发展的阶段不同。苏南的乡镇企业尽管以

市场调节为主要手段，但仍然在很大程度上受国家计划和宏观指导的制约，它不得不在计划与市场的边缘上寻找立足点。这就必然产生两种效应：其一、苏南的乡镇企业要比国营企业花费更多的气力才能求得生存和发展；其二、艰难的环境锻炼了苏南乡镇企业的生存能力，使它越来越具有竞争力。

“大分模式”处在日本商品经济的发展较为成熟、市场体系较为完备的大环境中，“一村一品”运动，是日本经济振兴的产物，顺应了日本经济高速增长的潮流。从“一村一品”到“技术立县”，折射出了当今日本经济发展的轨迹。

（二）人口转移方式不同。“离土不离乡”的人口转移方式，是苏南地区多年来实践着的方式，这种方式的主要特征是：农业人口的行业流动与区域流动相分离，建设小城镇与兴办乡镇工业相结合。这种方式的作用是积极的，上面已作过讨论。

日本大分县和其它一些地方，在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中，农业人口转移，主要采取了行业流动与区域流动相结合的方式。即离开农业的人口大多 进行了跨区域流动，由农村流向了城市。当然，随着“一村一品”运动的进展，一些青年知识分子返回了农村，但这只是少数。

（三）体制上的差别。这主要表现在所有制上的不同。苏南模式以集体经济为主，依靠横向联系，并努力纳入国家间接计划，来寻找比较稳定的供求关系。大分模式则主要是私营经济，面向市场进行自我调节，当然也受政府的指导。

（四）经济的管理方式不同。苏南模式有县乡领导人的积极干预，是“有为而治”，大分模式则是以引导为主，属“无为而治”。

四、农村发展的世界思考

农村发展的问题，已成为当今世界各国面临的共同问题。振兴

农业，振兴农村，也成为不同制度、不同肤色的学者的严肃命题。我简要地分析比较中国的苏南模式和日本的大分模式，对这两个不同的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模式进行探讨，是试图在纷繁的农村发展问题上理出一个思路来。

（一）从中国的实践看，中国的理论界和实际工作者们，一直在进行着艰苦探索，试图找到一个农村和城市共同发展的道路。它的意义不仅在于稳定农村，还关系到中国的人口战略和经济发展战略。中国是一个农民占绝大多数的大国，把农村安排好了，国家的大局就安定了。安排不好，国家就不得安定，更谈不上发展。“苏南模式”所表现出的“离土不离乡、建设小城镇”的特征，正在开始改变农村搞农业、城市搞工业的传统格局，使城乡联合发展的战略开始成为群众的实践，乡镇工业和小城镇在中国农村经济由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转化，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化进程中所起的作用，正为人们普遍承认。

（二）从日本的情况看，在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中，有眼光的人们也主张应兼顾农村和城市两方面的利益，避免农民过多地涌进城市。资料表明，东京、大阪、名古屋三大城市圈，已集中了日本全国百分之五十的人口，而这三大城市圈只占全国土地面积的百分之六，这将不可避免地给大城市的发展带来一系列难题，同时也影响到农村的繁荣。“大分模式”所显示的工业分散化特征，使农民看到了实实在在的利益，使日本农村的青年一代愉快地留在家乡，在农村开创自己的事业，并使一些青年知识分子开始从城市返回家乡，这确实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它对农村的发展，有着不可低估的影响。它的示范意义，也许在今后会看得越来越清楚。

（三）从世界范围看，伴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加快，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将是一种历史趋势。但是，工业与农业间的比较利益，会自然驱使“天平”向城市一头倾斜。在进步与代价之间，人类面临着艰难而痛苦的选择：一方面，农业是人类的立身之本，即使在高度工业

化的现代，工业和城市的发展与进步也离不开农业这个基础；另一方面，工业化和城市化作为历史发展的必然，又有其不可逆转的性质。以往的经验表明，有些国家实现这种历史性进步时，往往以牺牲或推迟农村的繁荣为代价。苏南模式的意义，在于通过发展农村工业，不仅在个人收入方面填补了城乡差距，把农民稳住在农村，还为农业现代化提供物质、经济基础，从而，在进步与代价之间找到了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前景广阔的道路。“大分模式”之所以引起我们的浓厚兴趣，原因亦在这里。因此，我认为，苏南和大分的经验，应该是人类的共同财富。尽管世界上人们的信仰不同，社会制度有别，经济环境和地理环境存在着差异，但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人们都在追求和创造着美好的未来。这就是我们探讨这个问题的出发点和意义所在。

谢谢大家。

（1989 年 3 月于东京）

中国苏南地区的新发展及其新影响

——在日本成蹊大学亚太研究所的讲演

东京的三月，南京的三月，都是迷人的季节。晨雾迷蒙，梅花怒放，樱花初绽，万物复苏，大自然赐予我们的实在太美了。今天，我有幸在这里同各位见面，感谢日本主人的精心安排。下面，请允许我介绍一些中国江苏的最新情况。

一、苏南地区的概况及其在江苏的地位

苏南，这里是指江苏南部的苏州、无锡、常州 3 个市，12 个县，在座的许多朋友和学者曾到过那里。这是一块江海交汇、河湖纵横、城镇星罗棋布、占尽地势之利的富饶土地。她东邻上海，南濒太湖，西接南京，北依长江，京杭大运河贯穿其间。

苏南地区现有土地面积 1.7 万平方公里，人口 1130 万，每平方公里人口密度高达 665 人，人均耕地约一亩。

在历史上，苏南地区就是中国最富庶的地方之一。这里气候温和，土地肥沃，农民勤于精耕细作，同时又巧妙地把种植业、畜牧业和手工业结合起来，在农业之外分出了家庭副业，形成了男耕女织或女耕男匠的局面。随着生产的发展和经济的繁荣，苏南又成了“万商云集”的商埠。

现在，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苏南地区的发展又呈现新的经济优势。乡村工业兴起最早，发展最快。1992 年，苏南乡村工业总产值达 1765 亿元，占全省的 57%。苏南地区共兴办“三资”企业 6800 多家，利用外资近 50 亿美元。农村城市化水平迅速提高。90%以上的农户住进了楼房，许多农民用上了自来水和液化

气，不少农户安装了电话，轿车也开始批量进入农民家庭。

发达的苏南经济，在江苏这个经济大省中历来居于举足轻重的地位。经济愈发展，这一重要地位就愈加突出。为了便于各位理解这一点，我利用一组数字，把苏南地区的新发展及其在江苏的重要地位介绍给大家。

苏南地区有 12 个县(市)，占全省 64 个县(市)的 18.8%；人口 1130 万，占全省总人口的 16.4%；耕地 1059 亩，占全省耕地面积的 6.3%。

1992 年，苏南地区国民生产总值 648 亿元，占全省的 34%；国民收入 580 亿元，占全省的 36%；工农业总产值 2160 亿元，占全省的 43%；工业总产值 1980 亿元，占全省的 48%；乡村工业总产值 1765 亿元，占全省的 57%；兴办“三资”企业 6800 多家，占全省的 70%；利用外资近 50 亿美元，占全省的 78%；农民人均收入 2600 元，是全省农民人均收入水平的 2.5 倍。

二、1992 年苏南地区发展的新特点

诸位知道，1992 年春天，在中国南方发生了一件影响中国改革开放进程的大事，这就是邓小平先生视察了深圳、珠海等地，并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谈话。在这一谈话精神的鼓舞下，苏南人聪明能干的巨大能量得到释放，苏南地区的发展呈现出一日千里的崭新面貌。概括起来，有以下五个鲜明特点。

1、改革力度明显加大，乡村企业的经营机制更趋灵活。中国在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后，国有企业的自主权逐步得到落实，乡村工业企业原有的许多优势不复存在。在这严峻的挑战面前，苏南乡村企业加大改革份量，对乡村企业进行股份制改革和组建企业集团。到目前为止，苏南已有 1500 家乡村工业企业进行了股份制改造，占苏南乡村企业的 5%。通过股份制改造，企业的产权关系更加明晰，职工是企业主人翁的意识得到强化，企业自主权得到进

一步落实，苏南乡村企业获得了新的动力与优势。

2、改革开放步伐明显加快，对外经济贸易和利用外资工作更有成效。1992年，苏南地区加快了外向型经济的发展步伐。在海外兴办各类企业近100家，总投资近8000万美元，在近100家海外企业中，有30多家是农民投资兴办的。1992年，苏南地区出口创汇额为32亿美元，比上年增长45%。

3、经济发展高速度高效益，整个苏南地区已成为中国经济增长最快、效益最好的地区之一。1992年，苏南地区的经济总量比上年增加近1000亿元，几乎翻一番。在生产增长的同时，经济效益也同步增长，利税总额比上年增长88%。

面对苏南地区经济高速发展的形势，不少人提出，这里的经济发展是否过热？目前的这种高速度还能持续多久？据我们的观察与分析，目前苏南地区的高速度基本上是正常的。其依据有三个：

(1)1992年的高速发展，是前三年国民经济治理整顿后的积极成果。1989年到1991年三年间，苏南地区做了三件事，一是对乡村企业进行大规模的技术改造，技改总投入180亿元。通过"伤筋动骨"的技术改造，引进了一大批国外八十年代的新设备，淘汰了许多技术落后、工艺陈旧的设备，使企业的技术装备水平大大提高；二是进行大幅度的结构调整，产品结构根据市场需求调整，企业结构根据经济规模原则分化组合；三是大量引进技术人才，目前苏南地区的技术人员占职工总数的比例达37%。由于这三条，苏南地区积蓄了强大的经济发展能量，1992年转化为经济发展的高速度。

(2)1992年的高速发展，是上一年特大洪涝后恢复经济的必然要求。1991年，我们国家发生了百年未遇的特大洪涝，世界各国，包括贵国的政府和人民在内，都给予了热切的关注和帮助。洪涝灾害给国民经济和人民生命财产造成巨大损失。苏南地区的损失尤其严重。1992年的高速发展，具有浓重的恢复色彩。

(3)1992 年的高速发展，不仅速度快，而且效益好。1992 年苏南地区的产销率达 95%左右，基本上是生产多少，销售多少。可以说，苏南地区的经济发展，基本上是速度和效益的有机统一。

基于以上分析，我认为，苏南地区的高速度基本上属于正常。当然，并不是一点问题也没有。其中少数地方也有重速度、轻效益的情况，投入还带有一点盲目性，等等。我相信，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和完善，这种状况会得到改变。

4、经济开发新区星罗棋布，它已成为城乡一体化的新的生长点。近年来，苏南地区陆续兴办了一大批经济开发新区；1992 年发展尤快，几乎每个乡镇都有。据有关部门的不完全统计，目前苏南地区有各种开发区 368 个，规划开发面积 1600 多平方公里。

从目前开发建设的情况看，各开发区的规划比较科学，建设起点比较高。新区内实现“七通一平”，道路、通讯、供电、给排水、环境保护等设施齐全；区内分布了许多中外合资企业、台商投资企业；区内生活服务等第三产业的发展也正在配套完善。开发区已经展露出农村城市化的雏形。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开发区已成为农村城市化的新生长点。

5、人民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是近几年提高最快的一年。1992 年，苏南地区城镇职工人均收入近 4000 元，农民人均收入 2600 元，分别比上年提高 52%和 46%。

三、苏南模式在九十年代上了一个新台阶

最先提出“苏南模式”这一概念的是费孝通教授。那还是在 1984 年的下半年。

“苏南模式”，是指苏南地区的农民率先实践的，以集体经济为主体，以乡办和村办工业为主导，以中心城市为依托，以市场调节为主要手段，由县乡两级政权直接领导的一种经济社会发展模式。

当时，“苏南模式”的主要特征有：

一是集体经济占主导地位。目前，苏南地区集体经济的比重仍占95%以上。

二是冲破了过去“城市工业、农村农业”的格局，农民大办工业。农村经济中，工业经济竟然成了主体。苏南农民所以能较快地由穷致富，集体经济所以能由弱到强，主要得力于乡村工业的兴起和发展。这就是“无工不富”的由来。

三是以大中城市为依托，与城市工业企业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苏南的农村充分利用了较为优越的地理位置和交通条件，接受上海、北京等大城市以及苏州、无锡、常州等大中城市的“辐射”，同国营企业、高等院校、科研单位建立了各种形式的横向联合，初步形成了城乡互补、共同发展的局面。

四是以市场调节为主要手段，通过市场机制取得能源、原材料，直至延揽技术力量，推销产品。苏南的乡村企业全方位、多渠道地寻找市场、占领市场、不断扩大产品覆盖面。按照市场的需求进行生产经营，“人无我有，人有我优，人少我多，人多我早，人优我廉”，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五是县乡两级组织是乡镇企业的实际决策者。苏南乡镇企业以集体经济为主，它同县乡村各级政权有着与生俱来的密切关系，县、乡两级的党政领导者，是发展乡村工业和地区经济的实际决策者，对乡村企业行使重大问题的决策权。

现在，在经过了一个不断补充和完善的过程之后，“苏南模式”形成了九十年代的一些新特点。

(1)在管理体制上，改活了，已从行政管理为主要手段转变为经济调控为主要手段并走向规范化。乡村政府在乡镇工业发展过程中，行政干预多了一些，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企业的发展。为此，乡镇企业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在经历了“三制一联”(承包制、厂长负责制、内部经营责任制和横向经济联合)，“两段分配”(税前计件工资和税后提留奖金分配)，“生产要素承包、资产滚动增值”(以

资产、劳力、投入的创利产出为承包内容，引导乡镇企业资产滚动增值，减少无效投入，提高经济效益）等几个阶段的探索，正在形成一整套灵活的乡镇企业管理体制，使政府与乡镇企业的关系逐步规范化。

（2）在经济格局上，外向了，即从内向型为主逐步向内外结合型和外向型经济转变。苏南乡镇企业在初创时期，不仅是内向型的，还是支农型的。八十年代，苏南乡镇工业逐步突破了“三就地”（就地取材，就地生产，就地销售）的框框，扩大了自己的生存空间。八十年代末和九十年代初，又抓住了沿海地区开放、发展外向型经济等重大机遇，使“两头在外”延伸到海外，使乡镇企业第二次异军突起。苏南乡镇企业占全省外贸出口创汇、直接利用外资兴办三资企业个数、合同外资金额这三项指标的比例，分别占到 69%、70% 和 80%。这些数据表明，苏南乡镇企业正在走向两面开弓、内外市场结合的经济新格局。

（3）在生产力水平上，提高了，已从比较低级的作坊式生产逐步向技术密集型生产和高新技术产业发展。企业的竞争，说到底是产品的竞争，技术的竞争。苏南乡镇企业始终把提高企业的技术装备水平和产品档次作为首要工作来抓。张家港市，1985 年技改投入的资金只占全年总投入的 30%，1991 年达 70%。1992 年技改投入已达 18 亿元，等于前三年的总和。无锡县 1992 年的技改投入达 20 多亿元，使一半左右骨干企业的技术装备达到 80 年代国内先进水平。经过这十多年的努力，苏南乡镇企业先进设备的比重已达到一半左右，少数骨干企业的技术装备已接近国际先进水平。科技进步使苏南乡镇企业的发展方式，从扩大外延的“多鸡多蛋”，转变为提高内涵的“鸡大蛋多”，从低起点、铺摊子向高起点、上水平转变，这是一个质的转变。

（4）在企业规模上，船大了，已从“小打小敲”、“船小好掉头”逐步向集团化发展。苏南乡镇企业“船小好掉头”的优势一直为人们

所称道。随着市场竞争的日趋激烈和国际市场的开拓，“船大好抗风，船大好远航”，正在成为人们共同认识。追求规模效益，增强市场竞争能力，成了苏南乡镇企业进一步发展的必然选择。据不完全统计，苏锡常地区3万多家乡镇企业中，已有1/4的单位与全国上千所高等院校、科研机构建立了多种形式的协作关系，并已组建了省级企业集团18个，一批跨所有制、跨行业、跨地区甚至跨国界的大型企业集团正在筹建中。

(5)在地区布局上，集中了，正在从“村村冒烟、遍地开花”转变为相对集中，向城镇靠拢，建设和形成工业小区。由于历史和体制的原因，苏南乡镇企业大多是镇属企业办在镇上，村属企业办在村上，具有鲜明的社区经济色彩，形成了村村冒烟的分散化区域布局特征。这种分散化的格局，不仅浪费土地，增加基础设施建设成本，而且不利于小城镇建设和环境保护。近两年来，不少有识之士受到昆山自费开发区的启发，把兴办乡镇企业与小城镇建设结合起来，建设乡镇工业小区。其主要特色有三：(1)工业小区靠近老镇区，又独立于老镇区，硬件软件投入集中，立时立刻见规模。(2)规划超前(或一步到位)，分步实施，筑巢引凤，全方位开放，好戏还在后头。(3)既是工业小区，也是社区建设重点投资区，有的县市还是经济技术开发区，集几任于一身，叩跨世纪的现代化新大门。由于存在这三个特点，缓和了资金不足的矛盾，争取了时间；也避开了过去改造老镇区所遇到的许多麻烦，有利于在较短时间内改变镇容街貌，使小城镇建设迈出了突破性的一步。

概括以上所述，我们可以用“活、外、高、大、集”五个字，来描述现今“苏南模式”新的特征。

四、苏南地区的发展给中国经济带来的新影响

通过以上介绍，我们已经了解到，苏南地区的新发展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近年来经济社会的巨大发展，二是苏南模式

的内涵更加丰富、深刻。这两个方面的内容客观上具有内在的联系：内涵不断丰富的、更具活力的苏南模式，是推动苏南地区新发展的强大内在力量。

那么，苏南地区的新发展将给中国经济和社会带来什么新的影响呢？

1、全面、高速、健康发展的苏南地区，将给"开发浦东"的决策予以强有力的配合和支持。苏南紧邻浦东。苏南是长江三角洲最有实力的腹地。苏南的大发展，极大地改善了浦东及其周围地区的投资环境，提高了外商在浦东地区的投资信心。苏南地区的新发展，为浦东发展成国际金融、贸易中心提供雄厚的产业基础。苏南有很强的工业实力，丰富的旅游资源，有条件成为繁荣浦东、服务浦东的大后方。

2、苏南地区的新发展，给中国沿海农村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思路。以前，人们一提起苏南地区，想到的就是乡镇企业。如今，苏南地区给人们以启迪的东西远远不止这些。乡镇企业管理体制的科学化，经营机制的市场化，经济格局的外向化，经济成份的多元化，资金技术的密集化，企业规模的集团化，工业布局的集中化，村镇建设的城市化，等等，这些新的发展特点，吸引了全国各地，尤其是沿海地区一批又一批的人前来参观，也值得国外的学者去考察研究，这或许是中国式的市场经济的大舞台。

3、经济实力越来越强大的苏南地区，对内地的辐射力也越来越强烈。近年来，苏南地区与内地的经济合作越来越广泛。到目前为止，与内地联合兴办各类企业 280 多家。把苏南地区的人才、技术、装备、资金和管理经验同内地的资源开发结合起来，促进两地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也是缩小沿海和内地差距的一条有效途径。

4、苏南地区大量兴办的各类开发区，为中国农村城市化道路的丰富和发展又充实了新的内容。目前，苏南地区多种类型的经济技术开发区，尤其是广大乡村新办的工业开发小区，如雨后春笋般

地成长起来。乡村工业开发小区的大量兴起，至少具有以下两个方面的积极意义：一是高标准建设的开发小区，各种设施齐备，为农村城市化提供了先进的“样板”。农村的城市化步伐也要高起点、大跨度，力争设计一步到位，分步实施。二是工业开发小区的建设，有效地解决了改造小城镇与保护古镇“小桥流水人家”等独特风貌的矛盾。开发小区的建设既要靠近老城(镇)，利用老城(镇)，又要独立于老城(镇)，努力形成各自的特色，相得益彰。总之，苏南农村大量兴办工业小区，已成为九十年代中国农村城市化道路的一大特色。

谢谢大家。

(1993 年 3 月 21 日于东京)

江苏乡镇企业与大分“一村一品”运动

——1993年11月5日在日本大分县的讲演

秋天，是收获的季节。大分的秋天和江苏的秋天一样，秋高气爽，果实累累，醉人时光。我有幸出席今天的国际研讨会，觉得有很多话要说。但是，主题应该是什么呢？我想，对于充满智慧和创造精神的大分人和江苏人来说，最为引以自豪的话题，莫过于“一村一品”运动和“乡镇企业”了。

下面，请允许我，就江苏乡镇企业与大分“一村一品”运动，发表个人的一些最新想法。

一、中国乡镇企业的今日地位

在今日中国，乡镇企业已经成为农村经济的主体和整个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1992年，中国乡镇企业总产值17600亿元，占中国农村社会总产值的69.5%，占中国社会总产值的31.6%。这就是说，在中国农村经济总量中，乡镇企业是三分天下居其二；在中国经济总量中，它是三分天下有其一。

乡镇企业的发展如此之快，生机勃勃，已经成为中国国民经济中最有活力的增长点。1992年，中国社会总产值净增量的51.6%、税收净增量的68.2%、外贸出口商品收购总额净增量的47.2%，来自乡镇企业。也就是说，在这一年新创造的物质财富中，有一半甚至更多的，是乡镇企业提供的。

由此可见，乡镇企业已经成为中国经济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鉴于它在全国经济中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和迅猛发展的势头，中国资深领导人邓小平对它的评价是：“异军突起”。

这里我想指出：

迅速崛起的乡镇企业，起源于江苏省的南部地区，人们习惯上称之为苏南地区，也有的称之为苏锡常地区。在座的许多朋友和学者曾到过那里。这是一块河湖纵横、江海交汇、城镇星罗棋布、占尽地势之利的富饶土地。她东邻上海，南濒太湖，西接南京，北依长江，古老的京杭大运河贯穿而过。

早在五十年代末期，苏南地区的广大农民就开始发展乡镇企业。为什么乡镇企业的发展首先开始于苏南地区，而不是其它地方？除了苏南农民历来有经营副业和手工业传统，较早接受近代工业熏陶，靠近上海等大中城市和交通便利等因素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人多地少，有限的土地不能够使农民的生活富裕起来。从这种意义上说，乡镇企业是农民追求富裕生活的必然产物。

乡镇企业在其发展过程中，几经曲折，历尽磨难，大有“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之势，所以被中国著名学者费孝通教授称之为“草根工业”。

江苏不仅是乡镇工业的发源地，而且也是中国乡镇企业最为发达的少数几个地区之一。1992 年，江苏省共有乡镇企业 92 万个，从业人数约 1000 万人；乡镇企业总产值 2900 亿元，比上年增长 71%。江苏的土地面积只占全国的 1%，乡镇企业的产值占全国 17%。这对于江苏来说，是经济发展的一大奇迹。

江苏乡镇企业的发展，有力地推动了农村的振兴，也对全省乃至全国的经济发展作出了贡献。主要表现在如下六个方面：

(1)为大批农村剩余劳动力提供了大量的就业机会。1992 年，江苏乡镇企业吸纳的劳动力是全省农村劳动力总数的 33%。由于江苏乡镇企业发展快，需要的劳动力也非常多，近年来在苏南地区，劳动力不但没有剩余，反而十分紧张；劳动力价格也随之上升，以致吸引了近 100 万来自四川、湖南、贵州、河南、陕西等省和来自江苏北部的外地劳动力前来打工。

(2)是农民富裕的一条希望之路。1992年,中国农民人均收入比上年净增部分的61.7%,江苏省农民收入比上年增净部分的82.6%,都来自乡镇企业。如今在江苏,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没有乡镇企业的发展,就没有广大农民的富裕生活。

(3)乡镇企业是振兴农村和实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根本途径。振兴农村,一个很重要的方面是振兴农业,振兴农业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乡镇企业是增加农业投入的重要来源。从全国来说,1978年以来乡镇企业直接用于补农建农资金达652亿元,相当于国家同期对农业投入的84.3%;1992年,直接用于农业的资金105亿元,相当于国家当年对农业投入的93.2%。从江苏省来说,自建立农业合作发展基金制度以来的7年间,共筹集资金30.87亿元,年均4.41亿元;1992年苏锡常3市一年间就筹集农业合作发展基金4.43亿元,相当于当年国家对该地区农业投入的2.01倍。用乡镇企业的赢利支持农业,为农业的现代化、专业化建设提供了强大的物质保证。

(4)乡镇企业是繁荣小城镇、缩小城乡差别的物质基础。1992年,江苏乡镇企业用于小城镇建设的资金为16亿元。乡镇企业本身的变化和它所提供的物质基础,使小城镇的面貌一年一个变化,有的已经比城市更为漂亮。

(5)乡镇企业是推动农村精神文明建设、提高农民整体素质的推动力量。乡镇企业的发展促进了农民的知识化、专业化,造就了一支新型产业大军,涌现出大批优秀企业家;为农村教育、文化等各项事业的发展,为农民告别陈旧的思想观念、树立现代生活观念,为农民素质的全面提高,提供了物质保证;解决了国家和地方政府无力解决的许多重大问题;在搞好农村社会治安、计划生育、社会福利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1978年以来,江苏乡镇企业为农村教育、社会福利等事业提供发展资金达126亿元。

(6)乡镇企业是国家财税的重要来源。1992年,江苏乡镇企业

上交国家税金 47.27 亿元，占全省财税收入的 31%。

1992 年以来，江苏乡镇企业的发展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出现了一些新的发展趋势：

(1)在管理体制和经营体制上，更活了。特别是对乡镇企业进行的大规模股份制改造，使乡镇企业拥有真正独立经营的自主权。

(2)在市场开拓上，外向了。乡镇企业的许多产品都打入了世界市场。1992 年，江苏省生产出口产品的乡镇企业 9418 家，出口产品交货额近 400 亿元。在出口创汇的同时，乡镇企业与国外企业的“嫁接”迅速发展，这类企业目前已达 9000 多家。

(3)在企业发展规模上，变大了。1992 年，江苏乡镇工业年产值超过 1000 万元的企业为 4541 个。这些企业只占全省乡镇工业企业的 5%，实现产值却占总产值的 52.51%。到目前为止，江苏省已组建年利税 1000 万元以上的大型乡镇企业集团 50 多家。

(4)在生产力水平上，提高了。大批乡镇企业开始告别低级的作坊式生产，逐步向技术密集型生产和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农民最早创办工业的无锡县，1992 年的技术改造投入达 20 多亿元，使一半左右骨干企业的技术装备现已达到国内最先进水平。

(5)在企业布局上，集中了。近年来大量建设的乡镇工业开发小区，有效地改变了过去乡镇企业布局上“村村冒烟、遍地开花”的不合理现状。

至此，乡镇企业发展的新趋势，我们可以用五个字来概括，这就是：“活、外、大、高、集”。

二、大分“一村一品”运动在江苏的影响

大分县以在平松守彦知事先生指导下的“一村一品”运动闻名海内外。早在 80 年代初期，中国从东到西、从南到北的许多地方，就开始重视大分县“一村一品”运动的经验。1984 年，上海就开展了“一街一品”活动，武汉开展了“一街一宝”活动，天津开展了“一

村一计”活动，江苏省的许多市县早有“一乡一品”、“一镇一品”的经验。

中国认识大分，熟悉大分，从何而来？应该说，首先是由于大分的“一村一品”运动。在江苏，大分经验的影响由来已久，且影响力越来越大。其原因，是因为江苏发展乡镇企业，其内涵与“一村一品”运动是相通的。这就是从本地资源和具体条件出发，努力生产出高质量的一流产品，具有在世界市场上竞争的能力。因而，江苏人对大分经验给予高度的评价。

第一，大分的“一村一品”与江苏的乡镇企业，都是农民发家致富的有效途径。和大分人一样，中国农民最为关心的问题之一就是如何富裕起来。事实胜于雄辩，发展“一村一品”和乡镇企业，都使农民的生活逐渐富裕起来。江苏自发展乡镇企业以来，农民的收入年年有较大增长。从1987年到现在的15年间，农民人均纯收入平均每年递增14.7%。

第二，大分的“一村一品”与江苏的乡镇企业，都是振兴农村、振兴家乡的重要手段。大分的“一村一品”运动开展得很有成效，不仅使农村留得住人口，而且还富裕了一个村，振兴了一个町，使原来留不住人才的乡村变成了充满活力、吸引人才的一片热土。江苏通过发展乡镇企业，成功地壮大了集体经济，有力地推动了乡村建设。农村中许多崭新的小城镇拔地而起，使人耳目一新。今日江苏的许多乡镇，已成为“乡村中的都市”，平坦的马路，漂亮的楼房，繁华的商业中心，欢腾的娱乐中心，郁郁葱葱的树木，穿流不息的人流、车流……，农民在乡村中过着城市的生活。

第三，大分的经验启发江苏农民，开发资源和开发市场，一定要寻找合适的途径。大分的成功实践说明，“一村一品”是开发资源、开发市场、走向世界的成功之路。开发资源、开发市场，要有专业化的特色。在中国，历来就有生产专业化的传统，如我的家乡——吴江市，有盛泽丝绸、黎里日用化工产品、平望辣油、太湖大

上交国家税金 47.27 亿元，占全省财税收入的 31%。

1992 年以来，江苏乡镇企业的发展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出现了一些新的发展趋势：

(1)在管理体制和经营体制上，更活了。特别是对乡镇企业进行的大规模股份制改造，使乡镇企业拥有真正独立经营的自主权。

(2)在市场开拓上，外向了。乡镇企业的许多产品都打入了世界市场。1992 年，江苏省生产出口产品的乡镇企业 9418 家，出口产品交货额近 400 亿元。在出口创汇的同时，乡镇企业与国外企业的“嫁接”迅速发展，这类企业目前已达 9000 多家。

(3)在企业发展规模上，变大了。1992 年，江苏乡镇工业年产值超过 1000 万元的企业为 4541 个。这些企业只占全省乡镇工业企业的 5%，实现产值却占总产值的 52.51%。到目前为止，江苏省已组建年利税 1000 万元以上的大型乡镇企业集团 50 多家。

(4)在生产力水平上，提高了。大批乡镇企业开始告别低级的作坊式生产，逐步向技术密集型生产和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农民最早创办工业的无锡县，1992 年的技术改造投入达 20 多亿元，使一半左右骨干企业的技术装备现已达到国内最先进水平。

(5)在企业布局上，集中了。近年来大量建设的乡镇工业开发小区，有效地改变了过去乡镇企业布局上“村村冒烟、遍地开花”的不合理现状。

至此，乡镇企业发展的新趋势，我们可以用五个字来概括，这就是：“活、外、大、高、集”。

二、大分“一村一品”运动在江苏的影响

大分县以在平松守彦知事先生指导下的“一村一品”运动闻名海内外。早在 80 年代初期，中国从东到西、从南到北的许多地方，就开始重视大分县“一村一品”运动的经验。1984 年，上海就开展了“一街一品”活动，武汉开展了“一街一宝”活动，天津开展了“一

村一计”活动，江苏省的许多市县早有“一乡一品”、“一镇一品”的经验。

中国认识大分，熟悉大分，从何而来？应该说，首先是由于大分的“一村一品”运动。在江苏，大分经验的影响由来已久，且影响力越来越大。其原因，是因为江苏发展乡镇企业，其内涵与“一村一品”运动是相通的。这就是从本地资源和具体条件出发，努力生产出高质量的一流产品，具有在世界市场上竞争的能力。因而，江苏人对大分经验给予高度的评价。

第一，大分的“一村一品”与江苏的乡镇企业，都是农民发家致富的有效途径。和大分人一样，中国农民最为关心的问题之一就是如何富裕起来。事实胜于雄辩，发展“一村一品”和乡镇企业，都使农民的生活逐渐富裕起来。江苏自发展乡镇企业以来，农民的收入年年有较大增长。从1987年到现在的15年间，农民人均纯收入平均每年递增14.7%。

第二，大分的“一村一品”与江苏的乡镇企业，都是振兴农村、振兴家乡的重要手段。大分的“一村一品”运动开展得很有成效，不仅使农村留得住人口，而且还富裕了一个村，振兴了一个町，使原来留不住人才的乡村变成了充满活力、吸引人才的一片热土。江苏通过发展乡镇企业，成功地壮大了集体经济，有力地推动了乡村建设。农村中许多崭新的小城镇拔地而起，使人耳目一新。今日江苏的许多乡镇，已成为“乡村中的都市”，平坦的马路，漂亮的楼房，繁华的商业中心，欢腾的娱乐中心，郁郁葱葱的树木，穿流不息的人流、车流……，农民在乡村中过着城市的生活。

第三，大分的经验启发江苏农民，开发资源和开发市场，一定要寻找合适的途径。大分的成功实践说明，“一村一品”是开发资源、开发市场、走向世界的成功之路。开发资源、开发市场，要有专业化的特色。在中国，历来就有生产专业化的传统，如我的家乡——吴江市，有盛泽丝绸、黎里日用化工产品、平望辣油、太湖大

头菜，还有泰兴的银杏，吴县的珍珠，江都的花木，等等。江苏的许多乡镇企业，就是在资源开发专业化的基础上形成的，因而就具有较高的经济效益和走向世界的竞争力。

第四，无论是“一村一品”运动还是发展乡镇企业，最重要的收获就是开发了人才，培育了人才。大分的“一村一品”运动，不仅生产了日本乃至世界一流的产品，而且还涌现了一大批高素质的人才。江苏乡镇企业的发展，同样造就了一支新型的产业大军，一支优秀的农民企业家队伍。大分称为“带头人”，江苏称为“乡镇企业家”。正是这些人才，又把“一村一品”和乡镇企业的发展推进到一个更新更高的水平。

三、农村振兴问题的世界思考

振兴农村的问题，已成为当今世界各国面临的共同问题。无论是生产力水平相当发达的日本，还是目前生产力水平还不那么发达的中国，农村的发展和繁荣问题都是一个值得人们严重关注的重大课题。中国的学者认为，研究农村和农民，是社会科学的尖端课题，是严肃学者的历史责任，而透过“一村一品”和乡镇企业，我们可以找出振兴农村的共同思路。是否可以认为：

(1)振兴农村，必须找到一条从当地情况出发、农村和城市共同发展的道路。它的意义不仅在于发展农村，而且不能以损害农村利益或城市发展为代价。现在要求实现的是城乡共同发展、共同繁荣。中国通过发展乡镇企业，打破了农村搞农业，城市搞工业的传统模式，使城乡在产业发展上共同成长。与此同时，乡镇企业的发展带动了小城镇的振兴，也就是旧城镇的改造和新城市的诞生。大量从事乡镇企业的职工(农民)，进入小城镇，而不是涌入大城市，这样，既繁荣了小城镇和乡镇企业，振兴了农村；又稳定了城市，为城市的健康发展创造了条件。我认为，“一村一品”运动同样具有兼顾城乡利益、谋求城乡共同发展的优越性。“一村一品”使大分农民

看到了实实在在的利益，使农村的青年一代愉快地留在家乡，开创自己的事业，这确实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2)从世界范围来看，农村的振兴，必须有赖于工业化的支持。大分的“一村一品”运动和江苏乡镇企业的发展都表明，农村振兴过程中，必须发展农村工业化。没有农村工业化的发展，就没有农村振兴的一些必备条件。这些条件的获得只有通过农村工业化的途径，而单纯依靠农业的积累，则是一个相当长的、极其艰难的过程。在现代经济发展一日千里的今日，靠农业的有限积累来振兴农村是不现实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农村工业化是振兴农村的必由之路。而大分的“一村一品”和江苏的乡镇企业，都是农村工业化的不同表现形式。

我的结论：江苏乡镇企业与大分“一村一品”运动，都是振兴农村和城乡共同发展的有效途径。这一点，对于世界范围内很多发展中地区的农村振兴，都有借鉴意义。

谢谢各位。

(1993年11月5日)

莫名篇



追 念 顾 愉

顾愉同志这么快地就走了，突然得凡是认识他的人都感到震惊。

我与他共事三十余年，有着十分相似的经历，可说患难之交，他的过早地去世，不能不使我们有痛心之感。回想1962年同在北京参加中央举行的七千人大会，住在海淀友谊宾馆时，他、我和还有一位朋友，年青气盛，爱作儿戏，三个人曾不止一次地一口气从一楼奔上第十四楼，同坐电梯的同志比速度，常常是我们三个人先到。曾几何时，顾愉竟先我们撒手而去。他的过早去世，已被确诊是胃癌所致，然而，有谁能确诊胃癌又是从何而得呢？岁月可贵而易逝，精英无多而早，科学何时能征服这无情的癌？

6年前我母亲去世了。我对母亲的感情很深，但我没有流过那么多的眼泪。这不是我不爱我的母亲，而是因为母亲已享年八十有六，可算无疾而终。顾愉才五十有九，一张娃娃脸，从来用笑眼和低声同人们周旋，无人不认为他长得年轻而可亲。我母亲的遗体火化那天，我没有告诉任何人，还关照本部门的同志也不要来，但顾愉老远地赶来了。我有点意外，当然也感激。我之感激，倒不是认为顾愉的屈尊（当时他身为省委代秘书长），而是因为顾愉带来了人情味。他没有讲究规格。他是知道一点我母亲的清寒出身和我对母亲的感情的，所以他以向我母亲的遗体致以最后一躬的人情味来安慰他的朋友。

顾愉是个认真的人，大事上从未糊涂，小事上如此细心，使人可亲以其富有人情味，使人可信以其无害人之心，一生能博得可亲

可信之誉，顾愉此去泉台应无憾了。

从1966年以来，十年"文革"，八年江西，两度靠边，对顾愉来说，可谓二十余年宁日不多，揪心事不少，担子不轻，心力交瘁。凡处逆境，身有委屈，辄易发火，易离群，易以冷漠态度处世，这类例子不少。顾愉不然，不如意事常随左右，从来处之泰然，从不怒形于色，对工作从不懈怠。为公如此，为人如此，令我折服，亦令我痛惜。

从1952年算起，整整40年，顾愉尽职于文字翰墨之中，一纸一笔即是千军万马，夜以继日，纵论省国内外，脑汁绞尽，手指茧生，开夜车、无假期是常事，有米之炊要做，无米之炊也做，而且立时立刻要拿上桌面，此中艰苦，有多少知音？因而翰墨之门常使许多青年为之却步，使许多有为之士另觅蹊径。顾愉一涉此门竟40年不拔，孜孜以求，直至病已不起，举步维艰，犹一手挂水，一手执笔改抗洪报告，此情此景，犹有何说！

前尘驹逝，隽者不寿，留吾辈钝驽滥竽，唯念之愧之而奋起。

（1991年9月28日，载《扬子晚报》）

理·利·情·义·法

——《中国社会报》笔谈

《中国社会报》出了一个好题目，要大家讨论“新时期的人际关系”问题。这无疑是许许多多人都在关心和实践着的问题，或者不少人正在为这个问题所困扰着而感到苦恼。本人在中国社会里已同各色各样的人们打了四五十年交道，自感尚未吃透个中三昧，纵然时有甜蜜亲切之感，亦时有苦涩失望之痛。然而无论如何，要想跳出人海，图个完全清静，不同任何人打任何交道而不发生人际关系，则是不可能的，对此还是有清醒认识的。

新时期的人际关系，如果一定要我说个究竟，我认为无非要摆正和妥善处理好“理、利、情、义、法”五个字的关系。这五个字在当今社会，人人碰得着、摸得到，似虚而实，缺一不可；你不想碰它，它在围着你转，回避不了，摆错位置也不行。至于如何摆正五个字的位置，千字文是说不清的。简而言之行不行？也难。这里只能讲我个人的一点体会，即：新时期的人际关系，作为一种行为规范，要既适应现代社会中交往的需要，又应继承中国传统中的美德，这样才谈得上与“理、利、情、义、法”五个字沾上边、摆得正。

举例来说，“轻诺必寡信”这句话，应是人际关系中的一个信条，既是当今社会各种交往中应注意的，也是我国历史流传多年的古训。上级对部下，“轻诺”不是应提倡的风气，随便许愿换来的将不是“威信”，而是失信以后的鄙视。同级之间、朋友之间也是如此，承诺一些自己力不能及、于理于法不容的事情，久而久之，就会在朋友之中留下“说大话”、“为人不诚”的轻蔑感。不轻诺，并非只顾己、不顾人，只求人、不帮人。人际关系总是双边或多角的，这需要

实事求是，量力而行，先做再诺，在理、利、法之间，在情、义、法之间作一估量，耍“哥们儿”脾气于事无济，也有危险。

再举例来说，“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也是人所熟知的一句古训。经过十年动乱以后的人际关系，“患难之交”尤其为人们所珍视。我个人也是理解和珍视这一点的。但是从全社会来说，对此要作理性的接受和理性的表现。具体来说，两人之间或两家之间在“恩”与“报”的问题上，如果涉及到他人利益或社会利益，则应遵守道德规范和社会规范，情、理兼顾，义、利无偏，法为准绳，庶几利己利人利社会。

（1991 年 5 月 27 日，载《中国社会报》）

一句未必适宜的开场白

现而今的社会里，可谓无日无会，无事不会，开会是最大的行业和最通用的手段。如果成立个什么“会议协会”，必是拥有最多会员的超级协会。过去是天下名山僧占多，如今是天下宾馆会占多。何时开会，开多少天为宜，有时往往不以领导机关的意志为转移，而是由会议招待所的排队先后来决定。宾馆盖得再多，更多的会议总能塞满它们，还要一再事先通知“不得超员”。

兹事体大，不是本文要讨论的。

这里想说的是每逢开会——不论是什么会——必定听到的一句开场白：“各位领导，各位……”。尽管有许多会议未必都有可称之为领导干部的人在场。

把它称为未必适宜的开场白，因为这句开场白有的属于文不对题，有的属于名不副实，有的属于俗不可耐。

有一个小学的家长会，学生代表银铃般的致词就从“各位领导”开始。有一个新闻发布会，毫无疑问，主要对象是各个新闻单位的记者，主持人也言必从“各位领导”开始。为一本著作举行论证，教授、研究员坐满了长条桌，主持人往往视“群贤”如无物，一开口就是“各位领导”。这一“惯例”还通行到了许多非会议性质的群众性场合，如演唱会、音乐会、戏曲演出等等，主持人很简单的几句开场白，也把“各位领导”放在第一位。台下可能坐着几位领导干部，但他们也是听众或观众，是众多欣赏者中的一员，同样是来欣赏艺术，“轻松一下”的。这句“各位领导”的开场白，听来总有些不太适宜的别扭感。

事出必有因。这句开场白的通行无阻和流行愈来愈广，据有的社会学家分析，认为颇具中国特色，是当今社会风气的一种折射，是人们观念形态的一种反映。“称谓学”常常最敏锐地反映着人们关系之间的变化。

我的主张是：开场白要分场合，要看主体对象。有的场合称呼“各位家长、各位老师”无疑最天公地道。有的场合主持人称一声“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其实最亲切。有的场合则就是“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最合适，也挺庄重……。该让“领导”休息的就不必提到他们了，否则，“领导”太累啦。

对此颇有同感的肯定大有人在，我无非是写了出来而已。

（1994 年 3 月）

调查研究的立脚点

这次我应刘济民书记的邀请，专程前来参加无锡市委的调查研究报告会。今天一天，听了陈璧显等八位同志的报告，深感此行不虚。他们八位同志的报告，内容丰富，水平整齐。说它内容丰富，因为八位同志都是市级领导班子的负责同志，从各自的工作实际出发，作了较长时间的调查研究，身有深入，心有所得，使大家听了获益不浅。说它整齐，因为他们讲得很实在，是围绕着各自工作中的重大实际问题在讲话，不是讲一般的道理，听了觉得有用，有启发。这场报告会，可以称之为“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前两天我们不是从中央电视台看到了两场转播的京剧“八仙过海”吗？吕纯阳有吕纯阳的本领，铁拐李有铁拐李的本领，真是各显神通，满台好戏。虽然他们各显各的本领，但是任务是共同的，就是要合力战胜那位碧波仙子，滔滔东海，狂风巨浪，他们要战胜碧波仙子而抵达东海的彼岸。

所以，听了今天八位同志的报告，尽管他们的调查有各自的角度和重点，还是可以找到共同的东西，给我们以普遍性的启发。我的认识，是不是有这么几条呢？

第一条，从他们的报告可以看到，任何部门的调查研究，都应该围绕党委的中心，这才能抓住根本问题，而不应该有离开党委中心的孤立的自己的中心。

当然这并非意味着每个部门都是研究同样的东西，说同样的话，但都是对党委中心的深化，或是为党委的中心服务，或是使党委的中心得到保证。

第二条，党委的中心是什么呢？全党各级都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是党的基本路线规定了的。因此，调查研究工作很自然地将反映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特色。从今天八位同志的报告来看，有几位是直接讲经济建设的，其他几位同志虽然不是直接讲经济建设，如吴钊同志讲到的无锡机场问题，难道同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紧密吗？再紧密也没有了。组织部长王家骏同志讲的组织工作的主旋律问题，军分区政委讲的忧患意识问题，纪委书记讲的四个观点，张怀西副市长讲的人才问题，同这个中心都是很紧密的。这说明，围绕着中心来开展调查研究工作，对实际工作就大有帮助，对党委中心工作的深化大有帮助，对部门工作的深化才抓住了根本。

第三条，八位同志所作的报告，都有无锡实际，有无锡风光，有一种无锡精神。什么是无锡精神？无锡精神是什么？外来之客，不敢妄议，但我对无锡的过去和现在并非全无所知，是否可以表述为：是一种敢于坚持认定是正确的东西并不断完善它的精神，是为无锡 410 万人民的根本利益孜孜以求的实践。这种精神是实现我国四个现代化所必需的，是今后应该继续予以发扬光大的。

愚者千虑，必有一得，智者千虑，必有一失。诸葛亮的食少事烦，事必躬亲，不是人人都做得到的。我们既要有自己亲身的调查，也要善于运用第二手的调研成果，善于运用调研部门。这才是善于工作，才是领导艺术。

在 1991 年伊始，1990 年刚刚过去，无锡市委以调查研究作为开端，我相信，今年一定能够取得各项工作的新发展！

（1991 年 1 月 31 日）

对改革告别仪式的一项建议

由于不可抗拒自然规律，省各级负责人和机关干部被通知去参加告别仪式的日见增多。然而南京石子岗公墓离城如此之远(这是正确的)，参加一次告别活动所用的时间、精力和物质消耗，参加者都是身有所感的。如属盛暑严冬季节，更非那些年高体弱的同志所能连续承受得了的。

鉴于时间和精力主要花在赶路上，建议着重先对这一点进行改革。

1、不在石子岗举行遗体告别活动，而以别的更合适的形式向去世的同志表示敬意。遗体火化，只由亲属子女(或组织指派一两名同志陪同)办理。

2、根据死者的身份和生前贡献，在单位所在地举行一定的悼念活动。如开追悼会，则挂遗像，骨灰盒一般不再进城。

3、作此改革后，对石子岗公墓礼堂会产生什么影响，未作调查，不敢预言。但城南和城外还有那么多单位，料想不会闲着。

(1987 年 8 月 12 日)

论 大 字 报

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是大字报风行的十年。文化大革命孕育了大字报，大字报推动了文化大革命。事实告诉我们：没有文化大革命这种内容和规模的运动，不可能造成铺天盖地十余年的大字报，具有那么大的摧毁力；没有大字报这样一种大民主形式，文化大革命也将难于收到那样“横扫一切”的效果。在文化大革命的舞台上，大字报是各种角色手里的有力兵器。

如今，文化大革命已经由党的十一次代表大会宣布结束了，然而，大字报这个中国特有的形式却没有得到应有的评价，依然活跃于某些街头。人们不禁要问：帷幕已经落下，角色已经退场，为什么还要让这种滥用了的兵器留在舞台上呢？现在是不是应该来议一议大字报这种形式呢？

大字报在文化大革命中所起的作用，被实践证明有其致命的弱点

大字报在文化大革命中象一股不消失的八级台风，在中国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翻来滚去，起到了大乱特乱的作用。毫无疑问，林彪、“四人帮”对这种形式的“大民主”是十分欣赏的，利用它来为他们篡党窃国的野心服务。正因为如此，大字报在文化大革命的十年中，充分暴露了它自己的致命弱点。

第一，大字报是为夺权服务的，是为了夺权而产生、而存在的。文化大革命的初期，是为夺刘少奇的权服务；后来，为夺各级党委的权服务，从省、市委一直夺到支部。有人可能要问：难道从上到下的夺权，要由大字报来负责吗？当然不是。但是，大字报对各级领

导干部的“揭发”，无限“上纲”，这种不允许当事人有任何申辩和见证人作任何说明的一面之词（这种一面之词又不需要负任何责任），对于搞臭党和政府各级负责人，使广大群众对组织一度失去信心，起了很大作用。

第二，发扬民主，应该“不抓辫子，不戴帽子，不打棍子”。不幸的是，大字报作为“发扬民主”的一种形式，后来又被用来打派仗，用来对付各自的对立面。一张口就是“打倒”、“勒令”，一出手就力图把对方搞臭、搞垮，因而尽可能地抓辫子、戴帽子、打棍子。大字报上的消息，真的、假的、夸大的、片面的、捏造的，比比皆是。大字报上的点名、勒令，比法令还严厉，真有生杀予夺之权。因此大字报竟然成了严重破坏民主和法制的一种形式。

第三，大字报流行到后来，作者用假名，不具名，已经成了理所当然。这是世界上任何一种出版物所没有的现象。“××战斗队”，“××造反总司令部”，牌子大得吓人，其实只是少数人甚至三几个人的一个皮包公司。一支排笔，一桶浆糊，就可以为所欲为，把全城搞得风声鹤唳，草木皆兵。因此，文化大革命中的大字报，竟然成了世界上“威力”最大的、最不负责任的一种出版物，也是在不正常状况下的一种合法不合理的出版物。

大字报不是发扬民主的理想形式，更不是唯一形式

在我们国家里，发扬人民民主是一件极其重要的事情。在党的领导下，人民愈能享有当家作主的民主权利，就愈能充分发挥自己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就愈能促进四个现代化的早日实现。过去需要民主，今天需要民主，将来也需要民主。

问题是我们需要民主，是否就非要通过文化大革命“完备”起来的那样一种大字报形式不可？这在当前全党工作重心转移到四化建设上来的新形势下，是很有必要重新认识的一个问题。内容决定形式，一定的形式又代表一定的内容。我国社会主义民主的内容，我认为，同大字报这种形式并非有必然的联系。就是说，不能认

为离开了大字报这种形式，民主就不存在了；只有上街贴大字报，才叫民主。不是那么一回事。

从现实情况看，我们现在发扬民主的内容是很丰富的。首先是我们国家有着大量的人民内部矛盾需要正确处理；尤其在最近几年，林彪、"四人帮"遗留下来的不少问题需要积极地、有步骤地解决。从这些问题的内容看，如果用大字报来讨论和研究，并不是理想的形式。因为面临这些问题的人，无论是领导还是群众，无论是解决问题的人还是被解决问题的人，都是站在一条阵线上的，完全可以通过党、政府和群众之间联系的各种途径，运用共同讨论、协商一致等方法来解决，而绝不是非要拿起大字报这个兵器不可。

从历史情况看，文化大革命以前，我们党内生活一般是生动活泼的，上下、干群之间的关系基本上是融洽的。那时，民主生活比较正常，但并没有采取写大字报这种形式。这说明，大字报并不是发扬民主的必要形式。在个别群众运动中，如反右派运动中，也出现过一阵子大字报。老实说，有些是奉命办事，有些也出现了扣大帽子、乱加分析的苗头，对反右的扩大化曾经起过推波助澜的作用。只是由于当时大字报限于贴在内部，搞了一阵子就停下来了，所以大字报的先天性弊病还没有充分暴露出来，没有引起人们的足够注意罢了。

有人说：大字报过去没有必要，现在大有必要了，因为领导上有官僚主义，没有大字报不足以克服官僚主义。应该承认，实际生活中的官僚主义是存在的。群众和下级对领导机关的官僚主义提出善意的批评是应该和必要的。但是，尽可以上访面谈、写信反映、会上发表意见、向纪律检查机构揭发，……渠道是大量存在的。特别要充分发挥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作用，这是最重要的渠道和讲坛。用大字报上街的办法"施加压力"，显然不是合理和妥善的方法。

有人说：大字报是为了讨论问题，是"民主论坛"。我认为，有意

见要发表，有观点要切磋，尽可以在本单位内讨论，一个车间或工厂——是大可以作为一座民主论坛了。还可以写文章投给报刊，让自己的观点为更多的人来了解和讨论。言之有物的文章，我看今天的报刊是不会嫌其多而只会嫌其少的。

大字报对实现安定团结和人人致力于四化是弊多利少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胜利结束，标志着全党工作着重点已经开始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在新的伟大的历史任务面前，必须进一步促进全国的安定团结，继续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巩固人民民主专政，建立和维护良好的生产秩序、工作秩序和社会秩序。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各级领导机关可以集中主要精力抓好社会主义建设，保证广大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其他劳动人民可以专心致志地劳动、工作和学习，保证党和国家各项决议的顺利实现。这是加快我国四个现代化进程的基本条件，是全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所在。

大字报——特别是大字报上街，作为一种言论自由的形式，对于实现安定团结和要求人人专心致志于四化来说，无疑是弊多利少的。人们关心政治，思考一些问题，这是好事，是应该鼓励的一种积极性。那么不妨可以设想：在本单位的各种会议上发表意见，写出书面意见或文章，等等，不见得就妨碍了这种积极性。还不妨可以设想：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其他劳动人民，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都要钻研自己的业务，难道可以离开本职工作，热衷于搞大字报上街吗？不能设想，广大人民群众为了把自己的全部力量和聪明才智贡献给壮丽的四个现代化事业，因而那样地需要政治安定和社会安定，而却可以允许大字报上街分散人们的视线和精力！

我们还必须清醒地看到，现在社会上还确有个别敌视社会主义制度的反革命分子，进行现行破坏活动的各种犯罪分子，其中也有一些是没有揭露出来的或继续坚持反动立场的“四人帮”帮派分子。大字报这种形式，往往很容易为阶级敌人和各种别有用心的人

所利用。这一点，坐而论道是说不大清楚的，多年的实际生活则早已说清楚了。

所以，对大字报这种形式，应该作为中国的一种历史现象来进行研究，给以应有的评价，而不能让它似乎是天经地义而永存。生活中往往出现这种情况，有些现象如果不予深究，好象不是什么问题，因为大家习惯了；仔细一推敲，则不是那么回事。客观地说，大字报的过去，并没有给人们留下多少美妙的回忆。

有的同志所以有所异议，主要认为在 1976 年 4 月 5 日天安门广场革命运动中和粉碎"四人帮"后的清查运动中，大字报起了好作用，因而主张不能否定这种形式。我认为，"四五"运动的发生，是中国共产党长期教育的结果，是周总理这座巍巍丰碑的昭示，也是"四人帮"祸国殃民反面"教育"的结果。主要是民心所向，军心所向，党心所向。凡是亲身经历了"四五"运动的同志，都可以知道，大字报这种形式并没有发挥什么特殊的作用。至于粉碎"四人帮"以后，大字报对清查和揭批运动所起的作用，老实说，这不过是把十年来已经用惯了的兵器拿起来继续使用罢了。即使没有大字报这种形式，党和群众也是有足够的力量和能力来清查"四人帮"、揭批"四人帮"的。

但是，看来在一定时期内这种形式还难以消失，因此，有必要予以正确引导。我想，如果要求首先做到如下三条，不能算是苛刻的。

第一，大字报的作者应该具上真名，以示负责。如果连这一点都不想做到，还有什么存在的意义呢？

第二，内容上要坚持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制度。这是每个公民必须遵守的义务，也是一切出版物必须遵守的原则。

第三，诽谤要反坐，造谣要追究。只有这样，才是真正的民主，才是社会主义民主。

我国现行的宪法是允许公民有运用大字报的权利的。这一规定，无疑反映了历史的足迹。有鉴于此，谨作为一个公民的建议，提请下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考虑修改这个规定。

（载《民主与法制》杂志1979年第5期，《文汇报》1980年2月11日转载）

(苏)新登字 007 号

鲈乡萍踪

作　　者：朱通华
责任编辑：陈咏华

出版发行：江苏文艺出版社(邮政编码：210009)
经　　销：江苏省新华书店
印 刷 者：江苏省文化厅印刷厂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14.1875　插页 2
字数：354,000　1994 年 1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数：1—2000 册

标准书号：ISBN 7—5399—0737—1/I・702
定　　价：精装：18.00 元　　平装：15.00 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